

责任编辑：李言英  
封面设计：张文强

##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蓝色经济建设的生态伦理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格局与空间重组研究

数字艺术法哲学

古希腊经济思想研究

让理想回归现实

——唯物史观语境中的自然权利



定价：32.00 元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文库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  
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牛喜霞 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人民出版社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 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牛喜霞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 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牛喜霞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牛喜霞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1. 11  
ISBN 978-7-209-12528-4

I. ①当… II. ①牛… III. ①农村—社会资本—研究—中国 IV. ①F3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70934 号

###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DANGQIAN NONGCUN SHEHUI ZIBEN DE XIANZHUANG JIEGOU JI YINGXIANG YINSU  
牛喜霞 著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人 胡长青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 165 号  
邮 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98914  
市场部(0531)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169mm×239mm)  
印 张 18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1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12528-4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 目 录

导 论 .....	1
一、问题的提出 .....	1
二、研究的意义 .....	4
三、叙述逻辑 .....	6
<b>第一章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与研究设计 .....</b>	<b>10</b>
<b>第一节 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综述 .....</b>	<b>10</b>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相关研究综述 .....	10
二、文献简评 .....	31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 .....	34
<b>第二节 研究设计 .....</b>	<b>36</b>
一、理论框架 .....	36
二、研究地点的选择 .....	44
三、研究方法 .....	45
四、研究过程 .....	48
五、资料搜集的困境 .....	50
<b>第三节 研究地点概况 .....</b>	<b>52</b>
一、山东省村落介绍 .....	52
二、西部地区研究地点详细情况 .....	62

第四节 信度分析 .....	67
一、个体社会资本的信度分析 .....	67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信度分析 .....	68
三、农村社区生活状况的信度分析 .....	70
<b>第二章 农村居民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状况 .....</b>	<b>71</b>
第一节 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及研究假设 .....	71
一、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 .....	71
二、研究假设 .....	72
三、统计模型 .....	75
第二节 农村居民的咨询网分析 .....	76
一、咨询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	76
二、咨询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	77
第三节 农村居民情感网分析 .....	79
一、情感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	80
二、情感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	81
第四节 农村居民帮工网分析 .....	83
一、帮工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	83
二、帮工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	84
第五节 农村居民信任网分析 .....	87
一、信任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	87
二、信任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	88
第六节 农村居民借贷网分析 .....	90
一、借贷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	90
二、借贷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	91
第七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 .....	94
一、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计算模型 .....	94
二、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现状 .....	96

第八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差序格局”变异分析 .....	99
一、农村居民社会网的提名顺序 .....	99
二、关系强度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	105
第九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 收入差异和权力差异分析 .....	107
一、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	107
二、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	111
三、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权力差异 .....	113
本章小结 .....	117
<b>第三章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 .....</b>	<b>123</b>
<b>第一节 社区参与 .....</b>	<b>126</b>
一、一般社区参与 .....	126
二、特殊社区参与 .....	131
三、社区参与小结 .....	135
<b>第二节 社区归属感 .....</b>	<b>136</b>
一、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 .....	137
二、喜欢所在社区 .....	138
三、关心本村事务 .....	139
四、相信村庄会越来越好 .....	140
五、社区归属感小结 .....	141
<b>第三节 合作 .....</b>	<b>142</b>
一、与村民的合作 .....	142
二、与村委会的合作 .....	144
三、与政府的合作 .....	145
四、与企业的合作 .....	146
五、与中介组织的合作 .....	147
六、合作小结 .....	149

第四节 共享	150
一、食物共享	150
二、农具共享	151
三、信息共享	152
四、共享小结	153
第五节 互惠	154
一、农忙互助	154
二、红白喜事相互帮忙	156
三、邻居间互相回报	156
四、不计报酬的帮忙	157
五、互助小结	158
第六节 信任	159
一、制度信任	160
二、熟人信任	164
三、普遍信任	168
四、信任小结	170
第七节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及整体状况	172
一、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	172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	176
本章小结	177
<b>第四章 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b>	<b>180</b>
第一节 个体因素	180
一、个人生活环境	180
二、年龄	181
三、民族	182
四、文化程度	183
五、社会地位	185

第二节 家庭因素	186
一、家庭人口结构	186
二、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	187
三、家庭经济状况	188
第三节 村落发展因素	189
一、村庄居民黏合程度	190
二、经济发展程度	192
三、乡村政治环境	193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耦合	194
第四节 社会转型因素	196
一、市场化的冲击	196
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198
本章小结	200
<b>第五章 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几点思考</b>	<b>201</b>
第一节 国外先进经验及其启示	201
一、国外促进和发展社会资本的先进经验	201
二、启示与思考	204
第二节 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意义	209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实现	210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实现	211
三、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管理民主”的实现	212
四、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	213
第三节 提升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路径	214
一、经济发展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增加的基础	214



二、政府善治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的突破口·····	218
三、文化教育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点·····	223
四、创新社会管理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土壤·····	225
本章小结·····	229
<b>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b> ·····	<b>230</b>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230
二、本研究的贡献·····	234
三、研究的不足之处·····	239
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41
<b>参考文献</b> ·····	<b>244</b>
<b>附录 1： 村民问卷</b> ·····	<b>259</b>
<b>附录 2： 村主任问卷</b> ·····	<b>270</b>

# 导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从理论上，城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村经济演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趋向，即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论”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改造论”。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型农村，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实践和探索来看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以及东亚的韩国和日本等，都有农村综合建设的实践过程，典型的如以圈地运动为发轫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英国模式，韩国的“新村运动”和日本的“造村运动”等。我们国家自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关于如何建设新农村，目前主要有三种代表性意见：一是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拉动内需”说，即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必须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市。二是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农民合作”说，即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三是政策部门的观点，如陈锡文（2005）<sup>①</sup>认为，新农村建设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要坚持发展农村生产力；要加快完善农村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要通过城乡统筹解决农民最无奈、最无法解决的问题；要建设一个好的农村环境。

---

<sup>①</sup> 陈锡文：《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2005年第11期。

纵观以上研究,在新农村建设中,其着眼点是硬件建设,而对诸如信任、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合作组织,以及公共精神涉及农民主体性意识、信念、农民观念的改变等软件方面疏于关注。自布迪厄于1980年正式提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中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993)<sup>①</sup>。这一定义强调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可见,社会资本作为一种为促进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和网络,它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繁荣具有积极意义。而建设和谐新农村,需要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可见,社会资本理论对此有很强的解释力。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见,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内在关联性,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重构和提升农村社会资本,而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与提升又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进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普特南第一次从社区层面对社会资本及其功效进行了研究,使社会资本的概念真正引起了广泛关注。普特南和他的同仁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在这本书中,普特南是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

---

① 符平:《社会资本和个体经营者的创业与发展》,《社会》2003年第2期。

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2）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3）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从普特南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后来，福山等人的研究指出，社会资本存量高可以促进社区经济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我国的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社会资本在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社区凝聚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新农村建设研究。再次，从实践层面来看，加强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加强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大变迁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姻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与业缘关系已经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谢建社、牛喜霞，2004）<sup>①</sup>。从而，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国农村社会原来丰富的社会资本开始变得不足甚至出现了匮乏，主要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取代，网络性社会交换逐渐被非网络性社会交换取代，和睦友好团结的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化。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和负面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这种匮乏状态已妨碍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

---

<sup>①</sup> 谢建社、牛喜霞：《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江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制约（牛喜霞、谢树芳，2006）<sup>①</sup>。为此，深入分析和探讨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现状，针对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相互不信任、规范缺失、公民参与网络不发达以及社会监督缺位等现状提出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与对策，应该成为促进当下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题中之义和重要视角。

## 二、研究的意义

如何建设农村，如何发展农村，进而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和谐社会，都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和热点问题，也长期受到了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普遍关注。十多年来，围绕农村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主导性目标，研究者们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非农化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农村贫困问题，从宏观、微观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描述与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实践价值的对策与建议。但是，现有研究的着眼点仍过多关注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和外力作用，而对诸如信任、参与网络、互惠规范、合作组织，以及公共精神涉及的农民主体性意识、信念、农民观念的改变等软件方面疏于关注。也就是说，对农民这一作为农村社会的主体力量以及由农民所构成的社区力量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还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这突出表现为：在微观上，对于广泛存在于农户间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咨询网、借贷网、帮工网、信任网、情感网等）的结构、现状及其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没有较为完善、深入的实证研究；在中观上，对于农村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社区参与、合作、社区归属感、共享、互惠信任）的结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更是不多。

### （一）理论意义

本研究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理论本土化研究的一次尝试。

从我国社会文化和社会特性出发来界定社会资本，这是本文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步。因为社会资本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学者在研究西方社会时根据西方文化和社会特质提出并给予界定的、能够反映西方社会现象的概念。我

---

<sup>①</sup> 牛喜霞、谢树芳：《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们在关注这一理论并将其引入中国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一契合于西方的概念能否反映中国的社会现象：如果能，它所反映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契合中国的社会，有没有把本土中的重要现象忽略掉；如果不能，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在支撑这个概念，这个社会和文化内涵是什么，而这个概念又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基础上运作的。为此，给出一个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概念是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步。因为去掉了一个概念或理论的内化过程，是做不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构建的；而要给出一个本土化的社会资本概念，就必须了解中国人的价值定位，以及在这一价值指导下的互动模式。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此，本研究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构成社会资本的六大基本要素。其在微观层次上主要表现为农户个体通过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帮工网和借贷网所获得的资源与支持；在中观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测量维度。

## （二）现实意义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总结，并对当年和此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农民收入问题作出具体部署，首次高层次、高视角提出“三农”问题。在此之后，连续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关注“三农”问题，这十个“一号文

件”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水利设施投资力度”到“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个字总要求，足可见党中央对于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重视。而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面临着匮乏的状况，主要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互惠互利”取代，网络性社会交换逐渐被非网络性社会交换取代，和睦友好团结的农村人际关系日益淡漠化。总之，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和负面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这种匮乏状态已妨碍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牛喜霞、谢树芳，2006）<sup>①</sup>。如何才能改变当下农村社会资本匮乏的状态？如何才能使农村社会现有的社会资本发挥出正面的效用呢？我们认为，只有深入分析和探讨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现状，针对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相互不信任、规范缺失、公民参与网络不发达以及社会监督缺位等现状提出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与对策，应该成为促进当前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题中之义和重要视角。

### 三、叙述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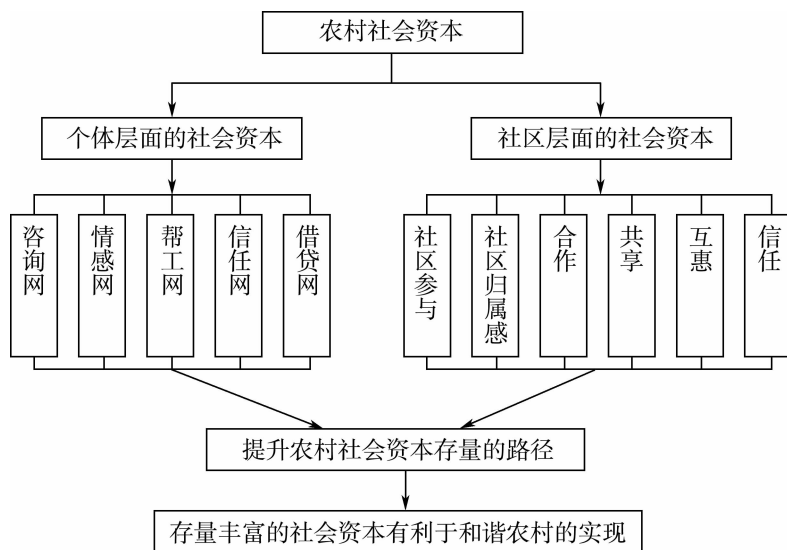
本研究按照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叙述逻辑及原则，分为六章：

第一章，社会资本理论评述与研究设计。本章介绍了与本文相关的理论观

---

<sup>①</sup> 牛喜霞、谢树芳：《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点与研究成果。综述的范围横跨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对有关文献资料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归纳和分析，指出了它们和本项研究的关系。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交代了本文的理论框架（见图1）、研究地点，说明了研究过程，阐明了研究的代表性与方法论问题，对本文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建立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并对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进行了信度分析。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分别对农村“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做了专门详细的探讨。在社会资本系统结构分析框架的指导下，分别从微观、中观层面探讨了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与现状。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是从村民的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借贷网五个维度进行研究的，具体涉及村民个体网的规模、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等状况。中观层面的社区社会资本状况是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六个维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在对鲁、陕、甘、宁四省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地区农村的社会资本现状，并对东西部地区农村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从而全面地展现了当前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



第四章，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个体因素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是首要的，它包括个体的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先赋因素包括个人的家庭出身、年龄和性别，而后致因素包括个人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等。家庭是个人生活的最基本单元，因而家庭人口结构、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也是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重要因素；村落发展因素包括村庄的区域位置、经济收入、宗教信仰、文化水平等对农村社会资本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转型，既深刻影响着村落经济、政治、文化、宗族结构的发展和变迁，又构成了当代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变迁和重构的深层社会根源。市场化的冲击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影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社会转型被用来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一方面，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流动范围和强度的提高，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其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带来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悄然变革。

第五章，农村社会资本的重构与提升。我国当前农村社会资本呈现着分布不平衡与整体存量不足、社会资本流失严重、可利用的公共资本匮乏和正式支持不足的特点；内生型社会资本的衰减与构建型社会资本的发展、非网络性社会交换与契约信用的产生与发展、货币化与商品化愈演愈烈成为当前农村社会资本发展的趋势。可见，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对于如何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本研究既结合中国本土的实际，又借鉴国外社会资本建设的先进经验，如在传统交往规则的基础上构建制度、扩大信任与合作的范围、凸显集体行动的回报、促进村庄自组织的发展、突出经济发展的社会性、重视教育的作用等。同时，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我国农村的实际，研究提出从经济发展、政治参与、文化建设、发展教育、社会管理、村庄建设几个方面去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

第六章，总结与讨论。本章对整个研究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社会资本测量

的复杂性，并提出构建农村社会资本的基本框架，指出了本报告在理论方面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之处。在此之后，反思了本报告的不足和尚待提升之处，最后提出了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本文各章之间的关系及叙述顺序，可以简要表述如下：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属基础层面；第二至第四章是对调查资料的深入研究和有关理论的应用，属探讨性层面；第五章探讨了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属于对策性研究；第六章是对研究主题所得出的结论，属结论性层面。其逻辑关系为，基础层面是探讨性和对策性层面的基础，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的调查研究，即实证研究。第二至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本文各章之间的叙述顺序和逻辑关系，详见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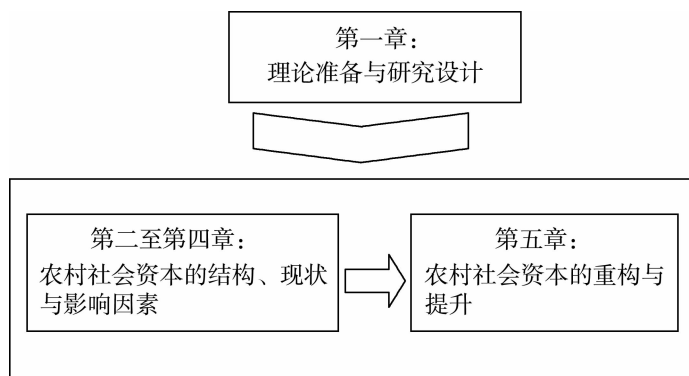


图 2 本文的叙述顺序和逻辑关系

可以说，本文是一项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基于实地调查资料之上的经验研究成果。

# 第一章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与研究设计

进行必要的理论准备和适当的研究设计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作。本章主要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报告的研究构架。

## 第一节 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新兴的理论，它为我们研究和透视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对话与综合提供了概念和方法上的支持，使我们对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对于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特殊的理论价值。而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理解，必然涉及社会资本理论的源起，以及社会资本的定義、构成、特征、结构和测量等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此处拟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这些问题及社会资本理论的相关研究做一简要的介绍和评价，指出当前社会资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农村社会资本研究的框架。

### 一、社会资本理论及相关研究综述

#### (一) 社会资本理论探讨

##### 1. 社会资本理论的源起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来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在经济学方面，主要是

以洛瑞、波拉思以及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学方面，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关于强关系、弱关系在个人求职中的作用的探索性研究对社会资本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经济学方面的源起。“资本”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领域，是经济学的核心术语，指以交换媒介为体现形式的价值载体，是一切能够带来收入或利润的资财，具有物质形式。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首次提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把“资本”理论的研究拓展到了非物质领域，资本也由此成为带来价值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然而，这时的资本概念仅属于生产要素，仅限于经济资源。但此后不久，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纷纷从自己研究领域出发引入资本范畴，于是，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组织资本、体制资本、权力资本等概念应运而生，丰富了资本理论。此后，经济学家波拉思提出了“F—连接”理论。他认为，由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公司（firm）组成的关系网络影响着经济交换的方式。而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则充分注意到了制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以新古典理论说明特殊经济制度产生的条件以及这些社会组织对系统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在他看来，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即个人是自利的，总是用尽一切手段谋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种利己主义者的描述与现实社会中的人相去甚远。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网络中的，并非以独立的方式去实现目标，个人追求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经济学家必须修改理论假设，以使之更符合社会现实。洛瑞认为，社会资本是诸种资源之一，存在于家庭关系与社区的社会组织之中。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自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率先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以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才逐渐被社会学者接受，以至于到20世纪末，社会资本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热门课题。

第二，社会学方面的源起。尽管有关社会资本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Durkheim）的“集体意识”、齐美尔（Simmel）的“互惠交换”、韦伯（Weber）的“强制性信任”那里，但一般认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是建立在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直接理论来源是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林南（Lin Nan）等人的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的关系的研究。真正作为社会资本理论，是从布迪厄、帕森斯等人的研究开始的。布迪厄最早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中。而科尔曼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的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布朗指出，“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达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的”。在科尔曼之后，经由普特南、波特等人的发展，社会资本理论才成为具有重要的跨学科影响的思潮之一。

## 2. 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是一种新的资本形式，目前对它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且未达成共识。国内外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表述。

### （1）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出发，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sup>①</sup>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 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

---

<sup>①</sup> 牛喜霞：《社会资本及其本土化研究的几点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声望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sup>①</sup>。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被认为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sup>②</sup>

学界对科尔曼的社会资本论述产生了很大的兴趣。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正是持着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sup>③</sup>“获取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在这里，波茨强调个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社会交往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从而使自己获利的能力，并认为这种能力也是一种社会资本。波茨侧重于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并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认为“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用规范消除优异者”。波茨对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有了更为全面的表述。

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

①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②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54页。

③ 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sup>①</sup>

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普特南（Robert D. Putnam）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sup>②</sup> 他使社会资本的概念真正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展了普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中成员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他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林南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按照这一定义，社会资本概念有三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个人摄取这些社会资源的能力；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运用或动员这些资源。可见，社会资本包含的三种成分涉及社会结构和行动：结构的嵌入性，机会的可涉取性，行动的导向性。”<sup>③</sup> 美国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定义为一个群体之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如果该群体的成员开始期望其他成员的举止行为将会是正当可靠的，那么他们就会相互信任。信任恰如润滑剂，它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sup>④</su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视社会资本为一种自觉形成的社会规则，它体现于社会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中，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它只有建立在民间团体和组织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才

---

① Ronald Burt,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

② 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95 页。

③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

④ 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刘榜离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 页。

可能是稳定的。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利用和保护,社会资本的作用就像胶合物,把四种资本结合在一起。<sup>①</sup>

## (2) 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

目前在国内,学者们主要是从以下四种角度界定社会资本的。

第一,社会关系网络说。国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研究得比较早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其仔博士(1997)<sup>②</sup>,他是国内首次真正提出并具体研究社会资本的人,他的研究主要围绕社会网络范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是一种关系网络,他试图探讨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影响。张其仔(1999)<sup>③</sup>通过研究一个村庄的案例发现,西方的方法和程序在中国的农民支持网研究中仅有部分适用性,研究弱关系和强关系必须考虑相应制度和文化背景。卜长莉(2001)<sup>④</sup>认为,社会资本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以一定的文化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以一定的群体或组织的共同收益为目的,通过人际互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第二,社会结构说。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及更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边燕杰和邱海雄(2000)<sup>⑤</sup>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他们通过对广州188家企业的调查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的经营能力也具有直接的正面影响,而社会资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功效,主要是因为企业通过各种联系可以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发现和聘用有用的人才,在交易双方之间减少怀疑、增加信任,提高办事成功率和经济效益。徐延辉(2002)<sup>⑥</sup>将企业社会资本界定为基于企

①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UNDP. 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教材》,1995年。

②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张其仔:《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以晋江市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④ 卜长莉、金中祥:《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

⑤ 边燕杰、邱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⑥ 徐延辉:《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6期。



业家和员工个人品行（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顾新等（2003）<sup>①</sup> 进一步强调社会资本是获取资源的能力，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两个以上的个体或组织通过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来获取资源的能力。

第三，社会动员说。把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主体所动员的持有回报预期的社会结构资源，是一种有助于目的性行动实现的工具或手段。李惠斌和杨雪冬（2000）<sup>②</sup> 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区别的，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是社会机构、社会成员互动作用的，具有生产性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具有工具性效应。

第四，社会资源说。杨永福（2002）<sup>③</sup> 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结构中，通过促使行动者交易与协作等特定活动而产生效益的资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蕴含于结构本身的结构资源。周建国（2002）<sup>④</sup> 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之中，以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多种形式存在，对人们的社会行动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人们通过自身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或改变其流动方向的一种资源。

### 3. 社会资本的构成及特征

社会资本的构成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定義，社会資本的定義不同，其所包括的內容也是不同的。詹姆士·科爾曼認為社會資本有六種形式：義務與期望、信息網絡、規範和有效懲罰、權威關係、多功能社會組織、有意創建的組織；<sup>⑤</sup> 普特南認為社會資本包括信任、規範和網絡三種形式；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則把家庭結構、共享規範、先例習俗、規則體系等看作社會資本的形式；亞力詹德羅·波茨和帕特里夏·蘭多特在他們的論文中把用於反社會目的的

---

① 顧新等：《社會資本及其在知識鏈中的作用》，《科學管理》，2003年第2期。

② 李惠斌、楊雪冬：《社會資本與社會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③ 楊永福：《“規則”的分析與建構：制度的社會網絡基礎》，武漢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02年。

④ 周建國：《緊縮圈層結構論——一項中國人際關係的結構與功能分析》，《社會科學研究》2002年第5期。

⑤ 詹姆士·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366頁。

社会组织、卖淫和赌博集团以及青年帮派等社会网络也称为社会资本；张其仔把社会网络等同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首先应该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价值增值性，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又具有不同于物质资本的一系列特殊性。科尔曼早对社会资本的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而后来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也大都接受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特征的阐述。其一，社会资本具有再生产性。社会资本是非短缺的，可以通过不断使用和投入而得到增加。其二，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让渡性。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的结果，个人只有进入某一个网络才能拥有社会资本，它不依附于个人的存在而存在。社会资本具有共性，与拥有者共存，并且有其使用范围。其三，社会资本具有互惠性。互惠是社会资本的原动力，社会资本在使用上能够达到互惠的效果，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最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詹姆斯·科尔曼指出，“就有目的的行动而言，许多社会资本具有公共品特征是社会资本与其他形式资本最基本的差别”<sup>①</sup>。社会资本在使用过程中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外部效应。

#### 4. 社会资本的结构或层次<sup>②</sup>

托马斯·福特·布朗从系统主义的角度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以个人间的关系模式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三个维度，即体系的要素、结构与环境。对社会资本这个体系来说，其构成要素是个体自我，他们构成社会网络，其结构是个体自我之间的关系模式，其环境则是体系嵌入其中的更大的社会生态，与社会资本体系包括的三个要素相对应，把社会资本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以某种关系的形式存在，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构成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的观点，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模式和特征，像罗纳德·伯特的结构空档理论、迈克尔·伍考克的镶

---

<sup>①</sup>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sup>②</sup> 托马斯·福特·布朗：《社会资本理论综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2期，第41—42页。

嵌和自主的观点，都对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等形式存在。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结构的观点，它所论及的是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和组织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系中去的。于是宏观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等便构成了宏观社会资本的内容。

## （二）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

自社会资本概念提出以后，引起了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这些都使得“社会资本”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热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学家乃至历史学家纷纷使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领域，伍考克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出色的有两个领域，一个是从微观的角度研究企业家伦理的“新经济发展社会学”，另一个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家—社会关系的比较制度研究。而对目前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伍考克认为主要集中在八个领域：社会理论方面；经济发展方面；家庭和青少年行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体生活，包括物理背景下的生活和虚拟背景下的生活；工作和组织；民主和政府治理；集体行为问题的普遍性案例等（伍考克，2000）。国内学者赵延东则将其概括为七个领域：劳动就业与移民；教育与家庭；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经济与发展；社会参与和民主政治；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社会资本的消极面（赵延东，2003）。就社会资本研究的具体内容来说，在西方研究较多的是信任（如巴伯，1989；Fukuyama，1996；科尔曼，1999；Cvetkovich&Lofstedt，1999；古德，2000；福山，2002）和社会网络（如格兰诺维特，1998/1973；林南等，1994）。在中国与社会资本有关的研究最早是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如梁漱溟的“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1987/1949）、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1947）等命题和概念，以及港台地区学者如金耀基、杨国枢、黄光国等人对“关系”“人情”“面子”“缘”“报”等在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都可视为是社会资本意义上的研究。一直到现在，大量有关人际关系的研究文本，都是社会资本研究的重要方面。

但就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比较宽泛的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8年创刊的《经济与文化》，其主要研究涉及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人们开始注重文化（包括信任、规范、制度、传统、网络、形象等）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力”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大量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的学者致力于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人们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进行的有益探讨，激起了众多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兴趣，这对刚刚起步的我国的社会资本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规范以及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礪、吴敬琏、樊纲等所做的相关研究。其主要成就在于发现，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作为一套支配人们行为的规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樊纲认为，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华文化优势的发挥，一定将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国际通用的规则”，更将取决于自己逐步走上制度理性化的道路。

第三，直接以介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为对象的理论研究。这表现在对西方社会资本理论的文献译介上<sup>①</sup>，为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界定；社会资本起源（创造社会资本）的不同模型（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社会资本是由个体关于规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码创造的、社会资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身份创造的）；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微观层次也即嵌入自我的观点；中观层次也即结构的观点；宏观层次也即包含结构的

---

<sup>①</sup> 这方面的研究集中表现在杨雪冬和李惠斌主编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5—417页）一书中，本报告全面详实地译介了怀特利、布朗、波茨、普特南、伍考克、纽顿等一批西方学者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成果。

观点)；社会资本的效用(降低交易费用的经济效用、提高民主运转的政治效用及信任合作互惠的社会效用)；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社会资本的积累；社会资本的测量等。从而为我国学者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可以借鉴的资料，并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的社会资本研究。

第四，关注社会关系网络，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对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农民工流动方式、求职等所做的实证研究。<sup>①</sup>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其关注的重点在于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从社会关系强度的角度来研究农村流动人口的生活轨迹。从社会支持网的角度对社区发展、家庭养老等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康姆贝尔(Cambell, 1986)等通过研究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网络密度等特性，发现社会支持网规模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网的密度与社会地位呈负相关；费舍尔(Fischer, 1982)的调查集中在关系构成上，他发现性别对于社会支持网的规模没有显著差别，但女性的支持网中有更多的亲属，男性的支持网中有更多的非亲属(主要是同事)，教育水平高的个体更可能与非亲属来往，收入与网络中的非亲属比例是正相关，同时他还发现高地位的人不是缺乏亲属关系，只是在亲属关系上会更具选择性；马斯丹(Marsdan, 1987)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支持网的规模将下降；白斯(Byers, 1999)探讨了经济地位与“互惠支持”的关系，认为互惠性主要发生在地位平等的家庭之间，其地位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莱肯(Lackne and Goldenberg, 1994)等人探讨了“社会支持的权宜性”问题，文

---

① 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彭庆恩：《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李路路：《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边燕杰：《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国外社会学》1998年第2期；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牛津出版社1999年版；边燕杰、丘海雄：《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功效》，《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陈传明、周小虎：《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若干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11期；赵延东：《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赵延东：《再就业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下岗职工的问题卷调查结果》，《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赵延东：《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以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为例》(2003)；符平：《社会资本和个体经营者的创业与发展》，《社会》2003年第2期；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桂勇：《关系网络在失业者求职中的作用》，《社会》2003年第7期。

章指出,过去的关系历史、个人的办事能力和在网络中已有的地位这三个权宜因素成为社会支持行动的前提。在国内,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最早发轫于1990年阮丹青《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分析》一文,其调查方法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提名法完全相同,即采用“重要问题讨论网”,而且在此调查分析中讨论网等于社会网,但这是国内社会网络分析的一大引入式研究和实际应用性的分析。城市领域的研究对象除了居民之外,还涉猎到企业管理中。例如,在整体网研究视角下,罗家德对企业组织关系、组织行为等做的研究。最早对农村居民社会支持网进行研究的是张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在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讨论网提名法)和分析社会网的规模、关系构成、紧密程度、趋同性、异质性等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a、1999b)。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社会支持网的分析多是采用提名法,甚至是直接拿来,分析的手段也多集中在社会网络结构的基本性质上,如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同质性与异质性、关系构成等。借用上述社会网络结构基本特征的分析方法,国内学者还做了不同地区的比较研究(1999, Zhang and Ruan, 2001; Lee, Ruan, Lai, Chan and Peng, 2001)。

第五,网络构成的结构性差异研究。基于社会成员阶层地位差异对社会交往的影响,张文宏等(2004)<sup>①</sup>认为城市居民在动员社会资本时遵循三个基本的理论,即群内选择理论、社会距离理论、中间阶层的跨越效应理论。从关系强弱视角,张文宏(2008)<sup>②</sup>提出了提名顺序理论和讨论内容顺序理论。具体来说,提名顺序与关系持续时间和交往频率有着正相关关系,人们的提名顺序有可能沿着家人、近亲、远亲和非亲属的差序由里及外、由近及远推延。其次,在讨论网中,人们所讨论的情感性内容和混合型内容随着提名次序的延后而逐渐减少,而工具性内容则逐渐增多。

---

①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社会》2008年第3期。

第六,社会资本总量的结构性差异研究。胡荣(2003)<sup>①</sup>通过对厦门市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调查提出,收入对网络资源的多元性有正面积积极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与网络资源呈正相关、户口还是重要的身份标志、政治身份对网络资源的影响不显著、单位所有制与单位主管部门对网络资源的影响不显著。倪志伟(1989,1991,1996)<sup>②</sup>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在转型过程中或者说在市场化背景下市场资本要比政治资本带给家庭更多的资本。白威廉和麦谊生(2002)<sup>③</sup>坚持“权力持续论”观点,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认为在中国农村,“地方官员将会灵活地审时度势,使自己和家庭努力适应新形势,以谋求最高的回报”。虽然没有直接论证政治资本或者市场资本等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但却论及社会资本的核心——关系和资源。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对社会资本影响因素的一大实证结果。

### (三) 社会资本的测量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学界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基本上包括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

#### 1. 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

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存在两种不同的测量方法,一种是以博特为代表的提名生成法,即关系网络结构观;另外一种是以林南为代表的职位生成法,即地位结构观。

采用提名生成法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是从博特的讨论网开始的。1984年

---

①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②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25页。

③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7、25页。

博特 (Ronald Burt) 在美国“一般社会调查”问卷 (general social survey; Burt, 1985) 上设计了这样的题目:“有时,许多人与其他人讨论重要的私人事件。回顾过去六个月(可回顾到去年八月),哪些人曾与您讨论过个人私事?”<sup>①</sup>即采用提名生成法让被调查人就此问题一一列举所有可能的人。进而,在此基础上问卷采用提名诠释法,针对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关系人进一步探询他们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问连带强弱问题,具体包括互动频率、认识的久远、亲密程度和互惠内容四方面;一部分是问社经背景(包括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收入、文化程度)相似性问题。博特的讨论网提名生成法简单易行,虽然在全面反映个体社会网情况上有所限制,但在当时却是一大创举,并对后来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后,费舍尔和范德普尔等人又通过提名生成法测量了个体社会支持网,费舍尔<sup>②</sup>在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的调查中设计了十个问题来考察个体核心网(由与被调查者经常互动的他人组成的网络),这十个问题既包括讨论网又包括情感网和资金借贷网。在提名生成法列出的关系人基础上最多抽取五个人回答与调查者关系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将问题分为关系强弱和社会背景两部分。在关系强弱这一部分,费舍尔保留了博特互动频率和认识久远这两个具体问题,并增加了是如何认识的这一问题。而在社会背景这一部分与博特的问题十分接近。范德普尔<sup>③</sup>在费舍尔问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测量方案,其问卷大部分以一种假设的方式提问,划分了十个问题、三个维度: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Van der Poel, 1993),使之测量更加系统和完善。每个问题最多提出五人,仍然回答与调查者的关系问题和个人特征。

国内采用提名生成法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成果主要有:1990年阮丹青<sup>④</sup>在《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分析》一文中采用了与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提名法完全

① Marsden, P. V.,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 S. R. vol. 52, 1987.

② Fischer, Claude S.,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③ Van der Poel,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Networks 15, 1993.

④ 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相同的测量方法研究了天津城市居民的“重要问题讨论网”。最早对农村居民社会网进行研究的是张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sup>①</sup>，通过讨论网提名法对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农民的社会网是以高趋同性、低异质性、高紧密性为特征的，业缘关系、友谊关系和地缘关系在社会网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的讨论网沿用了城市居民讨论网。贺寨平<sup>②</sup>在《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一文中在考虑农村老年人情况的基础上将社会支持网分为情感支持网、实际支持网、社交支持网和赡养支持网四部分。同样对农村居民生活有针对性研究的是刘军<sup>③</sup>，他在《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中将社会支持网分为情感支持网、劳动力支持网、小宗物资支持网和资金支持网四个维度。刘军关于法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是从整体角度出发，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张文宏、阮丹青、贺寨平等学者的研究主要是从个体角度研究，涉及关系构成、亲密程度、互动频率、互动距离等关系问题和诸如职业异质性、婚姻异质性、教育程度异质性等社会背景问题。

林南的职位生成法着眼于考察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情况，假定社会资源是按照社会地位高低呈金字塔型分布于社会之中的，每一个网络成员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数量主要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性地位，具体方法是使用一个或几个包含有若干标志社会地位的职业类型或工作单位类型等的量表。在调查中，首先要求被调查者回答其社会网络成员中是否有人符合表中所描述的特征，然后对所有被选择的单位类型及职业类型进行加总，并计算相应的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得分，然后用这些指针来反映个人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情况。对于职位生成法测量社会资本本土化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边燕杰，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国内一批优秀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推动关系社会

---

①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贺寨平：《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刘军：《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学的发展。在边燕杰等<sup>①</sup>著的《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一书中,社会网络分析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拜年网、讨论网、餐饮网和求职网等,这些社会网络分析多采用职位生成法来测量,这也是国内社会网络分析日趋成熟的表现之一。这些网络的分析中大都涉及网络的社会人口特征差异、网络的结构性差异、网络的地区差异,这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结构对社会网络影响力的发展。这些本土化社会网络的发展对于“关系本位”的中国来说,无疑开启了探讨社会关系的新天地,并将可能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大桥梁。胡荣<sup>②</sup>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一文中采用职位生成法从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两个方面探究了社会地位对关系资源的影响,表明单位所有制与单位主管部门对网络资源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单一维度测量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始于博特关于重要问题讨论网,他们进一步测量了网络关系强弱(互动频率、认识时间、亲密程度等)及被提名者的基本特征(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文化程度、收入),通过这些变量可以衡量社会资本的多寡。国外多通过朋友网、重要讨论网、交流网、互助网和支持网这些核心社会网络来测量。<sup>③</sup>

从多元维度测量农村居民社会资本。虽然核心社会网络能够解决社会资本多寡的问题,但不能全面反映个体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况。因此,国内许多学者综合运用了多个社会网络来测量个体社会网和社会资本的情况。

国内最早对农村居民社会网进行研究的是张文宏、阮丹青和潘允康(1999)<sup>④</sup>,其研究也是通过重要问题讨论网测量得到的,研究指标同样包括关系强弱(关系构成、亲密程度、互动频率、互动距离等)和个体社会背景(职业异质性、婚姻异质性、教育程度异质性等)两个方面。林南通过位置生

---

① 边燕杰等:《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胡荣:《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③ 曾明彬、周文超:《最大宴席网:个体社会资本本土化测量方法初探》,《管理学家》(学术版)2012年第5期,第31—44页。

④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0—120页。

成法首先提出了本土化的社会网络——拜年网<sup>①</sup>；毛德松（2014）<sup>②</sup>通过拜年网研究了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曾明彬（2012）<sup>③</sup>提出了最大宴席网取代拜年网的可能，最大宴席网以“礼金账簿”为测量工具，以人情礼金金额为社会资本的总量；边燕杰等（2012）<sup>④</sup>学者又发展了餐饮网、求职网核心网络来测量个体社会资本；韦璞（2009）<sup>⑤</sup>通过实际网络支持来测量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资本。

贺寨平（2004）<sup>⑥</sup>通过情感支持网、实际支持网、社交支持网和赡养支持网研究了社会网络与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刘军（2006）<sup>⑦</sup>通过情感支持网、劳动力支持网、小宗物资支持网和资金支持网研究了村庄整体社会支持网，对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也有一定借鉴意义。王晶（2013）<sup>⑧</sup>通过人情网和朋友网研究了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机制；吴中宇（2014）<sup>⑨</sup>通过重要节日网和餐饮网研究了社会网络与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提供了研究基础；黄瑞芹（2009）<sup>⑩</sup>通过重要问题讨论网和实际帮助网分析了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情

---

① 曾明彬、周文超：《最大宴席网：个体社会资本本土化测量方法初探》，《管理学家》（学术版）2012年第5期，第31—44页。

② 毛德松：《非农工作经历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2—106页。

③ 曾明彬、周文超：《最大宴席网：个体社会资本本土化测量方法初探》，《管理学家》（学术版）2012年第5期，第31—44页。

④ 边燕杰等著：《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1页。

⑤ 韦璞：《农村老年人社会领导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一个贫困地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⑥ 贺寨平：《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⑦ 刘军：《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

⑧ 王晶：《农村市场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机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119—144页。

⑨ 吴中宇、王友华、吴玉峰：《社会网络与少数民族居民经济地位的获得——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89—95页。

⑩ 黄瑞芹：《中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网络资本——基于三个贫困县的农户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1期，第14—21页。

况；任义科（2013）<sup>①</sup>通过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探讨了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健康的影响；谢娅婷（2014）<sup>②</sup>则通过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交往支持网分析了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不统一，各家学者针对自己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各种测量方法。从个体层次来看，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多是采用提名法和位置生成法来测量各种不同的社会网络，以发现嵌入在其中的社会资本。从研究成果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取得了巨大收获和进步。但由于其社会资本概念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社会生活、社会行动的多元性，对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依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第一，研究领域的失衡。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的研究领域多集中在城市居民，对于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涉及很少。而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际，缺少对于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对于新农村建设是极其不利的，不能真实、多样地反映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现状和问题就不会提高农村整体生活水平。另外，对于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比较性研究尚集中在城乡对比，或者几个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对比，对于地区差异的研究所涉甚少。统筹区域发展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一大方向，没有对地区差异的研究很难对平衡区域发展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措施。

第二，测量指标的混用。如前所说，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相应地其研究经验和测量指标就更为成熟。很多学者在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时依然采用了测量城市居民的指标，城乡差异导致了城市居民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测量不适用。这种混用也降低了研究的效度和准确性。

第三，各种社会网的片面性。目前，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社会网主要有重要问题讨论网（咨询网）、拜年网、求职网、餐饮网、情感支持网等。首先，

---

<sup>①</sup> 任义科：《社会支持网对农民健康的影响——基于“差序格局”的视角》，《人口发展》2013年第16期，第36—42页。

<sup>②</sup> 谢娅婷、靳小怡：《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15期，第173—176页。

讨论网和情感支持网仅仅是农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能反映生活全貌。其次，根据笔者的农村社会生活经验，讨论网或者情感支持网并不是农村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因此这两种社会网不具有代表性。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春节拜年并不是农户社会交往的主要表现，在农村，农户的社会交往是极其频繁的，况且本研究还涉及少数民族，对于他们来说春节未必是最重要的节日。求职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更为适用，对于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村居民，求职网可能更适用于农民工，而这仅是农民群体中的一部分。显而易见的是在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中并不以请客吃饭为载体，因此餐饮网不适用于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是“有事情时，如何动员获取社会资本”，因此，从微观层次上，我们将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定义为农户个体嵌入或融入不同社会网中，通过各种关系，诸如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等所获得的诸如咨询支持、情感慰藉、帮工、社会信任和借贷支持等社会资源。研究的测量方法是采用提名法，具体通过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5种社会网络来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

## 2.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sup>①</sup>

社会资本的强大解释力使它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中都被广泛的运用，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社会资本的定義及其测量变得极为复杂甚至混乱（赵延东，2006）。因此，学者们从各自的经验研究出发对如何测量集体层次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探讨。普特南（2001）指出应该从社会信任、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惠规范以及成功的合作等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澳大利亚学者布伦（Paul Bullen）和奥妮克丝（Jenny Onyx）（1997）认为可以测量和界定社会资本的要素包括对社区的参与、社会背景中的能动性、信任 and 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与朋友的联系、差异化的承受力、生活价值、工作联系等。他们实际上将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关系，因此他们的测量结果很难真正反

---

<sup>①</sup> 牛喜霞等：《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映社会资本的真实情况。但是他们对社会资本测量理论研究的开创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林南（2001）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构建的社会资本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视为网络资产来测量，他认为可以从被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个体的网络位置两个要素来测量社会资本。罗特利奇（Bryan R Rortledge）和艾姆斯伯格（Joachim von Amsberg）根据社会资本与交易目标实现的关系，提出并建立了内生社会资本模型，这是社会资本测量和量化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理论突破。Kawachi 等（2004）通过回顾 33 篇文献发现，经常被这些文献提到的测量社会资本的维度至少有 8 个，即信任、参与社团和组织、社会支持、自愿活动/志愿主义、互惠、非正式社交活动、社区凝聚力、社区归属感。Desilva（2006）综合分析了 28 篇文章后，建议社会资本的测量应包括 8 个主要维度，它们分别是信任、社会凝聚力、社区归属感、参与社团、社会网络、社会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家庭社会资本；纳拉扬和普里切特（2005）从村庄层面上考察了坦桑尼亚农村的社会资本与村庄经济之间的联系，提出衡量农村社会资本的 7 个指标，具体包括参与社团、一般规范、和睦相处、日常社交、邻里联系、志愿主义、信任；Harpham（2007）则认为社会资本应该包括 6 大维度，即网络、社会支持、信任、社会支持、互惠和非正式社会控制。

我国台湾学者罗家德和张绅震（2002）认为人际互动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承载着信任以形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测量得从信任来源及传递的研究开始，社会信任来源于人际信任，人际信任产生于个体的道德，是个体心理的计算或是对于彼此的了解所进行的行为预测、信任的结果，要透过个人或在群体社会所凝聚的规范、制定的规则以及形成的文化加以展现。信任的传递要考虑社会连带和网络结构，社会资本总量是综合考虑上述多种因素并进行测量的结果。近年来，大陆学者在引进和学习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也开始探索社会资本测量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如杨瑞龙和朱春燕（2002）认为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基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度。隋广军和盖翊（2002）提出了测量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模型，即  $S_i = a_i + b_1 C_i + b_2 X_i + b_3 I_i + b_4 J_i + b_5 G_i + b_6 Z_i + b_7 Q_i + U_i$ ，开启了国内学者研究测量社会资本模型的新纪元。王积超（2004）提出以社会资本总存量和子项存量的分解项来研究社会资本的测量，认为社会资本

的存量模型应为： $Q = \sum (a_1W_i + a_2G_i + a_3X_i + h_1i) + \sum (b_1E_1i + b_2S_1i + b_3T_1i + h_2i) + \sum (c_1E_2i + c_2S_2i + c_3C_2i + c_4T_2i + h_3i) + H$ ，进而认为社会资本的总量是由个体内部、环境社会资本、个体利用社会资本的能力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的，信任是社会网络与规则相互作用的产物。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世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方面分析了山东省农村社会资本的状况。赵延东（2006）则创造性地将测量个体（微观层面）社会资本的相关指标和测量集体（宏观层面）社会资本的指标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建立了测量城乡居民社会资本的信任维度和公共参与维度，其中信任维度包括制度信任、陌生人信任和熟人信任，公共参与维度包括一般公共参与和特殊公共参与。桂勇、黄荣贵（2008）确立了8维度的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并以上海的城市社区作为研究单位，对8维度测量指标进行了检验，最终提取了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和社区信任7个因子、29个项目。姜南（2009）提出了从信任与团结、团体、网络、社区凝聚、社区参与、信息交流、社区安全、政治参与8个方面对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并且对城市单位型社区与非单位型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行了比较分析。贾先文（2010）提出应该从信任、网络、志愿主义、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凝聚力5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裴志军（2010）认为应该从普遍信任、规范信任、正式网络、非正式网络、共同愿景与社会支持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了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个维度测量农村社会资本。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分别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通过经验研究对这些指标进行了检验，从而形成了较有代表性的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维度，这些维度可以概括为5维度法、6维度法、7维度法和8维度法，但引起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第一，何谓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应该有其基本的组成元素，那么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社区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变量，其组成结构又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

一问题,测量指标的建构将会失去其针对性和操作性。第二,现有研究过多地关注了社会资本测量指标的构建、检验和模型的建立,却忽视了对社区社会资本真实状况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缺乏关于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资本状况的比较研究更是空白,更没有关于少数民族村落与汉族村落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因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建构这些指标,其作用何在?测量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能否直接用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第三,现有研究建构了多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但并没有指出这些指标受社区中哪些因素的影响,似乎这些指标就是决定社区社会资本的最终因素,从而预设了一个前提假设,即社区的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规范、互惠、共享等因素是以前置变量或者自变量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些指标本身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大量的事实证明,不同类型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状况是不同的,因此,经验告诉我们,学者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这些指标仅仅只是中介变量,其本身也是受其他因素影响的,那么,到底又是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共享、互惠和社区的参与呢?从现有研究中显然难以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 二、文献简评<sup>①</sup>

就社会资本而言,通过上述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领域之宽泛,研究程度之深入,但社会资本理论作为近几年的新兴理论,对它的研究还远未完善,在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和认识,这无论是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完善还是对有志于研究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综观国内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它们存在明显不同。观点分歧之处主要表现在界定角度、概念主体、范围等几个方面。在界定角度上,边燕

---

<sup>①</sup> 牛喜霞:《农村土地交易中社会资本运作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2页。



杰和邱海雄（2000）、徐延辉（2002）等侧重于社会结构资源，张其仔（1997）、卜长莉（2001）侧重于社会关系；在概念主体上，亚历山德罗·波茨（1995）等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是个人，罗家德（2005）等认为社会资本的主体还包括企业、社团、社区等行动主体；在范围上，普特南（2001）等认为社会资本的范围很广，包括规范、组织、关系等在内的众多社会结构资源，詹姆斯·科尔曼（1999）等为社会资本只包含社会关系网络。正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这些分歧，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具体研究中，对同一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无法相互验证的局限。或许正因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影响力过于巨大，以致无法确定它的精确含义，在很多情况下，社会资本主要指个人所拥有的人际关系资源。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又包括其他方面，如个人声望、地位、文化规范、信任等。在极端情况中，社会资本甚至包括除经济资源之外的一切东西。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资本呢？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在这一问题上，作为从新经济学中演化出来的一种分析工具，社会资本概念却遭受了许多批评。关键的一点在于，无法有效区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诸多不同含义。如林南（2001）对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中的严谨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当社会资本研究迅速增长，其文献扩展到无数研究及应用领域时，这个术语成为包罗万象、能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的危险性亦随之增加；布朗（1998）批评说，虽然这个术语很快成了社会科学和决策圈内的常用词，但明确的含义却并不多见，使用这个概念的那些人，很少有人详尽地阐述过社会资本的理论细节。学者们开始批评这个概念的理论层次过低和用法过分简单化，但大多数人通过自己提供的关于社会资本的不同解释来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

第二，从国内外已有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成果来看，目前更多的是从功能论的角度（或从社会网络功利性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求职就业、地位获得、农民工流动、人力资本提升及政治上的善治等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即目前学界在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时，把重点放在了对社会资本所造成的结果的关注上，并且这种关注多放在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上，而对社会资本的社会发展功能、社会稳定功能和社会支

持功能关注不多。另外，也很少有人关注社会资本的具体运作过程，即在达到人们所追求的结果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是如何运作的？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流动的资源都有哪些？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它的运作环境是怎样的？它的运作机制是什么？

第三，在国内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并没有克服社会资本概念不明确和研究范围过泛的通病，也没有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给出本土化的界定，更没有从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出发，建立城市社会资本框架和农村社会资本框架来进行具体研究。并且，从目前国内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上，而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研究的文献并不多见。

第四，社会资本研究视角不一致。以科尔曼和波茨为代表的从微观层次进行研究的嵌入性个体视角，考虑的是个体通过他所嵌入的网络来调配资源的潜在能力，关注的重点是个体的结果。而以伯特为代表的从中观层次进行研究的结构视角，强调的是社会资本的结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的模式，关注的是作为特定的结构性后果和资源通过网络的流动。所以，结构视角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结构化及其配置后果，而不是个人。还有从宏观的层次进行研究的不太成熟的嵌入结构视角，它所考虑的是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或文化、规范体系中去的，其关注的是宏观的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影响谁与谁建立关系，影响这些关系如何运作，影响资源在网络内及网络之间的分配。总之，这种视角所关心的是宏观社会运作各种社会资本网络的逻辑。从嵌入结构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展。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对社会资本的定量研究较多，而定性研究很少。在研究手段上，社会资本理论仍然没有摆脱理性选择理论的窠臼，“理性人”假设仍然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假设。这突出表现在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动者之所以在关系网络中投资是以将来得到回报和收益为预期的。与之相随的是在研究中过于注重社会资本的经济功能，视社会资本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功能的研究。

###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框架

在对国内外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报告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构架。

####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

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可以帮助我们考量转型期政府的绩效、社区的效率与社会活力。但是，社会资本作为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概念范式，用来研究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时，首先要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采取行动的习惯特质，给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界定。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为此，本报告认为农村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和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是透过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展现出来的。

#### （二）社会资本的结构

目前，学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即有社会资本的微观层次的嵌入性个体视角、中观层次的结构视角和宏观层次的嵌入结构视角。而且，从目前的研究视角来看，微观层次的嵌入性个体视角多被采用，而把三种层次综合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由此出发，本报告选取了山东省各市县共 20 个自然村、陕西省的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各一个汉族村落、甘肃省靖远县 1 个汉族村落、宁夏回族自治区 8 个村落 [回汉杂居村 3 个、纯回族村 2 个（其中 1 个是移民村）、纯汉族村 3 个] 作为调查地点，试图综合社会资本的

微观和中观层次进行分析,使其融为一个完整系统,从而建立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系统结构。即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嵌入个体自我的观点,是个人融入网络的产物,主要以某种关系的形式存在,个体具有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缘关系、业缘关系等都是微观层次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结构的观点,强调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网络模式和特征,地方习俗、宗教信仰、道德观念等社区非制度性因素都是中观层次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

### (三) 社会资本的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对社会资本的定量研究较多,而定性研究很少。然而,社会资本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迈克尔·伍考克在他的论文中曾指出,“社会资本可能有不同的类型,而且它们会共同成为最优化的而不是最大化的资源”,“正是微观和中观层次上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联合决定了成本与收益之差是偏向前者还是后者”<sup>①</sup>。这说明,主体的社会资本不仅表现在社会资本存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结构上。而我们在研究主体的社会资本问题时,往往都是用存量上的差异来掩盖其结构上的差异。社会资本的结构变迁受主体行为的影响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这种变迁既有可能是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社会资本结构变迁,也可能是由高水平向低水平的社会资本结构变迁。当社会资本结构水平滑落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对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来不利。另外,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中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因素又是定量手段难以处理的,因此往往被排除在分析框架之外。本次研究的调查员均是来自调查村庄的人,他们参与在社区老百姓中间,与他们共同生活,能较为顺利地获取调查资料。

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社区层面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测量指标、对社区建设的影响,较少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对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的比较研究。故此,本报告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以农村社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客观地呈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

<sup>①</sup>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实际状况。本报告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在山东、陕西、甘肃、宁夏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获取了由2201个户主组成的数据库，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描述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并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

## 第二节 研究设计

### 一、理论框架

#### （一）基本概念界定

理论是对于生活某个侧面之观察的系统解释，而概念则是建构理论的基本单位。故而，在搭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之前，需要首先阐释的基本概念是：社会资本、农村居民和农村社区。

#### 1. 社会资本

考察社会资本的定义问题，并不是因为剖析各种定义、厘清繁杂的概念或搬弄词汇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而是因为定义社会资本的工作是一个有用的准备活动——它直接通向有关社会资本研究框架的构建以及探索其原因和后果的经验性研究的操作。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虽然已被社会学者广泛运用，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这些不同的定义依据对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及社会资源关系的认识差异，可归纳为以下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同于社会网络嵌入的社会资源；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独立的社会学概念或理论，其内涵与外延均不同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譬如边燕杰认为，从概念的最初含义来看，社会资源理论只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的范围更加宽泛；林南认为，社会资源只是社会资本的开始，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既定的工具性目标，二要在行动中运用它。尽管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有不同的界定，但都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原始定义来看，资源与资本虽有联系，但二者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概念，资源是一种存在，资本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即只有当资源用作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时才成为资本（如机器投入生产成为固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其界定应遵循学科传统，即不能抛弃资本的本质特性而论社会资本。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存在于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中的能够为拥有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一种资源。

鉴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把农村社会资本具体界定为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构成社会资本的六大基本要素。在微观层次上主要表现为农户个体通过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帮工网和借贷网所获得的资源与支持；在中观层次上主要表现为社区居民对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测量维度。

## 2. 农村居民

学者常常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本论文的农村居民亦采用这种界定角度，具体操作化为调查样本中有“纯农业收入”者，剔除“未答”“拒答”和“无纯农业收入”的情况。

## 3. 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由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群构成的共同体。本文选取了村庄（长期聚居于特定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的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社会空间）这个层次来研究农村社区。

###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

#### 1. 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

目前对于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比较全面的是刘军在《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一书中提出的四个维度，具体为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物资支持和资金支持。这四种维度既有以往学者普遍关注的情感网和资金借贷网，同时又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特征增加了劳力支持网和小宗物资支持网，如此便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但刘军的研究毕竟是在2006年，距离现在已有十余年，农村生活已发生了变化，四维度

法在测量当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时必然存在局限性。另外，社会网分析方面普遍关注的咨询网、信任网在刘军的研究中并未明确体现，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经济理性使得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发生改变，因而研究农村居民信任网亦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在刘军老师四维度测量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第一，这五种社会网保留了刘军研究农村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测量维度，例如情感网、帮工网。第二，小宗物资的支持和资金的支持都可以归入借贷关系中，因此我们将此合并为借贷网，既有实物的借贷，也有资金的借贷。第三，根据国外研究经验，咨询网（重要问题讨论网）是研究个体社会资本的一大重要维度，因此我们增加了此测量维度。这样我们的测量维度既有国内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典型特点，又汲取了国外研究的先进经验。

### （1）咨询网

咨询网或者重要问题讨论网是社会网中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一个测量维度，在本研究中咨询网是通过问卷中“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人商量或谈论：如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做出决定；当您与配偶或子女发生严重矛盾，而又无法与其讨论解决；当您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时；等等。您会找谁商量或谈论”这一问题来测量的。

### （2）情感网

个人情感是复杂的，也有很多表现形式，在这里我们通过以下问题进行测量：“您和谁一起外出，如赶集（会）、进城、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

### （3）帮工网

农村的帮工是最为普遍的，本报告所指的帮工主要是不计报酬，更多出于社会交往的目的而进行的互助行为，以期在自家需要帮助时能够有充足的劳力资源。农村劳力支持网是通过以下问题测量的：“当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如搬大袋粮食或重物、红白喜事、盖房子、打场等，您会找谁来帮助您？”

#### (4) 信任网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在农村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因此通过“当您有急事要外出一段时间（一周或更长时间），您会请谁帮助您来照料孩子、庄稼、牲畜并看管家呢”这一问题来测量信任关系。

#### (5) 借贷网

借贷网主要是从借物和借钱两方面来测量的，借物主要指小宗物资的借用，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食物和小型农具上。“当您需要借日杂小物（如自行车、筛子、饭桌等）、食物（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农耕用品（如小四轮、拖拉机、耕牛）时，您会找谁借？”“当您急需一大笔钱（看病、教育、结婚、盖房等），您会向谁借呢？”测量的是农村村民的借钱网络。

这五个测量指标是立足农村居民的实际生活而提出的，几乎涵盖了农村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能够全面反映农户的个体社会资本状况。经过 SPSS 17.0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得出农村居民咨询网的信度系数为 0.630，农村居民情感网的信度系数为 0.603，农村居民帮工网的信度系数 0.676，农村居民信任网的信度系数为 0.745，农村居民借贷网的信度系数为 0.579。综合来看，用这五个维度的指标来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网比较适合。

### 2.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进行了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基本上存在针对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和集体层次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所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 6 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考虑到村民的行为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行动主体的行为以集体为取向，将会更多地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即“一般社区参与”。反之，如果行动主体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则将会



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即“特殊社区参与”。为此，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同时，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从而使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会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外人。因此，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因此，中国人根据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即特殊信任，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即普遍信任，而对于体制内人员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

之所以选取谢治菊等提出的6维度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他们提出的测量指标是针对“农村的‘熟人社会’特征，村民们之间关系比较简单，村民们的‘信任、社区参与、互惠、共享、合作、社区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水平”（谢治菊、谭洪波，2011）；第二，在比较了国内关于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之后，我们发现他们提出的6维度法的信度是最高的，六个维度的信度系数均达到0.6以上。因此，可以成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一个很好的工具。第三，他们提出的这六个维度，既考虑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观层面社会资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同时也关照到了国内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还考虑到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特殊性。其中，“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互惠”“信任”指标主要借鉴了国内外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中的相关维度；“合作”“共享”指标则充分考虑到了农村社会村民间互动的逻辑。虽然是“在集体层面界定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但是考虑到个体层面的指标具有自身的优势”（Harpham，2007），“也更加切合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而且在实践中也更加可行”（桂勇、黄荣贵，2008）。因此，关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变量值，我们仍然是由“村落内个体层面（村民）进行测量的，然后由村民的变量值汇总、平均而成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而不是直接收集有关社区的特征指标”（裴志军，2010）。为了准确测量村民的态度，采用了李克特5点量表法，每

个变量均设计了“非常同意、同意、无所谓、不同意、很不同意”5个答案，并分别赋值1—5分。但考虑到我们的调查地点东西部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在制定量表时，我们对具体的测量指标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如下：

(1) 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在试调查中，社会参与的测量指标有13个：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愿意参与“义务为村里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愿意参加义务献血活动、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经常与邻居或村民相互走动、常常与亲戚朋友一起聚餐、经常和邻里之间一起打牌或玩麻将。根据我们对调查地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在的31个村子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村从未举行过“义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也从未举行过“义务献血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协会组织。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礼仪或主要节日，农民很少会和亲戚、朋友一起聚餐。为此，我们将测量指标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9个。“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2) 社区归属感：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试调查中社区归属感的测量指标有6个：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将6项指标变为5项：我们村的发展

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的。

(3) 合作：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对于这一维度的测量指标，只是将社会中介组织中养鹅协会用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了代替。操作化为：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政府有经济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合作。

(4) 共享：共享即分享，既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操作化为：有好吃的食物会分给邻居与其他村民、买了农耕用具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自己认识的人。

(5) 互惠：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操作化为4个测量指标：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

(6) 信任：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以情感内容和因素为维度的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种相信的主观态度（牛喜霞，2005）。在调查中，信任的测量指标有12个：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与法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相信市场上的医生不会欺骗消费者、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为此，我们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普遍信任”三个维度。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农村还存在着对于领导、政府、媒体、警察、法院和法官、医生的制度化信任（赵延东，2006），及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熟人信

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普遍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我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我们对前述的6维度38项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在0.4以上，其他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69，其他均小于0.3；“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28。为此，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剩余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33项指标。

### （三）分析框架

前述两大部分的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知识背景与研究启示，而对它们的简评，事实上也是为了凸显本文的研究取向。本研究选择了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32个自然村，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结构式问卷与长时间的实地调查，了解在有事情时农村社区居民对于关系的动员、维持和投资，以及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行动逻辑。具体是通过把农户看作参与农村事务的主体，引入社会资本这一变量，通过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和类型的划分（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系统结构分析视角的确立，建立农村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从而探讨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结构、现状及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而揭示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的下降趋势和负面影响，即妨碍了农民利益的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牛喜霞、谢树芳，2006），最后，提出了改变当前农村社会资本匮乏的状态，使农村社会现有的社会资本发挥出正面作用的路径。

## 二、研究地点的选择

研究地点的选择在任何实地研究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因为这关系到所得分析资料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选择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 32 个自然村，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虑：

第一，经济状况的代表性。从经济发展来看，山东省的整体经济状况能代表中部地区，陕西、甘肃和宁夏基本能代表西部省份，体现出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同时就山东省内的情况来看，由于鲁西北、鲁中、鲁西南和胶东半岛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为了体现出这种差别，我们在山东省的每个市都随机选择了一个村庄进行调查。

第二，民族因素。从民族构成来看，有纯汉族村落，如山东省的大部分村落都是纯汉民村落；回汉杂居村落，如西部地区的部分村落；还有纯回族村落，以宁夏的样本为代表。这样的调查地点选择可以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

第三，村落类型因素。从村落类型来看，有原来的传统村落，有移民村落和“合村并居”后形成的新的社区。村庄类型全面，可以分析村落类型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

第四，调查介入的便利性。我们的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构成，本次调查所选取的村庄均为调查员的家乡，因为调查员每年假期都要回家在村里住上一段时间，与村民们都有一定的接触和往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规范都有一定的了解。平日与家人通过电话交流也能了解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鉴于调查员的这种“在场”与“不在场”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既可以从旁观者的客位角度来审视和观察研究对象，这可以使他们对村庄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保持敏感的态度，并且也能做到“价值中立”。同时，由于调查员本身就是村庄的一员，也可以以当局者的身份参与村庄活动，调查员的这种参与者的身份，既能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能够获得更真实和全面的资料。

### 三、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采用调查问卷法和当面访问法相结合，配合调查员的实地研究。

第一，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长期以来定量研究占据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但在研究的深入性上存在局限性。就本报告所关注的农村社会资本而言，定量研究不可能完成全面把握社会资本的任务。因为，就社会资本的本质而言，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主观因素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动员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因素无法通过定量研究全面把握。因此，在本报告中我们采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属于后实证主义的研究，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允许定性研究的补充和深入。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了定量研究方法，具体是采取结构式问卷法。调查者将调查问卷给被调查者，由被调查者自己阅读并填答，然后再由调查者收回的一种方法。本次对于社区社会资本的调查最终在山东省的14个地级市收集到了1132份有效调查问卷。调查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需要在每个村庄中选出部分村民来完成问卷，以此来代表他们村庄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此调查需要去的地区较多，需要的调查员也较多，采用自填问卷法可以节省时间和人力，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作答，同时可以避免调查员对回答者造成的人力因素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得到比较客观的问卷。调查员对这一部分问卷的回收时间做了限制，所以问卷回收率较高。

在定量研究的同时结合定性研究，定性研究的方法是通过个案访谈收集资料。研究者培训一些调查员，由调查员带着调查问卷到各个调查地点，按照调查计划的要求对选择的被调查者进行访问，并按照问卷的格式要求记录下被调查者的回答。采用个案访谈这种调查方式的原因有三个：一是采用这种方法，被调查者的回答率比较高，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当面接触、面对面的交流，被调查者拒绝合作或者半途而废的情况比较少，调查的回答率和成功率比较高；二是调查对象的适用范围广，由于所做调查是在农村社区中，有很多农民不识

字，或者是因为问题较多而不愿阅读，在这种情况下，由调查者直接访问，把问题读出来，这样调查对象既可以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可以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扩大了调查对象的适用范围；三是调查资料的质量比较好，在调查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观察调查对象的态度、表情，对被调查者回答模糊的地方进行询问，减少由于被调查者对问题理解不清或误解所造成的误答，这样就使调查质量有所提高。

在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同时，调查员也进行了实地研究。实地研究是一种定性研究方式，调查员深入农村社区，与村民同食同寝，不但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定量资料，还仔细观察农村社区的实际情况，通过询问和感受收集各种定性资料。调查问卷作为一种定量研究的方式，为研究提供了数据资料，实地调查研究也为农村社区的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定性资料，还原一个更加真实、具体的农村形象。

本报告的结构式问卷主要分为四部分，具体为个体基本情况、个人社会交往情况、社区生活和社区整体状况评价。个人社会交往情况部分涉及被调查者个人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况，主要通过5种社会网来分析。社区整体状况部分涉及村庄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的存量，从信任、互惠、合作等方面来获得。个体基本情况涉及被调查者有关年龄、收入等人口学特征，对分析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分析时本报告主要从地位结构观的角度出发，探讨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结构中的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和网络结构。

## 第二，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巴里·韦尔曼曾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本报告中所指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就是在分析关系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模式等，属于关系网络结构观。并通过UCINET软件对农村社区进行整体网的中心性分析，以发现当前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黏合程度，做到个体网络分析和整体网络分析的有效结合。个体网络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等方面来探讨的，而整体网络分析则侧重于中心性的分析，尤其是中间中心度的分析。中

间中心度主要考察的是在整个村庄网络中，村民控制社会资本的程度。

本文对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是通过提名生成法获得的，让被访者尽可能多地提名网络成员，并详细提供前五名网络成员的姓名、职业、同自己的关系、婚姻情况、交往频率等信息，具体的操作化见（附录1 问卷）。本文研究数据的收集时间为2012年1月至2012年3月，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地区对1871名农村居民进行了有效的调查。

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从网络关系的视角出发，研究关系数据而非仅考虑属性分析。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论的指导下，对社会网分析存在着个体网分析和整体网分析两个研究领域。本文是从个体网分析视角出发，研究农村居民个体社会网的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网络位差、关系构成等关系数据，而不考虑整体网分析中的中心性分析、小群体分析等内容。

### 第三，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或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本报告的比较研究法是一种横向比较研究，主要是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定量的比较研究，所涉及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比较、不同（有无）宗教信仰的比较、不同村庄类型之间的比较等等。

总体来说，本报告是从个体微观层次和村庄中观层次相结合的角度来测量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进而提出有效的提升措施的。同时，通过从个体社会结构特征和社会关系网络分析两种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和提升措施也是一种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新综合。

### 第四，统计分析方法。

统计分析方法为研究者在现实生活和理论基础之间搭建了桥梁，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研究者可以在这两个层面上自由穿梭。统计分析可以检验最初的假设是否得到验证，完善研究内容。本论文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来计算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对家庭年收入、非农收入、政治身份与社会资本总量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 四、研究过程

本报告研究过程基本可分为调查培训、收集资料、处理并录入资料、分析资料及写作四个阶段。

##### （一）调查培训

调查之前，我们对每位调查员都进行了系统培训，并下发访问员手册，要求每位调查员严格按照访问程序进行调查。调查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调查问卷提问，不随意改变问题顺序和解释问卷问题，从而减少外界无关因素的影响，并严格按照调查问卷的格式将调查和访谈结果记录到问卷中。调查员入户在进行正式访问前，首先进行自我介绍，解释本次调查的目的，态度友好、有礼貌。要安排较好的地点进行访问并填答问卷，访问时调查员要保持态度中立，让被调查者充分思考，严格按照被调查者的意思进行填答。调查结束时要对被调查者表示感谢。

##### （二）收集资料

2012年1月至3月，我们在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四个省32个自然村进行了有效的调查，这个时间正是冬季，是村民们比较空闲的时间，被访者没有农活要忙，从而有完整的时间可以完成调查问卷。此次调查重点考虑的是自然村作为村落共同体保留着村落内习惯、民俗、历史、传统及社会信任的整体性（裴志军，2010）进行的大规模入户问卷调查<sup>①</sup>。我们选取了山东省各市县20个自然村，包含了鲁西北、鲁西南、鲁中和胶东半岛地区。鲁西北地区调查了德州、滨州、聊城、东营这四个地区的6个村庄；鲁西南地区调查了济宁、菏泽、临沂、枣庄四个地区的5个村庄；鲁中地区调查了济南、泰安、莱芜、淄博、潍坊五个地区的8个村庄；胶东半岛即山东半岛，是山东最发达的地区，调查地点是青岛的1个村庄。本次调查根据村庄大小在每个村庄选取1—4个村民小组，每个村庄调查人数在30—80人之间，鉴于胶东半岛地区仅

---

<sup>①</sup> 山东省主要包括淄博、济南、枣庄、潍坊、威海、东营、青岛、德州、菏泽、临沂、济宁、滨州、烟台、日照、聊城、泰安和莱芜，共17个地级市（莱芜市现已并入济南市）；陕西省主要是在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进行了调查，甘肃省主要是在靖远县，宁夏主要包括银川、盐池、吴忠三地。

调查了一个村庄，且村庄面积较大，所以在胶东半岛的村庄选取了 180 户村民进行调查。在山东省的 20 个村庄中收集到由 1132 户村民所组成的有效样本，剔除掉不合格的 7 份问卷，山东省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9%。调查对象主要是户主，户主多为男性，仅当户主长期出门在外或身体不便时，由配偶代答，所以调查样本中的村民多为男性，且多数为 41—60 岁的青壮年，这些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多是小学或初中水平。山东是一个汉族人口聚居、夹杂少量各类少数民族的省份，调查的村庄为汉族村，村民绝大多数为汉族。

对西部地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陕西、甘肃和宁夏。陕西省的渭南蒲城县和铜川市印台区各一个汉族村落、甘肃省靖远县 1 个汉族村落、宁夏回族自治区 8 个村落 [回汉杂居村 3 个、纯回族村 2 个（其中 1 个是移民村）、纯汉族村 3 个] 作为调查地点。为了获取村庄整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在山东、宁夏、甘肃分别选取了 1 个村子进行了整体调查，在其他 28 个村落，先获取自然村户主的名单，然后按照村落农户的比例随机抽取户主作为调查对象，每个村共访问 30—185 个户主，由于搬迁、外出打工、年龄太高、拒绝访问等原因，最终我们得到的数据集包含 2201 个户主组成的样本。（样本基本特征见表 1.2.1）

### （三）处理并录入资料

由于个别村民不配合或调查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导致部分问卷成为废卷，有的村庄大部分问卷有漏填现象，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和村庄的完整性，最后将整个村庄的问卷作废，故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是 2201 份。在调查结束后，笔者用 SPSS 17.0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对 2201 份有效问卷进行录入，以期在接下来的分析、写作过程中能够发现当代农村生活中的社会资本状况。

### （四）分析资料及写作

调查问卷分为 4 个部分，A 部分是个人基本情况，包括被访者和所有居住在该户中的家庭成员和符合条件的其他居住在该户中的人的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政治面貌、就业单位、家庭收入等情况；B 部分测量村民的个体关系网，通过农村情感支持、农村劳力支持、农村小宗物资支持、农村资金支持四个方面来农村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强弱；C 部分研究村民的社区生活，了解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状况；D 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测量农

村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六个维度村民对社区的态度和评价。

表 1.2.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

指标	频数 (%)	指标	频数 (%)
性别 (N = 2201)		民族 (N = 2201)	
男	1843 (83.7)	汉族	1812 (82.3)
女	258 (16.3)	少数民族	389 (17.7)
年龄 (N = 2193)		宗教信仰 (N = 2201)	
20—35 岁	208 (9.4)	有宗教信仰	68 (31.3)
35—55 岁	1215 (55.2)	无宗教信仰	1512 (68.7)
55 岁以上	870 (35.0)		
受教育程度 (N = 2201)		2011 年家庭总收入 (N = 2201)	
小学及以下	929 (42.1)	20000 元以下	1012 (46.0)
初中	973 (44.2)	20000—40000 元	937 (42.6)
高中	233 (10.6)	40000—60000 元	183 (8.3)
中专及以上	66 (3.0)	60000 元以上	127 (5.7)
政治面貌 (N = 2201)		家庭所在地 (N = 2201)	
共产党员	130 (5.9)	山东	1133 (51.5)
民主党派	15 (0.7)	宁夏	593 (26.9)
共青团员	27 (1.2)	陕西	35 (15.9)
群众	2029 (92.2)	甘肃	124 (5.6)

## 五、资料搜集的困境

### (一) 不完整的废卷

调查的资料很多,如果想要各个方面都涉及不免会项目繁多,过长的调查时间易引起被调查者反感,不认真的回答会导致调查结果的不准确。例如调查问卷中分为 ABCD 四个部分, B 部分的问题较多,很多被调查者在做完 B 部分后就没有耐心再做后面的内容了,以至于 CD 部分空着或是不认真地填写完;也有的被调查者直接空过了 B 部分,只完成 CD 部分的问题,造成了大量废卷

的产生。如何最大效率地收集到更多的资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

## （二）“不诚实”的被调查者

在调查时发现，年轻的村民与年老的村民对待问题的态度大不一样。在问及收入情况时，年轻的村民会夸大自己的收入，对待消费也比较大方，而年老的村民对收入情况比较保守，会把收入说得比较少。例如在调查一个五十多岁的村民时，她说年收入是两三万，而旁边知情的一个年轻村民告诉调查员“她说少了很多，她家里不但有大量耕地还有牛羊若干，此外还有小磨坊，年收入绝对不止两三万”。此后不论调查员怎么解释调查结果是只用于研究而不会妨碍到她个人，她也坚决不给予配合。调查时发现很多比较年长的村民对于收入情况都比较保守。另外，在满意度调查时，年长的村民也偏向保守，即便是有些不满意的项目，他们也会违心的回答满意，“就算是回答不满意又能改变什么呢，就答满意就行啦”，他们如此告诉调查员。而年轻的村民就直接多了，不满意就是不满意，但在调查中发现有些正在改善的地方他们看不到，夸大每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太过于愤世嫉俗了。一位年轻先生说，他对自己的医疗保障情况太不满意了，交钱从10块到20块到40块一直到现在要自己交60块钱了，交的钱越来越多谁愿意啊？据调查员所知，现在农村的医疗保障还是不错的，村民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时国家会报销一部分费用，虽然自己交的钱增加了一些，但是可以报销的病的种类增加了。有些年轻的村民们反映村里啥都没有，对什么都不满意。村里没有就业培训，没有公共活动场所，没有公共娱乐活动，村民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中进行，或是逛街串门等。文化娱乐设施的缺乏确实是现在村民生活中的一件憾事。

## （三）“不配合”的村主任

本报告通过调查村主任来了解农村中的整体情况、乡土人情、重大决策、村庄经济状况等信息。所谓的村主任，也即村里的领导者、知情者，有的村庄在进行村主任问卷的调查时并不是真正名义上的村主任来进行访问的，可能是村里的支书、会计等人物，他们实际执行村里的大小事务，对村内情况比一般村民要更为了解。但在实际的调查中这一过程并不顺利，我们的调查员遇到了种种难题，但又一一克服了。虽然调查员是熟悉调查村庄的人员，但是由于年

龄、经验的限制，在面对村主任的不配合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有的调查员反映，在访问村主任时面临村主任态度不认真的问题，有的村领导直接说“我刚上任不到两年，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回去叫你爸爸填上就行”。在调查时发现村主任经常是连任的，在农村非常注重人情，村民们很少会推翻村主任的“掌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领导的权威，在调查时，他们往往会推脱，对村财务更是不愿多说，为调查增加了困难。

### 第三节 研究地点概况

本报告的调查地点主要包括山东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陕西省四个地区，我们将山东省作为东部经济发达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陕西省作为西部欠发达区。对于这四个地区我们将从村庄基本概况、经济情况和传统生活现状三个部分来描述调查地点的基本情况。

#### 一、山东省村落介绍

本次调查可以把山东分为四个主要区域：鲁西北地区、鲁中地区、鲁西南地区 and 胶东半岛地区。鲁西北地区和鲁西南地区农业生产和开采业较发达，鲁西北地区有石油工业和钢铁冶炼业；鲁中地区种植业欠发达，但特色农业蔬菜大棚发展较好；鲁中和胶东地区的经济实力雄厚，主要是以新兴产业为主，并且胶东地区渔盐业发达。这四个地区各有特色，所以调查时随机抽取了每个地区的部分村庄。

##### （一）鲁西北地区

鲁西北包括德州市、滨州市、聊城市、东营市。调查样本为这四个地区的6个村庄：德州市平原县桃园办事处宋庄村、滨州市惠民县大年陈乡陈旺庄、滨州市无棣县小泊头镇东卢马村、滨州市无棣县王白杨村、聊城市阳谷县石佛乡平坊村、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利林村。鲁西北地区主要地形为平原，其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农业生产和外出务工所得，大部分

村中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并有剩余粮食出售。村中的生产经营方式主要依靠机械化生产结合手工劳动的方式，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是村中的高新技术缺乏，村中经济增长急需技术的支持。

### 1. 村庄基本情况

表 1.3.1 鲁西北地区村庄基本概况

村名称	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总人口(人)	村民小组(个)	地理类型	耕地面积(亩)	收入来源
宋庄村	6	356	2	平原	730	种养殖业
陈旺庄	35	960	8	平原	1950	非农业收入
东卢马村	40	1500	8	平原	1500	农业、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
王白杨村	7	987	7	平原	3500	种植业
平坊村	15	1127	11	平原	2073	种养殖业
利林村	35	1459	6	平原	10000	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

鲁西北地区的地形主要是平原地区，耕地主要以旱地为主，少数村里有水田，但是面积很小。例如，利林村的旱地约9600亩，但水田仅400亩，其余5个村均没有水田。鲁西北地区的村庄交通都比较便利，10公里以内均有乡镇政府驻地和集市。以王白杨村为例，该村隶属山东省W市W县D街道办事处，地处县城东7000米处，四通柏油路，交通便利，村中有7个村民小组，有农户334户，村总人口有98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80人，劳动力264人。该村行政面积有6平方公里，全部为平原地区，全村有耕地3500亩，全部为旱地，人均耕地3.5亩，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等农作物及小枣和冬枣等树木。该村拥有林地1900亩，其中经济果林1600亩，村庄主要耕地用于枣树种植，树木用地占耕地一半以上。

### 2. 经济情况

鲁西北地区属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该区农业比较发达，村民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在农闲时会有部分村民外出打工，家庭副业和打工收入成为村民收

入的部分来源。例如，王白杨村多数村民在农忙时种地，在农闲时外出打工，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多以打工为主，30岁以上的村民多是种地、打工两不误，50岁以上的村民多以种地为主、打工为辅，即便是高龄的老年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就会继续种地劳动，有的60多岁的老年人不但亲自照料地里的庄稼，还会在农闲时去干建筑活，打点零工以补贴家用。如48岁的宋先生，他是农村小学的一名教师，但是仍然在空闲时去种地，他说这在村子里很常见，很多老师不但承担着教书一职还是合格的农民。但是20多岁的宋家小哥，他是一名司机，他说他和那群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们一样，都不喜欢守着那些田地，既然当司机足够养活自己了，那么他们都想继续当司机，当问及他的田地怎么办时，他说现在属于他的那些地是父母给照料着，以后父母不愿意种地时就把地租出去或卖掉，他的愿望是能买上属于自己的汽车。

有的村庄有特色产业，更是增加了村民的农业收入。例如东卢马村的特色产业是棉花和小枣，王白杨村的特色产业是冬枣。鲁西北地区的大部分村庄，其粮食可以自给自足，并有大量剩余粮食用于出售，但也有少数村庄粮食不能自给，例如利林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依靠家庭副业及外出打工收入。鲁西北地区的生产机械化程度有较大提高，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机械化生产和手工劳动相结合的方式。鲁西北地区大部分村庄经济发展较好，能够实现全村通自来水、通电，家家户户有路灯，大部分村民家中有电话，少部分村民家中有电脑。

以王白杨村为例，王白杨村2011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约62.71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5000元，农民收入以种植业为主。王白杨村特色产业是冬枣产业，冬枣销往全国各地。除了冬枣产业，王白杨村还适合种植玉米、小麦、高粱、棉花等农作物，近年村民收入有所增长，农民生产从种到收机械化程度大为提高。十年前的王白杨村，村子里的住房还是以土坯房为主，现在处处可见装修大气的砖瓦房，该村现在的年轻人多住砖瓦房，而年老的村民还是多住土木结构的房子，但现在明显的一个住房趋势是砖瓦房代替土坯房，虽然现在村里的自建小楼还很稀少，但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自建小楼也会越来越多。不可否认的是，村民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即便是土木结构的房子，里面的设施也呈现出现代化的气息。截至2011年底，王白杨村已实现通水、通电、通路、通

电话、通电视、通宽带、存路灯，拥有电视机或移动电话的农户有 296 户。王白杨村主路为柏油路，分支道为土路，距集市 2 公里，全村拥有汽车 36 辆，拖拉机 126 辆。全村装有太阳能的用户占全村户数 60%，农户住房以土木结构房为主，土木结构房占全村房屋的 2/3，砖瓦房约占全村住房的 1/3，全村有两户居住自建二层小楼。

### 3. 传统生活状况

鲁西北地区大部分村庄的娱乐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的娱乐活动主要就是下棋打牌、串门聊天等。很多村庄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即便有部分设施，也没能得到合理利用。例如宋庄村的调查员说道：“打牌是没得选择的娱乐方式，村中虽有体育场，但是已经堆满了垃圾，村中的篮球场也已经残破，却无人管理。”也有少部分村庄有文艺队伍，如陈旺庄节庆时有扭秧歌、地方曲艺表演等群众自娱活动，利林村虽然经济较其他村庄落后，但是文化活动较多，村里有放电影、戏台演出、扭秧歌、地方曲艺表演等活动，也有自己组织的舞队。

鲁西北地区的村庄建设逐年变好，对于低保、农村合作医疗等制度村民普遍感到很满意。如东卢马村 93% 的村民加入了农村合作医疗，30% 的村民加入了农村养老保险。以王白杨村为例，村民的养老保障有所改善，6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 55 块钱，拥有农村户口的老年人在不用自己出钱的情况下就领到了养老钱。如果村民现在缴纳养老保险，将来就可以领到更多的养老金，可以交 100 元、500 元、1000 元不等，交得越多将来的养老金就越多。同时村里孩子们上学有了校车接送。现在九个村子的小学合并为一个小学，教学资源更为集中，教学质量有所提高。而校车的接送解决了这些孩子的上学路程问题。一个学期学生拿 640 元车费，政府补贴一半，学期末返还一半的费用。

## （二）鲁中地区

鲁中地区包括济南市、泰安市、莱芜市、淄博市、潍坊市。调查样本为这五个地区的 8 个村庄：济南市商河县张坊乡小孙村、泰安市东平县接山镇接山村、莱芜市莱城区大王庄镇西店子村、淄博市高青县李李镇新徐村、淄博市沂源县石桥乡茅子峪村、潍坊安丘市石埠子镇东殷民村、潍坊市寿光市化龙镇李家村、潍坊市寿光市营里镇吴营村。鲁中地区的地形是平原、丘陵和山地相



间，地形为山地的村庄由于交通不便造成经济发展滞后，如茅子峪村便是这种情况。由于地形的影响，鲁中地区村庄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对鲁西北地区的农业要滞后一些。村民的收入大多来源于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所得。

### 1. 村庄基本情况

表 1.3.2 鲁中地区村庄基本概况

村名称	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总人口(人)	村民小组(个)	地理类型	耕地面积(亩)	收入来源
小孙村	25	333	2	平原	650	外出打工
接山村	10	2223	7	40% 平原 40% 丘陵 20% 山地	3042	非农业收入
西店子村	40	635	4	—	547	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
新徐村	21.7	785	4	平原	800	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
茅子峪村	20	202	1	山地	164	农业、外出打工、政府补贴
东殷民村	50	523	4	70% 平原 20% 丘陵 10% 山地	690	大棚生产、养殖业
李家村	15	1000	6	平原	500	蔬菜种植、外出打工
吴营村	25	1760	11	平原	2600	外出打工

鲁中地区的地形是平原、丘陵和山地相间，地形的不便影响了种植业的发展。耕地主要是旱地，有部分耕地为水田，人均耕地面积较小，人均一亩左右。该地区粮食种植较少，粮食很少能够自给自足，其特色产业是蔬菜大棚种植。鲁中地区的村庄一般距离镇政府驻地和集市在 15 公里以内。鲁中经济实力雄厚，村民收入多依靠于外出打工所得。

### 2. 经济状况

鲁中地区的种、养殖方式主要依靠机械化作业和手工劳动相结合的方式，调查的 8 个村庄都是这种生产方式。许多村庄有农业生产大户或龙头企业带动村里的经济增长，如小孙村、接山村、西店子村等村庄便是这种情况。有的村

庄设有专门的协会或组织，如接山村有一个农业科技园区、一个农业科技市、一个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并设有专业协会用于科技服务；西店子村设有生产型的专业合作组织；新徐村设有农机合作社进行技术服务支持；李家村设有文艺性协会组织和基金信贷方面的组织；吴营村设有文艺型协会、技术型协会、养老助残和基金信贷等方面的组织。

鲁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相对缺乏，如小孙村的人均土地拥有量较少，每人 1.6 亩，地周围有沟，主要靠黄河水和地下水灌溉，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其他经济作物很少，种地收入甚微；接山村的特色经济作物是小麦良种培育和花卉养殖；东殷民村的特色农业是大棚生产和养殖，共实现人均增收约 3000 元；李家村在以前的乡村建设中被认定为蔬菜种植大村，重点发展蔬菜大棚反季节种植技术，全村几乎家家种蔬菜大棚，冬季种蔬菜以西红柿为主，夏季撤去棚膜种植果菜类，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且粮食作物的种植也不在少数。

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除了依靠特色农业的带动，还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收入和家庭副业的生产。如吴营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外出打工，打工地点一般在市区和周边村庄的工厂，在周边工厂打工的大部分村民为妇女，她们从事临时工性质的生产活动，但部分工厂的生产环境不安全、不卫生，使得部分劳动者承受着健康风险。在农忙时节，比如采收棉花、收季节性蔬菜时，农民会干按天按量计酬的农活，此项收入不低。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不多，大多数为年老体弱者，人们不再将重心放在农业生产上，亦不会对自己的农田精耕细作，导致管理粗放，闲地增多，种植的农作物多为粮食作物和易于管理的作物。不得不说外出打工确实极大地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甚至可以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村经济增长。以接山村为例，2011 年该村经济总收入 107 万元，平均家庭总收入为 18350 元，人均纯收入 8358 元，其中来自非农业的年收入为 16000 元。该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商品楼开发、村办企业、林业荒山承包、市场收入等。近些年，该村进行企业改革，增加集体收入，村里原有的面粉厂、蜂窝煤厂效益不好，经党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对其进行改制，由个人承包经营，引进商办华鑫管业、康健木业、隆鑫制砖、正通饲料加工等 6 家企

业，年收租赁费 6 万元，同时，村集体收取工业园区土地租赁费 15 万余元。依托驻地优势，加快小城镇开发建设，在沿泰东路两侧已基本开发结束的情况下，在村内的集市上开发了高标准商业街 2 条、新建商业楼 60 座、发展个体工商户 168 户，先后创通、拓宽、改造商业街三条，绿化、美化、亮化环境整治商业街道 2000 米；购置高标准货台 780 米，村集体每年增收 2 万元；在原来水泥预制件厂建成居民楼 4 栋，2011 年集体增收 74 万元。另外，通过整合资源，增加集体收入，对现有荒山、荒沟、荒滩、四旁道路进行招标，拍卖承包，实行三七分成，农户得大头，集体得小头；对农田林网道路树木实行二八分成，农户得大头，集体得小头，增加村集体收入 10 万元。

### 3. 传统生活状况

鲁中地区村庄文化娱乐设施和活动较少，即使有文化设施也没能得到合理利用。例如，小孙村的村子小，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公共活动场所，村里没有公共的体育设施，村委会有图书馆，但是村民一般不会去。接山村投资 80 万元建高标准三层教学楼一处，投资 16 万元建村综合服务楼一处，文化大院、计划生育室、党员活动室、卫生室、广播室、农民书屋等为一体，成为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但是村民的利用情况不明。西店子村中的娱乐活动较少，没有文艺队伍，村民平时的主要娱乐活动是打牌下棋、看电影、看戏台演出等。新徐村村委会的院子很大，是原来的幼儿园，现已废弃并长满了草，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更没有任何图书室、体育器材室等设施。茅子峪村村民平时的娱乐生活比较单调，缺乏自己的文艺队伍，闲暇时会进行打牌下棋、观看电影等活动，部分村民有自己的民间信仰。东殷民村的娱乐活动较为单一，没有文艺队伍，村民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打牌下棋、观看电影。

鲁中地区有的村庄道路条件较好，但也有的村庄道路条件很差。如是李家村和吴营村都是村村通客运系统的受益者，城乡公路较发达，距离市区较近，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方便地来回，与城市的互动交流较多。但是有的村庄交通条件还是较差，仅有主干路建设较好，甚至有的小村庄全部是土路。例如小孙村没有修柏油路，街上还是土路，房屋街道也没有规划；西店子村和东殷民村的主要干路是水泥路；新徐村村中心的路经过多次修缮，但是除了村中心路，

其他道路都是土路，并且宽窄不一。

鲁中地区基础设施和现代化设施建设较好，家家户户能够通水、通电。例如西店子村已经实现家家通电，村中90%的农户有电话，5%的农户家中买上了电脑，可以连通网络。村中已经通自来水，但是天然井水仍是该村重要的饮水来源；新徐村的公共设施主要有路灯、村务公开栏（黑板）、村委会的大院子，两年前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大部分村民家里有电话，村里电话是联网的，早入网的用户在同村之间相互打电话可以免费；茅子峪村已经实现全村通电、通自来水，94%的农户家中有手机，4%的农户家中有电脑，可以实现联网；东殷民村已经实现全村通电，每家每户都有电话，全村实现通水，家家户户都已经安装了自来水；李家村目前在进行全村房屋改建，村民采取了统一的外观设计，在原址的基础上盖起两层楼房，统一供水、电、数字信号、网络；吴营村的现代化设施逐步建立，每家每户都有自来水、电和数字电视信号。

### （三）鲁西南地区

鲁南、鲁西南地区包括济宁市、菏泽市、临沂市、枣庄市、日照市。调查样本为其中四个市区的5个村庄：济宁市邹城香城镇孙王村、菏泽市单县宋庄、菏泽市巨野县独山镇陈庄、临沂市沂南县薛家宅子村、枣庄市滕州市羊庄镇范西村。

#### 1. 村庄基本状况

表 1.3.3 鲁南鲁西南地区村庄基本情况

村名称	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总人口(人)	村民小组(个)	地理类型	耕地面积(亩)	收入来源
孙王村	—	1120	—	—	800	外出打工
宋庄	1	351	12	平原	400	种养殖业
陈庄	15	650	10	平原	905	农业、外出打工、经商
薛家宅子村	17	445	—	33%平原, 67%山地	386	种植业、林果业和畜牧养殖业
范西村	25	823	4	40%平原, 30%丘陵, 30%山地	953	外出打工

鲁西南地区的地形多为平原，少数为山地和丘陵地区。鲁西南地区属于山东省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耕地多为旱地，少数为水田，人均耕地面积普遍不高，每人约一至两亩地。鲁西南地区村庄的经济收入约有一半来源于农业，一半来源于外出打工或经商所得。

## 2. 经济状况

鲁西南地区农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和外出打工所得。例如孙王村全村共有土地 800 亩，人均七分多地，一般一亩地收入在 600 元左右，种地纯收入一两千元，如果地多的话年收入能有八九千元，现在有不少人已经不种地了，要么租给别人种，要么给亲戚、邻居种，而这部分人在外面打工，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工厂打工，基本没有保险，村里基本没有企业，也没有小型的作坊工厂，村民除了种地就是外出打工，一般外出打工的是 20—40 岁的男性，妇女小孩在家，一般外出打工的收入在 1 万至 3 万元。宋庄的经济来源有一半是来自养殖业，依靠于小农分散经营，另一半来源于非农业生产。陈庄经济收入的 1/2 来源于农业收入，1/3 来自家庭副业及外出打工的收入，还有少部分是来自经商办厂等经营性收入，陈庄农业人均 1.3 亩地，主要种植小麦、棉花，还有玉米、大豆、大蒜、花生等，农田管理半机械化，人工管理仍占 70%，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数是 35—65 岁的中年人，而且非农忙时节，男劳力会随建筑队在周围村庄、乡镇打工，在外务工的多是 18—30 岁的青年，经商人员大多从事农产品的收购、倒卖、搞运输等买卖，活动范围限于本县内。

鲁西南地区地形多样，有平原也有山地和丘陵，村庄根据本村的实际地形情况发展特色经济作物。例如薛家宅子村多山地，所以村庄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发挥山多地广、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种植业、林果业和畜牧养殖业等。在林果业方面，利用山地和光照资源丰富的优势，种植油桃、板栗、山杏等果树；种植业主要在地势平坦地区，经济作物有花生、玉米、小麦和地瓜。范西村 60% 的土地为山地或丘陵地区，种植条件较差，所以大多数劳动力要么上山采石，要么到外面一些大城市打工，在农忙时节再回家务农。

## 3. 传统生活状况

鲁西南地区文化传统较丰富，有部分村民信仰宗教，此区域是著名佛教禅

师六祖慧能的故乡，是六祖诞生和圆寂之所，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发源地。陈庄约有 10 户人家信仰基督教，其余绝大多数都拜佛，也拜道教，村外一里处有一座 400 多年的庙，庙里有如来佛、十八罗汉，有关公、冥王爷、吕洞宾、托塔天王，也有各种菩萨、送子奶奶、玉皇大帝、王母娘娘等，该村佛、道融合，每年初一、十五很多人，特别是 40 岁以上的妇女、老太太都会到庙里烧香、拜佛、许愿，也有人家里就摆放着神像，每逢过年，拜神更是绝大多数人家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为了修建庙宇，大家也会集体筹资募捐，在拜佛时，也会有算卦、占卜等现象。除了中国传统宗教，基督教也在农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宋庄是汉族村，但有 2.7% 的村民有民间信仰，有 13.5% 的人信仰天主教。薛家宅子村有一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不参加祭祖活动，结婚时请牧师主持，平时周末会有聚会，朗读《圣经》进行祷告，不信仰基督教的村民在过年、清明等节日时会有祭祖活动。

鲁西南地区的大部分村落姓氏明确，有的村落有宗族。例如陈庄村属于自然村落，96% 姓陈，刘、郑两姓仅有三户，陈庄村家族脉络清晰，最初的老祖宗由四个兄弟组成，也就形成了陈庄村今天的四大家族。一个家族中有红白事时相互参与、帮忙，给礼金，过年时给长者作揖。在各个大小家族内，都有一个或两个大家默认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一般都是本家族的长子，一般不会由别人替代，除非长子没有领导能力，家族事务一般有田地划分（家族组成的一个生产队）、“内政外交”事务，家族在陈庄人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孙王村内有孙、丁、汤、潘、于五大姓氏，孙姓占 70% 左右，其次是丁姓，占 15% 左右，然后是汤姓，占 12% 左右，潘姓和于姓只有两大家人。薛家宅子村人口较少，全村只有一个大姓：薛，清嘉庆元年薛氏从佛谢迁此立村，名薛家宅子，老祖宗有五个儿子，现在的薛家宅子村人口都是这五兄弟的后代。范西村中，范姓和朱姓是村里最主要的两大姓，约占全村 70% 的人口。村庄姓氏一致，使村民的凝聚力加强。

文化娱乐设施较少似乎成为现代农村的一个共性，鲁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如孙王庄的一些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缺乏路灯和一些健身设施；宋庄村民娱乐生活比较单调，主要是进行串门聊天、看电影等活动；陈庄村里没有任何公共

娱乐场所和基础设施，也没有任何协会、文化团等组织，文化娱乐几乎是空白，在七八年前农村还会有戏班子、杂技团表演，现在也没有了，现在村民绝大多数人都会以打牌、玩麻将、看电视、串门聊天以排遣时间、娱乐自己；范西村内的文化娱乐项目比较缺乏，也没有相应的文化娱乐设施，村民平时主要是看电视、串门聊天、打牌、打麻将等。

#### （四）胶东半岛地区

胶东半岛即山东半岛，指胶州湾莱州湾之间的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包括青岛、烟台、威海三个地区，也是山东省经济状况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调查地区主要集中在青岛市，选取了青岛市的一个村庄（青岛即墨区移风店镇韩家庄村）作为调查对象。

##### 1. 村庄基本状况

韩家庄村距离县城 40 公里，距离乡镇政府驻地约 7 公里，距离最近的集市约 0.5 公里。村中共有居民 182 户，总人口数为 679 人，其中劳动力有 420 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21 人，村中共有村民小组 7 个。该村的行政面积有 4 平方公里，全部为平原，村中有耕地 600 亩，全部为旱地。

##### 2. 经济状况

韩家庄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村里的粮食能够完全自给自足。2011 年超过 33% 的村民家庭总收入是 2 万元以下，21.7% 的村民家庭总收入是 2 万至 3 万元，20% 的村民家庭总收入是 3 万至 4 万元。

##### 3. 传统生活状况

现如今韩家庄村已经实现了全村通水、通电。从 2007 年以来，村里的生活环境已经越来越好，村里的饮水主要是使用自己安装的自来水，村主干路是沥青路，交通便利。该村的文化娱乐活动较为丰富，村里组织了舞队，偶尔会到外地去演出。村民平时的娱乐活动除了打牌下棋还会参加或观看扭秧歌、地方曲艺表演等活动。该村没有家族网络，部分村民有信仰宗教的习惯。

## 二、西部地区研究地点详细情况

本报告关于西部地区的调查包括三个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

省。陕西省主要是在渭南蒲城县进行了调查，甘肃省主要是在靖远县，宁夏主要包括吴忠、银川、盐池三地。研究地点选取了这三个省的 11 个村庄。

表 1.3.4 西部地区研究地点情况

村名称	离县城的距离(公里)	总人口(人)	村民小组(个)	地理类型	耕地面积(亩)	收入来源	村庄类型
西沟村	80	2652	6	70% 平原, 30% 山地	23525.2	养殖业、外出打工和政府生活补贴	回汉杂居村
北关村	80	1300	4	80% 平原, 20% 山地	7426	养殖业、外出打工和政府生活补贴	回汉杂居村
王古窑村	65	1406	5	75% 平原, 10% 丘陵, 15% 山地	17451.5	种养殖业、外出打工和工资性收入	回汉杂居村
南关村	80	3228	6	80% 平原, 20% 山地	18651	养殖业、外出打工和土地流转收入	纯回民村
申家滩村	90	1472	5	60% 平原, 10% 丘陵, 30% 山地	14760	种养殖业和土地流转收入	纯汉民村
郑儿庄村	95	1863	3	40% 平原, 20% 丘陵, 40% 山地	22734	种养殖业、家庭副业和外出打工收入	纯汉民村
南梁台子铣东一队	15	4000	8	平原	7900	—	纯回民村
上王庄村	6	2280	6	平原	11400	养殖业(养猪)	纯汉民村
南头村	15	2876	6	82% 平原, 18% 山地	1873	种植业	汉族村
北神沟村	25	1100	4	山地	2400	农业	汉族村
鲍寨村	10	650	3	平原	1500	农业	汉族村

### (一) 宁夏地区

本次调查在宁夏地区选取了 8 个村庄，其中有三个回汉杂居村：吴忠市西沟村、吴忠市北关村、吴忠市王古窑村；两个纯回族村：吴忠市南关村、银川市南台梁子铣东一队；三个纯汉族村：吴忠市申家滩村、吴忠市郑儿庄村、吴



忠市四墩子大队上王庄村。

### 1. 村庄基本情况

宁夏地区是平原和山地相间的地形，耕地多为旱地，部分村庄也有水田种植，耕地面积较大，有的村子人均耕地面积可达 10 亩，如申家滩村人均耕地面积为 10 亩、郑儿庄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12.2 亩、王古窑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12.4 亩。宁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回族人口较多，多数村庄有回族人口居住，甚至有的村庄就是纯回族村。宁夏地区的收入来源除了种养殖业收入外还有外出打工的收入、政府补贴、土地流转收入等。

### 2. 经济基础情况

宁夏地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配合少部分机械化作业，粮食自给率不高，如西沟村、南关村、申家滩村、郑儿庄村、王古窑村、北关村的粮食自给率分别为 30%、30%、50%、50%、60%、70%。村里进一步增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水源不足，常年干旱，全部土地靠天吃饭，如西沟村、王古窑村、南关村、申家滩村、郑儿庄村等村庄都面临缺水的问题。

宁夏地区的农业经济收入较低，多是依靠非农业的其他收入。以四墩子大队上王庄村为例，该村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机械化作业配合手工劳动，现在虽然每家还有 20 多亩的土地，而且都还是水浇地，可是村民从土地中得到的收入却不多，平均可能只有 2 万左右，而他们的大部分收入都是靠养猪来获得的。由于前几年政府政策好，现在几乎每家每户都在养猪，从养猪上得到的好处很多，每年他们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养猪上，通过不断地扩大养猪规模，现在村民每年的收入在 8 万元左右，这相比单纯依靠土地收入有了很大的进步，养猪可以说是此村的主要经济来源。有一部分不愿意养猪的村民选择走出去，通过外出打工获取报酬，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现在，村庄中养猪的用户不断增加，政府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村民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包括给猪上保险等问题。

### 3. 生活现状

宁夏地区的村庄已经实现全村通电，村里的饮水主要依靠国家自来水引用工程和水窖积攒的雨水。该地区少数民族多，在纯回族村和回汉杂居村一般有

自己的宗教信仰团体。现以上王庄村为例说明宁夏地区的村庄日常生活情况。上王庄村已经实现全村通电、通水，村里的饮水主要依靠国家自来水引用工程，从2007年以来村里的生活环境有所改善，村里的主干路是沥青路，该村村民接受正规教育的最高学历是大学本科，村民的日常交往按“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进行，村民联系最亲密的就是自己的直接亲属，其次是邻居，再接下来交往频繁的是同姓氏的人，遇到一些需要很多人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相同姓氏的人帮忙，最后才是不同姓氏的人，虽然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可是大家彼此见面都会打声招呼。在村庄的发展上面临两大问题：该村缺乏相应的娱乐设施，不能举办一些娱乐活动，最常做的就是去串门聊天；此外，垃圾处理问题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乱扔垃圾的情况随处可见，村里没有正确的垃圾处理方式。

## （二）甘肃地区

### 1. 村庄基本情况

南头村距离县城15公里，距离乡镇政府驻地1.5公里，距离最近的集市1.5公里。该村有6个村民小组，586户人家，共有人口2876人。该村行政面积2.34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地区占82%，山地占18%，该村耕地面积1873亩，全部是水田，该村非耕地面积有364亩，水面面积有34亩。

### 2. 经济基础情况

南头村主要进行种植业，生产手段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生产经营方式主要依靠小农分散经营。该村有宗教信仰团体和用水协会等村民合作组织。该村生产的粮食可以完全自给自足，2011年平均家庭总收入10000元，人均纯收入2000元，村里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家庭副业及外出打工，这部分收入占主要收入的60%，剩余的40%来自农业和工资性收入。该村进一步增收的主要困难是市场小、人多地少。

### 3. 生活现状

南头村现如今的三大姓氏分别是“吴”“张”“杨”，分别占全村人口的17%、15%、13%。该村现在已实现全村通电，每家每户都有电话。66%的村民家里通了自来水，村民饮水主要依靠自己安装的自来水。村主干路是土路，

交通不便。村里文化活动较多，有自己的戏剧社和社火队，这些文化队伍偶尔会到外地去演出，村里的文化娱乐环境较好，村庄设有文化活动室、阅报栏、寺庙等文化设施。

### （三）陕西地区

#### 1. 村庄基本情况

在陕西地区选取了两个汉族村：铜川印台区北神沟村和渭南蒲城县鲍寨村。这两个村落一个为山地地形，一个为平原地形；耕地类型一个为旱地，一个为水田。北神沟村距离县城 25 公里，距离乡镇政府驻地 10 公里，距离最近的集市 10 公里。该村有 4 个村民小组，260 户人家，共有人口 1100 人。该村行政面积 4 平方公里，全部是山地，该村耕地面积 2400 亩，全部是旱地，非耕地面积有 2000 亩。鲍寨村是自然村，距离县城 10 公里，距离乡镇政府驻地 5 公里，距离最近的集市 5 公里。该村有 3 个村民小组，182 户人家，共有人口 650 人。该村行政面积 0.14 平方公里，全部是平原地区，该村耕地面积 1500 亩，全部是水田地，非耕地面积有 30 亩。

#### 2. 经济基础情况

北神沟村和鲍寨村都以种植业为主，生产手段都是依靠机械化作业配合手工劳动，生产经营方式主要依靠小农分散经营，村里有不同的协会或组织，这两个村子面临同样的经济增长困境，即缺乏高科技的支持。北神沟村主要进行种养殖业，苹果产业较发达，村里有基金信贷方面的组织，该村生产的粮食能够基本自给，粮食生产率为 90%，2011 年平均家庭总收入 10000 元，人均纯收入 3000 元，村里的家庭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这部分收入占主要收入的 80%，剩余的 20% 收入来自家庭副业及外出打工。鲍寨村主要进行种植业，该村有文艺型协会组织，生产的粮食可以完全自给自足，有剩余粮食用于出售，2011 年平均家庭总收入 20000 元，人均纯收入 5000 元。

#### 3. 生活现状

北神沟村和鲍寨村都有村里的大姓，北神沟村现如今的三大姓氏分别是“王”“徐”“贾”，分别占全村人口的 50%、30%、15%；鲍寨村现如今的三

大姓氏分别是“薛”“马”“何”，分别占全村人口的20%、10%、8%。两个村庄家家户户都能通电，有电话，全村通水，饮水主要依靠国家自来水引用工程，但这两个村庄在交通和文化活动上的表现呈相反状况。北神沟村的主干路是土路，交通不便，而鲍寨村的主干路是水泥路。北神沟村无文艺队伍，村民平时的文化活动主要是观看电影、打牌下棋等；而鲍寨村里文化活动较多，有自己的锣鼓队，这些文化队伍偶尔会到外地去演出。

## 第四节 信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指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换句话说，信度是指测量结果的一致性 or 稳定性，即测量工具能否稳定地测量所测的事物或变量。本报告用 SPSS 17.0 数据统计软件对本报告的测量维度及指标进行了测量，具体测量指标的信度如下：

### 一、个体社会资本的信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指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果相一致的程度。信度的置信区间为 0 到 1，当信度系数为 0.5 以上就说明是可信的。本报告用五个维度对农村居民社会支持网进行分析，即把村民个体网的测量操作化为五个维度：农村居民咨询网、农村居民情感网、农村居民帮工网、农村居民信任网、农村居民借贷网。经 SPSS 17.0 数据统计分析软件，得出农村居民咨询网的信度系数为 0.630，农村居民情感网的信度系数为 0.603，农村居民帮工网的信度系数 0.676，农村居民信任网的信度系数为 0.745，农村居民借贷网的信度系数为 0.579。综合来看，用这五个维度的指标来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网比较适合。具体维度的信度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1.4.1 农村居民社会支持网的样本信度分析

测量指标	标准信度系数
农村居民咨询网	0.630
您会与谁讨论重大问题或谈论心事	
农村居民情感网	0.602
您和谁一起外出，如赶集（会）、进城、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	
农村居民帮工网	0.676
您会找谁帮忙搬大袋粮食或重物、或红白喜事、盖房子、打场	
农村居民信任网	0.745
当您有急事要外出一段时间（一周或更长时间），您会请谁帮助您来照料孩子、庄稼、牲畜并看管家	
农村居民借贷网	0.579
您会向谁借日杂小物（如自行车、筛子、饭桌等）、食物（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农耕用品（如小四轮、拖拉机、耕牛） 当您急需一大笔钱（看病、教育、结婚、盖房等），您会向谁借	

##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信度分析

本报告用六个维度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即用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这六个维度来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本报告用 SPSS 17.0 数据统计软件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维度及指标进行了测量，在 SPSS 17.0 软件中打开数据视图，点击“分析”，选择“度量”，选择“可靠性分析”，分别把“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六个测量维度拉入“项目”中，分别点击“统计量”，选择“描述性”下的“度量”和“项之间”下的“相关性”，点击“继续”，然后点击“确定”，就分别得出了这六个维度的信度。社区参与的信度系数为 0.723，社区归属感的信度系数为 0.670，合作的信度系数为 0.913，共享的信度系数为 0.724，互惠的信度系数为 0.675，信任的信度系数为 0.750，可以看出有一个维度的信度系数达到了 0.9 以上，其余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在 0.6 以上，可以得出这六个测量维度是可信的。此次测量的标准信度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1.4.2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样本信度分析

测量指标	标准信度系数
社区参与	0.723
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我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 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力出力 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 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社区归属感	0.670
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 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 我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 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合作	0.913
我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 我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 我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 我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 我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合作	
共享	0.724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 我家买了农具（小四轮），我会免费让邻居使用 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我会告诉我认识的人	
互惠	0.675
农忙时，我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 红白喜事时，我常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助 我的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 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	
信任	0.750
我相信我家人说的话 我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 出外时，我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 我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 我相信村领导 我相信政府 我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我相信警察、法官/法院 我相信医生 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 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基本可信的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六个维度的标准信度系数均为 0.6 以上，说明这六个维度能够较好地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

### 三、农村社区生活状况的信度分析

本报告用了 17 个测量指标来测量社区生活的满意程度，经过数据统计软件 SPSS 17.0 的统计结果，得出农村社区生活状况的标准信度为 0.824，所以这些测量指标是可信的。具体测量表格如下表：

表 1.4.3 农村社区生活状况的信度分析

社区生活满意度	0.824
村里的文化及娱乐活动	
村里的治安状况	
村容村貌	
房屋街道布局	
村公共活动场所建设	
垃圾处理	
村两委对公共设施的提供	
村财务公开情况	
村“一事一议”执行情况	
群众对村干部监督情况	
村干部为民办事公平公正	
村集体提供的就业服务	
村集体提供教育培训的内容	
村集体提供教育培训的质量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确定方式	
您的医疗保障情况	
您的养老保险情况	

## 第二章 农村居民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状况

本章主要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农村居民的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进行了研究，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地位分布和异质性等方面详细分析了存在于农村居民之间的五种社会网络，揭示了农村居民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基本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农村居民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差异。

### 第一节 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及研究假设

社会网是测量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也是个体社会资本的容器，分析社会网络的基本情况是计算社会资本总量的基础，以下对社会网及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进行具体界定。

#### 一、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分析维度

##### 1. 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是指被调查者所提名的人数，各具体社会网的规模操作化为“本问题一共提到的人数”。社会网的总规模 =  $\sum_{\text{提到的人数}}$  -  $\sum_{\text{重复的人数}}$ 。



## 2. 网络强度

网络强度是指强关系的比例，即各具体社会网的网络强度等于强关系数除以该网络规模，强关系由家庭成员和亲属构成。

## 3. 关系构成

关系构成是指各种关系在具体社会网中占的比例。我们将所有可能的关系分为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和其他六类。

## 4. 网络顶端

网络顶端即网络成员中社会地位最高者的得分，在这里我们操作化为处在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阶层。参照边燕杰<sup>①</sup>和张文宏<sup>②</sup>等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将职业阶层地位分为行政管理阶层、专业技术阶层、普通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并分别赋值6分、5分、4分、3分、2分、1分。

行政管理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科级以上行政管理人员、大中型企业厂长或经理等；专业技术阶层包括大专以上工程师、医生、护士、律师、大中小学教师等；普通白领阶层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非行政职务的一般科员和职员，以及商业、服务业非体力职员；小雇主阶层包括个体工商会、家庭小业主等；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sup>③</sup>

## 5. 网络位差

网络位差是指社会网中成员的地位差，即网络中职业阶层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网络位差较大则意味着社会资本也较多，这主要是基于弱关系理论得出的。

## 二、研究假设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于中国人际关系和社会基本机

---

①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产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36—146页。

② 张文宏、杨辉英：《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8—74页。

③ 边燕杰等：《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构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sup>①</sup>。要分析当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首先要研究农村居民的差序格局是否有变异。韦伯的三位一体的分层理论提出了定量研究社会分层结构的思想,他指出经济、声望和权利是考察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由于声望指标无法从问卷中直接获得,因此我们仅考虑了经济和权力结构性指标。本文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差异入手,提出了“差序格局”变异假设、经济收入差异假设和权力持续假设。

### 1. “差序格局”变异假设

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一直是由血缘与地缘两种主要的关系组成的“差序格局”<sup>②</sup>。在这一“差序格局”中,家庭是社会圈子中最里面的一轮,向外依次是“亲属圈”“邻居圈”和“私人交往圈”<sup>③</sup>。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流动的空间”和“自由流动的资源”的出现,农村居民的交往圈子逐渐开放,交往对象也冲破了村庄地域的限制,利益关系也成为主导农村居民交往的主要原则,交往规模的扩大和利益关系必然带来了非亲属弱关系的增多。

当前,农村居民打零工的现象日渐频繁,村民活动室的增加也让农村居民休闲生活日渐丰富,这种基于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而形成的“拟似血缘关系”正在渗入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差序格局”有所改变,农村居民的提名顺序可能按照家人、拟似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非亲属关系的差序排列。

### 2. 经济收入差异假设

个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获取需要前期的投入和经营,经济收入较多的个体在社会资本挖掘和维持上就会形成优势。同时,高收入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相应地,所嵌入的资源也较多。当前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已不再局限于农作物的种植和买卖上,而是更多地依靠种植果树、种植花卉树木、水产养殖等方面

① 边燕杰等:《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② 谢建社、牛喜霞:《新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创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13页。

③ 费孝通:《新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的收入。想要自己的农产品和水产品能够卖到好价钱，种好、养好固然重要，但卖出去更重要，而且价格要高。此时，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就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能不能拉来客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家庭农业总收入不同，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也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自由流动性已大大增强，农村居民的收入渠道也日趋多元化。农闲时期，农村居民会到其他村的工厂、县城里的工地等地方工作，甚至有的居民一直在工厂上班，只是在农忙的时候请假回家劳作。非农工作扩展了农村居民的工作范围，也促进了业缘关系网络的形成，进而扩大网络规模，提高网络异质性，提高了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

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家庭年收入越高，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顶端越高，社会资本总量越大。

假设3：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关系网络规模越大，网络顶端越高，社会资本总量越大。

### 3. 权力持续假设

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伴随着权力基础的转移<sup>①</sup>，虽然之后他对市场转型理论作了修正，但依然表现出市场替代权力的趋向。但是，罗纳塔斯的权力变形论认为，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成了社会网络资源<sup>②</sup>。Ivan Szelenyi 与 Eric Kostello 通过对东欧的研究，指出大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当资本积累成为可能时，干部、前任干部以及共产主义前精英将进入市场交易并获取利益<sup>③</sup>。

市场替代权力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但现在我们依然是权力再分配体制，政治身份依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在农

---

①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7、533页。

②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17、533页。

③ 边燕杰主编：《关系社会学：理论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村拥有党员政治身份的个体多担任村内职务，与普通农村居民相比更容易接触较高的阶层，尤其是体制内阶层。这样，他们获取的信息更快、更多，也更准确。这在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尤为重要。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发展，政治身份的作用会逐渐降低，对社会资本的总量的显著性与其他结构性变量相比也会降低。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依然不充分，尤其是在农村，因此，我们提出权利持续的假设，即：

假设4：拥有党员身份的个体，其关系网络规模（顶端）较大（高），社会资本总量更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论文研究的仅是不同政治身份变量下社会资本的总量差异，而不是社会资本对“办事”的影响。

### 三、统计模型

统计模型阐释了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计算原理和假设2、假设3的验证模型。

#### 1. 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有很多，主要分为主观评价法和客观评价法。通过因子分析来得到各指标的权重是比较简单、运用面较广的方法之一。因子分析是一种降维思想，是通过将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结为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因子从而进行分析的多变量统计方法。

首先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各因子的具体特征根值和贡献率，然后计算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和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进而计算出有指标的系数，最后计算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具体模型将在第三章第二节中具体解释。

#### 2. 二元 logistic 分析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前提为因变量为0、1，因变量取1的概率是研究对象自变量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模型为：

$$\text{Logit}(Y) = \ln\left(\frac{P_i}{1-p_i}\right)$$

其中， $i$  表示被解释变量，具体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总量的高低这一二

分变量。 $p_i$  表示社会资本总量较高发生的概率值。 $\frac{p_i}{1-p_i}$  表示社会资本总量较高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比。

## 第二节 农村居民的咨询网分析

对于农村居民咨询网的测量是通过“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如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做出决定；当您与配偶或子女发生严重矛盾，而又无法与其讨论解决；当您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时；等等。您会找谁商量或谈论”来测量的。这是在测量社会资本时常常会提到的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它为“重要问题咨询网”。我们可以从网络规模、密度、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异质性等指标来分析咨询网的基本特征。

### 一、咨询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表 2.2.1 农村居民咨询网规模和密度分布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规模	0	37	1.7	3.3249	1.73582	2201
	1	233	10.6			
	2	620	28.2			
	3	398	18.1			
	4	228	10.4			
	5	516	23.4			
	6—12	169	7.6			
密度	0.00	544	25.2	0.5679	0.40512	2163
	0.11—0.57	445	20.6			
	0.60—1.00	1174	54.2			

从表 2.2.1 中我们可以看出, 农村居民情感网的平均规模为 3.3, 有 7.6% (169 人) 的被访者的咨询网规模超过了 5 人, 只有 1.7% (37 人) 的被访者的网络规模为 0, 这说明在遇到重大问题需要找人讨论时, 几乎所有的居民都会向外寻求支援且都能得到相应的情感支持。有 28.2% (620 人) 的农村居民的讨论网的规模为 2 人。根据我们的访谈, 这两个人往往是夫妻或者是子女。个体网络平均密度为 0.57, 说明咨询网中亲属和非亲属的关系在所有咨询网成员中的比列相当。有 25.2% (544 人) 的咨询网成员是完全由非亲属构成的。密度在 0.11—0.57 之间的占 20.6% (445 人), 加之 25.2% 的完全由非亲属成员构成的比例, 可以看出弱关系在当前农村居民咨询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将家庭成员算在了亲属关系中, 未单独列出进行分析, 除去核心家庭成员对农村居民咨询网的影响, 其他亲属的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

## 二、咨询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表 2.2.2 农村居民咨询网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职业异质性频率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1109	726	494	305	219	2853
	亲戚	273	363	213	129	88	1066
	朋友	580	579	383	277	197	2016
	同学	12	29	27	30	17	115
	邻居	180	222	189	168	137	896
	其他	4	4	5	4	1	18
交往频率	经常(每周 一、两次)	1792	1512	940	672	558	5474
	有时(一月 一、两次)	142	183	173	148	85	731
	很少(半年 一、两次)	8	15	2	5	1	31
	没有过	0	1	0	0	0	1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职业	行政管理阶层	13	16	9	8	23	69
	专业技术阶层	39	45	30	21	11	146
	普通白领阶层	17	20	19	16	9	81
	商业和服务业阶层	6	16	13	13	3	51
	小雇主阶层	46	43	27	19	25	160
	产业工人阶层	89	142	94	77	52	454
	农业劳动者阶层	1584	1308	871	618	465	4846
	职业异质性	0.56	0.75	0.98	1.000	1.000	

表 2.2.2 显示的是向什么人寻求咨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成员的支持仍然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其次是朋友，亲戚排第三位。这与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基于费孝通差序格局的设想，我们预期亲戚的地位会高于朋友。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农村居民外出打工比以前要普遍得多，因此社会交往的范围就会扩大，认识的人也不只局限在原有的亲属圈中，当遇到重要问题时，有相同经历的朋友就成为首选。从交往频率来看，频繁的见面或联系是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的突出特点。网络中提到的人以农业劳动者阶层为主，其次是产业工人和小雇主阶层，其职业异质性也超过了 0.5，第一个人之间的职业异质性为 0.56，第二个人为 0.75，第三个人为 0.98。

在测量咨询网时，我们发现对于“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人商量或谈论：如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做出决定；当您与配偶或子女发生严重矛盾，而又无法与其讨论解决；当您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时；等等。您会找谁商量或谈论”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答案，这关系到农村居民咨询网关系的构成。

当碰到重要问题时，很多人都是家庭成员之间讨论决定，一般不寻求“外人”的帮助，与“外人”讨论也只是听一下别人的看法，作为自己做决定的参考。访谈对象 Y 告诉我们：“在生活中遇到需要做决定的重大事情，基本都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所以都是跟家人讨论，当然有时也会听听亲戚朋友的意见，但仅仅做参考。我儿子今年 20 岁了，需要建房子，但一开始不能确定是建平房还是楼房。因为村子里其他人家建的都是楼房，我们如果建平房，以后儿媳妇可能会有意见，但儿子在外读书，建楼房的成本太高。这件事是我们家这些年来最重要的事情，在房屋建造前，我们一家人进行了很多次的商量。”

而当与家庭成员发生严重矛盾时，村民往往会找邻居或者朋友。因为第三方往往能站在“旁观者清”的立场上，跳出来看问题，这样也更利于问题的解决。这种咨询帮助往往起着疏导情绪和开导村民的作用。“有些事尤其是自己家人之间产生矛盾，在心里憋着总是会心情不好，但自己又解决不了，只能找人说说。我女儿大了，自己谈了对象，小伙子各方面都挺不错，但他家庭条件很差而且工作离家远，我不太满意。想让女儿跟他分了再重新找，但女儿不理解我的用心，生我的气。我就把情况跟邻居聊了聊，邻居说：‘钱主要还是靠孩子自己赚，如果孩子不务正业父母能给一百万也没用，只要孩子们感情好，男孩对你家女儿好就行了。’后来我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也就不难为女儿了，让她自己发展去吧，儿孙自有儿孙福。”

### 第三节 农村居民情感网分析

对于农村居民情感网的测量是通过“您和谁一起外出，如赶集（会）、进城、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这一问题来测量的。个人感情是复杂的，表现形式也很多，我们主要是从社会交往这一方面来测量农村居民情感网的。



### 一、情感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农村居民情感网的规模和密度要比咨询网低，表 2.3.1 显示，情感网的平均规模为 2.6，超过 5 人的支持规模占 2.4%（56 人），有 8.9%（195 人）的人情感网规模为 0，最大支持规模为 11 人，情感网规模众数依然为 2 个人。从网络规模来看，少于两个人或两个人一起外出赶集、进城的超过了 5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第一，调查对象全部为户主，男性独立的性格特点影响了网络规模；第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农户一家一车（自行车或电动车）成为可能，极大增强了外出的便捷性，拉帮结派坐牛车外出的现象一去不复返；第三，经济的发展使得集市、商店增多，距离增近，农户自己可以根据情况随时得到满足，不需要结伙置办。

表 2.3.1 农村居民情感网规模和密度分布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规模	0	195	8.9	2.6364	1.63621	2200
	1	306	13.9			
	2	685	31.1			
	3	396	18.0			
	4	276	12.5			
	5	286	13.0			
	6—11	56	2.4			
密度	0.00	776	38.7	0.4574	0.42465	2006
	0.17—0.45	220	11.0			
	0.50—1.00	1010	50.3			

从情感网密度来看，平均网络密度为 0.46，说明在情感网成员构成中超过一半的成员与农村居民的关系属于弱关系，情感网成员中完全由非亲属构成的占 38.7%（776 人），亲属关系在农村居民情感网中超过一半的占样本数的

50.3% (1010 人)。在差序格局中,我们往往受到同心圆格局的影响,家庭成员和其他亲属常站在格局的立场上左右我们的决定,在情感的支持上同样存在着压抑自己的情绪、偏好而迎合差序格局要求的情况。因此,在情感网中,建立在相互认同基础上的弱关系就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 二、情感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表 2.3.2 显示,朋友关系被提到了 2074 次,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关系,其次是家庭成员,被提到了 1899 次,但在农村居民提到的第一个人中家庭成员依然排在第一位,总共被提到 897 次。这种朋友关系超越家庭成员的现象很值得我们探究,受家族思想的影响,家庭这一最小的社会组织单位几乎为中国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一切,因此在我们遇到问题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庭成员,情感交往也不例外。

表 2.3.2 农村居民情感网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职业异质性频率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897	476	297	165	64	1899
	亲戚	136	239	148	63	38	624
	朋友	635	636	360	280	163	2074
	同学	20	30	18	15	6	89
	邻居	196	294	166	70	39	765
	其他	11	8	2	2	0	23
交往频率	经常(每周 一、两次)	1658	1293	719	386	184	4240
	有时(一月 一、两次)	104	161	145	138	88	637
	很少(半年 一、两次)	4	11	0	0	0	15
	没有过	0	0	0	0	0	0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职业	行政管理阶层	12	3	7	3	0	25
	专业技术阶层	22	17	19	11	6	75
	普通白领阶层	10	11	11	3	0	35
	商业和服务业阶层	13	13	10	14	12	62
	小雇主阶层	32	39	30	21	7	129
	产业工人阶层	68	76	60	35	27	266
	农业劳动者阶层	1440	1079	600	342	178	3639
	职业异质性	0.67	0.88	1.00	1.00	1.00	

但从各种关系被提到的总次数我们看到，朋友这一弱关系在总体上超过了家庭成员，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已不局限在亲属的小圈子里，建立在相似的兴趣、脾气、价值理念等基础之上的朋友圈彼此之间更为了解，能够为居民的情感世界提供有效的支持和慰藉。从交往频率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是相当频繁的，至少每个月有一次见面或者一通电话。从交往对象的职业来看，群内选择的现象依然明显，在农业劳动者阶层共被提到 8485 次。整体来看，交往对象的职业几乎遍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职业异质性比例也比较大，从第一个人到第三个人的职业地位阶层异质性分别为 0.633、0.737 和 0.980，第四个人和第五个人的职业异质性到达了 1。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和谁一起赶集（会）、进城、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或者散步”除了考虑与其的情感之外，还会考虑到对方的保密性。在农村这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中，谁家发生了什么很快就会被同村的人知道，并且在一段时间内还会成为农村居民谈论的话题。而和谁一起外出就为农

村居民谈论某些话题制造了很好的时间和空间，首先不会被别人听到，而问题就是和自己外出的人会不会告诉别人，因此对方的保密性就成了选择和谁一同外出的关键因素。村民 Y 说：“我经常和 F 一同赶集，她也经常跟我说他儿媳妇这不好那不好。说完之后就一再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因为他害怕这件事传到她儿媳妇耳朵里，儿媳妇会数落她。当然她也知道我不会跟别人说，她只是再确保一下。”

## 第四节 农村居民帮工网分析

农村的帮工是最为普遍的，本报告所指的帮工主要是不计报酬，更多出于人情交往的目的而进行的互助行为，以期在自家需要帮助时能够有充足的劳力资源。农村劳力支持网是通过以下问题测量的：“当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如搬大袋粮食或重物、或红白喜事、盖房子、打场等，您会找谁来帮助您？”

### 一、帮工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从表 2.4.1 中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帮工网的平均规模为 3.4，个体网络平均密度为 0.46。帮工网规模超过 5 人的占 20.1%（442 人），2.8%（61 人）的支持规模为 0，最大规模为 15 人。帮工网是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村民往往以帮工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家庭的“面子”或者说人缘。在“婚”“葬”、老人过生日、房屋修缮等重要仪式和场合中，参加的人越多，待的时间越长，主人的声望和“面子”就越大。“农村人嘛也很要‘面子’，我们村庄不大，所以哪个家庭有点什么事整个村庄的人都会知道。像我们村 XKZ，别人家有点什么事情，他们夫妻俩总会在场帮忙，所以他们家在今年建房子时去帮忙的人也特别多，虽然现在都是机械化作业不需要太多的人，但大家还是主动过去帮忙，几乎整个村的人都去了，外村包工队的人都说‘他们家肯定为人很好’，这样的话让主人听到了，他们更是会很高兴。”

从网络密度来看,平均网络密度为 0.47,帮工网中家庭成员和亲属的比例不到一半,完全由非亲属成员构成的占到 34.9% (746 人)。此外在我们实地调查中发现,如今的农村特别是在东部地区,不计报酬的帮工形式很少,更多的是以一种“包工”形式或者“以帮工换帮工”的形式存在的,这主要体现在农忙时节,在红白喜事等活动中这种不计报酬的帮工形式还是比较普遍的。

表 2.4.1 农村居民帮工网规模和密度分布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规模	0	61	2.8	3.4300	1.81916	2200
	1	103	4.7			
	2	637	29.0			
	3	465	21.1			
	4	315	14.3			
	5	442	20.1			
	6—15	177	8.1			
密度	0.00	746	34.9	0.4689	0.41000	2140
	0.11—0.45	277	12.9			
	0.50—1.00	1117	52.2			

## 二、帮工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从表 2.4.2 所显示的帮工对象的特征中可以看出,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仍然占主体地位,分别被提到 2262 次和 2055 次。其次是邻居和亲戚,分别被提到 1357 次和 1252 次。相较咨询网和情感网,邻居和亲属被提到的次数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这不难理解,相较情感问题的理解和认同,劳力的支持不需要有同理心等方面的要求,影响这一支持的因素往往是地理位置上的方便性和互惠性。综合上述三点,邻居和亲戚的比例就会有小幅的上涨。从交往频率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是相当频繁的,每周一两次的见面或者电话联系是很常见的。从交往对象的职业来看,农业劳动者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小雇主

阶层依然排在前三位，职业异质性较咨询网和情感网较低，第一个人之间的职业异质性为 0.56，第二个人之间的职业异质性为 0.64，第三个人之间的职业异质性为 0.95。帮工的形式、内容和时间导致了农村居民帮工网中成员的职业分布比较集中，大多数成员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村民之间的帮工表现为多种形式，房屋修缮是帮工比较突出的一种形式。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多数情况下农村居民会把盖房子整体承包给包工队，包工队负责人安排前来建设的人员和建设日程，平日里不需要亲戚朋友的帮忙。最后“上梁”的时候，村里的人会来帮工，这时前来帮工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目前农村机械化作业程度也比较高，男性主要是帮忙干一些杂活，甚至仅仅是来给“撑场面”。妇女主要是帮着做饭，在东部有些村请客的酒席也会承包出去，因此，村里其他的人家就只有男人去帮忙以示两家人的关系。如果当别人家需要帮忙，而你恰巧有事没能去，这时一般会给一些钱、物以补偿自己未能帮工的歉意。访谈中村民王某提道：“我们家建房子的时候，YCC 前来帮忙做饭了，当时她在饭店打工，专门请假过来的，那天她少赚了三四十块钱。但在他家建的房子封顶时，我家正好在装修，也需要给装修队的人做饭。因此，我就没去他家帮忙，然后就送给她家三斤肉。”这一行为其实反映的是帮工具有强烈的互惠性，因此村民间简称“还工”。总的来说，“你不帮我，我就不帮你”，这是很多村民对“帮工”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在帮工问题上，村民表现出很强的互惠性和交换性。

表 2.4.2 农村居民帮工网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职业异质性频率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751	620	433	285	173	2262
	亲戚	359	384	260	129	120	1252
	朋友	613	579	382	293	188	2055
	同学	14	22	12	5	8	61
	邻居	384	397	284	198	94	1357
	其他	3	7	4	2	0	16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交往频率	经常(每周 一、两次)	1686	1583	1023	649	426	5367
	有时(一月 一、两次)	188	187	171	162	115	823
	很少(半年 一、两次)	7	13	2	0	0	22
	没有过	1	0	1	0	0	2
职业	行政管理 阶层	12	5	7	8	2	34
	专业技术 阶层	25	22	16	18	14	95
	普通白领 阶层	7	10	4	4	7	32
	商业和服 务业阶层	15	18	10	12	13	68
	小雇主阶 层	28	30	23	24	14	119
	产业工人 阶层	84	88	77	51	22	322
	农业劳动 者阶层	1584	1469	955	586	382	4976
	职业异质 性	0.56	0.64	0.95	1.00	1.00	

帮工的形式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支持，另一方面更是农村居民“面子”的体现，是不考虑经济消费的“面子”。假设村民 A 只需 10 人帮忙，但是却来了 30 人帮忙，此时 A 就需要多付出一些伙食费。但 A 绝不可以表现出“人太多了，招待费用太高，不愿意太多人帮忙”的姿态或言语，否则后果严重。这是因为，按照村民的说法，“人多好，前来帮工的人多说明人缘好，你要是觉得太费钱，那以后村里的人是来还是不来？久而久之就混不下去了”。

## 第五节 农村居民信任网分析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表现在很多方面，在农村最为重要的是土地和家庭，因此通过“当您有急事要外出一段时间（一周或更长时间），您会请谁帮助您来照料孩子、庄稼、牲畜并看管家呢”来测量信任关系。

### 一、信任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表 2.5.1 显示，农村居民信任网的平均规模为 2.5，网络规模超过 5 人的占 2.8%（63 人），与情感网的比例相近。5.4%（119 人）的支持规模为 0，多数农村居民的信任网规模为 2 人，占到样本数的 36.6%。平均网络密度为 0.58，其平均网络密度在这五种社会网中排名第二，完全由非亲属关系构成的占到 27.8%（579 人），这与农村居民咨询网的构成比较相当，信任网成员中亲属关系比例超过一半的占到 52%（1082 人）。根据我们测算网络密度的方法，即亲属关系在网络成员中的比例，农村居民信任网成员多数为家庭成员和其他亲戚，对于外人的信任是比较低的，熟人信任还是当前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主要特点。

表 2.5.1 农村居民信任网规模和密度分布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规模	0	119	5.4	2.5379	1.50016	2201
	1	385	17.5			
	2	805	36.6			
	3	364	16.5			
	4	238	10.8			
	5	227	10.3			
	6—10	63	2.8			



续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密度	0.00	579	27.8	0.5879	0.42355	2082
	0.17—0.60	421	20.2			
	0.67—1.00	1082	52.0			

## 二、信任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表 2.5.2 显示，农村居民信任网的关系构成中家庭成员关系总计被提到了 2233 次，朋友关系总计被提到了 861 次。虽然家庭成员和朋友仍然处于第一、第二位，但是相较咨询网、情感网和帮工网中朋友关系被提到的次数，朋友关系明显下降，几乎是家庭成员的一半，说明农户对外人的信任远不及对自己家庭成员的信任。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经济理性的导演下，过去农村那种纯朴的风俗正在逐渐消失，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却没有打破“小农心理”，尤其在东部，网络规模的扩大似乎并没有促进农村居民社会心态的开放，虽然认识不同的人但发生重要事情需要找人帮助时依然停留在家庭或者过去“老相识”的圈子中。

从交往频率来看，每周一两次的见面或打电话频率依然是比较突出的，值得关注的是在交往频率中“没有过交往”的情况为 0，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了当前农村居民信任对象的基本特征，即一定是自己熟悉了解的，对于村中只停留在认识层面的村民，往往是不会选择的。从职业异质性来看，与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的异质性相当，农业劳动者阶层被提到了 4010 次，产业工人阶层被提到了 197 次，而小雇主阶层被提到了 70 次，与前三种社会网相比明显下降。

表 2.5.2 农村居民信任网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职业异质性频率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1015	622	327	175	94	2233
	亲戚	281	305	148	80	47	861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朋友	483	470	230	154	67	1404
	同学	3	11	16	7	2	39
	邻居	261	265	152	99	50	827
	其他	1	2	3	1	0	7
交往频率	经常(每周 一两次)	1720	1323	639	353	208	4243
	有时(一月 一两次)	111	130	121	67	18	447
	很少(半年 一两次)	7	9	0	0	0	16
	没有过	0	0	0	0	0	0
职业	行政管理 阶层	11	1	5	1	0	18
	专业技术 阶层	22	19	16	2	5	64
	普通白领 阶层	4	4	2	3	1	14
	商业和服 务业阶层	8	6	3	2	3	22
	小雇主阶 层	18	17	15	11	9	70
	产业工人 阶层	48	47	39	40	23	197
	农业劳动 者阶层	1575	1276	585	377	197	4010
	职业异质 性	0.57	0.77	1.00	1.00	1.00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帮着照料孩子、庄稼等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发生在婆媳之间，另外一种情况发生在两家有差不多大小的孩子之间。有些年轻人为了赚钱，把孩子留给老人看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会给老人一些费用，为孩

子提供所需的营养品或生活用品的费用，作为老人照料孩子的回报，年轻人会给老人买一些衣服或补品。

另一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相同大小的孩子的父母之间，因为这些孩子在一起玩，如果有一家的父母有事，他会去另一家跟另一家孩子的父母说一声，让他们帮着照料一下孩子，让孩子先在他们家玩。村中孩子每天上学早晚都要接送，如果每天每位家长只接送自己的孩子，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他们往往是两家联合，轮流接送孩子，而且如果下午接回孩子后另一个孩子的父母有事，他也会让孩子在自己家，孩子饿了也会先给一些食物吃。

## 第六节 农村居民借贷网分析

借贷网主要是从借物和借钱两方面来测量的，借物主要指小宗物资的借用，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用品、食物和小型农具上。具体调查问题是：“当您需要借日杂小物（如自行车、筛子、饭桌等）、食物（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农耕用品（如小四轮、拖拉机、耕牛）时，您会找谁借？”“当您急需一大笔钱（看病、教育、结婚、盖房等），您会向谁借呢？”这些问题测量的是农村村民的借钱网络。但在实际的调查、访谈中我们发现，诸如日杂小物、小型农具等小宗物资几乎每个家庭都能置备齐全，加之商店距离村庄很近，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很少发生外借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此暂不报告有关小宗物资借用的情况。

### 一、借贷网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分析

表 2.6.1 显示，在农村居民借贷网中，平均网络规模为 2.8，超过 5 人的占 14.8%（323 人）。在借贷网和情感网中，网络规模为 0 的人数最多，分别占到 5.5% 和 8.9%。而网络规模超过 5 人的比例为 3.8%，与借贷网与信任网（2.8%）、情感网（2.4%）成了在网络规模超过 5 人方面比例最少的三种网络，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资金的借贷、情感的支持和社会信任是比较难以获得

的。资金借贷网的平均网络密度为 0.62，是 5 种社会网中密度最大的，完全由非亲属关系构成的借贷网占 22.6%（469 人），借贷网成员超过一半是亲属关系的比例为 57%（1186 人）。根据本研究网络密度的测算办法我们可以判定，农村居民的资金融借多从亲属中获得。

表 2.6.1 农村居民借贷网规模和密度分布表

变量名称	数值	频率	百分比	平均数	标准差	样本数
规模	0	122	5.5	2.7615	1.61355	2201
	1	225	10.2			
	2	802	36.4			
	3	478	21.7			
	4	251	11.4			
	5	243	11			
	6—13	80	3.8			
密度	0.00	469	22.6	0.6181	0.4057	2079
	0.09—0.50	424	20.4			
	0.50—1.00	1186	57.0			

## 二、借贷网关系构成和职业地位分析

在借贷网对象的特征中，从表 2.6.2 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成员、亲戚和朋友关系分别被提到 1996 次、1246 次和 1263 次。这比较符合“差序格局”的理论。在借贷网的规模和密度中，我们讨论了资金的借贷是五种支持中最难获得的支持，这种情况下，碍于情面农户向关系亲密的家庭成员、亲戚等借钱的成功率较大。加之农村毕竟还是一个熟人社会，情感纽带依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对于不易获得的支持，“差序格局”现象凸显出来。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在支持者中所占的比重不分伯仲，“差序格局”的影响也在逐渐改变。从交往频率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是相当频繁的，

“没有交往”的频率为0，说明人们不会向没有联系过的对象寻求支持和帮助，从提供资金的角度来说，人们也不可能将钱借给没有交往过的、不熟悉的对象。从交往对象的职业来看，依然存在群内选择现象。整体来看，资金支持网的职业异质性比例较其他支持较大，第一个支持者和第二个支持者之间的职业异质性分别为0.79和0.81。

在访谈中，当我们问到“当您急需一大笔钱（看病、教育、结婚、盖房等），您会向谁借呢”时，村民往往会说到和自己关系较近的对象。在借款方面，借款人在借款之前会考虑对方是我的亲戚、朋友还是同学等情况。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能不能借到钱，以及借到后可以什么时候还，因为关系近好说话，或者说碍于脸面有时不得不借。访谈中28岁的L说：“我现在在城里找了份稳定的工作，到了成家的年纪，需要在城里买房子，但自己手头没这么多钱，家里尽最大努力来帮我但也不能给凑够首付，只能自己想办法借一些。对我来讲首先我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同学、同事和朋友，其次才是家里的亲戚。”

表 2.6.2 农村居民借贷网关系构成、交往频率和职业异质性频率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869	410	410	212	95	1996
	亲戚	492	255	255	137	107	1246
	朋友	538	254	254	151	66	1263
	同学	13	12	12	5	3	45
	邻居	132	90	90	40	15	367
	其他	7	5	5	3	3	23
交往频率	经常(每周一两次)	1585	738	738	394	218	3673
	有时(一月一两次)	188	144	144	59	16	551
	很少(半年一两次)	19	13	13	0	1	46
	没有过	0	0	0	0	0	0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	第五个人	总计
职业	行政管理阶层	17	11	9	2	0	39
	专业技术阶层	59	45	33	12	7	156
	普通白领阶层	23	17	12	7	3	62
	商业和服务业阶层	25	20	22	10	13	90
	小雇主阶层	52	45	36	22	12	167
	产业工人阶层	112	119	13	48	30	322
	农业劳动者阶层	1391	1217	636	389	219	3852
	职业异质性	0.79	0.81	1	1	1	

同时，我们还了解到资金的借贷不仅可以通过私人关系来获得，有的农村居民现在还从银行等金融机构中获得。“目前来说，家里有需要很多钱的大事，比如老人生病、孩子上大学、结婚买房子等，我们一般都是去银行贷款。因为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事情，你跟人家借了钱万一人家急用时，你还不上，人家会不高兴而且你自己也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况且目前钱存在银行一年也会长很多利息，所以需要钱时也只是跟兄弟姐妹等亲戚或者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借一下，有时他们知道你家里需要钱也会主动借给你，一般都不会跟邻居借。而对一些小额的借款，百儿八十的有时急用，就会向邻居或者路上遇到的熟人借一下，因为这些钱不多，大家都会有，随时也会还上，所以不管是借钱的还是被借钱的都不会有什么顾虑。”从上述的访谈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居民资金的借贷能否成功不仅考虑与借贷对象的关系，同时还因借钱的数量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借贷对象，这种借贷对象的选择是互惠性程度权衡的结果。

## 第七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

### 一、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计算模型

当前对于社会资本的计算方法主要有通过计算职业得分、单位类型的综合得分、计算因子分析的贡献率、通过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等方法。计算因子分析的贡献率得到变量的综合得分，是应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计算方法是公共因子乘以各自的方差贡献率的总和，再除以公共因子的总方差贡献率。但这种计算方法也存在很大的争议。

为了避免这种争议和人为确定权重的主观性，我们采用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和相应的方差贡献率得到所有指标的权重，进而得到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具体计算模型如下：

确定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lambda_{ij} = \frac{\text{主成分因子载荷数}}{\sqrt{\text{主成分特征值}}}$$

式中， $\lambda_{ij}$  为各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即在第  $i$  个主成分中，第  $j$  个指标的线性系数。由此可得到各主成分的线性组合：

$$F_i = \lambda_{i1}X_1 + \lambda_{i2}X_2 + \cdots + \lambda_{ij}X_j, X_j \text{ 表示各指标}$$

1. 确定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

$$y_j = \frac{\sum \lambda_{ij} * a_i}{\sum a_i}$$

式中， $y_j$  为第  $j$  个指标在综合模型中的系数， $a_i$  为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由此可得到社会资本的综合得分：

$$Y_{sc} = \sum y_j X_j$$

2. 确定指标权重：

由于所有指标的权重之和为 1，因此指标权重需要在综合模型中指标数的基础上归一化，具体计算方法是：

$$y_j' = \frac{y_j}{\sum y_j}$$

具体各个指标的权重如下表：

表 2.7.1 指标权重表

具体指标	权重	具体指标	权重
咨询网规模	0.04	咨询网网差	0.01
情感网规模	0.03	情感网网差	0.05
帮工网规模	0.04	帮工网网差	0.04
信任网规模	0.02	信任网网差	0.04
借贷网规模	0.03	借贷网网差	0.05
咨询网网顶	0.07	咨询网密度	0.08
情感网网顶	0.08	情感网密度	0.06
帮工网网顶	0.05	帮工网密度	0.07
信任网网顶	0.05	信任网密度	0.07
借贷网网顶	0.05	借贷网密度	0.08

因此，社会资本总量为：

$$f_{sc} = 0.04X_1 + 0.03X_2 + 0.04X_3 + 0.02X_4 + 0.03X_5 + 0.07X_6 + 0.08X_7 \\ + 0.05X_8 + 0.05X_9 + 0.05X_{10} + 0.01X_{11} + 0.05X_{12} + 0.04X_{13} + 0.04X_{14} \\ + 0.05X_{15} + 0.08X_{16} + 0.06X_{17} + 0.07X_{18} + 0.07X_{19} + 0.08X_{20}$$

$X_1$ — $X_{20}$ 分别为咨询网规模、情感网规模、帮工网规模、信任网规模、借贷网规模、咨询网网顶、情感网网顶、帮工网网顶、信任网网顶、借贷网网顶、咨询网网差、情感网网差、帮工网网差、信任网网差、借贷网网差、咨询网密度、情感网密度、帮工网密度、信任网密度、借贷网密度。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通过各指标权重得到的社会资本转换为1—100之间的百分值。转换方法为： $a = 99 / (\max - \min)$ ， $b = 1 / (a - \min)$ ， $F_{sc} = (f_{sc} + b) * a$ 。其中， $f_{sc}$ 为各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数值， $\max = 3.95$ ， $\min = 0.30$ 。



## 二、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现状

根据调查地点的不同，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现状将分别描述山东、宁夏、陕西和甘肃四地的具体情况，不再划分东西部差异。由于三个研究假设会涉及不同变量下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差异，因此此部分仅描述不同性别的社会资本差异。

表 2.7.2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整体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平均数	标准差
地区	山东	31.62	0.56
	宁夏	17.70	0.60
	陕西	29.24	1.67
	甘肃	19.97	1.68
性别	男	26.65	0.49
	女	24.95	1.12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4.46	0.64
	初中	26.80	0.64
	高中	30.30	1.68
	中专及以上	35.12	3.87

从表 2.7.2 的数据可以看到，山东省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31.62，宁夏地区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17.70，陕西省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9.24，甘肃省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19.97。社会资本平均存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山东省、陕西省、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虽然标准差的数值都较小，但陕西省和甘肃省的标准差较山东省和宁夏地区较大，总体来说，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差异比东部地区要大。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详见表 2.7.3），东部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平均为 33.81，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平均为 16.06，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社会

资本的平均存量为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2倍。从因子负荷值来看,网顶和网差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积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因此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存量更多。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规模平均为9人,西部地区平均为6人;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在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社会资本方面比西部农村居民更容易。西部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宗教信仰和宗教习惯使他们的交往范围常常限制在同宗教居民中,保守的思想观念和不太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在社会交往中强化了趋同观念。

表 2.7.3 东西部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差异整体分布频率表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位差	社会资本	
因子负荷值		0.511	0.966	0.961		
东部	均值	9.15 (0.14)	14.94 (0.68)	13.27 (0.611)	33.81 (0.59)	
	性别	男	9.25 (0.15)	16.04 (0.76)	14.28 (0.68)	34.72 (0.65)
		女	8.58 (0.34)	8.01 (1.27)	6.89 (1.12)	28.06 (1.12)
	政治身份	党员	8.61 (0.42)	21.73 (3.02)	19.19 (2.78)	37.80 (2.50)
		非党员	9.20 (0.15)	14.36 (0.69)	12.74 (0.62)	33.46 (0.60)
	教育程度	5年以下	8.29 (0.29)	9.83 (1.18)	8.60 (1.04)	28.80 (1.06)
		5年及以上	9.39 (0.16)	16.43 (0.80)	14.62 (0.73)	35.27 (0.69)
	家庭收入	2万元以下	8.82 (0.27)	12.41 (1.15)	11.14 (1.05)	31.62 (1.06)
		2万元及以上	9.30 (0.16)	16.01 (0.83)	14.16 (0.75)	34.74 (0.71)
	西部	均值	5.84 (0.14)	6.18 (0.68)	5.84 (0.62)	16.06 (0.70)
性别		男	5.70 (0.15)	4.82 (0.67)	4.54 (0.60)	14.63 (0.71)
		女	6.52 (0.32)	11.71 (2.04)	11.13 (1.89)	21.83 (7.00)

续表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位差	社会资本
因子负荷值			0.511	0.966	0.961	
西部	政治身份	党员	7.14 (0.58)	29.47 (8.57)	23.48 (7.73)	39.14 (7.00)
		非党员	5.79 (0.14)	5.49 (0.63)	5.32 (0.58)	15.41 (0.68)
	教育程度	5年以下	4.63 (0.20)	5.03 (0.96)	5.10 (0.93)	14.28 (1.02)
		5年及以上	6.57 (0.18)	6.95 (0.93)	6.43 (0.82)	17.26 (0.95)
	家庭收入	2万元以下	3.97 (0.12)	3.67 (0.58)	3.80 (0.56)	11.38 (0.64)
		2万元及以上	8.91 (0.23)	13.53 (1.95)	11.80 (1.72)	29.67 (1.08)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从性别变量来看，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差异不明显，男性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6.65，女性的为 24.95。但女性的标准差要比男性的大，女性的社会资本总量标准差为 1.12，男性的仅为 0.49，这说明女性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大于男性。

从教育程度来看，教育程度越高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就越多，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4.46，初中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6.80，高中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30.30，中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35.12。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意味着能够更容易接触到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个体，其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也更为丰富。其次，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的标准差也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有所增大，离散程度也随着提高，较高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组内差异大于低教育程度居民的组内差异。

## 第八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差序格局”变异分析

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农村居民价值观念的转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基层民主的推进，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大幅改变，凸显了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结构性差异的实证分析的必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农村也在这场变革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差序格局”变异假设关注的是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是否发生了改变，“差序格局”是否有了新的变化。

### 一、农村居民社会网的提名顺序

关于提名顺序的假设，张文宏曾提出“可能沿着家人、近亲、远亲和非亲属的差序”。其他学者也均得出遵循差序格局的结论。那么，当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提名顺序是否依然遵循这一顺序而没有发生改变呢？我们认为并不尽然。随着农村居民社会流动的加快，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更加广泛，社会网规模有所扩大，非亲属弱关系的比例相应地也会有所增加。利益关系的渗入，使得朋友等拟似血缘关系加入传统差序格局中，成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源的重要提供者。因此我们提出朋友关系比亲戚关系对于农村居民更为重要，会更早被提名。

表 2.8.1 咨询网提名顺序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906 (49.4)	574 (35.1)	401 (36.0)	252 (32.4)	188 (33.8)
	朋友	516 (28.1)	511 (31.3)	345 (30.9)	241 (31.0)	165 (29.6)
	亲戚	245 (13.4)	322 (19.7)	179 (16.1)	107 (13.8)	67 (12.0)

续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邻居	154 (8.4)	204 (12.5)	169 (15.2)	155 (19.9)	125 (22.4)
	同学	10 (0.5)	20 (1.2)	18 (1.6)	21 (2.7)	11 (2.0)
	其他	4 (0.3)	4 (0.2)	3 (0.3)	2 (0.3)	1 (0.2)

表 2.8.1 描述的是咨询网的提名顺序, 具体来说, 家庭成员关系从第一个人到第五个人的占比有所减少, 但幅度不大, 依然在这六种社会关系类型中占比最高; 朋友关系的占比紧随家庭成员占比, 除在提名第一个人时占比差距较大之外, 提名其他四人时占比差距仅为 5% 左右; 亲戚关系的占比在提名第二个人时增加 6.3% 之后, 又减少为第五个人的 12.0%; 同学关系和邻居关系的占比基本随着提名顺序而逐渐增大, 其他关系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各类关系在提名第一个人时的占比反映了该关系在农村居民心中的重要程度, 一般来说对自己越重要的关系越容易较早进入提名中。纵向来看, 家庭成员在第一个人的占比为 49.4%, 几乎占到一半, 其次是朋友关系, 占到 28.1%, 排在第三名的是亲戚关系, 占 13.4%, 最后是邻居关系 (占 8.4%) 和同学关系 (占 0.5%)。因此, 咨询网的提名顺序为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关系。

咨询网涉及重要问题的讨论、与家人发生矛盾无法解决时的咨询等方面, 这涉及农村居民生活的隐私部分或者说这些问题对于农村居民来说比较重要, 很多时候需要倾听者守口如瓶。因此, 在涉及重要问题需要讨论时, 农村居民往往倾向于同家人商谈。同时, 对朋友的熟悉使农村居民有足够的信心相信, 自己的朋友不仅能够替自己出谋划策, 而且能够为自己保守秘密, 朋友就成为很好的支持者、倾听者。在面临重大问题时, 传统的家族观念会促使农村居民找亲戚帮忙, 尤其是遇到对家庭声誉不好的事情时, 他们往往倾向于求助三服以内的亲属求助, 所谓“家丑不可外传”。农村居民也会借助亲戚关系, 与他们结成联盟, 以血缘关系、家族意见给当事人压力, 从而解决问题。

表 2.8.2 情感网提名顺序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732 (42.8)	505 (29.2)	356 (30.0)	228 (29.0)	145 (29.5)
	朋友	575 (33.6)	515 (29.8)	348 (29.3)	256 (32.6)	164 (33.4)
	邻居	253 (14.8)	343 (19.8)	249 (21.0)	183 (23.3)	81 (16.5)
	亲戚	126 (7.4)	345 (20.0)	222 (18.7)	112 (14.3)	94 (19.1)
	同学	15 (0.9)	14 (0.8)	10 (0.8)	4 (0.5)	7 (1.4)
	其他	8 (0.5)	6 (0.3)	3 (0.3)	2 (0.3)	

再来看农村居民的情感网提名顺序（表 2.8.2），家庭成员关系在第一个人名中的占比依然最高，但在第二、第四和第五个提名人中占比低于朋友关系，在第三个提名的人中家庭成员关系的占比略高于朋友关系；朋友关系在五个被提名的人中占比浮动较少，基本保持在 30% 左右；在情感网中邻居的占比基本随着提名顺序而增大，在第一、三、四个提名的人中邻居关系的占比超过亲戚关系的占比；横向来看，亲戚关系在第一个提名的人中占比最小；同学关系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没有人在提名第五个人时选择其他关系的人。

比较第一个被提名的人中关系的占比，家庭成员依然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占样本的 42.8%；其次是朋友关系，占 33.6%；第三是邻居关系，占 14.8%，第四是亲戚关系，占 7.4%，最后是同学关系和其他关系，分别占 0.9% 和 0.5%。因此，情感网的提名顺序为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对于农村居民情感网的测量是通过与谁进城、赶集等实现的，与谁能谈得来，同谁的感情好，就越容易同谁一同外出。因此，除了和自己的家人一同外出之外，观念相近、消费习惯相似、能够交心的朋友就成同行的伙伴。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兄弟两家仅隔一条小胡同，但兄弟、妯娌很少一同赶集，他们觉得自己的年龄、观点都有差别，会感觉不太自在。在农村，

尽管亲戚同自己居住在同一个村，但相隔一条公路，他们一同赶集的可能性也较低，除非是老人过生日买菜等大家庭活动。所以，基于地理的便利性和日常生活交往的范围，邻居比亲戚更容易成为同行的伙伴。

表 2.8.3 帮工网提名顺序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614 (33.8)	505 (29.2)	252 (13.5)	146 (27.6)	53 (19.8)
	朋友	554 (30.5)	515 (29.8)	315 (16.8)	248 (46.9)	142 (53.0)
	邻居	317 (17.5)	343 (19.8)	150 (8.0)	68 (12.9)	35 (13.1)
	亲戚	314 (17.3)	345 (20.0)	136 (7.3)	55 (10.4)	33 (12.3)
	同学	12 (0.7)	14 (0.8)	13 (0.7)	10 (1.9)	5 (1.9)
	其他	3 (0.2)	6 (0.3)	2 (0.1)	2 (0.4)	

横向来看帮工网的提名顺序（表 2.8.3），家庭成员关系从占第一个人的 33.8% 下降到第五个人的 19.8%，在第三个被提名的人中占比最少，为 13.5%；朋友关系从占第一个被提名的人的 30.5% 上升到占第五个被提名人的 53.0%；邻居关系从占第一个被提名人的 17.5% 下降到占第五个被提名人的 13.1%；亲戚关系从开始的 17.3% 下降到第五个人的 12.3%，在第二个被提名的人中占比最大，为 20.0%；同学关系占比变化幅度依然较小；其他关系在第五个被提名人的关系中没有被提到。

比较第一个被提名人的关系占比，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重要的关系依次为家庭成员关系（占 33.8%）、朋友关系（占 30.5%）、邻居关系和亲戚关系（分别占 17.5% 和 17.3%）、同学关系（占 0.7）和其他关系（占 0.2%）。因此，帮工网的提名顺序为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邻居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由于地缘关系，邻居在帮工网络中比亲戚尤其是远方亲戚来说更易给农村居民带来方便，且他们之间种植作物或水产养殖等的同质性较高，对于农

活的熟练程度远高于亲戚，基于帮工的互惠性特点，邻里之间的帮忙更持久。

表 2.8.4 信任网提名顺序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813 (46.6)	494 (34.0)	271 (35.8)	147 (33.0)	78 (37.0)
	朋友	445 (25.5)	424 (29.2)	208 (27.5)	132 (29.6)	57 (27.0)
	亲戚	262 (15.0)	285 (19.6)	129 (17.0)	68 (15.2)	36 (17.1)
	邻居	221 (12.7)	239 (16.4)	133 (17.6)	93 (20.9)	40 (19.0)
	同学	2 (0.1)	9 (0.6)	13 (1.7)	5 (1.1)	
	其他	2 (0.1)	2 (0.1)	3 (0.4)	1 (0.2)	

表 2.8.4 显示了农村居民信任网的提名顺序，总体来看，信任网中第五个被提名的人数较少，仅有 211 个人，而且没有提名同学关系和其他关系。从第一个人到第五个人，家庭成员关系占比呈下降趋势，从占第一个人的 46.6% 下降到占第五个人的 37.0%；朋友关系占比呈上升趋势，从占第一个人的 25.5% 上升到占第五个人的 27.0%；亲戚关系占比呈上升趋势，从占第一个人的 15.0% 上升到占第五个人的 17.1%；同学关系的占比也基本呈上升趋势，从占第一个人的 0.1% 上升到占第四个人的 1.1%；邻居关系从占第一个人的 12.7% 上升到占第五个人的 19.0%；其他关系的有效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具体比较第一个被提名的关系占比，农村居民信任网的提名顺序为在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亲戚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关系。联系农村居民的情感网排序，朋友关系已不再单纯地建立在利益关系或者工具性行动的基础上，情感和信任加固和深化了朋友关系。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的厚薄成为决定居民行动的原则之一，在情感和信任的双重包装下，朋友关系为自己获取社会资本增加了分量更重的砝码和更具说服力的理由。



表 2.8.5 借贷网提名顺序分布表

变量名称	类型	第一个人 (%)	第二个人 (%)	第三个人 (%)	第四个人 (%)	第五个人 (%)
关系构成	家庭成员	690 (39.4)	338 (38.8)	338 (38.8)	178 (39.1)	83 (35.3)
	朋友	485 (27.7)	217 (24.9)	217 (24.9)	121 (26.6)	52 (22.1)
	亲戚	443 (25.3)	226 (25.9)	226 (25.9)	114 (25.1)	84 (35.7)
	邻居	116 (6.6)	77 (8.8)	77 (8.8)	37 (8.1)	14 (6.0)
	同学	10 (0.6)	10 (1.1)	10 (1.1)	4 (0.9)	2 (0.9)
	其他	6 (0.4)	4 (0.5)	4 (0.5)	1 (0.2)	

在借贷网中（表 2.8.5），家庭成员关系从占第一个人的 39.4% 下降到占第五个人的 35.3%，变化幅度较少；亲戚关系从占第一个人的 25.3% 上升到占第五个人的 35.7%，上升了近 10%；朋友关系从占第一个人的 27.7% 下降到占第五个人的 22.1%，下降了近 6%；邻居关系占比在借贷网中的平均占 8%；同学关系和其他关系变动幅度依然不大。

借贷网中，不同关系类型对于农村居民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家庭成员—朋友关系—亲戚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关系，分别占 39.4%、27.7%、25.3%、6.6% 和 0.6%。借钱在当今农村社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事，基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偏低和物价水平的偏高，农村居民的剩余收入较少，一般农村居民都不情愿往外借钱。其次，目前农村居民还面临着子女结婚、在城里买房等问题，房价的高升使农村居民难以承担。当前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意外事件、大病发生率的提高以及农村养老保险数额的偏低使农村居民不得不储备一笔应急资金和养老钱，这就更强化了农村居民不愿外借的想法。因此，当需要筹集一笔较大金额时，农村居民往往会选择同自己关系最为紧密的人，这是一种情感的牵引。在五种社会网中亲戚关系在第一个被提名人的占比中首次与朋友关系相近，血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在农村居民动员较难获取的社会资本时发挥了重

要作用。

综合这五种社会网的提名顺序，虽然各个网的提名顺序有所变化，但大体都是沿着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亲属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和其他关系的顺序推展开来的。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家庭观念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家族观念在农村居民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居民的观念，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农村居民的利己思想渐渐加重，现代观念也逐渐加深，许多农村居民已经逐渐简化了过节、祭祖等家族仪式，同时也瓦解了按五服、三服亲属关系形成的家族势力，这使农村社区的传统家族观念和传统记忆逐渐淡化。“关起门来自己过日子”“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最重要，要不然谁都会看笑话”已经成为许多农村居民的生活信条。

互为朋友的双方的社会地位相同或相近，经济情况、家庭生活水平也较接近，因此，不存在瞧不起、看笑话的情况，一旦一方发现对方有此行为，那么朋友关系也就会受到损伤，甚至就此结束。比起其他关系，朋友关系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等方面更与当事人相近，再加上情感交往，朋友关系这一弱关系就会更早地进入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络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正在突破家族限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网络。

至此，第一个假设得到验证，农村居民社会网的提名顺序不再完全按照费老的差序格局，即不再是家庭—亲属圈—邻居圈—私人交往圈，也不是张文宏提出的“可能沿着家人、近亲、远亲和非亲属的差序”。而是按照家人、拟似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非亲属关系的差序推展开来。

## 二、关系强度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假设1已得到了验证，我们好奇五种社会网的不同关系强度究竟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有着怎样的影响，影响程度又如何？基于上述提名顺序的描述和分析，可以看出，拟似血缘关系已经渗入了“差序格局”之中，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五种社会网的关系强度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我们将社会资本总量转化为二元变量，小于等于平均值的赋值为0，表示较低水平的社会资本；高于平均值的赋值为1，表示较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后

面所涉及的二元 logistic 分析都是采用这种二元划分的方法，以五种社会网的关系强度为自变量，以社会资本的二元变量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logistic 分析。表 2.8.6 只报告最后结果。

表 2.8.6 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的二元 Logit 估计模型

变量	B	S. E.	Wald	Df	Sig.
咨询网关系强度	-0.752	0.264	8.097	1	0.004
情感网关系强度	1.073	0.203	27.912	1	0.000
帮工网关系强度	-0.528	0.245	4.645	1	0.031
信任网关系强度	0.302	0.196	2.366	1	0.124
借贷网关系强度	1.900	0.216	77.495	1	0.000
常数	-1.438	0.126	129.504	1	0.000

表 2.8.6 中，B 表示系数，S. E. 表示标准差，Wald 代表回归系数检验的统计量值，df 是自由度，Sig. 是 Wald 检验的显著性概率。Wald 和 Sig. 的值代表自变量中的重要程度，Wald 值越大或者 Sig. 的值越小，自变量越重要。

由于信任网关系强度  $p > 0.05$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做具体考虑和分析。因此，自变量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借贷网关系强度（Wald = 77.50， $p < 0.001$ ）、情感网关系强度（Wald = 27.91， $p < 0.001$ ）、咨询网关系强度（Wald = 8.10， $p < 0.01$ ）和帮工网关系强度（Wald = 4.65， $p < 0.05$ ）。

具体来说，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咨询网和帮工网的关系强度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影响显著，影响方向为负，说明咨询网和帮工网中强关系比例越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越少；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情感网和借贷网的关系强度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说明情感网和借贷网中强关系越高，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越大。

不同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对社会资本总量的影响有所不同，借贷网和情感网的关系强度在模型中最为重要，也就是说，强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影响着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结合提名顺序中各类关系被提到的频次，家庭成员关

系对于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积累更为重要。不可忽视的是，咨询网和帮工网的关系强度对社会资本总量为负影响，这说明弱关系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已经凸显出来。由此可以推测，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今后弱关系的作用将不可小觑。

## 第九节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的收入差异和权力差异分析

本章通过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来检验经济收入差异假设和权力差异假设。收入差异假设关注的是不同收入水平下（包括家庭年收入和非农收入）社会资本总量的差异及其对社会资本总量的影响。权力差异假设关注的是在转型时期，党员身份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

### 一、家庭年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一直都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反映了个体在村中的社会地位，也反映了农村居民动用社会资本的能力，毕竟高出一般水平的经济收入仅靠传统种植业和收购价格是难以实现的。市场信息、客户资源等都是决定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除此，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给农村居民拓宽了收入渠道，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使非农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的重要来源。

动用社会资本需要前期的投入和维护，无论是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还是逢年过节的外出吃饭和拜访，较高的经济收入为此提供了基础。其次，较高的经济收入代表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本的动员有一定的互惠性，自己有能力成为别人动员的资源，如此往来，社会网络才更加坚固，动用社会资本也就更容易。

在对五个社会网的网络顶端分析来看，虽然近四分之三的农村居民的网络顶端为农业劳动者阶层，但在不同收入水平下，农村居民网络顶端依然会存在差异。由于数据记录的缺失，无法剔除每个农村居民的重复关系类型，因此未计算五种社会网总的关系强度，最终保留五种社会网各自的关系强度。关于社

会资本的收入差异我们将分析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位差、咨询网关系强度、情感网关系强度、帮工网关系强度、信任网关系强度和借贷网关系强度的均值差异。

从表 2.9.1 得到，家庭年收入在 2 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平均水平为 21.28，年收入在 2 万至 4 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平均为 31.55，年收入在 4 万至 6 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32.79，年收入在 6 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平均为 29.90，社会资本总量基本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有所增长。

从网络规模差异来看，家庭年收入在 2 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为 5 人，年收入在 2 万至 4 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为 9 人，年收入在 4 万至 6 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平均规模为 9 人，年收入在 6 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为 13 人，也呈现随经济收入的增长而不断扩大的趋势。

表 2.9.1 社会资本的家庭年收入差异

	20000 元以下/年		20000—40000 元/年		40000—60000 元/年		60000 元以上/年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社会资本	21.28	0.58	31.55	0.72	32.79	1.6	29.9	1.46
网络规模	5.44	0.15	9.03	0.15	9.21	0.39	12.89	1
网络顶端	1.57	0.04	2.33	0.07	2.46	0.16	1.96	0.22
网络位差	0.56	0.04	1.31	0.07	1.4	0.16	0.94	0.21
咨询网关系强度	0.5	0.01	0.57	0.01	0.66	0.03	0.86	0.04
情感网关系强度	0.41	0.01	0.46	0.02	0.58	0.04	0.68	0.05
帮工网关系强度	0.44	0.01	0.46	0.01	0.53	0.03	0.54	0.05
信任网关系强度	0.51	0.02	0.62	0.02	0.67	0.03	0.79	0.05
借贷网关系强度	0.41	0.01	0.57	0.01	0.57	0.03	0.67	0.04

从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的差异来看，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顶端平均为1.57，位于农村居民和工人阶层之间；年收入在2万至4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顶端平均为2.33，位于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之间；年收入在4万至6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顶端平均为2.46，位于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之间，比家庭年收入在2万至4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更加接近小雇主阶层；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顶端平均为1.96，近似工人阶层。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位差平均为0.56，属于群内选择，同阶层之间的交往；年收入在2万至4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位差平均为1.31，年收入在4万至6万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位差平均为1.4，趋向于跨阶层交往；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网网络位差平均为0.94，群内选择的趋势弱于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居民。从不同家庭年收入的网网顶和网网差均值差异来看，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丰富性较低，平均网顶为超出小雇主阶层，获得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的能力还较弱。虽然农村居民的网网络规模较大，但加入的网网络层成员同质性仍然较高。要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必须将提升农村居民自身素质作为重要的措施。

比较五种社会网在不同家庭年收入水平下的关系强度，家庭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咨询网和信任网中的强关系和弱关各占一半，情感网、帮工网和信任网主要由弱关系构成；家庭年收入在2万至4万元之间，咨询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主要由强关系构成，情感网和帮工网的关系强度相同，均为0.46，弱关系占比略高；家庭年收入在4万至6万元之间，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主要由强关系构成，帮工网的关系构成中强关系比例略高；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咨询网和信任网中的强关系占80%甚至更多，情感网和借贷网中的强关系占70%，相比这四种社会网络，帮工网中的强关系仅占54%。虽然家庭年收入有所不同，但强关系对于农村居民来说都是他们咨询支持的重要提供者，尤其是对家庭年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来说，强关系是他们的不二选择。相对来说，帮工网的关系强度随家庭年收入变化的幅度较小。

为确定家庭年收入与社会资本总量、社会网规模和五种社会网关系强度的具体影响关系，我们做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2.9.2报告了最后结果。

表 2.9.2 家庭年收入与社会资本的二元 Logit 估计模型

变量	家庭年收入	标准误	常数项	标准误
社会资本	0.445***	0.049	-1.291***	0.113
网络规模	0.526***	0.045	-1.250***	0.099
网络顶端	0.539***	0.07	-1.493***	0.131
网络位差	0.527***	0.07	-1.477***	0.131
咨询网关系强度	0.202***	0.036	-0.306***	0.085
情感网关系强度	0.137***	0.034	-0.272***	0.085
帮工网关系强度	0.056	0.032	-0.06	0.08
信任网关系强度	0.197***	0.036	-0.311***	0.087
借贷网关系强度	0.194***	0.034	-0.863***	0.086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帮工网关系强度  $p < 0.05$ ，说明家庭年收入对帮工网关系强度的影响不显著。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年收入对社会资本总量、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位差、咨询网关系强度、情感网关系强度、信任网关系强度和借贷网关系强度有着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均为正。家庭年收入与社会资本的二元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越高，社会网络规模就越大，获取较高职业阶层的社会资本的能力也就越强。既然家庭年收入对网络顶端有着显著的正影响，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村居民越能够获得较高职业阶层的社会资本，相较自己的阶层，他们的网络位差也就越大，社会资本也就越丰富。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家庭年收入对咨询网关系强度、情感网关系强度、信任网关系强度和借贷网关系强度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家庭年收入越高，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中以家庭成员和亲戚关系组成的强关系比例就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倾向于向强关系寻求帮助。

至此，假设2即家庭年收入越高则社会资本总量越大也得到了验证。不仅如此，我们还得到家庭年收入对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都有显著的正影响。

## 二、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

有专家提出，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加收入最具潜力。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即非农收入。当前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作为家庭年收入的一部分，在扩大结交范围、结识不同层次的个体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对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有着积极的作用。为详细分析不同非农收入的社会资本总量差异，我们将根据数据样本非农收入情况的频数，将非农收入划分为 5000 元以下、5000—10000 元和 10000 元以上三个等级。

表 2.9.3 社会资本的非农收入差异

	5000 元以下/年		5000—10000 元/年		10000 元以上/年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社会资本	24.50	0.57	28.15	1.38	30.40	0.79
网络规模	6.64	0.15	4.96	0.37	9.06	0.16
网络顶端	1.87	0.05	1.69	0.15	2.14	0.07
网络位差	0.85	0.05	0.69	0.15	1.13	0.07
咨询网关系强度	0.50	0.01	0.58	0.04	0.63	0.02
情感网关系强度	0.44	0.01	0.50	0.04	0.45	0.02
帮工网关系强度	0.44	0.01	0.49	0.04	0.48	0.02
信任网关系强度	0.52	0.01	0.54	0.04	0.68	0.02
借贷网关系强度	0.44	0.01	0.50	0.04	0.58	0.01

从表 2.9.3 可以看到，非农收入为 5000 元以下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4.50，5000—10000 元之间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28.15，10000 元以上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 30.40；非农收入为 5000 元以下的网络规模平均为 7 人，收入在 5000—10000 元之间网络规模平均为 5 人，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网络规模平均为 9 人。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随着非农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将有所提升，网络规模将有所扩大。非农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网络顶端为 1.87，数值介于农业劳动者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之间，平均



网项尚未达到产业工人阶层；非农收入在 5000—10000 元之间农村居民的网络顶端为 1.69，比 5000 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网络顶端要小；非农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网络顶端为 2.14，已经能够获得产业工人阶层的社会资本，且有向小雇主阶层接近的可能。非农收入在 10000 元以下的农村居民的网络位差均未超过 1，说明相同职业阶层内交往的占比更大；非农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农村居民的网络位差为 1.13，说明他们已经摆脱群内交往的困境，已有获取跨阶层社会资本的能力。

从关系强度来看，咨询网的关系构成从 5000 元以下的 0.50 上升到 10000 元以上的 0.63，情感网的关系强度从 5000 元以下的 0.44 先上涨到 5000—10000 元的 0.50 后又下降到 0.45，帮工网的关系强度从 5000 元以下的 0.44 上升到 10000 元以上的 0.48，信任网的关系强度从 5000 元以下的 0.52 上升到 0.68，借贷网的关系强度从 5000 元以下的 0.44 上升到 10000 元以上的 0.58。纵向来看，非农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其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和借贷网主要由弱关系组成，关系强度均为 0.44，咨询网和借贷网中强弱关系各占一半；收入在 5000—10000 元之间的农村居民的情感网、帮工网和借贷网关系强度均为 0.5，说明在 5000—10000 元之间这三种网中的强弱关系各占一半，咨询网中的强关系大约占到 60%，信任网中强关系比例略高；收入在 10000 元以上的农村居民，其咨询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主要由强关系构成，强关系占到 60%—70%，情感网主要由弱关系构成，强关系仅占 45%，帮工网中弱关系略高于强关系。

可以看到，强关系在不同非农收入农村居民咨询网和信任网中占比均超过 50%，而帮工网中强关系的比重则一直低于 50%。

为进一步探讨非农收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而验证假设 3，我们将非农收入和社会资本进行了二元 logistic 分析。首先，以非农收入的平均值为标准将非农收入转换为 0, 1 二元变量，低于或者等于平均值的非农收入值转化为 0，高于平均值的非农收入值转化为 1。社会资本做了同样的二元变量转化。表 2.9.4 报告了最后结果。

表 2.9.4 非农收入与社会资本的二元 Logit 估计模型

变量	非农收入	标准误	常数项	标准误
社会资本	0.754***	0.131	-0.590***	0.068
网络规模	0.953***	0.105	-0.472***	0.056
网络顶端	0.520***	0.520***	-0.730***	0.063
网络位差	0.500***	0.118	-0.730***	0.063
咨询网关系强度	0.872***	0.108	-0.141*	0.055
情感网关系强度	0.065	0.107	-0.01	0.057
帮工网关系强度	0.352***	0.104	-0.02	0.056
信任网关系强度	0.865***	0.111	-0.151**	0.056
借贷网关系强度	0.632***	0.107	-0.644***	0.059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通过表 2.9.4 的报告数据，情感网关系强度  $p < 0.05$ ，非农收入对情感网影响不显著，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 0.001% 的置信水平下，非农收入对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网络顶端、网络位差都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方向为正。说明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居民比非农收入低的农村居民获取更多社会资本的可能性更大，非农收入越高，农村居民的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越大的可能性就越高。在 0.001% 的置信水平下，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咨询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的关系强度有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说明非农收入高的农村居民，其咨询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中强关系的比重越大。

至此，假设 3：非农收入越高，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就越高得到了验证。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外界，其社会交往的范围更就广泛，有更多的机会同小雇主阶层等更高阶层接触，并将其发展成社会资本动员的对象。因此，非农收入越高，其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相应地也就越大（高）。

### 三、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权力差异

虽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但依然是再分配体

制，加之历史的烙印，党员身份在再分配体制中依然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制度改革的再一次深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员身份的作用可能将逐渐减弱，但目前来说党员身份权力依然持续。在农村，党员身份往往意味着在村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他们或者是村里的书记，或者是村主任，或是两委班子的其他成员，或者能够在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甚至左右着村务决定等。这样一来他们就比普通农村居民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因此，本论文选取是否是党员作为衡量农村居民权力的指标，将中共党员身份赋值为1，非中共党员赋值为0。表2.9.5描述了不同政治身份的社会资本平均水平。

表 2.9.5 社会资本的权力差异

	非党员		党员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资本	25.81	0.44	37.48	2.96
网络规模	7.43	0.12	8.29	0.40
网络顶端	1.92	0.04	2.53	0.21
网络位差	0.90	0.04	1.51	0.21
咨询网关系强度	0.55	0.01	0.59	0.04
情感网关系强度	0.45	0.01	0.49	0.05
帮工网关系强度	0.45	0.01	0.54	0.04
信任网关系强度	0.58	0.01	0.62	0.04
借贷网关系强度	0.49	0.01	0.63	0.04

从表2.9.5反映的差异来看，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37.48，非党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平均为25.81，两者社会资本总量差异明显，具体相差近12个单位。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平均为8人，而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为7人，仅相差1人。但两群体之间的社会资本总量相差较大，可以推想，社会资本的差异主要是通过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的差异实现的。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其网络顶端为2.53，已超过产业工人阶层（网顶为2），向小雇主阶层（网顶为3）靠拢，

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已获得的顶端优势，搭建同更高职业阶层的个体的桥梁，进而获得更多、更有效的社会资本；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网络顶端为 1.92，尚未跨越产业工人阶层，其获得较高质量的社会资本的能力明显要弱于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从网络位差来看，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网络位差为 1.51，已经实现了跨阶层交往，但非党员农村居民的网络位差为 0.90，仍处于阶层内交往。

比较各社会网的关系强度，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咨询网关系强度为 0.59，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咨询网关系强度为 0.55，差异不明显。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情感网关系强度为 0.45，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情感网关系强度为 0.49，差距不大，仅为 0.04。可以说仅以党员身份为划分标准，农村居民的情感网主要由弱关系构成。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帮工网关系强度为 0.54，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帮工网关系强度为 0.45。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信任网关系强度为 0.62，在五种社会网关系强度中排名第二，强关系占比较高；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信任网关系强度为 0.58，在五种社会网关系强度中排名第一，强关系占比最高。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借贷网关系强度为 0.49；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借贷网关系强度为 0.63，在五种社会网中强关系占比最高。纵向来看，以是否为党员为划分依据，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中，咨询网和信任网的关系强度均在 0.5 以上，说明咨询网和信任网主要由强关系构成；情感网和帮工网的关系强度均为 0.45，说明情感网和帮工网主要由弱关系构成，弱关系占 55%；借贷网的关系构成中强关系和弱关系的比重相差不大，几乎各占一半。在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中，强关系比重比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要高，咨询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中强关系占到 60%，甚至超过 60%；帮工网中强关系比重反而超过弱关系，占到 54%，情感网中强弱关系比重相当。

在中国，是否具有党员身份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党员身份是进入领导阶层，获得政治权力和资源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农村，党员身份也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作用。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曾提出包产到户等农村改革制度会削弱农村干部的再分配特权，给普通农民带来更有利的发展。白威廉和麦谊生

等人却坚持“权力持续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农村，“地方官员将会灵活地审时度势，使自己和家庭努力适应新形势，以谋求最高的回报”。从表 2.9.5 描述的不同政治身份的社会资本的差异可以得出，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更多，且差异明显，市场与行政之间的较量还在继续。就目前的数据和情况来看，农村行政人员在获取社会资源时更具优势。

为进一步分析党员身份对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我们将党员身份二元变量和社会资本的二元变量导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中，分析结果如表 2.9.6。

表 2.9.6 党员身份与社会资本的二元 Logit 估计模型

变量	党员身份	标准误	常数项	标准误
社会资本	0.737**	0.27	-0.429***	0.059
网络规模	0.465*	0.207	-0.224	0.048
网络顶端	0.781***	0.234	-0.627***	0.055
网络位差	0.733**	0.233	-0.630***	0.055
咨询网关系强度	0.203	0.212	0.091	0.048
情感网关系强度	0.248	0.228	0.002	0.05
帮工网关系强度	0.342	0.213	0.037	0.048
信任网关系强度	0.326	0.218	0.071	0.049
借贷网关系强度	0.665*	0.213	-0.494***	0.05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二元 logit 模型显示（表 2.9.6），党员身份对咨询网关系强度、情感网关系强度、帮工网关系强度和信任网关系强度的影响不显著（ $p < 0.05$ ），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不再做具体分析。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党员身份对网络规模和借贷网关系强度有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比非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网络规模更大，借贷网中强关系的比例会更高。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党员身份对社会资本和网络位差有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资本和网络

位差，职业阶层跨越度更大。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党员身份对网络顶端有显著影响，方向为正，说明具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的网络顶端更高。这与 2009 年边燕杰进行的中国“八城市调查”中餐饮网的研究结果相同。

在市场化较弱的农村地区，行政的作用较强还可以理解，但这八所城市中包含了上海、广州、厦门等市场化较为发达的城市，其结果与此相同。可以推测，不管在农村地区还是在城市中，党员身份都有着特殊的作用。

至此，假设 4：权力持续假设得到了验证，即拥有党员身份的农村居民，其社会资本总量更高。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出党员身份对个体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都有显著正影响的结论。相比家庭年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的显著性水平，我们发现，党员身份对居民社会资本等的影响程度要弱于家庭年收入和非农收入对其的影响程度。我们认为，随着社会市场化的深入发展，市场在资源分配和获得中起决定性作用，党员身份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

## 本章小结

边燕杰等学者的前期研究证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位差和网络顶端是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形成规模效应、网密效应、网差效应和网顶效应。但这四个变量的测量内容和标准不一，不能采用简单相加或相乘的方法计算。为探讨当前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现状，我们将采取因子分析的方法求出一个因子得分，进而得到资本存量现状。另一个问题是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的计算。由于本报告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测量是通过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五个网络进行的。除了网络规模能够通过计算直接得到，其他三个变量均不能实现简单相加。所以，我们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网络规模是用四个支持网的密度求出因子值得到的，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为了叙述和理解的方便，我们将 0—1 之间的因子值转化为 1—100 之间的百分值。由于网络密度对农户个体社

会资本的因子负荷值仅为 0.006，因此将其删除，表 2.10.1 只报告了转化后的分布结果。

表 2.10.1 农户个体社会资本整体分布频率表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位差	农户个体社会资本
因子负荷值	0.511	0.966	0.961	
均值	7.5443	11.2000	10.0800	16.7084
男	7.5578	11.4349	10.27188	17.0354
女	7.4749	9.9942	9.0939	15.0579
东部	9.1553	14.9540	13.2665	21.8894
西部	5.8443	6.1838	5.8405	9.9478
标准差	4.92766	20.00000	18.00000	19.5970
男	5.00869	20.01315	17.94944	19.6749
女	4.49378	19.92654	18.26041	19.1524
东部	4.75408	17.85744	18.58255	19.7934
西部	4.51520	20.69186	16.26582	17.1369

1. 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较大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

在对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做回归分析时，我们发现网络规模的因子负荷值为 0.511，但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的因子负荷值分别为 0.966 和 0.961。从因子负荷值来看，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对农户社会资本的影响很大。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主要由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三个因子构成。较高的网络顶端和较大的网络位差是农户积累个体社会资本的理想社会网络结构，更有利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这很好理解，纵使农户的网络规模很大，但都是农村居民，其获得的社会资本必然具有同质性，或者说仅有一种类型的社会资本。而不同地位阶级能够使农村居民获得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地位阶层高的网络支持者更会为农户提供高质量的社会资本，丰富多样且高质量的社会资本才是理想的状态。

## 2. 农村居民的个体社会资本整体偏低，且个体差异较大

从表 2.6.1 可以看出网络密度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存量的均值为 16.70，但标准差较大，说明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相差较大。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整体偏低的原因可能是农户与外界的交往多局限在与自己阶层差不多的低职业地位阶层，从各个支持网中支持者职业地位阶层的分布中就可以明显看出。这对于本身拥有较低社会资本的农户来说并不具有雪中送炭的效果，这种群内选择的效应使得农户个体支持网的网顶和网差整体分布较低，在网顶效应和网差效应的影响下即使农户个体网络规模有所扩大也不能充分发挥扩大农户社会资本的作用。相较农户社会资本整体分布情况，不同个体之间的社会资本差距十分明显，这种分布可以从以下原因中得到解释。第一，如今有不少的农村居民从事着非农经济活动，个体经营和外出打工现象甚是普遍，这就扩大了交往的规模和层次，无形中也影响了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增加。第二，农村中能考上大学并有能力供孩子上大学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些大学生毕业之后离开了这片土地，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这对以家庭成员为核心的社会网而言大大增加了农户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但在农村并不是所有或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通过大学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也就扩大了个体社会资本的差异。

## 3. 男女社会资本差异较小，但东西部地区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差异较大

从 2.10.1 中我们了解到男性的社会资本为 17，女性的社会资本为 15，而东西部地区比较而言，东部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大约为 22，西部地区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大约为 10，东西差距近两倍。现如今，女性已经冲破传统走进了现代社会，社会交往也不再局限在家庭和亲属中，另外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明显提高，这给她们获得较高的网络顶端奠定了基础。因此，总体而言男女个体社会资本差异较小，但东西部地区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受地区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社会交往开放程度、交往花费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也影响了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存量。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地区差异明显，山东省最高，其次是陕西省，第三是甘肃省，最后是宁夏地区。山东省和宁夏地区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平均差 14 个单位。男女性别的社会资本总量差异不明显，农村居民社会资本



总量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加，中专及以上教育水平比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平均多近 11 个单位的社会资本，高中教育水平比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平均高 6 个单位。

#### 4. 年龄、住房类型、户口、民族、政治面貌和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探讨影响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状况的具体因素，我们将年龄、住房类型、户口、民族、宗教信仰、政治面貌、家庭收入和教育年限等 8 个变量分别引入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2.10.2）。为了简明起见，表 2.10.2 只报告了最后的计算结果。

表 2.10.2 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影响因素（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网络规模	网络顶端	网络位差	农户个体社会资本
年龄 a	-0.695 *	-4.825 ***	-4.297 ***	-6.030 ***
住房类型 b	0.349	17.940 ***	19.084 ***	16.973 ***
户口 c	-0.897	14.700 ***	8.755 **	9.669 **
民族 d	3.561 ***	2.698	2.730	6.401 ***
宗教 e	-0.756 **	-1.545	-1.067	-2.048
政治面貌 f	-0.588	2.043 ***	6.612 ***	5.967 **
教育年限 g	0.151	2.282 *	1.088 *	1.809
收入 h	2.353 ***	6.194 ***	5.098 ***	7.533 ***
常数项	4.115 ***	7.452 ***	6.629 ***	11.165 ***
F 检验值	82.209 ***	28.853 ***	27.153 ***	39.515 ***
调整后的 R <sup>2</sup>	0.228	0.121	0.115	0.169
D. F	8	8	8	8
N	2198	1619	1615	1512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a 年龄，以 60 岁以上为参照

b 住房类型，以政府未统一建造居民区为参照

c 户口，以农业户口为参照

d 民族，以少数民族作为参照

e 宗教信仰，以无宗教信仰作为参照

f 政治面貌，以非中共党员作为参照

g 教育年限，以 5 年以下为参照

h 收入，以 20000 元以下为参照

在研究农户个体社会资本影响因素时我们引入了年龄、住房类型、户口、民族、宗教、政治面貌、教育年限和收入 8 个变量，经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宗教和教育年限对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没有显著性影响，剩下 6 个变量是影响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但住房类型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16.973，户口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9.669，收入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7.533，在 6 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居于前三位，且都非常显著，对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简要概之，住房类型、户口和收入是影响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三大人口学因素，这三个因素既包含了村庄外部环境的影响，又包含了个体因素的影响。

5. 提名顺序基本按照家庭成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非亲戚关系推开

在“差序格局”变异假设方面，不同关系类型对农村居民的重要性依次为家庭成员关系、朋友关系、亲属关系、邻居关系、同学和其他关系。虽然五种社会网的提名顺序略有不同，但基本按照家庭成员关系—拟似血缘关系—亲戚关系—非亲戚关系推开。朋友这种“拟似血缘关系”逐渐渗入到传统“差序格局”中，弱关系在农村居民获取社会资本过程中渐渐凸显出来，验证了“差序格局”变异的假设。对于家庭观念极重的中国人来说，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是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主要对象，在利己观念侵入和家族仪式简化的双重作用下，家族观念正在逐渐变淡。朋友关系带有利益性和拟似血缘的情感性，在家族观念逐渐淡化的情况下，渐渐成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源获取的新主力。

6. 家庭收入和非农收入越高，社会资本总量越大

在收入差异假设方面，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就越高，社会网络规模就越大，且显著性极高。从收入构成来看，非农收入越多，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总量就越高，社会规模也越大。经济收入的提高为农村居民更多挖掘和维持社会资本提供了物质基础。在中国，“请客吃饭”往往是结识朋友、动用社会资本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场所，这无疑需要较多的物质支持。根据“群内选择”理论，个体收入提高的同时也结识相同阶层地位的群体，他们所

拥有的社会资本往往比较丰富。因此，这就扩大了自己的社会资本的总量，也验证了“家庭年收入越高，则社会资本总量越大”和“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则社会资本总量越大”的假设。

#### 7. 拥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农村居民其社会资本总量越高

在权力持续假设方面，党员身份在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农村，具有党员身份往往意味着担任一定的村内职务，成为村中的政治精英，获得了政治权力和再分配的权力。他们依靠自己手中的再分配权力能够吸引其他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亲近，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本。同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够同职业阶层较高的个体搭上关系，发展社会资本。事实表明，党员身份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党员身份和非党员身份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差距较大。在市场化发展程度较弱的农村，行政的作用依然较大。但党员身份对社会资本的影响程度明显弱于家庭年收入和非农收入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 第三章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状况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是以共同居住的地域为基础，具有共同的社会联系和价值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区是伴随着西方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一个概念。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农村社区是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居民聚集程度不高，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传统农村社区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现代国家的建构，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外部性因素日益向农村渗透，农村社区不再是自然状态，更是一种国家规划性制度变迁的产物。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国，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虽然在城市化巨大潮流的影响下迅速减少，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仍占有很大比例。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全国人口总数为 1370536875 人，其中居住在乡村的就有 670000000 多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50.32%，可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是我国应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十八大报告强调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观点，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且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农村贫困问题，相比较城市的发展来说，农村的发展仍然十分缓慢，尽管国家采取多种鼓励措施促进村庄的发展，

但是城乡差距依然很大。福山等人的研究指出高存量的社会资本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应对贫困，促进社区的经济的发展。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具有增强社区凝聚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重要作用。可见，农村社会资本研究是新的视角，对促进村庄发展、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为了搞清楚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社区甚至是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国内外学者运用了很多变量对其进行测量和分析。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外存在着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和集体层面社会资本测量方法。如通过提名生成法、位置生成法来测量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通过信任、公共参与、社会联结和社会规范来测量集体（社区、组织等）拥有的社会资本量。本报告主要分析的是社区社会资本方面，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提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33项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如下（牛喜霞、张生元，2012）：

### 1. 社区参与

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根据我们对调查地山东、陕西、甘肃和宁夏所在的31个村庄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村庄从未举行过“义务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也从未举行过“义务献血”活动，也没有任何的协会组织。此外，除了一些正式的生命仪礼或主要节日，农民很少和亲戚、朋友聚餐。为此，我们将测量指标由原来的13个减少到了9个。“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承担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 2. 社区归属感

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

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具体操作化为：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为了村容村貌不会乱丢垃圾、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 3. 合作

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对于这一维度的测量指标，只是将社会中介组织中养鹅协会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做了代替。操作化为：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政府有经济行为的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合作。

### 4. 共享

共享即分享，即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操作化为：有好吃的食物会分给邻居与其他村民、买了农耕用具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信息会告诉自己认识的人。

### 5. 互惠

指互相给对方恩惠或者好处。操作化为4个测量指标：“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

### 6. 信任

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生活，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以情感内容和因素为维度的一方对另一方表示出的一种相信的主观态度（牛喜霞，2005）。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联系，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越强。为此，我们将“信任”维度系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除了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特殊信任之外，目前，农村还存在着对于领导、政府、媒体、警察、法院、法官和医生的制度化信任（赵延东，2006），以及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

院和法官”“相信医生”；“熟人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相信家人说的话”“相信自己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普遍信任”维度的测量指标有：“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我会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

## 第一节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居民自愿自觉地参与社区内的各项事务和各种活动的过程。农村的社区参与是村民对自己所在社区公共事务和各项活动的参与，它表明村民是否愿意对村内的事务发挥个体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从中获取个人生存所需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源。

考虑到农村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行为受到自身价值观念取向的影响，我们将谢治菊提出的“社区参与”这个测量指标划分成“特殊社区参与”和“一般社区参与”两个分指标。“特殊社区参与”是指行动主体以个体利益为取向，从自我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会资源。“一般社区参与”是指行动主体以集体利益为取向，更多地从他者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我们确立的测量“特殊社区参与”维度的指标有以下2个：“参与村落举办的文娱活动”和“积极参与村庄民主选举”。“一般社区参与”维度的测量指标有4个：“主动参与村庄事务”“会无偿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义务担当卫生监督员”。

### 一、一般社区参与

一般社区参与指的是行动主体以集体利益为取向，从他者的角度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参与社区活动。一般社区参与的测量指标有4个：“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无偿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参与村庄事务”“义务担当卫生监督员”。村民对一般社区参与的认同态度如下表所示：

表 3.1.1 一般社区参与状况 (%)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	10.7	62.5	18.6	7.4	0.9
	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11.4	55.8	23.3	8.6	0.8
	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	11.9	55.0	22.2	10.0	0.8
	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11.6	57.3	20.0	9.8	1.0
东部地区状况	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	10.8	56.1	24.4	7.3	1.4
	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11.6	44.1	34.0	9.3	1.1
	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	11.6	43.5	32.4	11.5	1.1
	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11.7	44.7	30.4	11.8	1.4
西部地区状况	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	10.5	69.2	12.5	7.4	0.3
	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11.4	68.1	12.2	7.7	0.6
	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	12.2	67.3	11.6	8.3	0.6
	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11.6	70.7	9.5	7.5	0.5

### (一) 农村社区居民一般社区参与的现状

#### 1. 农村居民一般社区参与的总现状

从表 3.1.1 中的总体状况态度百分比分布情况,可以看出村民将自己置于社区人的层面从他的角度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程度如何。超过 60% 的村民都有良好的一般社区参与意愿,其中村民倾向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情况最多,有 73.2% 的村民愿意这样做,但是也可以看出只有大约 10% 的村民是非常倾向于一般社区参与的,超过半数的村民只是在心理上愿意这样做,倾向的程度并不强烈。大约有 25% 的村民对一般社区参与持有无所谓的态度,甚至约有 10% 的村民是不愿意进行一般社区参与的。总体说来,村民对“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事情比较热衷,因为这与他们的劳动方式有关,村民对于出工出力的事情比较擅长,出工出力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村民对此活动最为认同。



## 2.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一般社区参与的现状

东部地区的村民对“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这一项测量指标的态度表现出村民在社区参与中的体力付出情况。在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有10.8%的村民倾向于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也有多达56.1%的村民同意这一观点，与此同时，仅分别有7.3%和1.4%的村民对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这一指标是持“不同意”和“很不同意”态度的，也有24.4%的村民认为“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一事是无所谓的。总体来看，倾向于“同意”态度的村民要远远多于倾向于“不同意”态度的村民。对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这件事情，村民的态度接近于“同意”。

“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有11.6%的村民非常同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43.5%的村民同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与此同时，有11.5%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有1.1%的村民很不同意这一观点，有32.4%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总体看来，同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村民多于不同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村民，但是村民对“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赞同度要高于对“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赞同度。而“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远远小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则表示村民对于“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态度仅是略为倾向于同意。

在“主动关心村级事务”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有11.6%的村民表示非常同意，44.1%的村民表示非常不同意，与此同时，也有9.3%的村民和1.1%的村民对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一事分别表现出“不同意”和“很不同意”的态度，也有34.0%的村民认为此事“无所谓”。总体来看，同意“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的村民要多于不同意这一点的村民，说明村民对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这一项行为较为积极。而村民略倾向于同意“主动关心村级事务”，则表示对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较为积极。

在“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有11.7%的村民倾向于非常同意这一观点，44.7%的村民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与此同时，有11.8%的村民表示不同意“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这一观点，也有

1.4%的村民对于“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表示出很不同意的观点，30.4%的村民对此呈现无所谓的态度。总体来看，同意“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居民略多于不同意此观点的村民。但“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比例远远小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也小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村民更愿意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最不喜欢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可能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卫生监督对村容整洁的重要性，加之受到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村民大多认为担任“监督员”应该是村干部的工作，对于村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思想还是比较弱。

### 3.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一般社区参与的现状

从表3.1.1的西部地区表中可以看出，有79.7%的农村社区居民“愿意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仅有7.7%的村民不愿意出力；79.5%的农村社区居民“愿意主动关心村级事务”，8.3%的村民不愿意这样做；79.5%的农村社区居民“愿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8.9%的村民不愿意；82.3%的农村社区居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仅有8.0%的村民不愿意这样做。

总体来看，西部地区70%的村民对一般社区参与极为认可，非常愿意参与进去，甚至有80%以上的村民非常重视卫生监督员一职，但是相比较而言，东部地区的村民仅有50%以上愿意进行一般社区参与的活动，可见在一般社区参与方面，西部地区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要高于东部地区的村庄。

## （二）农村社区居民一般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 1. 村民智力参与明显不足

从总体情况来看，76.9%的村民“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其中10.8%的村民非常愿意出工出力，仅有8.7%的村民不愿意这样做；超过半数的村民愿意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约10%的村民表示不同意；55.1%的村民表示“愿意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但也有12.6%的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有56.4%的村民表示“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但也可以看出13.2%的村民对此表示不认同。总体上看，村民更愿意对村级事务出工出力，

而对于献计献策、卫生监督、关心村级事务等方面，村民的积极性明显不高。

### 2. 东西部地区的农村社区居民在出工出力方面差异较小

东部地区村民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人数占比为 72.9%，西部地区村民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人数占比为 79.7%；东部地区村民不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人数占比为 8.3%，西部地区村民不愿意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人数占比为 7.7%，可见对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情况，西部村民更为积极。

### 3. 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农村社区居民一般社区参与率低

东部地区社区社会资本的一般社区参与指标中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四个指标的同意人数百分比分别为：76.9%、55.7%、55.1%、56.4%，而西部地区同意人数的百分比分别为：79.7%、79.5%、79.5%、82.3%，西部地区村民的一般社区参与率在四个测量指标上分别比东部地区村民的一般社区参与率高出了 2.8%、23.8%、24.4%、25.9%。可见在一般社区参与方面，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积极性高，尤其在“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献计献策”“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参与活动方面西部地区村民比东部地区村民具有更高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般社区参与方面，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更高一些。

## （三）村民一般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 1. 农村居民教育水平普遍较低

相比较脑力劳动村民更愿意在体力劳动上为村级事务做出努力，这是由于农村居民的工作主要就是劳作，体力劳动是村民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除去少数老弱病残的村民可能在体力上无法出工出力，90%以上的村民还是不排斥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但是对于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情况就要求村民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基础，而农村的教育质量还是比不上城市，在农村，村里考出个大学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多数青壮年的学历为初中或高中，还有部分村民仅有小学学历，甚至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村民要为村级事务贡献出良好的计策是较为困难的事情，所以农村教育的普及势在必行。

## 2. 农村居民经济理性开始凸显

东部地区相较于西部地区有更为发达的经济和较为优越的生活，但是在一般参与指标上西部地区的社区比东部地区社区的社会资本存量要高。这说明经济的发展情况与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并不能成正比，有时候社会资本会随经济发展有所减少，这可能是与经济发展带来的理性情感增多有一定的关系。经济发展了，道德水平却倒退了，在钱财的问题上村民更为慎重，所以对于一些不需要出钱的地方村民较为积极（Gao Yue, 2014）。

## 3. 凝聚农村居民的社会团体不足

西部地区调查地点包括三个：宁夏、陕西和甘肃，其中宁夏为回族自治区，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在村庄生活中对本民族的人有较强的认同感，对村庄也有较强的归属感，所以社会资本的含量较高。但是在东部地区调查地点集中于山东省，该省汉族居多，信仰宗教的人口较少且宗教种类比较繁多，如佛教、道教、基督教或民间信仰等，宗教的力量在东部地区显然不如西部地区明显，农村社区居民在村庄生活时缺乏凝聚村民力量的兴趣小组，所以社会资本的存量较少。

## 二、特殊社区参与

特殊社区参与是指行动主体以个体利益为取向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的一种参与形式。特殊社区参与的测量指标有两个：“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村民对特殊社区参与的认同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1.2 特殊社区参与的总体状况 (%)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11.8	54.5	25.4	6.7	1.4
	我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	7.6	40.3	26.3	20.2	5.5

续表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东部地区状况	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11.4	39.3	36.5	10.2	2.6
	我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	7.6	27.8	30.1	24.2	10.3
西部地区状况	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12.3	70.6	13.8	3.0	.2
	我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	7.7	53.7	22.3	15.8	.6

### （一）农村居民特殊社区参与的现状

#### 1. 农村居民特殊社区参与的总现状

特殊社区参与强调行动主体的行为更多地考虑到个体利益，从表 3.1.2 中可以看出村民的行为以个体为取向，更多地从个体利益角度参与社区活动，以期获得社区人的合法资源的情况。我们明显可以看到接近 66.3% 的村民愿意参加村干部选举，但是只有不到 50% 的村民愿意参加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只有不到 10% 的村民不愿意参加村干部选举，且只有 25% 的村民不愿意参加村里的活动。

#### 2.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的特殊社区参与现状

东部地区的村民在“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这一项测量指标中，11.4% 的村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39.3% 的村民同意这一观点，仅有 10.2%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有 2.6% 的村民倾向于很不同意“参加村干部选举”，有 36.5% 的村民对此呈现无所谓的态度。总的来说，同意“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的村民要略多于不同意“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的村民。在特殊社区参与中，“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的平均值为 3.469，介于 3—4 之间，表示“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的态度介于“同意”和“无所谓”之间，尽管平均值大于 3，倾向于“同意”，但是数值偏小，且较接近于“无所谓”的态度，可见对村干部选举的积极性并不高。

在“积极参加村活动”这一项测量指标中，仅有 7.6% 的村民非常同意“经常参加村活动”，27.8% 的村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有 24.2% 的村民对此

持不同意的态度，更有 10.3% 的村民很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有 30.1% 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总体上看，有更多的村民不同意积极参加村活动，所以对于参加村活动呈现比较消极的态度。“积极参加村活动”的平均值为 2.980，平均值小于 3 说明村民参与村活动的态度倾向于“不同意”，对村活动的参与比较消极。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东部地区的村民更愿意参加村干部选举，但参加村活动的态度并不积极。

### 3.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特殊社区参与现状

从西部地区状况的表中可以看出 82.9% 的村民愿意参加村干部选举，仅有 3.2% 的村民不愿意参加；61.4% 的村民会经常参加村里的协会活动，有 16.4% 的村民表示不会参加村活动，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村民对参加村干部选举的热情远远大于参加村活动的热情。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对于特殊社区参与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村民在特殊社区参与方面要比东部地区的村民更为积极。

## （二）农村居民特殊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 1. 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少

从表 3.1.2 的总体状况表中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村民都愿意参加村干部选举，但是不到半数的村民却对参加村里的活动不是那么积极。在调查员入户访问时，有村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位宋先生说：“村干部选举？谁不愿意去啊？能不能有用就另说啦！”这表明村民的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抱有乐观的态度，但起码他们在意识上认识到了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但有很大一部分的村民参与村活动的意识不强，这可能与村里缺少组织娱乐活动的队伍有关。

### 2. 东部地区农村社区居民参加村干部选举不如西部地区村民的积极性高

对比表 3.1.2 中东西部村民的特殊参与状况，可以发现东部仅有 50.6% 的村民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有 12.8% 的东部村民对此持反对意见；西部地区却有 82.9% 的村民表示愿意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仅有 3.2% 的村民持反对意见，可见在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这一活动上西部地区的村民比东部地

区的村民有较高的积极性，而东部地区农村社区居民在参加村干部选举时的积极性显然不如西部地区农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高。

### 3. 东部地区农村社区居民在参加村活动时不如西部地区村民积极

对比表 3.1.2 中东西部村民的特殊参与状况，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仅有 35.3% 的村民会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但是西部地区却有 61.4% 的村民表示会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可见在积极参加村活动方面西部地区的村民比东部地区的村民有较高的积极性。

## （三）农村社区居民特殊参与不足的原因分析

### 1. 农村社区居民的兴趣小组较为缺乏

从表 3.1.2 的特殊社区参与的总体表中可以看出愿意积极参加村活动的村民不足半数，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占到被调查者总数的 25%，这与村里的活动较少、村民生活比较单调有关。在进行访谈时，有村民提到“村里前几年还有组织乡亲们去县里表演秧歌的活动，近几年却不再组织了”，也有更多的村民提到“村里根本就没有组织什么活动，我们平时的娱乐也就是聊天、打牌”，可见村民的娱乐活动缺乏，更没有兴趣小组可以丰富村民生活，娱乐活动的单一也降低了社区社会资本。

### 2. 社会流动减少了农村居民之间的联系

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的经济发达，社会流动也快，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了村庄去进城务工，社会流动的加快减少了村民的联系，减低了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所以东部地区的村民在村选举和村活动上表现的不如西部地区的村民积极。

### 3. 传统节日的影响日渐淡薄

西部地区的调查地点包括了回族自治区，被调查者中有大量的回族村民，回族有自己的传统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等，在这些节庆日农村居民会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而东部地区的被调查者多数为汉族人民，节日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渐渐淡薄，村民联系也变少了，社区社会资本也随之降低。

### 三、社区参与小结

特殊社区参与的积极性都不高，其中对于村活动的参与非常消极；一般社区参与情况有较好的方面，例如村民的体力参与较多，但是也存在不足，如欠缺脑力劳动的参与，对村级事务的参与积极性较低，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意愿较小。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一）特殊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较低

特殊社区参与表现为对村干部选举的情况和参加村活动的情况，村民对这两方面的态度积极性都不高。一方面，村民对村干部选举的积极性较低，对于“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的态度虽然倾向于“同意”，但接近于“无所谓”，呈现出了漠视态度，对于村干部选举活动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村民对村活动的参与积极性很低，不同意“积极参加村活动”，村庄中确实严重缺乏集体活动，村民的精神娱乐活动贫乏。在调查中发现山东村民的性格比较传统和中庸，所以更愿意选择“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各种事件和活动也较倾向于“说好不坏”的态度，山东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村民的性格特点也表现为较谦逊，所以村民对于每一项测量指标会尽量偏向于“同意”或“不同意”的态度，其中“同意”的态度会比较多，而较少会认同“非常同意”或“很不同意”的态度，然而只要村民选择了“不同意”的态度，就说明村民对此指标中表述的行为确实是非常不赞同的。总的来看，村民的特殊社区参与都偏低，其中对村活动的参与积极性非常低。

#### （二）体力劳动付出积极，但脑力劳动付出不足

村民对“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和“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的平均值分别为 3.676 和 3.530，说明村庄对于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事件是比较积极的，即在体力上的义务劳动方面比较积极，但是村民对于献计献策等脑力付出比体力付出要小得多。对于参与义务劳动这样的活动非常积极，而对于“献计献策”这样的脑力策划行为并没有积极参与。

#### （三）对村级事务的关心比较消极

根据数据分析发现“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的平均值为 3.559，远远没有达



到4，即没有达到“同意”的态度，说明村民对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偏低。在一般社区参与中，仅有“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平均值达到了3.6以上，虽然也没有达到4，但是在一般社区参与中，村民的体力付出情况最好，相比较来说村民对于“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比较消极，对关心村级事务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

#### （四）卫生监督中的集体责任感缺失

在一般社区参与的四个测量指标中，“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平均值较小，所以虽然村民略倾向于同意“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但是其积极性还有待提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也是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的一种方式，但是又区别于为村级事务付出体力劳动，因为在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过程中不但要付出体力劳动，还有某种脑力劳动的付出，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担任村卫生监督员时需要村民承担一定的责任，在必要时需要村民去得罪他人。在农村社区中，村民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出于照顾彼此之间的面子问题，村民也不愿意去做得罪他人的事情，碍于情感的影响对“愿意免费担任村卫生监督员”的参与并不积极，可以看出村民对村庄的责任感还没有上升到集体的层面。

## 第二节 社区归属感

社区归属感指的是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在操作化过程中，考虑到“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这一指标属于社区参与维度，同时，这是一个对别人的行为作出评价的态度选项，放在这里不合适，为此，我们取消掉了这一指标，操作化为：“村发展对自己很重要”“喜欢所在农村社区”“关心本村事务”“相信村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从村民对于社区归属感的态度的状况出发，指出农村居民在社区归属感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 一、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

### (一) 农村社区居民对村庄发展重要性认识的状况

表 3.2.1 反映了村庄居民对所在村庄发展程度对自己重要性的态度。可以看到, 同意“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的村民占 86.6%, 不同意仅有 3.1%, 约 10% 的村民持“无所谓”的态度。

在“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这一项测量指标中, 东部地区的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 30.1%、52.4%、2.8%、0.5%、14.1%。

而西部地区认为“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的村民占 91.1%, 不同意的村民占 2.6%, 尚有 6.2% 的村民持无所谓态度。

总体看来, 80% 的村民赞同“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这个观点。数据对比也可以看出“村民对村庄发展”的重要性有较普遍的统一认识。村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村庄里, 不论是出于从小到大对村庄难以割舍的感情, 还是出于对个人和家庭的权益和利益考虑, 都能深刻认识到村庄发展所带来的重要意义。

表 3.2.1 认为“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26.2	60.4	10.3	2.7	0.4
东部地区	30.1	52.4	14.1	2.8	0.5
西部地区	22.0	69.1	6.2	2.4	0.2

### (二) 东西部地区村民在村庄发展认识程度中存在的差异及原因分析

尽管总体上看, 超过 80% 的村民意识到村庄发展对自己的重要性, 但是通过表 3.2.1 中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相较于东部地区, 西部地区的村民更为重视村发展的重要性, 在东部地区中认为“村庄发展对自己很重要”的村民

达到 80%，而西部地区中有超过 90% 的村民认识到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绝大多数的农村社区村民能够意识到村庄发展对自身带来的重要性，但是西部地区的村民比东部地区的村民更重视也更依赖自己所在村庄现在的发展状况。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东部地区的村庄虽然比西部地区的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稍好，但是村民人口地域性流动也多，很大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常年不在本村居住，从而对村庄的归属感就降低了。

其次，东部地区的村民比西部地区更缺少社团文化活动，村民之间的交流和相互联系的纽带不如西部地区强，导致东部地区村民对村庄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

再次，东部地区的村民即使不依靠村庄土地产出收入，也能通过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而西部地区村民的经济收入大部分依赖于村庄的发展，农民家庭收入水平与村庄的发展水平相互依赖，所以西部村民比东部村民更重视村庄的发展状况。

## 二、喜欢所在社区

### （一）农村居民对社区喜爱的情况

从表 3.2.2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总体状况上同意自己“喜欢所在社区”的村民占 85.2%，不同意的村民占 3.7%，10% 左右的村民持无所谓态度。同时，在“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的测量指标中，东部地区的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 30.1%、53.4%、3.2%、1.6% 和 15.0%。总体看来，大多数村民对“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这一项测量指标表现出强烈的“同意”。同时，可以看出西部地区表示“喜欢所在社区”的村民高达 90.3%，东部地区的村民中有 26.8% 表示非常同意“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这一观点，53.4% 的村民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也有 15.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总体看来，大多数村民对自己所在的社区表现出喜爱的态度，村民对“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这一项测量指标表现出较强烈的“同意”倾向。

表 3.2.2 “喜欢所在社区”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23.8	61.4	11.2	2.7	1.0
东部地区	26.8	53.4	15.0	3.2	1.6
西部地区	20.5	69.8	7.2	2.2	0.3

### (二) 东西部地区村民对村庄情感上存在差异及原因分析

比较东西部农村居民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地区村民中超过 90% 表示“喜欢所在农村社区”，这种情况在东西部地区并无显著差异。但是东部地区的村民相对而言更多倾向中立，对村庄的情感喜爱与否都持无所谓的态度。从总体来看，3.7% 的村民表示“不喜爱本村庄”，东部村民的比例为 4.8%，西部村民的比例为 2.5%。虽然东部村庄比西部村庄经济更为发达，但是表示不喜爱本村庄的村民却比西部地区多。东部地区村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一些负面消息加剧了村民对本村的不满。提到本村时，有的村民会把所在社区与网络上宣传的各种发展成熟的社区做对比，只看到其他村庄好的方面而忽视了本村的优点，其实说到底村民对本村有种恨铁不成钢的失望感。

## 三、关心本村事务

### (一) 关心村务的现状

从表 3.2.3 中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73.6% 的村民同意“关心本村事务”，6.4%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20.1%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东部地区的村民对“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这一观点，表示非常同意和同意的比例分别为 18.4% 和 47.5%，表示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比例分别为 4.8% 和 1.3%，也有 28.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西部地区的村民对“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这一观点，表示同意的有 81.8%，不同意的有 6.6%，11.6% 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总体来看，同意“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的村民占绝大多数。村民对

“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的测量指标更倾向于“同意”的态度，但是不如对“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这项测量指标的平均值高，即对村级事务的关心程度不如对村庄的喜爱程度高。

表 3.2.3 “关心本村事务”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15.1	58.5	20.1	5.6	0.8
东部地区	18.4	47.5	28.0	4.8	1.3
西部地区	11.6	70.2	11.6	6.4	0.2

### (二) 关心村务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在表 3.2.3 中我们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关心情况，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村民比东部更为关心本村事务。西部地区村民同意关心村级事务的百分比比东部地区的要大，但是持反对意见和态度的西部村民比东部地区要多一点，东部地区的村民更倾向于持中立的态度。主要是西部地区虽然经济较东部地区落后，但是村民对村务的关心更多，对村庄的归属感更强（Gao Yue, 2014），这与西部村庄独特的现实特点有关系。究其原因，在于西部地区村民的被调查者多为回族群众，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使回族村民有更强的精神凝聚力，对本村事务更为关心。

## 四、相信村庄会越来越好

表 3.2.4 “相信村庄会越来越好”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28.3	59.9	8.0	2.9	1.0
东部地区	33.7	55.2	7.6	2.5	1.0
西部地区	22.6	64.9	8.2	3.4	0.9

### （一）对村庄前景的态度

从表 3.2.4 的总体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出，同意“信任村庄会越来越好”的村民占 88.2%，不同意的占 3.9%，8.0% 的村民持无所谓态度。

在“我们村会越来越好”这个测量目标中，东部地区的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 33.7%、55.2%、2.5%、1.0% 和 7.6%。87.5% 的西部地区村民认为“我们村会越来越好”，4.3% 的村民不同意，8.2%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总体看来，大部分村民对“我们村会越来越好”持乐观态度。从村民“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谁不盼着家乡变得好呢”等朴实的话语中，可以看出村民对村庄发展越来越好的期待。

### （二）东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村居民都“信任村庄会越来越好”

在表 3.2.4 中比较东西部农村居民的观点，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村民比西部地区村民对村庄前景的态度要乐观一些。西部地区 87.5% 的村民同意“信任村庄会越来越好”的观点，略低于总体状况表中的 88.2%；东部地区 88.9% 的村民都认同“信任村庄会越来越好”这一观点，略高于总体状况表中的 88.2%。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村民对村庄的发展较西部地区村民更为乐观。

## 五、社区归属感小结

社区归属感表现了村民对于村庄的感情和依赖，也表现了对村庄发展的信心，即对目前村庄的认同和对村庄未来发展的期望。对自己农村社区的喜爱和对自己村级事务的关心体现了村民对所在村庄的喜爱程度和关心状况，都表现了对目前村庄现状的关心和认同。“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则表达了村民对村庄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我们村会越来越好”表达了村民对村庄发展的乐观态度以及对村庄发展重要性的认识。

总的来看，农村居民对村庄未来发展的关心和期望程度远远高于对当前村庄现状的关注度。

### （一）对村庄的喜爱程度不高

“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的平均值小于“对未来村庄认同”的平均值，表明村民对于自己村庄的感情抱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对村庄的现状存在一定的不满情绪。而对村庄未来的发展则充满信心。

### （二）对村级事务的关心程度不够

在社区归属感的四个测量指标中，村民对村级事务关心程度的平均值是最低的，但是比社区参与维度中提到的“主动关心村级事务”的程度要高，说明广大村民没有积极主动地关心各项村级事务。但是在内心深处，对村级事务的“潜在的”关注和关心要比“主动关心”的情况多。总体来说，村民对自己村级事务的关心程度明显不足，还有待提高。

## 第三节 合作

合作是指群体成员一起活动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这些目标通常是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而实现的。在合作条件下，彼此之间表现为团结协作、亲密友好的关系，合作是个体间协调作用发挥到最高水平的行为。我们将社区社会资本合作维度的测量具体化为以下5个指标：“与村民的合作”“与村委会的合作”“与政府的合作”“与企业的合作”“与中介组织的合作”。

### 一、与村民的合作

#### （一）村民合作的现状

从表3.3.1的总体状况一栏中，我们看到同意“与村民合作”这一观点的有48.3%，不同意的有34.6%，17%的村民持无所谓态度。

其中在“与村民合作”这一项测量指标中，东部村民中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0.6%、29.8%、29.3%、12.1%和18.3%。

从西部地区一栏中可以看出，56.3%的村民同意“与村民合作”这一观

点, 27.8% 不同意, 15.8%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可见, 农村社区村民之间合作情况不佳。

表 3.3.1 村民之间的合作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8.9	39.4	17.0	25.0	9.6
东部地区	10.6	29.8	18.3	29.3	12.1
西部地区	6.9	49.4	15.8	20.5	7.3

## (二) 村民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3.1 中可以看出有超过 1/3 的村民之间不存在合作, 不管是对于东部地区的村民还是西部地区的村民, 他们之间的合作状况明显不如社区参与的状况积极。在表 3.3.1 中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的态度, 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村民之间的合作更少一些, 仅有 40.4% 的村民与其他村民有合作, 但是西部地区有 56.3% 的村民与其他村民有合作, 可见虽然村民之间的合作较少, 但是西部地区的村民合作状况比东部地区的村民稍好一些。

在实地访谈中, 大部分村民提到村里没有培训机构, 也没有大型经济合作组织, 大家除了务农获得家庭收入外, 外出务工是大部分青壮年的选择, 村民的大量外出务工使得相互之间的联系减弱, 合作行为也相应地减少 (Gao Yue, 2014)。对于之所以选择外出务工, 村庄大多数青年认为当农民“没钱途”。在访谈中, 青年小宋 (26 岁) 告诉我们, “在家种地不如干货车司机, 先是当司机, 挣了钱以后自己买货车跑生意, 我周围的朋友都不想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村里的青壮年男子基本上都外出打工或者自己经营小买卖, 女孩子也愿意在城市或者县城找份清闲的工作, 家里的田地都留给了年迈的父母耕种, 而且很多中年男子一般都是农忙时照顾一下农活, 农闲时外出务工。由此, 农村中关于农作物种植方面的合作就少了。



## 二、与村委会的合作

### (一) 与村委会合作的现状

从表 3.3.2 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 同意“与村委会有合作”这一观点的村民占 30.5%, 多达 46.4% 的村民不同意“与村民会合作”这一观点。

在东部地区, 有 24.3% 的村民同意“与村委会有合作”这一观点, 高达 53.4% 的村民不同意“与村委会有合作”这一观点, 22.2% 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态度。

在西部地区, 37.0% 的村民同意“与村委会有合作”这一观点, 38.9% 的村民不同意“与村委会有合作”这一观点, 24.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表 3.3.2 与村委合作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5.3	25.2	23.1	35.3	11.1
东部地区	4.5	18.9	22.1	39.0	15.5
西部地区	5.7	31.3	24.0	31.9	7.0

### (二) 与村委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3.2 中可以看出村民与村委会的合作较少, 只有不到 1/3 的村民表示“与村委会有合作”, 但有接近半数的村民表示“与村委会没有合作”。与“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合作”情况相比较, “村民与村委会的合作”则更少。对比东西部村民与村委会合作的状况, 西部地区村民与村委会合作的情况要稍微好一点, 东部仅有 23.4% 的村民表示“与村委会有合作”, 而在西部地区有 37.0% 的村民表示“与村委会有合作”。在“与村委会合作”这一项测量指标中, 东部村民中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5%、18.9%、39.0%、15.5% 和 22.1%。总的来看, 在“与村委会合作”这一态度测量中, 持不同意态度的村民 (54.5%) 要远远多于持同意态度

的村民 (23.4%)。可见,大部分村民不愿意“与村委会合作”。其原因主要是村委会为村民们提供生意或项目合作的条件和手段较少,很多村民甚至不知道与村委会能有什么样的经济往来,多数村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用村委会的力量来加强经济合作。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不透明,工作不到位,而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尚未形成,这样就使得村庄在管理机制上出现了断层,村干部不了解村民的真正想法,村民对村干部不够信任,从而使许多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在与村民进行访谈时,有的村民谈道:“村委会私自把村里的土地卖了,村主任上台两年,家里就盖起来二层小别墅。”可见有的村委会工作不透明,个别村干部从中饱私囊,使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下降。

### 三、与政府的合作

#### (一) 与政府合作的现状

从表 3.3.3 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28.4%的村民与政府有合作关系,49.1%的村民与政府无合作关系,22.5%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在“与政府合作”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村民中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5%、17.5%、39.9%、15.8% 和 22.3%。调查结果显示,东部村民对“与政府合作”倾向于持“不同意”的态度,说明村民在与政府合作方面的社会资本存量水平较低。

从西部地区的状况中可以看出,34.2%的西部村民“与政府有合作”,43.4%的西部村民“与政府无合作”。

表 3.3.3 与政府合作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4.9	23.5	22.5	38.1	11.0
东部地区	4.5	17.5	22.3	39.9	15.8
西部地区	4.7	29.5	22.5	37.0	6.4

## （二）与政府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村民与政府的合作较少，近半数的村民表示与政府没有合作，仅有 28.4% 的村民表示“与政府有合作”。相比较村民与村委会的合作情况，村民与政府的合作更少。东西部地区相比较，西部地区村民与政府的合作稍多一些，约有 1/3 的村民表示与政府有合作，而东部地区仅有 22.0% 的村民与政府有合作。

目前，政府对村庄的管理还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村级事务的管理由上级政府部门下达通知或由村委会干部讨论决定，最后通过广播或宣传栏传递给村民，实现村庄治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更为看重的是自己实际获得的利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村民对离自己比较近的村委会并不熟悉或缺乏信任，村民对于政府就更加不了解，就更加谈不上与政府的合作。除此之外，政府对村民的优惠政策也是通过上传下达实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政策的宣传不到位，村民对于很多政策并不了解，对于获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清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错失了许多与政府合作的机会。西部地区虽然经济不发达，但是国家有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因而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村民与政府的合作情况比东部地区稍好。

## 四、与企业的合作

### （一）与企业合作的现状

从表 3.3.4 中可以看出村民与企业有租赁协议的行为，即村民与企业有合作关系。从表 3.3.4 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仅有 27.2% 的村民“与企业有合作”，多达 50.2% 的村民“与企业无合作”。

从表 3.3.4 的中可以看出，对“与企业有租赁协议”这一项测量指标，东部地区村民中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2%、17.9%、41.1%、16.0%、21.9%。可见，东部地区村民对于“与企业有租赁协议”这一测量指标倾向于“不同意”的态度。

从西部地区的状况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有 32.6% 的村民存在“与企业

有合作”关系，而高达 44.2% 的表示“与企业无合作”。

表 3.3.4 与企业合作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4.1	23.1	22.6	39.3	10.9
东部地区	3.2	17.9	22.9	41.1	16.0
西部地区	4.7	27.9	23.2	38.4	5.8

## (二) 与企业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3.4 中可以看出，村民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非常少，过半数的村民与企业没有合作关系，相比较村民与政府的合作情况来看，村民与企业的合作更少。东西部相比较来说西部地区的情况稍微好一点，西部地区有 32.6% 的村民与企业有合作关系，但是东部地区仅有 22.1% 的村民与企业有合作关系。

究其原因，大部分村庄的产业结构是种养殖业，生产手段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结合机械化作业，在生产经营方式上村庄主要依靠小农分散经营，很少有村庄能够有龙头企业带动发展，更缺乏经济合作组织或技术协会等组织来增强村民与企业的合作，多数青壮年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的方式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而不是与企业进行合作 (Gao Yue, 2014)。相比较东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中央对地方专项资金补助向西部地区倾斜，对西部地区农业科技的发展、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农业病虫害防治和救助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西部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投入力度加大，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同时，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促进产业化经营。这一系列举措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前去投资。因此，西部地区村民与企业的合作状况比东部地区村民与企业的合作状况好一些。

## 五、与中介组织的合作

### (一) 与中介组织合作的状况

从表 3.3.5 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仅有 32.3% 的村民“与中介组

织有合作”，多达 46.7% 的村民“与中介组织”没有建立合作关系，21.0% 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在“与中介组织有合作”这一指标中，东部地区村民中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5.6%、21.3%、37.1%、15.4%、20.6。总体来看，有 52.5% 的村民不同意“与中介组织有合作”这一观点，仅有 26.9% 的村民表示同意此观点。

从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 36.8% 的西部村民“与中介组织有合作”，但也有 41.8% 的村民表示“与中介组织无合作”，21.4%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可见，在“与中介组织合作”这一指标的测量中，大部分村民倾向于“不同意”这一观点，即大部分村民“与中介组织无合作”。

表 3.3.5 与中介组织合作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5.5	26.8	21.0	36.1	10.6
东部地区	5.6	21.3	20.6	37.1	15.4
西部地区	4.6	32.2	21.4	35.6	6.2

## (二) 与中介组织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3.5 中可以看出，村民与中介组织的合作关系较少，仅有不到 1/3 的村民与中介组织有合作，这个比例表明，村民“与中介组织的合作”情况比“与政府和村委会的合作”要多，但是不如“村民之间的合作”多。东西部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与中介组织的合作”稍微多一点，有 36.8% 的村民“与中介组织有合作”，但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仅有 26.9% 的表示“与中介组织有合作”。可见，在“与中介组织合作”这一指标测量中，东西部存在明显的差异，且比例均较低。

在实地访谈中,村民们普遍谈到“村里哪有什么中介组织啊”“与政府有啥经济的合作”“咱村里也没有啥企业啊”……由此可见,村民们不是不想搞好经济合作,而是找不到有效合作的途径,农村中介组织较少,也缺乏政策的引导,村民缺乏与之合作的机会。因而,农村还需进一步加强环境的改善,吸引涉农中介组织进入农村社区。

## 六、合作小结

我们可以将合作维度的五个测量指标分为两大类型,即在村庄体系内部进行的合作和在村庄体系外部进行的合作。“与其他村民合作”和“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合作”都是在村庄体系内进行的合作。“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合作”“与企业有租赁协议”“与社会中介组织有合作”这三项测量指标都是在村庄体系外部进行的合作。

### (一) 村民对合作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村民对于合作维度的观点普遍倾向于“不同意”。在五个具体测量指标中,村民对合作的认可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与村民合作、与中介组织合作、与村委会合作、与政府合作、与企业合作。可见,村庄体系内的合作多于村庄体系外的合作。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社区作为一个传统的小团体,村民之间由于地缘和血缘的关系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邻里之间不但有由于地缘而形成的邻里关系,甚至是兄弟姐妹或父子、母子关系,即便农村社区中合作的情况不佳,但这并不影响村民之间的合作。

### (二) 村民严重缺乏与企业的合作

村民与企业合作的信任度平均值倾向于2,是合作维度所有测量指标中最低的。这表明在农村社区里,村民与企业合作这一指标上的社会资本存量最低。虽然,国家实行乡村振兴战略,鼓励企业参与农村的生产经营,并且村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但是村民由于长期受到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缺乏与企业合作的经济行为。

## 第四节 共享

共享即共同分享，是物品或者信息的所有者让渡出使用权或提供服务，使得更多的人能够共同拥有。共享是对农村社区各种闲散资源进行合理利用的有益尝试。我们将“共享”设计了三个具体测量指标，即“与村民分享食物”“与村民共享农具”“与村民共享广告信息”，简单记为“食物共享”“农具共享”和“信息共享”。

### 一、食物共享

#### (一) 食物共享的现状

从表 3.4.1 中可以看出农村社区居民食物共享的状况。从总体状况一栏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多达 82.8% 的村民同意“食物共享”，仅有 6.7% 的村民对此持不同意态度，超过 1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在“与村民分享食物”这一项测量指标中，农村居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比例分别为 32.3%、50.3%、5.9%、1.2% 和 10.3%。

从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有 83.0% 的农村村民同意“食物共享”，有 6.2%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约 1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总体看来，对于“与村民分享食物”这一测量指标，大部分村民持赞同态度，并且多表示“非常同意”这一观点。

表 3.4.1 食物共享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25.7	57.1	10.5	5.8	0.9
东部地区	32.3	50.3	10.3	5.9	1.2
西部地区	18.6	64.4	10.8	5.6	0.6

## （二）食物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农村社区居民对于食物共享的认可程度比较高，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村民同意“食物共享”，但是也有百分之十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或认为无所谓。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对于食物共享的态度可以发现相差不大，分别有十分之一的村民不同意食物共享。这与村民之间的交往程度降低有关，大部分农村居民都忙于外出务工，平时基本是在单位吃集体饭，或是买现成的，很少有做饭的，只有在农忙时才回家集中做农活，基本都是干完农活又急匆匆返回单位务工，根本没有时间互请吃饭。村民只有在传统节日尤其是春节时才会互换食物等物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家对于食物的需要并不迫切，食物共享更多的是一种表示亲近的形式。

## 二、农具共享

### （一）农具共享的现状

从表 3.4.2 中可以看出村民农具共享的状况。从表 3.4.2 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多达 89.4% 的村民同意农具共享，仅有 2.5%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点。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在“农耕用具共享”这一测量指标中，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9.9%、49.2%、1.5%、0.5%、8.7%。

从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有 89.9% 的西部村民同意农具共享，仅有 2.7%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有 7.4%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总体来看，村民对“农耕用具共享”这一测量指标持非常赞同的态度。

在共享维度中，村民之间农具共享程度很高，这是因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耕用具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下分散经营的生产模式决定的，一来大多数农户基本无力购买农耕所需要的全部用具，二来随着青壮年外出务工的增多，土地基本都由留守的老人来耕种，进一步加速了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而农业生产季节性又强，特别是赶上农忙时，几户人甚至一个村庄农具共享的行为就会大量出现。



表 3.4.2 农具共享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32.5	56.9	8.0	2.0	0.5
东部地区	39.9	49.2	8.7	1.5	0.5
西部地区	24.5	65.3	7.4	2.2	0.5

## (二) 农具共享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4.2 中可以看出，有接近 90% 的村民同意农具共享，仅有不到 3% 的村民对此持反对态度，可见村民对于农具共享的态度非常积极，甚至比食物共享更为积极。比较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态度，可以发现大家关于农具共享的态度相差不多，几乎所有村民都对农具共享持赞同态度，但是也有百分之八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在实地访谈时，有部分村民告诉我们“自己并不愿意把贵重农具外借，担心会对农具造成损伤”。归根结底，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变淡，经济理性开始成为村民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使然。

## 三、信息共享

### (一) 信息共享的现状

从表 3.4.3 的总体状况可以看出，农村中赞成信息共享的占 88.5%，不赞成的仅占 2.1%，而 9.2% 的村民觉得无所谓。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在“广告信息共享”这一项测量指标中，农村居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4.3%、52.0%、1.7%、0.8%、11.2%。总体来看，绝大多数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赞成与邻居或者外人共享“打折或者优惠的广告信息”。

从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多达 91.1% 的村民同意信息共享，仅有

1.7%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7.1%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对“打折或者优惠的信息共享”的态度介于“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从总体来看，信息共享的社会资本存量比食物共享多，但是比农具共享少。

表 3.4.3 信息共享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28.0	60.5	9.2	1.6	0.5
东部地区	34.3	52.0	11.2	1.7	0.8
西部地区	21.3	69.8	7.1	1.7	0.8

#### (二) 信息共享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表 3.4.3 中可以看出村民的信息共享状况良好，信息共享的状况要比食物共享的状况好。比较东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信息共享的状况，东西部所有村民几乎都同意这一观点，但是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的信息共享状况更好一些，有超过 90% 的西部地区村民都对“信息共享”持赞同态度，而东部地区有 2.5% 的村民对此持相反态度。由此可见，在信息共享方面东部村民不如西部村民积极。究其原因，西部地区经济落后，大部分农民仍以务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很少外出务工，农民之间的联系频率高；而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民大部分以进城务工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流动性的增加、生产方式的变化、获取信息的途径多样化，以及更重要的经济理性思维的出现导致村民之间的联系变弱。

#### 四、共享小结

在共享行为中，农具共享行为最多，其次是信息共享行为，食物共享行为最少。

首先，作为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中存在着较高的

农具共享行为不足为奇。

其次，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闲散时间几乎不存在，除了几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大家能聚在一起，其他时间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而食物共享的行为相对来说较少。而信息共享行为居于食物共享和农具共享之间，其特殊性表现在信息是非物质资源，是无形的；而食物和农具都是物质资源，是有形的。另外，信息本身具有无偿性、传播迅速的特点，信息共享多不仅是因为农村居民之间联系密切，也与信息是一种不需要居民直接付出金钱交换的无偿资源有关。居民通过无偿的信息共享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比较划算的投资，信息共享行为的增多也表现出居民的更加理性化。

总之，不论是出于感情因素还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较多的共享行为能够表现出村庄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而通过和谐有序的共享行为增强村民之间良好关系，进而增强村民获取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能力，这也是本文研究“共享”问题的一个角度。

## 第五节 互惠

互惠是指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某种资源或帮助时，后者有义务向帮助自己的人提供各种回报。Gouldner（1960）把互惠定义为：“构筑给予帮助和回报义务的道德规范。”在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调查中，我们将互惠这个测量维度操作化为4个具体指标：“农忙时节与村民互换活路”“婚丧嫁娶与村民相互帮忙”“日常生活与邻居互相回报”“村民之间不计报酬帮工帮忙”。接下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详细探讨农村社区的互惠状况。

### 一、农忙互助

#### （一）农忙互助的现状

从表3.5.1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高达90.0%的村民同意农忙互

助，仅有 1.9% 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8.0% 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东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到，在“农忙时节与村民互换活路”这一测量指标中，农村居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9.2%、48.6%、2.0%、0.5% 和 9.6%。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对“农忙时节与村民互换活路”的态度更多是介于 4 和 5 之间，即“非常同意”与“同意”之间。

从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多达 92.4% 的农村居民同意农忙互助这一观点，仅有 1.3% 的村民持不同观点，有 6.3% 的西部村民认为无所谓。

总体来看，农忙互助这一测量指标所包含的社会资本存量非常高。

表 3.5.1 农忙互助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32.3	57.7	8.0	1.6	0.3
东部地区	39.2	48.6	9.6	2.0	0.5
西部地区	24.8	67.6	6.3	1.2	0.1

## (二) 农忙互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农忙互助的赞同人数达到了 90.0%，说明村民对于农忙互助的认同度非常高，但是比较东西部地区农忙互助的态度发现，西部地区的互助情况更好一些，在西部地区有 92.4% 的农村居民同意农忙互助这一观点，东部地区同意此观点的村民比例为 90%。

可见，西部地区村民的互助认同度略高于东部地区，这与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大部分农民仍以务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有关，再加之宗教信仰的缘故，村民之间的团结往往比较紧密。在经济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村民通过农忙时候的互助一来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二来可以减少经济开支，节约成本。而对于东部地区的村民来说，青壮年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对于他们来说，外出务工才是主要工作，家里的田地交由年长的父母照料。另外，此次调查

抽取的是户主，许多户主在农忙时已经外出打工，因此就谈不上农忙互助。

## 二、红白喜事相互帮忙

从表3.5.2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多达94.4%的村民同意婚丧嫁娶相互帮忙。对于“婚丧嫁娶与村民互相回报”这一项测量指标，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6.1%、47.7%、1.2%、0.2%和4.8%。经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可知，东部村民对“婚丧嫁娶与村民互相回报”的平均态度值介于4和5之间，即介于“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从西部地区的数据中可以看出，高达95.3%的西部村民同意婚丧嫁娶相互帮忙，仅有1.3%的西部村民不同意这一点。

可见，村民对“婚丧嫁娶与村民互相回报”的认同度高于互惠维度的其他所有测量指标，这表明农村社区在婚丧嫁娶这一互惠行为上的社会资本存量是最高的。这是因为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社区中，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是农民生命中的大事情，村子里的大部分人甚至在外地打工的一般都会来参加或帮忙捧场。

表 3.5.2 红白喜事相互帮助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41.2	53.2	4.2	1.1	0.2
东部地区	46.1	47.7	4.8	1.2	0.2
西部地区	35.9	59.4	3.5	1.0	0.3

## 三、邻居间互相回报

从表3.5.3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93.7%的村民同意“邻居间互相回报”，仅有4.5%的村民表示无所谓，1.9%的村民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

从东部地区的数据来看，在“邻居间互相回报”这一项测量指标中，村

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3.8%、49.4%、1.6%、0.8%和4.4%。

从西部地区的数据来看，94.2%的西部地区村民同意“邻居间互相回报”，仅有1.4%的西部地区村民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经过数据统计分析，村民对“邻居间互相回报”的态度介于4和5之间，即介于“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总体来看，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认同“邻居间互相回报”。

总体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流动的加速，村民之间的联系逐渐减弱。同时，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先赋性社会关系逐渐松懈，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而发展起来的后致性社会关系，从而使村民基于感情基础而进行的邻居间相互回报的行为有所减弱。但是受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影响，村民在重大节日的时候仍然会去邻居家走动，进行一种仪式上的互相回报行为。

表 3.5.3 邻居间互相回报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36.1	57.6	4.5	1.4	0.5
东部地区	43.8	49.4	4.4	1.6	0.8
西部地区	27.8	66.4	4.4	1.2	0.2

#### 四、不计报酬的帮忙

##### (一) 村民不计报酬帮忙的现状

从表3.5.4的总体状况一栏中可以看出，高达90.7%的村民同意不计报酬帮助别的村民，仅有2.3%的村民不同意这一观点，也有6.9%的村民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东部地区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不计报酬地帮助村民”这一测量指标中，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

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6.6%、50.8%、2.6%、0.4% 和 9.6%。

从西部地区数据中可以看出，多达 94.4% 的西部村民同意不计报酬帮忙，仅有 1.5% 的西部村民不同意这一点。

总体来看，村民对“不计报酬地帮助村民”的调查认同度介于“同意”和“非常同意”之间。

表 3.5.4 不计报酬帮忙的状况 (%)

地区	态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32.4	58.3	6.9	1.9	0.4
东部地区	36.6	50.8	9.6	2.6	0.4
西部地区	27.6	66.8	4.0	1.1	0.4

## (二) 不计报酬帮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达到 90.0% 的村民支持相互之间不计报酬的帮忙。通过比较东西部地区的状况，我们发现村民的态度虽然都达到了 85% 以上，但是西部村民的不计报酬帮忙状况稍微好一点，达到了 94.4%，而东部地区村民对于不计报酬帮忙的认同度还不足 90%。由此可见东部地区村民在“不计报酬帮忙”方面不如西部地区村民积极。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经济不如东部地区发达，社会流动也不如东部地区速度快，加之宗教团体活动促进了村民之间的联系，彼此之间互相帮忙的情况比较多，因此在一些小事上村民更倾向于不计报酬的帮忙。另外，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东部地区村民较西部村民受到更多的经济理性的影响，大家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更倾向于有偿工作。

## 五、互助小结

### (一) 互惠行为分类

我们可以把“互惠”的四项测量指标分为“特殊事件互惠”和“一般行

为互惠”两类。特殊事件互惠包括农忙时节和婚丧嫁娶时的村民互惠行为，一般行为互惠包括邻居间互相回报和村民间不计报酬的帮忙。前二者属于在村民某一特殊事件或某一特定时刻所发生的互惠行为，后二者是随时随地都能发生的互惠行为，所以称之为一般行为互惠。

## （二）互惠行为总结

村民的互惠行为都比较多，但由于村民的经济理性凸显，其互惠行为表现出一定的形式化。通过数据比较我们发现在互惠维度中，认同度从低到高依次是：不计报酬的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农忙时节村民互惠、婚丧嫁娶村民互惠。其中不计报酬的帮忙行为最少，说明利益问题在互惠行为中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互惠行为是相互的，农村社区的互惠行为有一定的形式化，而互惠往往成为维护社会资本过程中的一种“义务”行为。如何保持村民出于情感补偿而进行更多更持久的互惠行为，则是本文考虑互惠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 第六节 信任

信任是建立在双方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以情感内容为维度，一方对另一方持的一种信任的主观态度<sup>①</sup>。在社会科学中，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社会心理学家韦伯将信任分为两类：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和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特殊信任的对象只包括有血缘或裙带关系的人，普遍信任的对象则扩展至相同信仰的所有人。笔者考虑到“信任”维度和“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结构相类似。“差序格局”一词是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旨在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如同水面上泛开的涟漪一般，由自己延伸开去，一圈一圈，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中，与“己”关系越亲近，信任感越强。因此我们确立了基

---

<sup>①</sup> 牛喜霞：《农村土地交易中社会资本的运作研究》，2005年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出版社，第62页。



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熟人信任维度。另外农村还存在着对政府领导、新闻媒体、警察、法官、医生等管理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制度化信任，及对陌生人和大多数人的普遍化信任。我们对信任维度的分析就从这三个维度（“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进行展开。

### 一、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表现为对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制度信任”维度细分的具体测量指标有5项：“信任村委会”“信任乡镇政府”“信任新闻媒体”“信任警察、法官”和“信任医生”。

表 3.6.1 制度信任状况 (%)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相信村领导	15.4	57.2	17.9	7.0	2.5
	相信政府	18.7	59.0	10.5	4.5	1.2
	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13.6	58.4	17.5	8.3	2.2
	相信警察、法官	15.2	60.3	17.6	5.9	1.0
	相信医生	18.0	57.7	17.3	5.8	1.1
东部地区状况	相信村领导	14.0	45.0	27.8	10.0	3.2
	相信政府	18.0	49.3	24.0	6.7	2.0
	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14.0	51.8	23.7	9.0	1.5
	相信警察、法官	13.5	51.3	25.1	8.4	1.6
	相信医生	16.9	56.9	18.4	6.3	1.5
西部地区状况	相信村领导	16.9	69.9	7.7	3.8	1.7
	相信政府	19.4	69.4	8.6	2.2	0.5
	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13.0	65.4	11.0	7.6	3.0
	相信警察、法官	16.9	69.7	9.6	3.3	0.5
	相信医生	19.2	58.7	16.1	5.2	0.7

### （一）制度信任的现状

#### 1. 总体制度信任现状

从表 3.6.1 的总体状况统计来看，对于村委会，72.6% 的村民选择“信任”，9.5%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7.9%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乡镇政府，77.7% 的村民选择“信任”，5.7%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新闻媒体，72.0% 的村民选择“信任”，10.5%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7.5%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警察、法官，75.5% 的村民选择“信任”，6.9%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7.6%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医生，75.7% 的村民选择“信任”，6.9%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7.3%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从总体状况看，东部地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比较高，其次是警察、法官和医生，再次是村委会，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最低。

#### 2. 东部地区制度信任现状

对于“信任村委会”这一项具体指标，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4.0%，45.0%，10.0%、3.2% 和 27.8%。通过计算，村民对于“信任村委会”的平均态度值为 3.566，介于 3 和 4 之间，即“同意”和“无所谓”之间，略微倾向于“同意”。但是数值偏小，所以认为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属于偏低型。

在制度信任测量指标中，村民对医生和政府的信任度偏高。对于“信任医生”这一项测量指标，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6.9%、56.9%、6.3%、1.5% 和 18.4%。经过统计分析，村民对于“信任医生”的平均值为 3.814，介于 3 与 4 之间，即村民对于“信任医生”的认同度介于“同意”与“无所谓”之间，比较倾向“同意”的态度。对比发现，村民对于医生的信任度在制度信任维度所有测量指标中是最高的；对比熟人信任维度中的测量指标，村庄对医生的信任度也仅低于对家人和亲属。这是因为村庄相对于城市医疗条件落后很多，大家普遍对于医生抱有一种比较尊敬的心理，村民出于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负责的心态，对于医生的话言听计从，因此对医生的信任度也会比较高。

对于“信任乡镇政府”这一项具体指标，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

“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8.0%、49.3%、6.7%、2.0% 和 24.0%。总体来看，同意“信任乡镇政府”的村民（67.3%）明显多于不同意（8.7%）的村民。经过统计学测算，村民对于“信任乡镇政府”这一测量指标的平均值为 3.747，介于 3 与 4 之间，即村庄对于“信任乡镇政府”的认同度在“同意”与“无所谓”之间，倾向于“同意”。跟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认同度（3.566）相比，村民对政府信任的认同度（3.747）要高出接近 0.2。这是因为我国广大乡镇政府通过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近期开展“一次性办好”活动以来，政府部门又重新赢得了广大农村群众的信任。

对于“信任新闻媒体”这一项具体指标，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4.0%、51.8%、9.0%、1.5% 和 23.7%，可以看到大部分村民对新闻媒体表现出信任的态度（65.8%）。经过统计学测算，村民对“信任新闻媒体”这个测量指标的平均值达到 3.679，介于 3 与 4 之间，即介于“无所谓”与“同意”之间，但是由于平均值较小，所以广大村民对新闻媒体表现出的信任度并不高。

对于“信任警察、法官”这一项具体指标，村民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和“无所谓”态度的人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3.5%、51.3%、8.4%、1.6% 和 25.1%。经过统计学测算，村民对于“信任警察、法官”的信任度平均值为 3.667，介于 3 与 4 之间，即介于“无所谓”与“同意”之间。但是信任度的数值偏小，村民对警察、法官的信任度偏弱。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发现，村民对新闻媒体和警察、法官的信任度在 3.6 左右。

### 3. 西部地区制度信任现状

从表 3.6.1 的西部地区制度信任状况来看，对于村委会，86.8% 的村民选择信任，5.5%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7.7%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乡镇政府，88.8% 的村民选择信任，2.7%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8.6%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新闻媒体，78.4% 的村民选择信任，10.6%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1.0%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警察和法官，86.6% 的村民选择信任，3.8%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9.6% 的村民认为无所谓；对于医生，77.9% 的村民选择信任医，

5.9%的村民选择不信任医, 16.1%的村民认为无所谓。通过对比可以看出, 西部地区的村民对政府和警察、法官的信任度最高, 其次是医生和村委会, 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最低。

## (二) 制度信任中的问题

### 1. 村民对新闻和村委会的信任度偏低

比较总体状况和东西部状况可以得知村民对于新闻的信任度不足, 仅有72.0%的村民表示信任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但是有10.5%的村民明确表示不信任国内媒体上的新闻。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度也仅有72.6%, 但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占9.5%, 可见村民对于国内媒体上的新闻和村委会的信任度偏低。相比较而言, 村民总体上来说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 77.7%的村民表示信任政府, 仅有5.7%的村民对此持反对意见。

### 2. 东部地区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度偏低

从表3.6.1的东部状况中我们可以看到, 村民对于村委会的信任度最低, 仅有不足60%的村民表示信任村委会, 13.2%的村民表示不信任村委会。比较东西部地区的状况, 西部地区有86.8%的村民表示信任村委会, 仅有5.5%的西部村民对此持反对意见, 可知东部地区的村民严重缺乏对村委会的信任。

### 3. 西部地区村民对新闻和医生的信任度偏低

对比表3.6.1的东西部地区状况可知, 西部地区的村民对于制度信任比东部地区稍高, 但是比较西部地区的状况可知, 西部地区村民对于新闻和医生的信任度偏低, 都有不足80%的村民表示信任新闻和医生, 但是西部村民对于政府、村委会和警察、法官的信任度都达到了80%以上。可见相比较来说, 村民对新闻和医生的信任度偏低。

## (三) 村民制度信任不足的原因

### 1. 领导方式自上而下

村民平时接触得较多的领导班子就是村委会, 但是现在的治理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 而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与村委会的联系较少, 会出现村民对一些政策不了解、与村委会的沟通渠道不畅通等情况, 加之在一个村庄中村民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 一些对于村委会不满的情绪会扩大化, 更加剧了村民对村委会的

不满。尤其是对于东部地区的村民来说，信息接受量更大，有时对于领导阶层的人有着更激进的想法。

## 2. 传媒发展的影响

村民对于新闻的信任度较低，现在的传媒业发展迅速，各种负面消息和相互矛盾的言论层出不穷，降低了村民的信任感。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社会流动较快，东部地区的村民能够接收的各种信息更多，良莠不齐的新闻信息使得村民对于新闻的信任感偏低，尤其是对于东部地区的村民来说新闻就更加的不可信。

## 3. 发展水平的影响

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比西部地区迅速，东部地区村民对于村庄和社会的要求更高一些，想法也要更为激进一点，表现形式上是东部地区村民对于制度的信任不如西部地区村民对制度的信任强烈。但是对于西部地区村民对各种制度的信任来说，村民对于医生的信任偏低，这与西部地区医疗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有关，村民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因此对于医生的信任不足。

# 二、熟人信任

“熟人社会”一般是指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民间有“找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熟人信任是基于这种血缘关系、姻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等亲近关系网基础上而形成的信任感。我们设计了4项测量熟人信任的指标：信任家人、信任亲戚、信任邻居保管钥匙、信任外人帮忙读信。根据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理论，村民对此四项指标的信任度从高到低应为：信任家人、信任近亲人、信任邻居、信外人。

## （一）熟人信任的现状

### 1. 总体熟人信任现状

从表3.6.2的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对待家人，93.8%的村民选择信任，1.8%的村民选择不信任，4.5%的村民选择无所谓；对待亲戚，88.7%的村民选择信任，2.7%的村民选择不信任，8.5%的村民选择无所谓；对待邻居，

76.2%的村民表示外出时可以把钥匙交给邻居保管, 10.5%的村民对此选择不信任, 13.3%的村民认为无所谓; 对待外人, 73.9%的村民选择信任外人帮忙读信, 10.9%的村民选择, 15.1%的村民表示无所谓。从总体状况来看, 村民对找外人和邻居的信任度较低, 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度较高。

表 3.6.2 熟人信任的状况 (%)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信家人	37.3	56.5	4.5	1.5	0.3
	信亲戚	30.7	58.0	8.5	2.3	0.4
	外出时, 钥匙会交邻居保管	18.1	58.1	13.3	9.1	1.4
	找人帮忙看信	15.7	58.2	15.1	5.8	5.1
东部地区状况	信家人	45.3	47.6	5.7	1.2	0.4
	信亲戚	35.0	51.6	10.5	2.4	0.6
	外出时, 钥匙会交邻居保管	20.6	51.8	14.4	11.2	2.0
	找人帮忙看信	16.1	49.0	16.8	8.5	9.7
西部地区状况	信家人	28.8	66.1	3.2	1.8	0.2
	信亲戚	26.1	65.0	6.4	2.2	0.2
	外出时, 钥匙会交邻居保管	15.3	64.9	12.3	6.8	0.7
	找人帮忙看信	15.2	68.0	13.4	2.8	0.6

## 2. 东部地区村民熟人信任的现状

从表 3.6.2 熟人信任状况中, 我们看出东部地区村民对家人和亲人的信任度最高。在“信任家人”这一项测量指标中, 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45.3%、47.6%、1.2%、0.4% 和 5.7%。经过统计学测算, 村民对于“信任家人”的平均态度值为 4.362, 介于 4 于 5 之间, 即介于“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 倾向于“同意”。总体来看, 绝大多数村民对于家人都持信任的态度。在“信任亲戚”这一项测量指标中, 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35.0%、51.6%、2.4%、0.6%、10.5%。

经过统计学测算, 村民对于“信任亲戚”的平均态度值为 4.178, 介于 4 与 5 之间, 即在“同意”与“非常同意”之间, 倾向于“同意”, 但是略低于对家人的信任。在“信任邻居保管钥匙”这项测量指标中, 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0.6%、51.8%、11.2%、2.0%、14.4%。经过统计学测算, 村民对“信任邻居保管钥匙”的平均态度值为 3.777, 介于 3 与 4 之间, 较为接近于 4, 即介于“无所谓”和“同意”之间, 更为倾向于“同意”的态度。村民对邻居信任感比对家人和近亲要低。曾几何时, 农村信奉“远亲不如近邻”, 邻居外出都会相互托付家门钥匙, 但城镇化打破了农村社区封闭的环境, 农村流动人口也多了起来, 村民们对邻居的信任感大大降低。在“信任外人帮忙读信”这一项测量指标中, 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6.1%、49.0%、8.5%、9.7%、16.8%。经过统计学测算, 村民对“信任外人帮忙读信”的平均态度值为 3.532, 介于 3 与 4 之间, 即介于“无所谓”与“同意”之间。村庄对“信任外人帮忙读信”表现出了“无所谓”的漠视态度, 原因耐人寻味: 近年来, 农村的教育水平逐渐提高, 村里文盲越来越少, 尤其是我们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户主, 青壮年居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 再加上电视、手机、网络等社交媒体的普及, 在客观上很少需要别人去帮忙读信。

### 3. 西部地区村民熟人信任的现状

从表 3.6.2 的西部地区状况中可以看出, 对待家人, 94.9% 的西部村民选择信任, 2.0%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 3.2% 的村民表示无所谓; 对待亲戚, 91.1% 的西部村民选择信任, 2.4%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 6.4% 的村民表示无所谓; 对待邻居, 80.2% 的西部村民选择可以把钥匙交给邻居保管, 7.5% 的村民对此表示不信任, 12.3% 的认为无所谓; 对待外人, 83.2% 的西部村民选择信任外人帮忙读信, 3.4%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 13.4% 的村民表示无所谓。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我们发现, 和东部村民一样, 西部村民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度最高, 但是西部地区村民对邻居和外人的信任度要高于东部地区。

## （二）熟人信任的问题

### 1. 村民对邻居信任不足

从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村民对家人的信任度最高，已经超过了90%的村民表示信任家人，其次是对亲戚的信任比较高，但是对于邻居的信任和对同村识字村民的信任偏低，仅有不到80%的村民表示外出时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时遇到不认识的字会请同村人帮忙看信，这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的形式，村民对于和自己关系较近的人表现出较强的信任，这种信任随着他们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不同，村民对邻居的信任明显不如对家人和亲戚的信任。

### 2. 东部地区村民对帮忙看信的信任度最低

东部地区仅有65.1%的村民同意看信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时会找识字的人帮忙，而西部地区的村民有高达83.2%的村民同意帮忙看信，可见东部地区的村民对信任外人帮忙看信的信任度更低。在东部地区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在信任家人、信任亲戚、外出让邻居帮忙保管钥匙和找人看信这四项中，村民对于信任外人帮忙看信的信任度最低，其次是让邻居帮忙保管钥匙。

### 3. 东部地区村民的熟人信任不如西部地区村民强烈

东部地区有92.9%的村民表示信任家人，西部地区却有94.9%的村民表示信任家人；东部地区有86.6%的村民表示信任亲戚，而西部地区有91.1%的村民表示信任亲戚；东部地区有72.4%的村民表示钥匙能够放心交给邻居保管，而西部地区有80.2%的村民表示同意这一点；东部地区有65.1%的村民表示能够请人帮忙看信，西部地区有83.2%的村民表示同意这一点。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对家人、亲戚、邻居、同村识字人的信任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村民对这些人的信任不如西部地区村民强烈。

## （三）熟人信任不足的原因

### 1. 差序格局的规律

费孝通先生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就如同一颗小石子落入水面，波纹由石子中间一圈一圈晕开，人们按自己距离别人的远近来划分亲疏，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所以村民对于熟人信任的表现就是最信任家人，其次是信任亲戚，最后才是对邻居和同村识字人的信任。



## 2. 文化程度的影响

东部地区村民对于请人帮忙看信的信任度比西部地区村民的同等行为要少，这与村民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东部地区发展比西部地区迅速，教育水平也比西部地区先进，识字的村民相对来说较多，因此也就不需要请别人帮忙看信。

## 3. 社会流动的影响

对比东西部农村居民的熟人信任，我们发现西部地区更为信任熟人，这与西部地区村民的感情交往比较密切有一定关系。西部地区村民生活较为封闭，对于本村人有较为强烈的感情，同时也较为排斥外村人，但是东部地区的村民多数会外出务工，社会流动较为迅速，对同村人的感情逐渐淡薄，同时接受的新事物较多，思考问题更为复杂，对熟人的信任度就降低了。

## 三、普遍信任

普遍信任表现为社会中个体对陌生人及大多数人的信任。在研究中，我们设计的测量普遍信任的指标有 2 个：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仅是对普遍信任的一种态度。而“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是一种在普遍信任基础上所采取的行为。

表 3.6.3 普遍信任的状况 (%)

地区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5	4	3	2	1
总体状况	信陌生人	10.2	39.7	23.0	25.4	1.7
	信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13.4	69.0	10.5	5.7	1.4
东部地区状况	信陌生人	11.4	53.5	22.3	10.6	2.2
	信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17.7	63.1	15.1	3.1	1.1
西部地区状况	信陌生人	9.0	25.4	23.5	41.0	1.1
	信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8.9	75.3	5.6	8.4	1.8

### （一）普遍信任的现状

从表 3.6.3 的总体状况中可以看出，对于陌生人，49.9% 的村民选择信任，会向陌生人提供帮助，27.1%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23.0% 的村民选择无所谓；对于大多数人，82.4% 的村民选择认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7.1%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10.5% 的村民选择无所谓。总体来看，90% 以上的村民还是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但是对于陌生人，信任度要小很多。

从东部地区的表来看，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项测量指标，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7.7%、63.1%、3.1%、1.1%、15.1%。总体看来，绝大多数村民（80%）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项测量指标持赞同态度。对于“信任陌生人”这一项测量指标持“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很不同意”“无所谓”态度的村民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1.4%、53.5%、10.6%、2.2%、22.3%。经过统计学测算，对于“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的平均态度值为 3.614，介于 3 与 4 之间，即介于“无所谓”与“同意”之间，但是对于“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的平均值较低。

从西部地区的表中可以看出，对于陌生人，34.4% 的村民选择信任，会向陌生人提供帮助，42.1%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23.5% 的村民选择无所谓；对于大多数人，84.2% 的村民选择认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10.2% 的村民选择不信任，5.6% 的村民选择无所谓。通过数据比对，东部地区的村民比西部地区更易信任陌生人，也更易信任社会上大多数人。总体上看，东西部地区村民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值都较低。

### （二）普遍信任的问题

由表 3.6.3 的总体状况可知，村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非常低，仅有不到 50% 的村民表示愿意信任陌生人，但是不愿意信任陌生人的人数已经占到了被调查总人数的 25% 以上。对比东西部地区村民对于陌生人的信任，西部地区村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不如东部地区村民的信任度高，西部地区仅有 34.4% 的村民愿意信任陌生人，却有 42.1% 的村民表示遇到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时自己不会信任他们，但是东部地区有 64.9% 的村民表示自己愿意信任陌生人，

这个比例偏低，但是可以表明东部地区村民对于陌生人比西部地区村民的信任感强。

### （三）普遍信任不足的原因

由表 3.6.3 中可以得出村民普遍信任感不强的结论，尤其是村民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是这些信任中最低的一项，如今的社会信息流动非常迅速，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村民对于普遍信任也严重不足，尽管有超过 80% 的村民表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可信的，但是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度却严重偏低，村民出于对自己保护的原因，在面临陌生人的求助时持自己的不信任感。

比较东西部地区村民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村民更不容易信任陌生人，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社会流动较快，村民见到的外来人口更多有一定的关系。而西部地区的村民生活相对来说较封闭，他们对于自己村里的熟人更为信任，但对于陌生人的信任不如东部地区的村民接受度高。

## 四、信任小结

在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信任维度中，村民信任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家人和近亲、熟人信任、制度信任、陌生人的信任。其中对于陌生人和村委会的信任严重不足。

### （一）熟人信任强度表现为“差序格局”

熟人信任强度表现为差序格局，村民对自己家人和近亲的信任度较高，但是对邻居及村里其他人的信任度较低。在“信任”维度中，村民对信任家人这项测量指标的认同度是最高的，可见在信任家人方面的社会资本存量最高。这符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于家人的信任度是最高的，其次是对近亲的信任度也比较高，可见“熟人关系”是中国人组织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但是相对于对家人和近亲的信任来说村民对于村里其他人的信任度较低，如何提升村民对村里其他人的信任，从而促进村庄整体信任度的上升是本文思考信任问题的一个方面。

### （二）制度信任偏低，对村委会的信任严重不足

制度信任主要表现为对村委会、政府、国内媒体上的新闻、警察、法院和

法官、医生的信任。在制度信任中，村民对这些测量指标的认同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信任医生，信任政府，信任国内媒体上的新闻，信任警察、法院和法官，信任村委会。其中村民对医生和政府的信任度在制度信任中比较高，这与医生和政府的权威有关，但是现在社会上报道了越来越多医生与百姓、政府与百姓的矛盾，出于一种义愤的心理，村民对于医生和政府的信任仅是在制度信任中偏高，但是还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的信任值。在制度信任中，村民对于国内媒体上的信任度和对警察、法院、法官的信任度仅比对村委会的信任度高一点，低于对医生和对政府的信任度，村民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媒体新闻和警察、法院、法官，这种熟悉是听在耳里的，除非村民需要用到这些机构，否则这些机构对于村民的影响比较间接，远远没有与医生的关系来的亲密，因为不能详细真实地了解而对他们的信任处于偏低的认同。对村委会的信任强烈偏低，不论是对村委会的信任还是对村民与村委会的合作都呈现出比较低的认同度，这说明村委会在平时的工作中没有发挥先锋带头的作用，或者是村委会的工作没有被村民认同和接纳，村民对村委会的公正性存在质疑，也不清楚村委会的工作流程，村委会没有在工作中做到“透明”，村民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心理会对村委会的信任产生怀疑。

### （三）普遍信任态度积极但行为不足

普遍信任包括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帮助，对比熟人信任和制度信任的测量指标，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的认同度仅低于对家人和近亲的信任，高于制度信任维度中的任意一项测量指标，这说明村庄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的认同度是较高的，村民还保持着传统农村乐善好施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观念上就是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可信的”，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抱有一种比较信任的乐观态度。但是村民对于帮助向自己求助的陌生人表现出一定的戒备心理，在行为上没有达到非常积极的态度，远远低于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感。这与村民的生活特点有一定的关系，村庄发展表现为一种比较排外的态度，在村庄内村民之间彼此了解，信任感会比较强烈，但对于不了解的陌生人的信任感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尤其是随着近年来社会流动的越来越快，往来于村庄里的陌生人也越来越多，不排除

有些陌生人会使用一些诈骗技巧去获取个人利益，村民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也会对向求助于自己的陌生人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 第七节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及整体状况

### 一、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结构<sup>①</sup>

首先，我们对前述的6维度38项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结果发现“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在0.4以上，其他均在0.3以下；“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和“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个为0.369，其它均小于0.3；“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没有大于0.3的；“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与其他指标的相关系数只有一项为0.328。为此，在进一步的因子分析中予以剔除。

接下来，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33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了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结果见碎石图（图3.7.1）。从图3.7.1中可以看到，有9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用F1、F2、F3、F4、F5、F6、F7、F8和F9来表示（参见表3.7.1）。从表3.7.1中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公因子方差）除“我们村会越来越好”（0.438）、“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0.419）和“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0.402）以外，都达到0.5以上。9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1%。KMO检验值为0.861，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达到26061.624（ $p=0.000 < 0.001$ ），说明这些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

<sup>①</sup> 牛喜霞等：《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70—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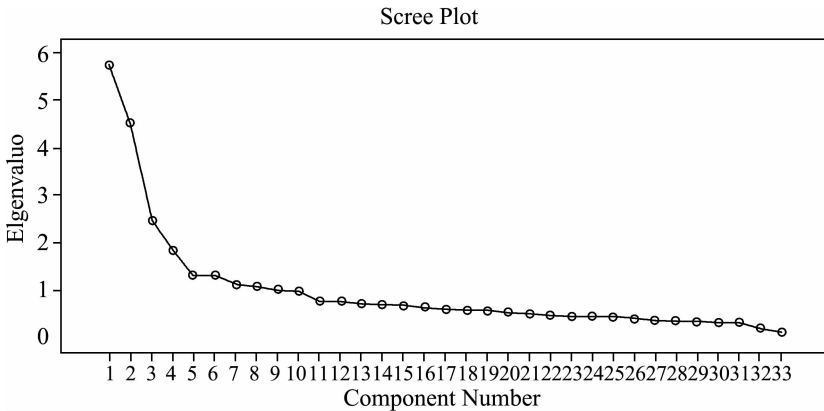


图 3.7.1 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后的碎石图

“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合作项目”“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合作”“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合作”5项指标对F1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57、0.824、0.920、0.916和0.856，说明此5项指标很好地代表了F1。这5项指标都反映了村民与不同主体有经济上的往来。因此我们将F1命名为“合作”因子（参见表3.7.1）。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我家买了农耕用具（小四轮），会免费让邻居使用”“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会告诉我认识的人”“农忙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4项指标对F2的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740、0.783、0.712和0.658。这4项指标反映了邻里之间对食物、农具、信息等的分享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共享”（参见表3.7.1）。

“红白喜事时，常常与其他村民互相帮助”“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3项指标对F3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503、0.531和0.507。这3项指标表达了邻里之间的相互报偿，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互惠”（参见表3.7.1）。

“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和“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这2项因子对F4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0.823和0.619。这2项指标更多地反映了村民为实现个人的某种诉求或发挥某种特长而参与社区活动，我们将此

因子命名为“特殊社区参与”（参见表 3.7.1）。

“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这 4 项指标对 F5 负荷值最高，分别达到了 0.538、0.715、0.777、0.684。这 4 项指标更多地表达了村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如社区发展、社区卫生等）的关心，以及村民是从社区公共人的角度参与到社区日常事务之中的，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一般社区参与”（参见表 3.7.1）。

F6 对应着“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和“我们村会越来越好”，其负荷值分别为 0.713、0.775、0.568 和 0.548。这 4 项指标均反映出村民对自己所生活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故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社区归属感”（参见表 3.7.1）。

F7 对应着“相信我家人说的话”“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外出时，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其因子负荷值分别为 0.667、0.649、0.711 和 0.769。这 4 项指标反映出村民对于家人、亲戚、邻居等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熟人信任”（参见表 3.7.1）。

F8 对应着“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法官/法院”“相信医生”，其负荷值分别为 0.651、0.763、0.520、0.765、0.667。这 5 项指标表达了村民对于政府、体制内从业人员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制度信任”（参见表 3.7.1）。

F9 对应着“社会上的大多数是基本可信的”和“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2 项指标，其负荷值分别是 0.736 和 0.683。反映出村民对于陌生人和社会上的不确定主体的信任程度，我们将此因子命名为“普遍信任”（参见表 3.7.1）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存量在结构上由 9 个因子组成：合作、共享、互惠、特殊社区参与、一般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如前所述，国内外关于社区社会资本测量的探讨，我们发现这些测量维度都离不开“网络”“信任”“参与”“互惠”“合作”“共

享”等指标，且当前学者们都是基于集体层面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我们结合以上学者（赵延东，2006；桂勇、黄荣贵，2008；裴志军，2010）的观点，主要是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6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我们将原来“社区参与”维度细分为“一般社区参与”和“特殊社区参与”两个维度，将“信任”维度细分为“制度信任”“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三个维度，从而形成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九种结构维度。

表 3.7.1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因子分析结果

测量项目	提出的因子									共同度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X1 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0.071	-0.061	-0.01	0.823	0.169	-0.017	-0.033	0.136	-0.035	0.735
X2 参与村级活动	0.363	0.043	-0.059	0.619	0.241	0.061	0.267	0.121	-0.11	0.680
X3 免费为村务出力	-0.048	0.108	0.166	0.404	0.538	0.123	-0.086	0.062	0.043	0.522
X4 主动关心村务	0.077	0.012	-0.042	0.183	0.715	0.144	0.006	0.062	0.094	0.585
X5 无偿为村务献计献策	0.120	0.026	-0.032	0.039	0.777	0.117	0.123	0.083	0.074	0.662
X6 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0.093	0.077	0.06	-0.007	0.684	-0.021	0.103	0.121	-0.032	0.513
X7 本村的发展很重要	-0.037	0.123	0.1	0.042	0.033	0.713	0.037	0.094	0.001	0.548
X8 喜欢自己所在的社区	-0.038	0.133	0.112	0.01	0.078	0.775	0.047	0.237	0.004	0.697
X9 关心本村事务	0.146	0.014	-0.031	0.108	0.356	0.568	0.158	0.077	0.237	0.570
X10 村会越来越好	0.061	0.168	0.233	-0.079	0.073	0.548	-0.097	0.119	0.126	0.438
X11 与村民合作	0.757	-0.075	0.012	0.124	0.094	0.051	0.111	-0.033	0.123	0.634
X12 与村委会合作	0.824	-0.055	-0.031	0.051	0.074	0.034	0.079	0.015	-0.026	0.699
X13 与政府合作	0.920	-0.035	-0.054	0.027	0.048	-0.001	0.041	0.03	-0.048	0.859
X14 与企业合作	0.916	0.007	-0.067	0.021	0.054	-0.007	0.046	0.041	-0.063	0.855
X15 与中介组织合作	0.856	0.082	-0.069	0.019	0.035	-0.034	0.064	0.025	-0.044	0.754
X16 邻居之间食物共享	-0.022	0.740	0.002	-0.142	0.188	0.161	0.015	0.107	-0.081	0.648
X17 邻居之间农具共享	-0.051	0.783	0.076	-0.044	0.019	0.151	-0.003	0.095	-0.022	0.656
X18 邻居之间信息共享	0.027	0.712	0.191	0.037	0.038	-0.009	0.061	0.022	0.078	0.558
X19 农忙互助	0.011	0.658	0.338	0.138	-0.02	0.107	0.049	0.049	0.162	0.609
X20 红白喜事相互帮助	-0.085	0.487	0.503	0.066	-0.058	0.168	0.081	-0.075	0.251	0.608
X21 邻居间互相回报	0.009	0.191	0.531	0.113	-0.112	0.054	0.177	-0.069	0.189	0.419
X22 不计报酬为村民提供帮助	-0.041	0.293	0.507	0.084	-0.005	0.167	0.118	0.007	0.092	0.402



续表

测量项目	提出的因子									共同度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X23 信家人	-0.16	0.222	-0.085	-0.09	0.079	0.13	0.667	0.217	-0.012	0.606
X24 信亲戚	-0.058	-0.047	-0.070	-0.187	0.179	0.077	0.649	0.293	-0.18	0.624
X25 外出时, 钥匙会 交邻居保管	0.156	-0.018	0.261	0.008	0.147	-0.037	0.711	0.074	0.162	0.654
X26 找人帮忙看信	0.207	0.161	-0.080	0.053	0.069	0.107	0.769	0.192	-0.099	0.732
X27 信村领导	-0.003	0.052	-0.046	0.051	0.158	0.181	0.338	0.651	-0.059	0.607
X28 信政府	0.01	0.095	0.143	0.059	0.127	0.193	0.058	0.763	0.069	0.677
X29 信新闻	0.138	-0.076	0.073	0.094	0.098	0.047	-0.009	0.520	0.528	0.600
X30 信警察	0.011	0.059	0.031	0.099	0.112	0.07	0.109	0.765	0.187	0.664
X31 信医生	0.025	0.082	0.112	0.024	-0.028	0.095	-0.073	0.667	0.226	0.532
X32 信陌生人	-0.022	0.010	0.058	-0.017	0.105	0.061	0.031	0.215	0.736	0.535
X33 信社会上大多数人	-0.098	0.149	0.052	-0.096	0.016	0.102	0.007	0.120	0.683	0.609
特征值	5.738	2.465	1.328	1.025	1.852	1.323	1.081	4.532	1.149	
方差贡献率	17.387	7.469	4.023	3.107	5.613	4.008	3.277	13.735	3.481	
累计方差贡献率	17.387	24.856	28.879	31.986	37.599	41.607	44.884	58.619	62.10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说明: 因子含义: Factor1 = 合作; Factor2 = 共享; Factor3 = 互惠; Factor4 = 特殊社区参与; Factor5 = 一般社区参与; Factor6 = 社区归属感; Factor7 = 熟人信任; Factor8 = 制度信任; Factor9 = 普遍信任。)

## 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

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以9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 9个新因子也作了同样的转换, 其基本分布状况见表3.7.2。

表 3.7.2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

	合作	共享	互惠	特殊参与	一般参与	社区归属感	熟人信任	制度信任	普遍信任	社区社会资本整体状况
Mean	52.59	42.83	38.57	25.37	26.70	29.22	56.88	23.23	16.05	40.09
S. D	20.99	12.40	10.28	6.99	7.38	6.67	10.25	7.27	3.34	13.48

从表3.7.2中可以看出,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状况水平偏低 (Mean

=40.09, S. D = 13.48), 其中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社区归属感、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程度分别为 52.59 (S. D = 20.99)、42.83 (S. D = 12.40) 38.57 (S. D = 10.28)、25.37 (S. D = 6.99)、26.70 (S. D = 7.38)、29.22 (S. D = 6.67)、56.88 (S. D = 10.25)、23.23 (S. D = 7.27)、16.05 (S. D = 3.34)。这一结果表明, 农村社区保持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 其次为共享和互惠, 再其次为社区归属感、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和制度信任, 而普遍信任程度最低, 并且合作的差异性最大, 普遍信任的离散性最小。

##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 本研究发现,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总体不足。其中虽然互惠和共享行为较多, 但是表现出一定的形式化; 社区参与不足, 其中特殊社区参与严重不足, 村庄缺少集体活动, 村民的脑力参与缺乏; 村庄的社区归属感情况不理想, 村民对村庄的感情小于对村庄发展的态度; 村庄中严重缺乏合作, 村民与企业的合作最少, 其次是与政府、村委、社会中介组织的合作较少; 村庄的信任感表现出差序格局, 村民对家人和近亲的信任最强, 但是村民的制度信任较差, 其中对村领导的信任最差, 此外, 村民对陌生人的信任感较低。村庄的自然特征和人口变量对村庄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第一, 有无宗教信仰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明显, 表现为有宗教信仰的村庄在合作、共享、特殊参与、一般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无宗教信仰的村庄。第二, 不同民族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明显, 表现为汉族村落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少数民族村落, 而在其他方面汉族村落却显著低于少数民族村落。第三, 不同地区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

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如山东)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如陕甘宁)的村庄,而在特殊参与、一般参与和社区归属方面却显著低于西部地区的村庄。第四,不同年龄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60岁以下人口占主体的村庄在合作、互惠、一般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而在共享、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其他方面却显著低于60岁以上人口占主体的村庄。第五,家庭年打工收入不同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熟人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上的村庄在合作、共享、互惠、特殊参与和普遍信任方面显著高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而在一般参与、社区归属和制度信任方面却显著低于家庭年打工收入2万元以下的村庄。第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同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差异显著,表现为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而在其他方面却显著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5年以下的村庄。

总体上看,农村社区存在大量可利用的社会资本,有些社会资本是可以看到的,如社区归属感、共享等;而有些社会资本在表面上看来是欠缺的,如合作、信任。但是这些欠缺的社会资本并不是不存在的,而是隐藏起来,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即使可以看到的社会资本,也并不是被充分利用起来了。村民对社区参与的积极性、对社区强烈的归属感是行动的动力,会促使村民为自己所在的农村社区,也为自己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村民之间的信任感是村民合作的黏合剂,而互惠和共享行为是增加村民之间感情、培养良好人际关系的手段和途径。

东部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以山东为例,农村社区中村民的共享和互惠行为虽然比较多,但是共享和互惠的行为却表现出一定的形式化,是村民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交换行为。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信任等方面存在不足:社区参与不足,其中特殊社区参与严重不足,村庄缺少集体活动,村民的脑力参与不如村民的体力参与积极;村庄的社区归属感情况不理想,村民虽然

对村庄未来的发展持有乐观态度，但是比较来说，村民对村庄的感情较低；村庄中整体合作情况不佳，村民与企业的合作最少，其次是与政府、村委会、社会中介组织的合作较少；村庄的信任感表现出差序格局，村民对家人和近亲的信任度最高，但是村民的制度信任较差，其中对村领导的信任最差，此外，村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整体来说，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较低。

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都是村民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们都是农村社区中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对它们的合理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村民的积极性，使村民充满干劲地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经济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又会增强村民的社区参与度、社区归属感、合作行为、共享行为、互惠行为以及信任感，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

## 第四章 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分析

研究表明，一方面，农村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等个体因素和人口数量、结构、社会地位等家庭因素影响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和维系，另一方面，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转型，既深刻影响着村落经济、政治、文化、宗族结构的发展和变迁，又一同构成当代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变迁和重构的深层社会根源。

### 第一节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村民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是首要的，它包括个体的先赋因素和个体的后致因素。先赋因素包括个体的家庭出身、年龄和性别，而个体的后致因素包括个体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下面分别详细做一下说明：

#### 一、个人生活环境

个人生活环境是指一个人出生时就拥有的家族和亲属网络，这是先赋因素，不受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在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依据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内生的。有的人出生在大家族，那么他在社会资本的获得中，来自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支持就多。家庭出身对个体社会资本影响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家庭原有的社会关系状况（包括血缘关系、姻亲关系等）和辈分。家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个体社会交往的基础，也是

个体最可利用的社会资本。而辈分则决定个体在宗族关系中地位，一般来说，辈分越高，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也越广泛。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基层结构<sup>①</sup>。“差序格局”形象地概括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sup>②</sup>。“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推移的，表明了自己和他人关系的亲疏远近。由此，受“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在乡村社会中有着很高的熟人信任和合作，但村民对于外人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

## 二、年龄

从对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影响来看，年龄大于60岁的农户要比年龄小于60岁的农户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与社会关系的积累不无关系，但不能简单说社会资本与年龄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为这毕竟是基于二分变量的分析，例如，高龄老人的社会资本高但从经验来说肯定是要减少的，他们除了通过家庭成员获得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外，通过寻求社会关系获得资源的可能性较小。一个家庭或个人的社会资本性质与数量与本人或户主年龄的关系往往表现在交往对象中。比如说，老一辈人更喜欢传统的社会交往网络，而年轻人更愿意选择新的社会关系网：同学、玩伴、工友等。当然，受身体机能的改变、文化水平及与人接触和交往频次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村民，其社会资本的结构和水平有着很大不同。

表 4.1.1 年龄与社会资本

	社会网 规模	咨询网 网差	情感网 网差	劳力网 网差	信任网 网差	借钱 网差	咨询网 网顶	情感网 网顶	劳力网 网顶	信任网 网顶	借钱 网顶
15—20岁	7.8	2.8	2.2	2.8	2.4	2	3.4	2.4	3.4	2.4	2.6
T值	9.75***	2.89**	1.90**	2.89**	2.14**	2.11**	3.30**	2.14**	3.30**	2.14**	2.08**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续表

	社会网 规模	咨询网 网差	情感网 网差	劳力网 网差	信任网 网差	借钱 网差	咨询网 网顶	情感网 网顶	劳力网 网顶	信任网 网顶	借钱 网顶
21—25岁	9.182	0.957	0.733	0.622	0.333	1.2	1.022	0.9111	0.6889	0.381	0.8
T值	10.01***	4.44***	3.77***	3.25***	2.40***	2.12***	4.63***	4.28***	3.43***	2.57***	3.58***
26—30岁	5.872	0.528	0.432	0.595	0.371	0.5	0.732	0.712	0.8095	0.621	0.85
T值	12.17***	5.04***	4.32***	4.68***	3.55***	4.78***	5.43***	5.16***	5.40***	4.40***	5.72***
31—40岁	6.29	0.419	0.276	0.364	0.174	0.4	0.447	0.3101	0.4091	0.208	0.43
T值	29.27***	7.32***	6.33***	6.93***	4.81***	7.06***	7.65***	6.72***	7.38***	5.33***	7.34***
41—50岁	8.029	0.805	0.378	0.444	0.274	0.7	0.872	0.4979	0.5088	0.369	0.93
T值	45.13***	11.36***	7.57***	8.63***	6.39***	10.53***	11.85***	8.56***	9.09***	7.16***	12.06***
51—60岁	8.253	1.031	0.48	0.608	0.291	0.8	1.099	0.5423	0.6453	0.372	1.02
T值	40.27***	10.65***	7.11***	8.03***	5.36***	9.04***	11.12***	7.84***	8.32***	6.20***	10.53***
60岁以上	8.355	1.101	0.436	0.663	0.284	0.8	1.144	0.511	0.7303	0.384	1.04
T值	31.89***	9.71***	5.31***	7.35***	4.31***	7.76***	9.98***	5.98***	7.75***	5.11***	9.30***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

从表 4.1.1 年龄与社会资本的 T 检验中，我们发现不同年龄段与社会资本的不同测量指标都有着显著相关性。从 T 值来看，41—60 岁与各个社会网中的网差、网顶和社会网规模的值都是最大的，也就是说这个年龄段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最大。另外，从 T 值的大小来看，我们还发现 41—50 岁这一年龄段是一个分水岭，41—50 岁为高峰值，之前呈现正比趋势，此后呈现反比趋势。由此说明，社会资本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投资的过程，而年龄逾过 50 岁，尤其是 60 岁，虽然社会网的规模较大，但动员较少，投资也较少，相应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和在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会降低。

### 三、民族

将民族因素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4.1.2），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024$  ( $p > 0.05$ )，说明有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庄比汉族聚居的村庄的社区社会资本更低，但是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度，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族对社区社会资本状况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民族与宗教信仰有着极其相关的关系，由于少数民族

在饮食方面与汉族有着很大的不同，汉族人能够毫无忌讳地和其他民族的兄弟姐妹吃饭，而少数民族的农村居民就会有着很大的限制。加之在中国，通过餐饮来扩大和维系自己的社会关系是极其普遍和有效的，这在边燕杰等人的餐饮网调查中已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此，饮食上有较多禁忌的少数民族通过请客吃饭来扩大和维系社会关系的机会就有所限制。村庄团结、合作和信任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很大，但这种村庄氛围不只是通过宗教信仰来维持的，其他社会因素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表 4.1.2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民族	F 检验值	调整后的 R <sup>2</sup>	N
合作因子	-0.161***	76.280***	0.198	2140
共享因子	0.031	20.210***	0.059	2140
互惠因子	0.095***	23.974***	0.070	2140
特殊参与因子	-0.002	14.612***	0.043	2140
一般参与因子	0.061**	9.616***	0.027	2140
社区归属因子	0.021	2.503***	0.005	2140
熟人信任因子	0.135***	36.702***	0.105	2140
制度信任因子	0.013	7.556***	0.021	2140
普遍信任因子	-0.023	18.402***	0.054	2140
社区社会资本	-0.024	2.914**	0.024	2140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民族，以少数民族作为参照。

#### 四、文化程度

将人均受教育年限变量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得出人均受教育年限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072$  ( $P < 0.01$ ) (表 4.1.3)，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 5 年以上的村庄的社会资本要低于人均受教育年限 5 年以下的村庄 0.072 分，但这并不能明确说明受教育年限和社区社会资本成反比。从具体因子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人均受教育年限在 5 年以上的村庄比人均受教育年限 5 年以下的村庄在共享、社区归属、制度信任方面分别高 0.002 分、0.042 分和 0.049 分，说明人均受教育年限 5 年以上的村庄在合作、互惠、熟人信任方面显著高于人均受教育年限 5 年以下的村庄，可见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于社会资本是有影响的，良好的教育再加以正向引导，使村民能够认识到社会资本对于自身和其他村民的有益影响，村民就能够从中获益并增加社会资本存量。

表 4.1.3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人均受教育年限	F 检验值	调整后的 R <sup>2</sup>	N
合作因子	-0.100***	76.280***	0.198	2140
共享因子	0.002	20.210***	0.059	2140
互惠因子	-0.087**	23.974***	0.070	2140
特殊参与因子	-0.029	14.612***	0.043	2140
一般参与因子	-0.053	9.616***	0.027	2140
社区归属因子	0.042	2.503***	0.05	2140
熟人信任因子	-0.090**	36.702***	0.105	2140
制度信任因子	0.049	7.556***	0.021	2140
普遍信任因子	-0.003	18.402***	0.054	2140
社区社会资本	-0.072**	2.914**	0.024	2140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 < 0.05，\*\* p < 0.01，\*\*\* p < 0.001）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以 5 年以下为参照。

从表 4.1.4 教育与社会资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受过教育的社会网规模是最小的，从各个社会网的网顶与网差的均值来看，中专、技校或者职业学校，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要比其他学历的农村居民的均值要高，且最高值均出现在这三种教育水平中。从 T 值的相关性来看，由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多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因此受到人数比例的影响，小学和初中教育水平对各个社会网的网顶和网差有着较高的影响，但是从均值来看我们还是认为高学历能够对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积极影响。

表 4.1.4 教育程度与社会资本

	社会网 规模	咨询 网差	咨询网 网顶	情感网 网顶	劳力网 网顶	信任 网网顶	借钱 网顶	情感 网差	劳力 网差	信任 网差	借钱 网差
没有受过 任何教育	6.427	0.57	0.62	0.404	0.649	0.38	0.583	0.3404	0.5563	0.294	0.35
T 值	16.86***	5.53***	5.67***	4.12***	5.41***	4.06***	5.18***	3.74***	4.99***	3.42***	4.06***
扫盲班	8.156	0.78	0.829	0.571	0.615	0.37	0.795	0.5143	0.5641	0.314	0.72
T 值	10.36***	3.06***	3.09***	2.58***	2.70***	2.13**	3.12***	2.36**	2.68***	2.23**	3.02***
小学	6.673	0.589	0.622	0.333	0.425	0.25	0.64	0.286	0.4	0.195	0.49
T 值	37.29***	10.00***	10.27***	7.46***	8.64***	6.25***	10.55***	6.76***	8.32***	5.53***	9.22***
初中	8.027	0.8	0.848	0.419	0.562	0.29	0.829	0.339	0.4928	0.222	0.66
T 值	54.21***	13.59***	14.08***	10.46***	11.29***	7.98***	13.57***	9.37***	10.64***	7.07***	2.18***
高中	8.263	1.235	1.37	1.039	0.737	0.61	1.206	0.8508	0.6632	0.479	1.21
T 值	23.78***	8.81***	9.38***	7.67***	6.79***	5.77***	8.35***	7.11***	6.48***	5.14***	6.41***
中专、技校 或职业学校	10.39	1.419	1.903	1.143	1.433	1.44	2.467	0.6786	1.1667	0.852	1.03
T 值	8.74***	4.43***	5.96***	3.77***	3.97***	3.30***	5.95***	2.41**	3.37***	2.31**	3.62***
大学专科	9.737	1.929	2	1.583	1.6	1.13	2.231	1.4167	1.4667	0.8	0.85
T 值	7.03***	3.23***	3.32***	2.26**	2.86***	2.06**	3.93***	2.20**	2.85***	1.98**	2.86***
大学本科	9.182	2.222	3	2.444	2.444	1.89	2	1	1.2222	1	1.67
T 值	5.70***	3.16***	4.02***	3.19***	3.35***	2.29**	2.75**	1.73*	2.05**	1.5*	2.43**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 五、社会地位

政治地位是指由居民的个人职务所产生的地位，主要是村庄基层组织中的社会公职，如村两委成员、教师等。利用 UCINET 网络分析软件对一个村个体社会交往中资金支持维度的分析，我们得到图 4.1.1。从图 4.1.1 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村在资金支持中的中心人物是 15 号，通过对 15 号居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他在该村担任大队书记一职，而且是一名老党员。此外，还有几个二级中心 12、18 号，通过对这两位村民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一位是村两委成员，另一位是村里的教师，可见村民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社会网络。而图中的点度中心度是 13，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发现，由于 13 号家里从事

石材生产，因此，其具有很强的借款及信用支持需求，而由于其借款的金额和发生的次数都很高，他的借款对象也非常广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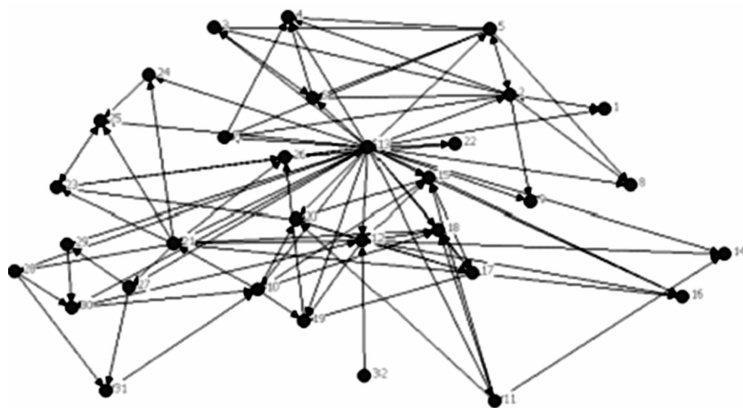


图 4.1.1 某村资金支持关系图（箭头指向债权人）

## 第二节 家庭因素

家庭是个人生活的最基本单元，因此家庭因素也会对村民个体社会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家庭因素对居民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庭人口结构；二是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三是家庭经济状况。

### 一、家庭人口结构

家庭成员的数量、性别结构对个体社会资本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对于有成年子女的家庭来说更是如此。子女性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男孩家庭的偏重，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有男孩家庭在宗族社会地位往往高于无男孩家庭，在其需要支持时也会获得更多的支持。访谈对象 X 这样告诉笔者：“在我们农村，还是都想要儿子的，传宗接代嘛。所以对于我们没有儿子的家庭来说总感觉腰板不硬，在村里抬不起头。所以，有很多事情，没脸面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国外有研究显示子女数与退学率呈反比，有较多子女的家庭其子女的

退学率也较高,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子女数多会分散父母的关注和爱护,分到各子女身上的资源就少,这样便造成了退学率的提高。根据我们的经验,教育能够为农村学生提供获得较高网络顶端和社会资本的途径,进而提升整个家庭的社会资本。

## 二、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

在农村,“母以子贵”“子以父贵”的现象都存在,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家庭成员社会地位的急剧变迁对于其他家庭成员来说,也会影响到他们社会资本的变化。我们的研究表明,村民的社会地位与其社会资本有着正相关关系,社会地位越高的村民,其社会资本也越是丰富,质量也越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地位越高,越容易居于社会网的中心位置。村民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本人或主要家庭成员在村庄的正式社会地位,如担任主要村干部等。二是家庭的经济地位,一个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相应的其社会资本也会越多。三是本人在家族中的地位,这往往与本人的辈分、为人处世的方式及文化程度有关。由于前两个方面在其他章节已有分析,这里重点分析第三方面。

虽然目前农村已是核心家庭为主,但仍旧受到本家及门户大小的影响。“在一个大家族中,年长的人一般说话就会更有分量,而为人处世能顾全大局的就会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我们辈分小的人或者年轻人,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都会去他们那里咨询。相应地,他们在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尽自己所能去支持他们。”可见,如果一个人在家族中辈分比较大,那么他在寻求支持时,小辈为了长辈的脸面是不会轻易拒绝的。这种社会地位除了体现在家族辈分中,还与教育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村中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也是我们寻求支持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有文化,办事不发愁。长此以往,与他们交往的人就会增多,当他们遇到问题时,会向他们提供支持的人也会多。”这两种情况是由不同原因形成的权威,但不论哪种权威,在村中村民既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又很乐意帮助他们。

### 三、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的经济状况包括家庭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家庭的富裕程度直接影响到村民社会交往的频率与强度，尤其是在人情消费方面，这对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与维系影响很大。而农村家庭经济结构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村民在农闲时会外出打工。当然也有一部分村民以个体经营为主，但从样本基本情况来看差距并不明显。因此我们主要分析家庭收入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

从表 4.2.1 家庭经济情况与社会资本来看，总体上社会网规模与家庭经济情况呈正比关系，家庭收入越高社会规模越大。从 T 值的相关性来看，家庭年收入在 70000 元以上与社会资本的显著性减低，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超过 70000 元的比较少，在我们所调查的样本中家庭年收入超过 60000 元的仅为 127 位，占 5.7%，绝大部分农村家庭年收入在 40000 元以下，人数的差异造成了高收入与社会资本的低显著性。从各个社会网的网顶、网差来看，较大的均值均位于家庭收入较高的区间，综合社会网规模、各种社会网的网顶、网差的均值，我们可以得出经济的增长与社会资本的增长存在着正比关系，大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增加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基础。

表 4.2.1 家庭经济情况与社会资本

	社会网 规模	咨询网 网顶	情感网 网顶	劳力网 网顶	信任网 网顶	借物 网顶	咨询 网差	情感 网差	劳力 网差	信任 网差	借钱 网差
20000 元 以下	5.649	0.508	0.333	0.445	0.254	0.26	0.473	0.3074	0.405	0.222	0.43
T 值	39.58***	11.34***	8.66***	10.49***	7.83***	7.98***	10.99***	8.25***	10.03***	7.19***	8.70***
20000— 30000 元	8.275	0.765	0.392	0.548	0.374	0.47	0.71	0.3188	0.4749	0.286	0.7
T 值	46.97***	9.89***	6.72***	8.17***	6.32***	7.36***	9.44***	6.21***	7.62***	5.63***	9.28***
30000— 40000 元	9.877	1.748	0.888	0.881	0.497	0.79	1.674	0.6973	0.8013	0.331	1.13
T 值	44.12***	14.19***	10.32***	9.58***	6.47***	8.76***	13.73***	8.84***	9.11***	5.36***	10.50***
40000— 50000 元	8.984	1.269	0.804	0.787	0.625	0.5	1.093	0.5567	0.6296	0.423	1.03
T 值	22.92***	7.04***	5.50***	5.33***	4.30***	3.73***	6.34***	4.57***	4.84***	3.54***	6.00***

续表

	社会网 规模	咨询网 网顶	情感网 网顶	劳力网 网顶	信任网 网顶	借物 网顶	咨询 网差	情感 网差	劳力 网差	信任 网差	借钱 网差
50000— 60000 元	9.103	1.036	0.959	0.585	0.533	0.46	0.764	0.5714	0.434	0.289	0.62
T 值	14.14***	4.12***	3.63***	2.87***	2.51***	2.44***	3.65***	2.77***	2.60***	2.11**	3.20***
60000— 70000 元	10.86	1.111	0.5	0.684	0.278	0.58	1	0.1875	0.4211	0.167	0.5
T 值	7.96**	2.29**	1.52**	1.86**	1.43**	1.60**	2.26**	1.38**	1.51**	1	1.93**
70000— 80000 元	12.08	1.545	0.909	1.4	0.8	0.44	1.455	0.8182	1.4	0.7	0.6
T 值	6.88**	2.48**	1.61**	1.77**	1.31	1.51**	2.39**	1.69**	1.77**	1.35	1.77**
80000— 90000 元	11	0.143	0.143	0.429			0.143	0.1429	0.4286		0.14
T 值	5.71***	1	1	1			1	1	1		1
90000— 100000 元	15	1.5	0.5	1.5	1.5	1.5	1		1	1	1
T 值	2.14**	1	1	1	1	1	1		1	1	1
100000 元 以上	14.04	0.391	0.091	0.565	0.095	0.09	0.261		0.5652		0.36
T 值	7.95***	1.57**	1	1.67**	1	1	1.19		1.67**		1.28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 第三节 村落发展因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分析来自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整个村庄的整体网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村庄发展对于社会资本的影响。对于村庄整体网的分析，我们将从中心性入手深入挖掘东西部两个村庄的结构特征。东部地区我们选取的是山东省德州市的一个农村社区，之所以选取这个社区是基于此村庄目前正处于“非农化”，对于分析我国农村社区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西部农村社区选取的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的一个回族村落，主要考虑到宗教信仰因素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



表 4.3.2 中间中心度及中间中心度的等级嵌套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EACH MEASURE	
Network Centralization Index = 0.87%	
	1 2 1 4 1 3 2 3 3 2 1 1 2 2 8
	4 2 1 4 6 0 3 1 8 4 0 1 7 7 8 9 0 1 5
	-----
5	5 . .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	4 .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在 S 村，资金的借贷除短期周转之外都是有利息的，即使是亲属之间的借款也是如此。出现借贷情况的家庭有两种，一种是家庭贫困者，另一种是做小本生意者，他们会先考虑向熟人（也包括通过打工结识的熟人）借款，当在熟人那里都筹集不到时才会另想办法。但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其实在亲戚朋友之间借款的也很少，村民之间似乎有一种谈钱伤感情的想法。此外，小额贷款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村民的资金需求，“同样都有利息，何苦看他人脸色，不如小额贷款来得方便”是 S 村村民具有代表性的心理。小额贷款需要三人互保，其担保人有两种情况：一是三人的经济地位相同，大都没有充足资金，二是本不想当担保人但由于强关系的原因不得不当，当然，小额信贷的担保人其自身的诚信也是很高的。根据科尔曼和普特南关于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的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具有多元化和利用率渐高的趋势，这种可积累和有自我增强性的社会资本最终会促使形成更高水平的信任、合作、互惠和公众参与。

从东西部两个村庄整体社会网的状况来看，在借贷网中中心人物的控制力都极其微弱，整个网的密度也比较低。村庄中的社区成员并没有形成对社会资本的绝对控制力，这种低依赖性也会造成农村居民较低的参与度，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



## 二、经济发展程度

村庄经济发展因素我们主要从村民居住类型来探讨，我们将村民居住类型划分为政府统一建房和政府未统一建房这一二分变量。政府统一建房代表着整个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相反，政府未统一建房代表着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将居住类型变量引入总体社会资本状况及其各因子的线性回归方程（见表 4.3.3），从表 4.3.3 中我们可以看出：居住类型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 0.090（ $p < 0.01$ ），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居住房屋为政府统建社区的社会资本要高于居住为自建房屋社区 0.090 分。村庄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社会资本可预见的影响结果有：第一，村庄经济的发展带来村民收入的增加，这对于人情消费投资提供了保障。第二，整个村庄经济的发展会扩大村民结识外界的范围，对扩大网络规模等都有比较明显的作用。第三，整个村庄的富裕程度会影响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增强村民之间的合作与信任，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表 4.3.3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居住类型	F 检验值	调整后的 R <sup>2</sup>	N
合作因子	0.254***	76.280***	0.198	2140
共享因子	-0.024	20.210***	0.059	2140
互惠因子	-0.021	23.974***	0.070	2140
特殊参与因子	-0.110**	14.612***	0.043	2140
一般参与因子	0.103*	9.616***	0.027	2140
社区归属因子	-0.058	2.503***	0.005	2140
熟人信任因子	0.092*	36.702***	0.105	2140
制度信任因子	-0.136***	7.556***	0.021	2140
普遍信任因子	-0.022	18.402***	0.054	2140
社区社会资本	0.090**	2.914**	0.024	2140

（双尾检验统计显著度：\*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居住类型以政府未统建住房作为参照。

### 三、乡村政治环境

乡村政治环境影响村民的社会交往,进而影响村民社会网络的规模与质量。农村自治、村民民主选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政治形态,也必然影响到村民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

#### (一) 基层组织建设状况

村庄政权组织是农村居民最直接依赖的正式社会组织,农村的基层组织状况如何,对于整个村庄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良好的政权建设有利于维系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甚至加强农村居民固有的社会网络的社会资本功能,反之亦然。另一方面,村庄的正式支持也是农村居民摆脱传统的狭隘社会交往的重要动力。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山东的某个村子在村庄分开之前,三个村一套领导班子,每届村委上台后都为自己捞好处,有事情不跟村民商量就自作主张,导致三个村非常不和谐。村民不服从领导,家族之间也不和睦。自从三个村分开以后,每个村有自己的领导班子,都是从自己村庄的村民中选举产生,现在村民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很多,有什么困难村民之间也能互相帮助。

#### (二) 村庄自组织情况

德国理论物理学家 H. Haken 认为,从组织的进化形式来看,可以把组织分为两类:他组织和自组织。如果一个系统靠外部指令而形成组织,就是他组织;如果不存在外部指令,系统按照相互默契的某种规则,各尽其责而又协调地自动地形成有序结构,就是自组织。<sup>①</sup>农村社区缺乏这种村民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没有村民兴趣小组,没有秧歌队,也没有什么能组织活动的协会。自组织的缺乏使村民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去进行社区参与,也没有机会去进行各种经济类的合作,这就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逐渐瓦解,村民社区归属感减弱,村民之间的互惠和共享行为也逐渐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出现危机。而有宗教

---

<sup>①</sup> 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29—34页。

信仰的村庄一般能够形成宗教信仰组织（如宁夏地区的伊斯兰教组织），所以村民的同质性增强，相互之间的交往增多，在合作、共享、参与和信任上更能够达成一致，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相对无宗教信仰的村庄要高一些。

如果村庄能够存在各种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就会对村民的社会交往在对象选择、交往范围等方面产生很强的影响。宗教组织现象在西部地区的宁夏村庄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这些村庄超过 60% 的村民信仰伊斯兰教，而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不打架、不骂人、不偷盗等向善的观念，受这些观念的影响，村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帮助他人。朋辈群体会影响人们的观念和习惯，比如年轻一代的观念受朋辈群体的影响，他们的交往范围可能并不仅限于本村的居民，他们在社会支持中可能延伸至自己的同学、朋友等外地人。

### （三）村庄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

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仍是从上至下的，村级事务由上级通知或由各级村干部讨论决定，最后下达村民，实现村庄治理。2006 年我国政府提出要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府变革的新目标，强调还政于民，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共同治理，<sup>①</sup>但在村庄治理中能真正在村级事务中说得上话的村民不多，大多数村民都不了解村庄治理是如何实现的。村民在意识上比较愿意参加村级事务，但是在现实的村民选举和村级事务中，村民群众的声音比较少，村民觉得自己人微言轻，认为自己即使参加了选举或村级事务自己的建议也不容易被采纳，心愿也不会得到满足，所以在涉及民主权利的参与方面表现出不积极的一面<sup>②</sup>。

##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耦合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多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尤其是新农村建设在全国的持续发展，使得这种转型效应更加明显。农村社区发展的转型效应除了体现

---

① 齐学红：《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道德教育改革》，《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第 11 页。

② 李绍伟、池忠军：《村民自治的功能主义二分法及统合》，《甘肃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第 164—165 页。

在经济发展的“非农化”上，传统文化的潜在作用和现代文化的渗入影响同时占据了农村文化的舞台。由此，在我国农村社区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耦合的情况。

### （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依然是影响和制约村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力量。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差序格局”，使得“关系”等传统性社会资本异常丰富，并因此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关系。普特南在对意大利北部和南部进行测量时发现，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社会信任有很大差异，而社会信任水平也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状况。意大利北部的地方政府非常有效，而南部的地方政府普遍效率低下，其主要原因就是意大利北部有共和传统文化，使人们更加公民化；而南部政治集中化程度高，极权统治制约了社会资本的产生，公民化的程度低，人们习惯于被控制和保护。“我们这一代人受孝道观念、传统习俗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比如，在老人赡养这方面，我们村没有人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一直以来都是儿女给老人养老。这是我们这边的传统，如果谁不养老，将老人送往养老院就说明他不孝。在我们日常交往中的很多规范也是受传统习惯的影响。比如，平日里红白喜事的往来、房屋修缮的帮工等都受我们村传统习俗的影响。”在农村，传统的儒家文化、孝道观念、民间习俗仍然是维系或者制约村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力量，这些传统文化的存在也使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提高。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存在能够使一个地区社会资本变得丰富。

### （二）现代观念的影响

现代观念的传播影响年轻一代村民社会网络的建构和维系。正如图雷纳所分析的，我们当前生活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过去的环境，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体制、社会和文化的纽带纷纷断裂，个人主义盛行。在全球、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层次上，愈来愈多的冲突在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性的增加，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受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影响很大，他们更愿意、也更希望接受现代社会的交往理念和交往方式。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维持需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稳定性。社会组织或社

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亡殆尽。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作为现代化主要表现形式的全球化，更会对社会资本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一切都在融合，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了，生产、消费和通讯等方面都实现着全球化网络。我们在共同生存的同时，又重新变得分化，变得相互排斥。在农村，受社会转型及现代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的传统关系网络比如地缘关系已不再是主要的支持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业缘网络。

## 第四节 社会转型因素

社会互动是社会网络形成的前提，而稳定的社会结构则是社会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资本建构的条件。社会变迁会导致原有社会结构的变迁，从而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组织方式，进而影响社会交往的类型和模式。社会转型被用来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一方面，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流动范围和强度的提高，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带来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悄然变革。

### 一、市场化的冲击

“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也必须调适，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社会转型使传统社会资本受到影响，但市场经济的竞争伦理又不足以成为社会团结的基础，市场化、现代化本身并不能自发地促进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因此必须人为地重建或创造社会资本。市场经济对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一）集体经济的衰弱

原有的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乡村经济逐步为个体经济所取代，导致村民间经济交往的减少，由于个体经济的发展，农民在时间上有很大的不统一性，时间的交错也降低了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这里集体经济的衰弱主要是指村办企业的没落，没有了村办企业的发展和带动，就无法找到激发农村居民共同利益的支点，进而很难产生集体行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削弱集体经济作用的同时，也吞没了能够采取集体行动的机会。集体经济除了村办企业之外还有征地赔款、村民集资等多种形式。如果没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良好的回报前景、严格的分配制度，要想村民集资是比较困难的，没有了对共同利益的认同，合作、信任、互惠便无从谈起。以征地赔款为主要方式的集体经济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腐败问题，其实是合理分配问题，征地之后的生活供给同样能够引发农村居民对村委和政府的不满，要想在如此多的不满情绪中激发集体意识、发展集体行动可谓天方夜谭。

### （二）工具理性的兴起

受西方近代兴起的理性思潮的影响，市场原则、商品观念渗透到社会交往中，导致村民在社会交往中透出浓浓的理性算计：货币化、商品化。在观察中我们发觉，村民对别人家的事不像以前那样尽心尽力了；有时你有心事向别人诉说，别人非但不去安慰你，反而会看热闹。在帮工方面也是这样，可能有些人家没有儿子，并不需要修建房屋，因此别人家修建房屋时他也不会去帮忙。这种经济理性的增长使得农村社区失去了以往的人情味，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在社会网规模有所扩大的今天，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究竟是开放了还是更加的封闭了？这种社会网规模的扩大究竟是工具性原因的结果还是情感的自然发展？人们之间这种攀比、计算、害怕别人过得比自己好究竟是利益战胜道德的结果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不适应？

### （三）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两极分化导致贫富之间的对立，农村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流失更为严重。首先，一些人群在金钱方面不富裕，那么其可运作的资金就不足，人情往来中可支配的资金有限，长此以往，其人际交往的规模和频率也会降低，最终影响

自己的社会支持规模。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有钱人没有这么多的后顾之忧，在平时的人情往来中就会比较阔气。另外，如果一个人的资金充足，那么他在向别人借钱或者向别人寻求担保时，别人便能放心地帮助他。相反，穷人跟别人借钱时，别人会担心借的钱能不能还上，或者需要借很长时间等问题，便不愿意帮助他。

可见，在农村由于贫富分化，村民在获得社会支持方面也出现“马太效应”。

## 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的发展促进了农村传统社区的改造，也带动了大批农村村民挤进城市人的大部队中，这其中既有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有发家致富的村民，他们都向往城市生活，希望成为城市人，不可否认的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 （一）社会流动改变了村民的生活面貌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的出现，导致大规模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频繁流动，由此带来了人们生活面向的改变。<sup>①</sup>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致富观念已经有很大改变，大多数人渴望新的致富途径，<sup>②</sup>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以外出打工为主，尤其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认为当农民“没钱途”，他们得以维持生活的资源基本上都是从城市通过劳动换来的，再加之近几年用工荒的出现，使农村务工人员在城市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增强了他们继续留在城市的打算。为此，他们很少过问也基本不会参与村庄的事情，从而导致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度的降低。同时，随着大量青壮年流入城市务工，村里留下来的基本就只有老人和孩子了。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关系，他们很少去关注村内事务，从而导致村庄社会资本整体状况偏低。在访谈中，一位老

---

<sup>①</sup> 秦广强：《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2003CGSS的实证分析》，《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第58—62页。

<sup>②</sup> 王晓峰：《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致富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东北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调查研究》，《人口学刊》2008年第5期，第33页。

者向我们叙述了两代人的不同生活面貌：“年轻人现在都不在家，他们在外面工作会体面，而且待遇也好。我年轻的时候我父母的庄稼是我给种植收割的，现在村里种田的都是妇女和年长的老人。以前父母每天的生活饮用水也是我给送几担（村庄一直没有自来水，村民的生活用水都是从村里公共的水井里挑回家），现在我年老了，我的儿女却都去了城里，庄稼还是我跟老伴一块儿种，水也是我们自己去挑。”当代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流动加快，村民不再局限在一块土地上以种地为生，农村社区原有的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出现松动<sup>①</sup>，越来越多的村民因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形成新的人际关系网络。

## （二）村落合并与搬迁

村落的合并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单纯的行政兼并，即几个行政村合并成一个行政村，农户并不搬迁；二是在行政合并的同时，让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形成比较大的居民点。村落的合并与搬迁有如下作用：一是可以节约用地，保护了土地资源，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共建和共享；二是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但同时，村庄的合并也会导致人们心理的动摇，破坏村庄原有的结构。在村民功利和互惠心理的作用下，村民原有的支持网络会遭到破坏。当然，这也有利于村民新网络的形成。

调查员在进行走访时也发现，在农田劳作的都是妇女和老人，访谈对象张大爷告诉笔者：“家里主要干活的就是自己和老伴，儿子一家到青岛打工不能回来。家里有两处房子，其中一处长年空着没人住，想卖掉。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出去了，过得不错的子女就把老人接走，好多人家的房子长年空置，不少人都在张罗卖房子。”由于村庄的空心化，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加之许多人原有的左邻右舍减少，导致他们支持的缺失。

---

<sup>①</sup> 朱海龙：《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与社会舆论——以社会动员为视角》，《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第95页。



## 本章小结

影响农村社会资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个体因素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是首要的，它包括个体的先赋因素和后致因素。先赋因素包括个人的家庭出身、年龄和性别，而后致因素包括个人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等。村落发展因素包括村庄的区域位置、经济收入、宗教信仰、文化水平等，对农村社会资本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此外，以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为代表的社会转型，既深刻影响着村落经济、政治、文化、宗族结构的发展和变迁，又同时构成了当代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变迁和重构的深层社会根源。市场化的冲击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是影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社会转型被用来描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一方面，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意味着社会开放性的增加，社会流动范围和强度的提高，人们社会交往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的增长；另一方面，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转型，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从而也带来村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悄然变革。

## 第五章 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几点思考

总结国外学者在提升农村社会资本措施中的经验和不足对于我国现阶段提升和重塑农村社会资本路径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汲取国外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研究其不足，找出改善的方法。同时，我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高和重塑要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现实和农村发展的具体实践，提出符合我国当前农村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选择路径和提升措施。

### 第一节 国外先进经验及其启示

#### 一、国外促进和发展社会资本的先进经验

##### （一）在传统交往规则的基础上构建制度

施奈德和其他学者的研究（1997）表明，传递地区公共物品的制度设计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政府的政策能够而且确实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制度资本本身并不易于替代，明确的规则和步骤被设计用于处理问题。但怎样的制度建设是更有利于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建设的？在考虑农村发展的诸多情况之后，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制度的构建要同传统交往规则相联系。这种交往规则可能包含在村委会、民间其他社会组织中，同时它们也在促进或者制约社会资本的建立。因此，将传统社会交往规则整理完善成正式的制度就显得更为重要。这种经验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非

洲大陆马拉维共和国的“自主乡村供水项目”。项目管理者并未忽视乡村领袖，他们积极寻求传统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让其负责计划咨询委员会的运转。但项目管理者也不允许传统领导人操纵决定，委员会在村民们选举的新领导层的领导下负责每日的计划安排。

### （二）扩大信任与合作的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一定形式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信任和合作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对于信任，我们又可以划分为熟人信任、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在当代农村，熟人社会依然是典型特征，相应的熟人信任就成了信任本身的主体，信任的范围比较狭窄，主要存在于以家庭成员为主的小圈子中。由此，扩大信任范围问题在于人们并不知道哪些人值得信任，或者说如何扩大信任范围。但经验研究表明，广泛的信任能够增强社会资本。因此，增强彼此的信任、扩大信任范围是提升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有效渠道。通常来说，现行制度反映了目前的结构环境，同时也限制了人们扩大信任范围的程度。因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对于社会资本的建设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双重作用，理应成为构建社会资本的重中之重。

### （三）集体行动能够引导个人行为，增强合作

印度拉贾斯坦邦河流域的调查发现了集体行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这两者之间在村庄层面上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通过规范、信任、价值标准等意识而存在，但前提是人们必须赞同这些意识，因此社会资本是一个集体性的产物，它大大超越了个人的行动和思维。加之，这种赞同是通过共同协商的形式确立的而非暴力和强制，对于增强合作和成员凝聚力有着推动作用。在集体行动中，个人行为不会减损，更有可能在集体性的指导下增加个人行为的效益和多样性。如此建立起来的规则和秩序能够为以后村庄发展问题的决策和获得村民支持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集体行动除了能够引导个体行动和思维，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调查证据显示集体行动的缺失还能够降低公共设施的服务质量，在中爪哇省公共水塔供应系统的设计中只有 32% 的村民参与，在同批 NGOs 资助的工程中参与率最低，当地村民甚至在平时的生活中也不习惯与邻居一同工作和交流。当村庄出现村庄官员非法移动管道而影响服务设施

功能时，他们也不能采取集体行动来处理这一问题，只好寄希望于外界的干预，这直接降低了村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和社会资本的发挥。

#### （四）以有目的的干涉或者监督来增加社会资本

Durston 在 1998 年对战后危地马拉的调查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有目的的干涉来增加社会资本，这种干涉主要体现在依赖已有的社会关系、发掘具有共同利益的动机和职责转化。这些方法能够加强成员间的信任、合作、互惠等。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以社区为基础的水供应工程调查显示，对村民为设施修建所做的贡献进行监督时，公共设施的运行更好而且这种监督也影响着从私人连接系统处获得的用水数量。容易理解的是这种干涉和监督是一种体现公平正义的奖赏制度。它能够增强村民参与集体行动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维护和发展共同利益的动机，并通过村民对公共事业所做贡献的多少进行职责的调整，增强组织内的建设能力和成员的合作关系。

#### （五）村庄自组织塑造了社会资本的新形式

社会团体作为社会事务管理的一个主体，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建立起来，并有着明确的个人职责、社团规则和团体结构。社会团体同时蕴含了自助、互助、团结、合作、互惠等社会资本基础。联合国发展纲要中的 CAPPERE 计划以及由世界银行资助的东北地区村庄发展计划，培养了地方自身的发展能力，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加。这两个发展计划说明第二代社区资金和社会发展方法将不再通过中介机构来管理，而是由村庄自主管理。他们一方面依靠已经形成的规则和习俗，另一方面又通过学习建立新的制度和社会关系。如此形成既有传统社会资本又有现代社会资本的多重社会网络，塑造和重建了社会资本的新形式。

#### （六）经济发展产生了普遍信任

众所周知，社会资本的增加需要经济的投入，因此物质财富的增加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社会资本的物质投入上，经济发展环节中的生产和分配制度都会对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产生外部性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货币不仅是物质资源，更具有社会性（西迈尔，1907；特纳，1996），要促进经济发展，货币必须成为一种能得到普遍信任的媒介。而类似

于货币这样的经济工具所产生的信任能够在市场交换中创造出范围更广的社会信任。相比其他的交换媒介，比如说爱、忠诚等，人们更愿意接受商品化的媒介，也正是这种商品化的媒介促使物质和服务出现多样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信任涉及信任者、被信任者和由信任产生的风险。既然信任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那么承受这种风险的能力越强就表明其更容易相信他人，反过来这同样也是对自己的信任。因此我们说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承受信任风险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增加了自信，又增强了对外人的信任。

### （七）普遍教育能够增强社区意识

当我们把教育定位于接受学校教育时，我们发现国外有不少的调查认为教育对于农村社会资本没有显著影响，本调查也显示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对于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很小。而事实上，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育年限高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肯定比教育年限低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多。我们将这种低影响归结为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几乎一样，加之教育年限都比较低，所以其本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就会比较低。另外，整个村庄教育年限的差距几乎体现不出教育年限的差别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差距。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而忽略或者否定教育的作用。无论从个体角度还是从村庄角度，教育水平的提高或者技能的增进对于农村居民思想水平的提高和获得外界社会资本能力的提升都有所裨益。抛开教育等于学校教育这一观念，我们发现国外对社区成员所进行的环保教育、公益教育、公共健康教育和各种形式的咨询活动以及对社区劳动的重视等都体现出教育的作用。例如，旧金山打破卖淫怪圈的计划有司法官员和曾经参与卖淫活动的人相互合作，放弃简单的通过法律体系来解决的方法，取而代之的是给妇女和女孩提供有关健康的放映物、健康咨询和同龄人的咨询服务以及生活技能培训，成功帮助约 500 名妇女和女孩找到合法的职业。

## 二、启示与思考

从国外促进和增加社会资本的案例来看，集体行动或者说参与合作、增加信任和互惠以及合理的制度规范、适当的干预监督等都是普遍被采用的具体措

施。从大的方面来看,经济发展、民主建设、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是大部分国家重点关注的。从作用效果来看,这些促进和增加社会资本的措施与社会资本之间是双向作用的。一方面,措施的实施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积累和发展,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发展同样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集体行动的参与、彼此间的合作、信任等。如此,便可以产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具体来说,社会资本的增加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府绩效,促进信息对称交流等积极作用。但也不是说社会资本或者社会资本的增加对于社会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波茨曾经指出社会资本的四种消极作用: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sup>①</sup>结合我国转型时期的现实,社会资本在农村发展中的弊端主要有家族势力的复苏或集团化的发展阻碍了农村民主制度的进程和集体参与与精神的建设,甚至能够诱发腐败,在经济上家族企业的发展同样阻碍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并损害了信用的建设。但是,这种消极作用的发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本身同积极作用共存的,不可否认当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其消极作用必然会产生。但针对我国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较低的现状,增加社会资本是当务之急,考虑到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在增加社会资本的措施中要设定预防措施。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和合作,根据波茨提出的社会资本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影响的理论,不同的作用机制能够带来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们所提出的措施必须以增进农村居民之间相互信任、互惠、合作及集体行动为立足点,完善和创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机制和运行方式。

### (一) 加强经济组织化建设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加强经济的组织化建设,即促进村庄中的经济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农村整体社会资本才能得到提升,才有条件谈得上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而推动经济组织化的发展,合作和诚信建设是必不可少的。

---

<sup>①</sup> 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 1. 通过合作促进经济发展

只有从合作入手，才能把握经济发展的脉搏，促进经济的组织化发展。这种合作，不仅指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等村庄体系内部的合作，也指农村与企业、政府、其他社会组织等村庄体系外部的合作。在调查中，T市J村是一个用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例子。J村坚持合作促进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进行企业改革，增加集体收入，对村里效益不佳的厂房进行改制，由个人承包，引进客商兴办的企业，达到年收租赁费6万元，村集体收取工业园区土地租赁费15万元；第二步，依托驻地优势，加快小城镇开发建设，在村集市道路两侧开发高标准商业街2条，新建商业楼60座，发展个体工商户168户，除此之外还绿化、美化、亮化环境，实现村集体每年增收2万元，2011年集体增收74万元；第三步，整合资源，增加集体收入，对荒山、荒沟、道路进行招标、拍卖承包，三七分成，农田林网道路树木进行二八分成，都是实行农户得大头、集体得小头的分配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10万元。在J村的例子里，村庄注重与村委、企业、政府、中介组织合作，整合多方面的利益诉求，实现了集体创收，增加了村民的满意度，由此可见合作的重要性。

### 2. 经济组织化建设需要诚信建设的护航

村庄中的各种经济类社会组织一般是由于村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共同致富。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更要重视整个农村社会的诚信文明建设，而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调查发现村民之间的信任感有所下降，村民对村里识字的人的信任感较低，这一方面是因为识字的村民渐渐增加，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因为村民注意保护隐私，不愿信任他人的缘故。村民彼此之间的信任只要牵扯到利益问题就容易引起纠纷，毕竟农村经济发展并不十分发达，在对待利益问题时表现为“亲兄弟、明算账”的态度，道德诚信缺失不但会损伤感情，更重要的是降低村庄社会资本存量，所以我们要强调建设诚信文明的和谐社会，让社会的和谐气氛来带动信任感的回归，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 （二）创新社会治理

现有文献证明丰富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提高治理绩效，还有一些学者

(马得勇、王正绪, 2009) 深入探讨了要想社会资本对社会治理起到正积极作用, 只有在民主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所以只有对社会治理进行创新, 促进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的实施才能够保障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

### 1. 以共同参与促进治理方式的转型

研究发现男性比女性对于参与村级事务更加积极, 但是村级事务并非只是男性的事务, 也并非只是党员、村干部的事务, 村级事务需要全村的共同参与。普特南(2001)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加强了互惠规范, 促进交往, 增加合作。”显而易见的是, 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共同参与可以增加村民之间的合作, 提高村民对农村社区的归属感, 增强主人翁意识, 进而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只有村民认识到社区参与的重要性, 才能逐步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 使社会管理职能落实到每一个人, 让村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提升自己对于村庄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 2. 加大社会管理部门的办事透明度

新时代的农村村民不再是仅守住自己一亩三分地, 期待“青天大老爷”为自己打抱不平的平头老百姓。当前, 村民大都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 明白自己村庄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村民甚至还对村庄治理有着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当办事人员侵害自己的利益时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 并表现出对社会管理部门的不信任。因此, 诸如村干部、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医生等与村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人员和机构, 必须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 疏通、扩大与村民联系的渠道, 简化办公程序, 增加工作透明度。如此, 村民在良好社会治理的氛围下, 可以逐渐缓和社会矛盾、增加社会信任感。

## (三) 重视发展教育

我们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时发现, 受教育程度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很大, 且受教育程度与社区社会资本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因此发展教育对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1. 培养村庄精英

重视教育的作用, 使农村的孩子们能够平等享受接受教育的权利, 认识到自己有权利去关心村级事务, 也有义务为了自己村子的发展而关心村级事务。



在教育的过程中要注意素质教育的实施，结合农村生产生活的特点培养新型农民的生产技能，培养农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新性，努力培养出下一代的农村精英，培养能够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现代农村精英有更多空间可以发挥个人才干，尤其对于经济精英来说更是如此，在培养村庄精英时要更加注意素质教育，培养村庄精英对于村庄的归属感。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农村精英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知识和农业生产新技能，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人员，为新农村建设带去新的活力。

## 2. 提高村民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

当代农民已经渐渐走出自己生活的一小片土地，已经有不少村民具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对国家大事和村级事务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而现代教育应该全方位地培养村民的政治素养，使其能够客观、公正地对待村级事务。村民从小接受现代化教育，相信长大后会长成为有知识、有素质的新农民，创造出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培养村民的政治素养，使村民了解到农村社区的建设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村级事务和每一位村民都息息相关，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团体就可以决定的，每一位村民应该关心村级事务。因为这关系着以后大家的村庄是否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只有自己所在的农村社区发展好了才能有利于每一位村民自身利益的实现。让村民对村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培育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养，才能使整个农村社区都团结有序。

### （四）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

农村社区居民的信任强度符合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人们往往对与自己越亲密的人信任感越强，所以在由血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村民的联系最为密切，其次是由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最外围的是由业缘和趣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这种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渐松动，提高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需要以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为切入口，复活高尚的村庄历史记忆，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

#### 1. 协调各类人际关系

现在的村庄虽然受到社会流动加速和现代文明的冲击，由于血缘和地理位置而形成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有所松动，但是调查表明现代村庄中由血

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仍然占主体，村民对于家人和近亲的信任感仍然非常强烈，其次是对邻居的信任。村民对由熟人介绍而来的合作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必须巩固利用好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形成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使村民共享和互惠行为有序进行。通过互惠和共享行为加强亲人、熟人之间的联系和感情，利用各种节日（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进行互惠交往活动，以此来维系彼此之间的感情，促进合作行为的有序进行。社会流动的加快虽然动摇了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是也形成了由业缘关系和趣缘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学者们对圈子现象的研究证明，“圈子”具有弹性，熟人可以从圈外人发展而来，所以村庄建设应注意发展由各种良性的人际关系网络所组成的村民小组，带动村庄的良性发展，小组内的互惠行为使村民间感情加深、沟通增多，而感情的加深和人际往来的增多又使互惠行为增多，这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农村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有利于和谐新农村的建设。

## 2. 合理继承利用农村社区记忆

农村社区记忆是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的表现，村庄传统在村庄中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优秀的文化传统继承了世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深深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与村庄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村庄丢失了自己原有的优秀传统，造成了村庄记忆的断裂，村民之间的亲密联系被割裂，越来越成为原子化的人，造成村民对参与村庄事务的消极态度与归属感的降低。所以要根据不同的村庄类型来合理继承、利用农村社区记忆，剔除文化糟粕，继承优秀文化，使村民能够在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利用传统记忆所构成的联系来形成一致行动，提高村民对农村社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树立共同富裕的目标，从而进一步促进村庄的发展。

## 第二节 重构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意义

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发生了激烈的变迁，

传统社会资本的功能在逐步弱化,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资本又尚未形成。<sup>①</sup> 全面推进“十二五”时期农村改革,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体现了新形势下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要求。在农村改革、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农村的社会资本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趋势。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降低直接影响了社区整体的发展速度,增加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成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的提出,将重建农村社会资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sup>②</sup> 重构与提升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提升农村居民的思想素质、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发展,进而从总体上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 一、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实现

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使得成员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为个体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便捷快速的通道,通过这个关系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互助和信任,为获得信息、技术和节省交易成本等提供了便利。此外,非政府性质的农村民间组织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的经济利益增长,节省交易成本。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聚集形成组织化的代表群体,如农村经济协会、合作组织等就是农村社会资本组织化的表现形式。在诸如庙会、秧歌队等组织活动使村民之间加强了认识和了解,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组织化的活动中得到深化,这无疑为经济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组织化的代表群体解决了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降低了农村居民在交易过程中隐藏的风险,通过组织内信息的共享与流动,可以抵御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等危险。所有这些都会降低农村居民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农村居民获取更多收入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离不开强大的资源支撑:社会关系网络把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联系在一起,动员社会关系网络能为资源匮乏者带来各种各样的资源

---

① 孔晓娟、邹静琴:《农村社会资本现状、成因及对策》,《南方农村》2012年第1期,第73页。

② 谢萌、辛瑞萍:《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第23卷第4期。

收益。因此,挖掘、利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克服新农村建设的资源瓶颈。<sup>①</sup>总之,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网络的拓展扩大了其交际圈和交往范围,降低了交易风险,并且信息渠道的获得更加多样。

## 二、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实现

从传统文化观念向现代思想道德素质转变的过程中,农村居民道德素质出现了一些问题。儒家学说中的传统美德对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曾起到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传统观念被冲破甚至摒弃,思想道德素质代际差别明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现状使居民合作意识逐渐减弱。但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意味着农村居民能够遵守规范,对社会发展有所共识。村容整洁和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正是以这种能够达成共识的规范为前提的。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原有的规范和治安受到挑战,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能够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对共同规范的遵守和对社区发展的认同意味着对社区的归属感,会强化“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凝聚力和集体行动的产生。

乡村文明还涉及家庭和睦的问题,只有各个小家庭和睦才会有农村社区的大和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増加为解决家庭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一般家庭是以夫妻关系、夫妻与孩子的关系、夫妻与老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而家庭问题也主要是在夫妻之间、夫妻与子女之间以及夫妻与老人之间发生。从村民的个体来讲社会资本具有情感支持功能。物质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精神的支持同样是人类的追求目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精神的动力更能促进人的健康发展。农村居民之间的交往是“鸡犬相闻”的社会环境,而社会资本在这样的环境下是一种值得人们相互信赖和依靠的有价值的资源。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下的精神保障相比,它更加细腻、周全,也更加富有我国传统礼仪的人情味。而在农村人际关系淡化的今天已经不能很好地从邻居或者

---

<sup>①</sup> 赖晓飞、胡荣:《论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思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10卷第6期。

朋友那里得到有效的情感支持。因此，重构与提升农村的社会支持网络，有利于村民家庭问题的解决。

### 三、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管理民主”的实现

我国传统社会的核心是家族制，强调社会的优先地位，个人对于群体家族利益的服从。因此，血缘关系是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最重要关系，这种关系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中国人际关系结构的差序格局。此外地缘关系也是主要关系，“老乡”观念浓厚。同时，“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的观念也深入人心，这就形成轻法治重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朋缘”关系网络。<sup>①</sup>由此可见，我国的传统是一种基于社会交往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社会交往可以使人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在当前旧的社会支持网络解体、新的网络尚未形成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居民情感支持相对不足，提升社会资本可以扩大居民的社会支持规模、丰富居民的社会交往。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意味着社区成员之间有着较强合作、较强信任度，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普遍信任。莱恩曾说：“如果一个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信任他人，他当然不能信任由于权力的诱惑而担任公职的那些人。对当选官员的信任看来只是对一般人信任的特例。”管理民主依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然认同，由此可见，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扩大了村民的普遍信任，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直接作用是减少上访的数量和提高解决农村居民社会问题的质量。与此同时，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所产生的信任感也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力度，提髙对集体利益的兴趣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在对农村居民的走访中笔者了解到，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参与自己村里的事务，只是由于垄断专权的存在，他们无法参与甚至他们的意见根本起不到作用。而这根本上来说是由村民社会资本存量不足导致，对农

---

<sup>①</sup> 李聪：《论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构建》，《泰山学院学报》2008年1月第30卷第1期，第12页。

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提升村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 四、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利于“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

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使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政策（制度）上协调发展的过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资本的増加首先是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增多和增强，这对于打破城乡、工农业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跨地区、跨产业的联合和分配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的发展自然会积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改变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增加农村居民休闲生活时间和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进而可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曾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始终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发展的思想在社会学上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过有关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新型的农村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城镇是农村居民与外界交流、联系发展的基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必然会为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农村社会资本的提髙能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利用，能够实现农村市场的开发和发展，能够实现城乡社会资本的统筹发展，因此对于拉动内需、建立新型城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简言之，社区的发展离不开社区共同问题的解决、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流动加快、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冲突问题增多等矛盾。在农村，由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更加剧了上述矛盾。而通过拓展信息交流渠道、加强村民之间的合作、完善基层政权组织建设等方式提高农村社会资本，可以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加强社会的沟通、促进社区的和谐，进而促进整个农村社区的发展。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的社会资本水平体现着个体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也反映着社会整体发展的潜力。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贫乏，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农村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和维系、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重构和提升，对于促进个体和村庄共同体利益的发展，促进个人、村庄共同体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促进乡村治理乃至整个农村社会的进步和繁荣都具有重大而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重构和提升不是农村居民个人的事情，单靠农村居民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的，亟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

### 第三节 提升我国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路径

美国社会学教授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且分布均衡时，社会就有活力和发展动力。反之，社会资本存量低下或分布不均就会导致社会割裂和发展迟滞。而对于社会成员个人而言，其社会资本的多寡更是个人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村居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和主力军，农村居民之间的团结信任、互惠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资本的功能赋予了社会资本在解决农村居民问题上的巨大意义和价值；而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缺失现状则凸显出提升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升和重塑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优化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结构，对提高农村居民的政治、经济地位，促进农村居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村居民群体的分流以及传统农村居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从根本上解除长期以来农村居民问题的困扰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重构并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理应成为当代农村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政策选择。

#### 一、经济发展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增加的基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提出

的新农村建设总要求。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如此，足以看出经济发展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同样需要经济的支持来维系和发展社会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社会生活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丰富，有助于拓展其经济发展、改善生活的路径和机会，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家庭收入高、物质生活水平高又有助于家庭成员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构建和维系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网络，并保持一定的交往频度与强度，从而提升其社会资本的存量水平。在这一节我们将围绕经济这一大概念来探讨提升新农村社会资本的可行措施。

### （一）发展新型农村经济

树立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思想。十八大报告曾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sup>①</sup>可见当下和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是机械化、科学化、规模化，我们必须破除“小富即安”的思想，转变农业发展方向和理念，大踏步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已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农村居民都能实现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由于小农思想的固化，农村居民在平稳面前很容易懈怠，要使农村经济取得显著的发展必须转换思想，踏上时代发展的节拍。由此，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引导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发展曾经由于效率和效益的问题一度退出了发展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农村居民个体经济的发展。这在给农户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理性的增长和社会信任的下滑。信任、互惠和合作是社会资本的三大要素，由于个体经营发展方式的特点，长期以来逐渐削弱了农户之间以及农户对外界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程度。但我们不能就此放弃个体经济的发展，继续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引导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是当前农业经济发展的渠道。集体经济不止有村办企业一种，除此外还有征地

---

<sup>①</sup> 引自新华网：《十八大报告》（全文），2012年11月19日。



赔偿、上级拨款和村民集资等形式,现如今村办企业对集体经济的贡献远不如后三者。集体经济较为发达的村庄,其控制的资源相应较多,也有能力举办公益事业,这样就激活了农村居民的利益,使得农村社会居民更加关心村级事务,从而能够有效地增强农户的社区归属感和荣辱感,提供互惠、合作的机会,进而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流动人口的增加使人际交往的匿名性加大,社会信任也因而受到削弱。<sup>①</sup> 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吸引外出打工者回乡工作,在保证其收入的同时,降低了这种匿名性,从而保证了社会信任不被削弱。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来说,城乡生产要素要对称流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农村的劳动力进了城,再往前追溯,更是以农村来养城市,现在虽然确立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扶持农村的发展思路,但城市的资本却很少下乡,建设新型集体经济就是要让城市的资本下乡,将城市的社会资本引入农村,以真正实现反哺和扶持的效果。

流通金融增强了村民贷款的便利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根据我们的调查,一方面,现代农村居民在经济理性和信任度较低双重作用下,往往很难从亲戚朋友或者邻居那里借到资金来支撑生产或者子女结婚、上学、医疗等重要事项开销,另一方面,从现有银行贷款往往利息较高,还需担保人,无论从实体经济学还是从形式经济学角度分析,都存在借贷人偿还不上的连带作用,直接影响村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成立类似小额联保等惠民金融组织或者制定低利息、简程序的贷款制度,向农民发放贷款,来帮助解决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非常必要。

## (二) 促进相关制度的改革

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是农村居民的命根,新中国前后就曾经历了多次土地制度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极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家庭收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如今发展战略和形势下,现行承包责任田规模较小,土地划分比较零碎,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

---

<sup>①</sup> 胡荣:《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受到制约<sup>①</sup>，进而阻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值的增长。加之城镇化的发展，“合村并居”所产生的土地发展、农具存放和从事传统农业种植的意愿等问题都对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了挑战。在有些地区，新农村建设往往表面化，以为将农村平房改为新楼就算完成了新农村建设，殊不知新农村建设最根本的是要转变农村土地使用方式和运营方式。对比梁漱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经历的四次变革，就可以发现土地问题依然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矛盾。另外，政府征地、农民工进城务工所造成的农村滞留地的解决都有赖于土地制度的改革。改变土地流转制度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大措施，也是推动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实现规模化效应的制度保证。如今农村还存在着外嫁女土地获得两头空、在校大中专学生的土地承包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土地承包流转制度必须根据现有情况进行改革，并增加制度的预见性。

建立公平正义的共享制度。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攀升，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个人之间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社会发展的成果并未平行地照耀在祖国版图上。相较发展成果的差异，更让百姓不能接受的是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好比高考制度，有人上大学，有人落榜，但人们认为这是当前最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实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一大基础，程序和制度的公认性建设又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阿瑟·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提出：“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sup>②</sup>如果我们忽视了公平公正地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程序和制度，那么就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农村居民社会信任和合作的维系与发展。当前关于公平正义谈论最多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这主要是经济领域内的公平正义问题。除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同样是建立公平正义共享制度的一大重点。现如今，我国对户籍的控制已经放开，城乡间、地区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但这并不是户籍改革的结点。拥有不同城市户籍的公

---

<sup>①</sup> 罗大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sup>②</sup> 阿瑟·奥肯著，王奔洲等译：《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民所享有的社会资源和福利是完全不同的。目前这种户籍管理制度更多的是一种强制的控制手段，允许流动却很难扎根，从社会控制到社会管理是社会发展的途径，同理，推及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的放权和信任。相信市场和社会的调节能力，给市场和社会更多的空间去分配劳动力，同时我们也需要相信自己的公民有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而不是担心大城市一旦放开会出现劳动力拥挤、产生更多社会问题的后果。当城市之间不再有阻隔，我们只有中国公民这一个身份时，不论我们在哪里工作和生活，都可以自由、安心地去为城市创造财富。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住房自由流动、社会保障跨地区转接等制度的配合，因为社会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真空地带，不同制度的相互配合和运行产生的良性社会机制才是社会发展的保证。

简言之，经济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条件谈得上社会资本的合理利用，才能为建立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经济基础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在当代社会，要想让村民提高共享和互惠行为，根本措施是努力发展经济，使物质财富大幅增加，以致让村民不再为了蝇头小利而计较得失，从而有条件去实现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共享。村民们基本上还是善良友好的，在有关钱财利益的方面慎重一些，不愿意为村里事务出钱也是可以理解的，出现这一现象根本原因还是村民生活不够富裕，所以要想根本解决村里出现的一些比较冷漠的现象还是要从发展经济入手。

## 二、政府善治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的突破口

“政府善治是对治理失效的回答。概括地说，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一般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很高的行政效率、良好的行政服务几个要素。实际是国家权力的下放，是向社会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sup>①</sup> 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参与能够巩固国家制度。意大利的经验表明，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社会实践，地方政府的民主改革

---

<sup>①</sup>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给地区政治社会生活带来了看得见的、大部分是有益的影响，改革转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意大利统一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区自治。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意大利的地区改革也有类似之处。从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算起，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也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虽然这一制度变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但是村民自治倡导的农村群众自主管理农村事务的精神，以及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行，使村民自治总体上改变了以前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任命的传统。目前中国农村治理的公共权威体现在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和民间组织三者的统一，但普遍实行的是村民委员会领导的村民自治制度<sup>①</sup>，其他民间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力和程度都极其微弱。

#### （一）充分尊重居民“自治”

增强村民代表会议的实质效果，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村民自治要求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广大的普通村民，而事实往往是普通村民处于被领导、被管理的地位，村干部和村里有威望的、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人成为农村治理的主体。村民代表会议为村民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机会，在村中重大事务的决策中有了发言权和提议权，从此也就提高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同时，参与村中事务也提高了村民的信任和对村庄的认同感，通过搭建村民参与管理的平台和创造参与的机会，来提高对村务决策的满意度和执行的效率，这种平台的搭建依赖于以往村中按地理优势组建起来的村小组。通过村小组组长组建起来的村民代表会议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村民意见。与此同时，通过问卷询问全面调查的方式来提高村民集体行动的热情也是一种可行的措施。无论采取何种措施，最重要的是要让村民感受到被尊重，感受到自己是村中不可缺少的一员。

培养新型乡村精英。农村社区整体网的中心性反映了村庄中的权力或者声望情况，拥有几个具有较高权力或者声望的乡村精英对于整合村庄社会资本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收缩和市场经济的渗透为乡村经济

---

<sup>①</sup> 周红云：《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和社会活动提供了空间、风险和机遇，一些有能力有闯劲的乡村精英因而崛起。<sup>①</sup>在改革开放初期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利用乡村自治逐步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导致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而这些乡村精英的存在，对整个村庄村民的社会资本状况产生了引领性影响。另外，发家致富的愿望在村民中十分普遍，因此，能够带领村民实现致富梦想的经济精英就成了村领导的高呼声人选。而通过民主化和制度化途径成为村庄治理主导人的经济精英不仅能够带领村民实现财富梦想，同时也增加了村民对村庄领导者的尊重，提高了村民信任和社区归属感。

20世纪80年代开始，乡村社会已经不自觉地融入市场经济体系中去。虽然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还部分地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但是商品的流通和生产生活消费必须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运作，文化和观念也受到了市场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外部文化的冲击和震荡，传统的社会已经被打破了。但是，大多数农村居民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还固守着小农经济陈旧思想，另一方面对财富有了更加迫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乡村精英们的出现以及带领乡村共同致富，不仅能够扩大与外界社会资本的联系，提升自己的地位，同时也能获得村中其他村民的支持和拥戴，进而影响自己及村民的社会网络状况。因此在动员社会资本时，通过乡村精英来调动村中社会资本甚至是外界社会资本都是事半功倍的。

保证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参与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村委会的建设，提高农民参与集体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为促进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提供组织平台。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在客观上会促进适合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也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的“管理民主”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推行村民自治就是一项能够创造现代社会资本的制度改革，这在一些村民自

---

<sup>①</sup> 邢亚非等：《乡村精英的崛起与政治认同的获得——国家政权与乡村关系新形态的探讨》，《改革与开放》2009年第7期，第31页。

治规范运作的乡村地区已初见端倪。只有真正地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和政府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才能够发挥家族等农村原有的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实现家族、民间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化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现代社会资本。

## （二）提升基层“善治”管理水平

提高信息透明度和行政反应速度。每个公民都有权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和财务信息。对于这些政府信息的公开是公民能够有效参与决策的前提，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了解，缩短距离，同时也是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的基础。行政反应速度是指对公民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回复的能力。<sup>①</sup>这是对政府和公职人员责任性的一大要求。行政反应速度还要求政府和公职人员定期、主动地向村民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我们所调查的村庄中，有的地方实行了“网格化”管理或者“村民代办点”管理方案。所谓网格化就是贯彻党员牵头、全覆盖、责任到个人的管理理念，村民代办点是村两委成员定期走访、将村民问题解决于基层、帮助村民去上级政府办理事务，提高行政办事效率，积极打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

物质与精神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在农村村民之间建立起一种能够理解和运用信任、公平、平等、合作、勤劳、创新和博爱的理念，也就是说培育了村民的“公民心”，即村民集体行动的意识，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的“合力”，这种公共精神又会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即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与分布均衡，政府工作运行效率就高，这个社会就有效率和活力；社会资本缺乏、下降与分布不均，政府工作运转就效率低下，社会就没有效率和活力。因此，政府、村领导、警察、法院、法官、医生等国家机构和工作人员要真心实意地为广大民众办事，让村民看到国家为自己建设的努力成果，疏通与村民群众的联系渠道，加大办事透明度，用真心感动村民，村民自然会提升对这些人员和机构的信任感。

---

<sup>①</sup>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激发村庄集体行动。集体意识的发展需要集体行动的产生，而集体行动又依赖于共同利益的形成。这种共同利益不仅仅指经济利益。对于经济共同利益的激发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不少措施，例如土地流转的合理开发、新型集体经济的建设等。除此之外，共同利益还涉及社区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村容的整洁、公共设施的完善和维护、自来水的安装、路面的硬化等。在这些集体活动中，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政府投资、村民决策和参与施工的方法，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以提升政府和村务工作的效率与满意度。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论》中提道：“利他主义注定不会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装饰，相反，它恰恰是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sup>①</sup> 因此，要想增加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激发集体意识，必须从村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改进村干部单方面决策和获利的现状，将村民作为社会的合作伙伴而非只是社会成员。

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适度结合。按照迪尔凯姆对社会团结的解读，农村社区是机械团结的典型社会形态，城市是有机团结的典型社会形态。我们知道，机械团结由于社会分工低，成员之间属于并列形式，加之压制性社会制裁等特点，机械团结并不牢固，很容易解散。但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分工程度较高，成员间彼此相互配合，整个社会网更不容易解体。但在有机团结的社会形态中，容易发生个性过于突出的问题，而在机械团结的社会形态中，个体的意识是被高度压抑的。因此在农村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两者的结合。在国外经验一节中，我们提到在传统交往规则的基础上构建制度，其实这就是一种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结合。公俗良行代表了传统社会团结的集体意识，而正式制度的建设又体现了复原性法律的约束作用，减缓了强制性约束带来的个性被压迫。另外，共同的集体意识又能够改变有机团结的个性过分突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的适度结合，对于缓解如今社会中个性过分突出与集体行动的矛盾，适当鼓励村民在重大节日恢复原来的民俗活动来说是可行的方法，或者由政府主导以传统民俗为载体，成为村民情感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契机。

---

<sup>①</sup> 迪尔凯姆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 三、文化教育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点

当然，只靠发展经济是片面的，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而一心只看到利益，还要对农村村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要让村民明白关心他人就是关心自己，在共享中发现乐趣，增强村民的亲密感，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重视整个社会的诚信文明建设，缺乏诚信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严重时更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现在村民间信任感的下降就是一个例子。人与人之间缺乏了必要的信任感就将导致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更不要说新农村的建设。所以我们要先强调建设诚信文明的和谐社会，让社会的和谐气氛来带动信任感的回归。

#### （一）提升农村教育培训质量

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社会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性，父辈社会资本能够为后代社会资本的创建和积累提供一定的支持，一般来说，父辈的社会资本与后代的社会资本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目前，农村教育存在教育设施匮乏和师资力量单薄两方面问题，硬件和软件的双重薄弱使得农村子女进入高等教育学府的机会和能力低于城市子女。而这些农村子女成家立业之后带给后代的依然是稀少的社会资本，例如对孩子生活关注较少、学习辅导跟不上、兴趣培养落后等。反过来，农村孩子不能通过教育爬上较高的社会地位，不能给家庭带来高质量的丰富的社会资本。因此，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教育资源分配制度是提高农村社会资本的基本措施，其回报率也较高。教育的改善除了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能够产生连带作用，例如村民素养的提高、村庄风气的改善等。

创新农科培训的内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前农村居民的致富情绪比较高涨，但他们大多缺乏科学知识和市场信息，不是依然种植传统作物，培育不出好品种，就是跟风市场，一窝蜂地投入到当年价格高的农副产品当中。我国的经济产业链依然处于较低水平，但随着我们科教兴国战略的不断发展，农业现代化生产必将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农村居民的科教培训必须根据农村现有发展特点来进行，同时要向农村居民传授前沿信息和市场走向信息，让农



村居民不仅清楚现在应该干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未来会怎样,以增强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信心。农科技术的培训方式有政府派出、村委聘请和社会其他组织开讲座等形式。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只要是对农户有帮助,都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增强农户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大要素,其信任范围的扩大和信任程度的增强对于提升农村社会资本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信任的普遍性会带动农户个体之间和农户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互惠,并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参与,产生多重效应。另外,这种科技培训不能仅局限在农村种植户这一小部分农民中,对于农资销售点的培训亦不可忽视。在农村,对于买什么农药、施什么化肥,种植户往往会听从销售点工作人员的意见,因此,发展现代化农业、打造科技农业就必须考虑不同群体对农村种植户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科培训除了传播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前沿的市场需求信息外,对于使用剧毒农药对农村种植户的危害和对使用低毒害、低污染农药的宣传同样不可忽略。

## (二) 发展农村文化事业

加强农村居民的普遍教育。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互信等美德。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是基于道德习俗建立起来的,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在中国农村地区,社会资本重建的关键是要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意识,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积累信任、合作、创新和规范等现代意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而随着家庭少子化、家庭核心化和人口流动,这种社会资本的减少乃至衰弱就成为必然。因此,要重构农村的社会资本,不能够试图复制原有的农村居民社会关系,而应该建立以互助合作、互惠互利、诚实守信为基础的新型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并使之成为新时期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基础和核心。而要建立这样一种新型的人际交往关系,首要的就是培养农村居民的现代交往观念和公共信用意识,培育一种超越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广泛的信任与合作。一是要从农村青少年道德教育做起,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问题,制订出一套适合青少年的德育原则,要使青少年从小就懂得理解和运用信任、公平、平等、合作、勤劳、创新和博爱等理念,从

而对现有社会资本存量（即文化、习俗、规范、信仰等）进行改造。二是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教育，促进他们改变传统观念，培养现代意识，通过加强农村居民之间的认同感，来弘扬社会资源共享和互助互爱的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批判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思想，建立起一种能够理解和运用信任、公平、平等、合作、勤劳、创新和博爱的理念，为农村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文化和伦理基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血缘关系和家庭意识，克服现有社会资本封闭、分散和规模小的弱点，积累信任、合作、创新和规范等现代意识，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重构和提升奠定坚实的基础。

丰富农村居民休闲文化生活。农村文化大院建设一度成为丰富农村居民休闲文化生活的主要阵地，而与文化大院这样的活动场所类似的健身小广场更是兼容了健身器材和广场舞两大优势。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已不仅仅是文化娱乐设施，还影响和包含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民情习俗、信仰观念、人际关系等。良好的社区文化是一种利益向导，发挥着使农村居民超越个体思维和行动形成集体意识和归属感的功能。<sup>①</sup>在这种文化休闲生活的氛围中，人们能够摒弃利益的冲突和博弈，而通过兴趣爱好和团队成员的感情联系起来，在增加相互了解和认同的基础上，扩大了自己社会交往的范围和规模，丰富了农户个体社会资本。丰富的休闲文化生活在增加农户生活乐趣的同时，也规范了农户的行为，多彩的活动能够吸引农户的参与，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为村庄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和行为规范。另外，如果某村的文化休闲活动搞得比较好，会吸引邻村居民的参与或者前来学习广场舞，这都于无形之中增加了农户对自己村庄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凝聚力的增强都为农村社会资本的维系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 四、创新社会管理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土壤

个体的社会资本静态是个体的社会网络结构，而动态则是个体的社会交

---

<sup>①</sup> 赖晓飞、胡荣：《论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于 CGSS2005 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思考》，《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10 卷第 6 期。

往，因此，社会互动是个体形成和提升社会资本的有效路径和手段。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区公益组织的发展对于提升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有着重要意义。在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村民自治组织。虽然近年来在我国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农村，民间公益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其作用仍然比较微弱。因此，发展适合农村社会现状的第三部门对于提升和重塑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来说是有效途径。

### （一）推动第三部门的良性发展

社会管理的一大任务是化解理性经济人和非理性社会人之间的矛盾，进而促进社会自治，第三部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这种社会效益的产生。首先，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可以为农村居民搭建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交往、互动平台，从而有效地拓展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空间；其次，发展民间公益组织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有助于农村居民合作意识、理性精神的养成，促进建立村民自组织、成立村民兴趣小组、组织适当的活动，使村民能有机会多多走动联系，在沟通交往中增进彼此的感情，深厚的感情自然会增加村民之间的共享和互惠行为，也会使村民信任感上升，从而提升村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在促进农村自组织建立的同时，也要优化村庄的他组织管理。村干部要为民办事、为民着想，让村民都看到自己村庄的发展，能为自己的村庄感到自豪，而不是去羡慕别的地方。只有村民自己所在的农村社区发展得好了，村民才会从心里有一种自豪感，对社区的归属感自然也就增强了。

第三部门的发展要结合村民生活特点和农村社会发展现状。可以成立一些活动协会和兴趣小组，在农民空闲时组织一些活动，促进自组织的建设。一年中村民比较空闲的时间有两段：一是春播完了之后空闲较多一些，中午前后空闲五六个小时，尽量在天气不太热时上地干活；二是夏秋之交庄稼收获前一段时间比较空闲，劳作时间较少，不太忙碌了，一般6时至10时、15时至18时干点活，其他时间就空闲了。现在农村也并非每天忙碌，许多农活都是机械作业，田间管理用除草剂，大大减少、减轻了劳动时间与强度。最忙的是夏收（收小麦）和秋收（收玉米、棉花、高粱、枣等），劳作时间多达十几个小时。冬季大部分时间空闲，有的村民会做一些手工活儿，如打苇帘等。在不农忙的

时候可以组织村民活动，加强村民间的沟通、互动，为单调的农村生活多加些色彩。一是以农村社会公共事务参与为切入点，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建立各类技术协会、红白理事会、农村居民协会等，充分调动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热情，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互助合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同时，逐步减少在红白公事、社会生产等领域对传统血缘关系的依赖，促进建构型社会资本的发展。二是以丰富农村居民业余文化生活为切入点，鼓励、引导农村居民组织业余爱好小组、兴趣协会，如“农村居民剧社”“农村居民书法协会”等。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调动农村居民的社会参与积极性，陶冶情操、拓展社会网络。三是以社会公益和社会慈善为切入点，大力推动农村居民社会公益组织，如“志愿者协会”“互助组织”等。积极引导农村居民有计划地开展义工慈善、村民互助活动，如互助养老、助老服务，留守儿童照看等活动，这样既能提高农村居民自身的道德素质又能达到社会和谐，从而促进村民形成社会整合，缓解社会冲突，实现和谐发展，形成新的社会资本。在城市化发展的影响下，村中青壮年大多在城里打工，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儿童。他们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当家中的顶梁柱不在时必须撑起农田和家庭的重担。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发展的现状，我们有必要建立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核心的自组织，实现自助和互助的社会功能。这种自组织除了要解决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宜和繁重农活带来的身体劳损，还要关注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心理问题主要是情感支持的缺失，这同样是社会资本的缺失，而妇女在经济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承受着更重的心理负担。

给予第三部门发展的政策支持。政府及村委会发挥好带头作用，各种村民自组织发挥应有作用，重视农村经济合作，为村民之间或村民与其他组织的合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当发现有适合的经济项目时，应及时通知村民，促进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三部门的组织和建设发展能够培养农民的政治素养，使村民了解到农村社区的建设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村级事务和每一位村民都息息相关，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团体就可以决定的。每一位村民应该关心村级事务，因为这关系着以后大家的村庄是否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而只有自己所在的农村社区好

了才能有利于每一户村民自身的利益。让村民对此有正确的认识，才能使整个农村社区都团结有序。

## （二）培育社会管理的良好环境

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其制度的完善、合理程度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获取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我们农村经济的发展已能满足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当患病住院等情况发生时就会给农村居民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一度成为农村居民因病致贫的真实写照。通过本次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发生借贷多是由于大病或者子女婚嫁。农村居民看病贵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保障率较低，另一方面是医疗费昂贵。这就使得社会保障的发展成为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不仅存在着城乡差异，地区之间的差异亦十分明显。随着农民进城务工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可以自由地在全国各地流动。但由于地区社会保障缴纳标准不同，社会保障很难跟随劳动力自由转移，往往存在没有保障的情况。除了医疗保险的匮乏，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同样处于低保障状态。2011年7月实施的《社会保险法》在附则中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也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的流动性比较强，基本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比较困难，很多进城务工者放弃投保。当然，新农保的实行为农村居民的老年生活增添了不少光芒。但是社会保障的缴纳标准、替代率、不同性质单位的差别、跨地区的转移等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能够增加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同时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社会资本。

推动良好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我们说关系能够产生信任和合作，进而形成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这种关系的建设包括家庭关系的维护和邻里关系的发展。远亲不如近邻，而邻里关系的相处又与家庭关系密切相关。在农村，妇女在维持家庭关系和发展邻里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在家庭中，作为妻子、母亲和媳妇，妇女的行事尤其是妇女对婆媳关系的处理直接影响了村民对这个家庭的看法。基于此，重视对妇女群体的教育和关怀就显得十分重要，除了注意维护妇女群体的合法权益之外，向其宣传家庭教育知识和推动妇女群体

休闲活动的发展，对于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本章小结

在分析总结国外先进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农村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推动村庄集体行动提供了新的指导，并能够为新农村的高质量建设、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牢固的理论基础。

简而概之，提升农村社会资本必须多管齐下，发挥整体效应。经济发展为建立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通过深化改革，提高生产效益，使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加大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和科技培训的力度，使农民能够运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提高农业技术含量，以促使其向现代农民的转变；通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合理收费项目，做好帮扶工作，从而解决农民的一系列生活问题，促使人际关系与经济发展向着同一个方向变迁；综合运用经济、政策、法律、行政等手段，正确引导、科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优化群众交往环境，建立和完善促进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的体制和机制。

##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本章首先对前五章的内容进行了概括，然后总结了本文对于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最后对本文中存在的不足和今后需要探索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 一、本研究的主要结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乡村文明、管理民主”。农村居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力量，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广泛了解民意的基础上。本文在广泛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呈现了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况和影响，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这对于建设符合农村居民期望和农村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新家园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1. 目前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无统一规定，对于研究农村的社会资本就更缺乏本土化的定义。本文结合对于农村地区的调查，给出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我们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构成社会资本的六大基本要素。在微观层次上主要表现为农户个体通过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帮工网和借贷网所获得的资源与支持；在中观层次上主要通过社区居民对

于信任、互惠、合作、共享等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行动展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建构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测量维度。

2.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们用不同的维度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测量,但是这些测量多是集中在城市方面并且符合城市特征。本文认为六维度法比较符合农村简单社会关系的“熟人特征”,是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一个比较适合的方法。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是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而且此六维度是并列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经数据检验,每一个维度的信度都在0.7以上,说明六维度的信度比较高。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及其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

我们对谢治菊、谭洪波(2011)提出的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和信任的六维度测量法进行了修正,并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进行了相关矩阵分析,得出了测量社区社会资本的33项指标: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文化活动、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力、主动关心村级事务、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我喜欢我所在的社区、我关心我们村的事务、我们村会越来越好、与村民合作、与村委会合作、与企业合作、与政府合作、与社会中介组织合作、食物共享、农具共享、信息共享、农忙时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红白喜事时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忙、邻居间互相回报、村民需要帮忙会不计报酬的帮助他、相信村领导、相信政府、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相信警察和法官、相信医生、相信家人、相信亲戚、外出时钥匙会交给邻居保管、找人帮忙看信、相信陌生人、相信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

3. 我们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进行了相关关系的矩阵分析。笔者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指标进行主成分法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发现了九个主要成分。我们根据这九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对他们进行命名,得出了构成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结构的九个因子,即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在结构上由一般社区参与、特殊社区参与、合作、共享、互惠、合作、熟人信任、制度信任、普遍信任这九个因子构成。



4. 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网络和社会资本状况。在测量我国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时,我们从这五种社会网出发,分别探讨了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等内容,涵盖了农村居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了情感生活、劳动帮工、社会交往和资金借贷等社会场景。

5. “朋友关系”的突起打破了原有的“差序格局”。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一直是由血缘与地缘两种主要关系组成的“差序格局”。<sup>①</sup>在这一“差序格局”中,家庭是社会圈子中最里面的一轮,向外依次是“亲属圈”“邻居圈”和“私人交往圈”。<sup>②</sup>在此调查中,各种支持网中支持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地位大致是按照“差序格局”的顺序分布,总体而言,家庭成员、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是农村居民支持网的主力。如今的农村虽然经过了众多改革和发展,但熟人社会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家庭依然占据农村社会支持的主导地位。同时,朋友这种“拟似血缘关系(业缘关系)渗入‘差序格局’,导致‘差序格局’所包括的社会关系范围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利益’亦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关系亲疏的一个重要维度”<sup>③</sup>,这都极大地改变了“差序格局”原有的作用和影响。另外,这种被认为是建立在工具性行动基础之上的朋友关系<sup>④</sup>,以极大的优势代替了亲属关系在情感慰藉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同时也为朋友关系增加了多层色彩。总之,在朋友关系突起的影响下,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不再以“家庭和家族关系”为核心,而变为以“家庭为核心,拟似血缘(业缘关系)为基础的格局”。

6.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因素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在微观方面采用皮尔逊卡方检验的方法测量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个体和家庭因

---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月第37卷第1期。

③ 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29—34页。

④ 钱宁、田金娜:《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29—34页。

素，并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法分析个体和家庭因素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维度的相关性。个体因素主要包括性别、户口状况、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文化消费、家庭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年收入。其中，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因素和家庭因素中的家庭文化消费因素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其他因素虽然没有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性影响，但却影响了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某个或某些维度，所以这些因素都是对社会资本产生一定影响的因素。除此之外，本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结合前述数据分析结果分析了政治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等宏观因素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影响，村民经济理性、农村经济与村民需求的矛盾是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经济因素；村庄兴趣小组、村庄治理方式是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管理体制因素；大众传媒信息、小农思想观念是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文化因素；社会流动、社会转型是影响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转型因素。本文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分析时结合微观与宏观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既有微观层面的具体因素的影响，又有宏观层面的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构成并影响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现状。

7. 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多来源于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从这五种社会网的职业分布中我们发现，支持者的职业类型几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干部（包括村干部）、经商、工人、职员、务农、教师、医生和司机又是这五种网中都会提到的职业。从职业地位阶层来看，支持者的职业地位多集中在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这三个阶层都处于职业地位金字塔的底端，群内选择效应依然存在，或者说当下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仍然从同地位、相近地位的群体中获得。另外，行政管理阶层在五种社会网中被提到的次数最少，从农民阶层最底层到行政管理阶层最高层，农民所获得的高层次的社会资本少之又少。根据网顶效应我们可以说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在质量和多样性上还有待提高，同时这也反映了我国当下社会阶层的刚性分化，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互惠和跨越依然困难。

8. 严格的规范与规则、普遍的信任、广泛的村民参与、互惠规范、合作组织、强烈的公共精神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本课题基于前期研

究, 尝试性地提出提升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 第一, 经济发展是基础。必须加强经济组织化建设, 促进经济发展, 而要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关注合作, 还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道德诚信的建设。第二, 教育是提升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关键点。重视发展教育, 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育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农民, 一方面要培育农村精英带动村庄发展, 另一方面要提高整个村庄的村民素质。第三, 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是提升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的突破口。对社会治理进行创新, 只有通过创新治理模式才能保障自下而上村庄治理方式的实施, 为此必须呼吁村民共同参与村级事务, 社会管理部门还要加大办事透明度。第四, 第三部门是提升和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的现实土壤。构建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 合理继承利用农村社区记忆, 巩固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 同时也要培育新的业缘、趣缘人际关系网络, 培育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网络来形成良好的循环互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二、本研究的贡献

本研究在分析当前农村社会资本时, 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发展, 并且很好地指导了本文的实地调查和数据的分析研究。

### (一) 理论贡献

本书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构建农村社会资本框架、研究视角和对原有理论的补充上。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构建, 我们提供了微观、中观层次相结合的视角, 并基于此提出了本文对农村社会资本的定義, 具体内容我们已经在结论部分详细论及。对于社会网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差异, 本研究为打破这种分裂做了一定的尝试和努力。具体内容如下:

1. 为农村社会资本的构建提供了个体微观和社区中观相结合的视角。学界对于社会资本的定義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 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的研究层面。在实地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仅从某一个研究层面来分析社会资本的存量、结构等内容。但作为社会系统的一员, 任何人、任何物、任何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微观个体、中观社区和宏观政策的多重影响。农村居民这一

鲜活的群体，如果仅从某一单个层面来测量社会资本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其社会资本的全貌。因此在分析时，本文同时呈现了微观社会资本和中观社会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并构建了农村社会资本的框架。首先我们将农村社会资本划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两部分，然后通过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帮工网和借贷网来测量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通过社区参与、社区归属感、合作、共享、互惠、信任六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2. 为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的融合提供了视角。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村居民，因此对阶层地位的分析只能落到农村居民社会网成员上。我们研究了农村居民社会网成员在7个不同阶层上的频数分布及职业阶层异质性，探讨了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的地位结构。网络成员地位阶层结构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农村居民自我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此同时，我们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等方面加强了对网络结构的分析。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作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同范式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不能将两种范式完全的对立，对于两种范式的融合研究将推动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分析的全新发展。

3. 为“差序格局”理论补充了新的观点。“差序格局”理论自提出后就一直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参考模式，这种由近及远的同心圆结构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尤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不同的变革，相应地也会对中国居民的社会交往产生影响。本书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的关系网络依然以家庭为主，传统的“家本位”理念在改革的浪潮中并未褪色，在中国居民的生活中依然承担着经济支援、情感慰藉等多重功能。但是，由近及远的同心圆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所谓关系的远近已不再简单因“血缘亲属”或“地缘邻居”而划分，个人的私人交往圈在农村居民关系网络中异军突起。同时，朋友关系的作用也不再是简单的工具性支持，在情感网中我们发现，农村居民寻求朋友的支持在关系构成中占据第二位。我们可以预想，朋友关系在较为传统的农村社区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差序格局”的变化可能更加明显。

## （二）方法贡献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采用了前人尚未涉及的研究方法以及对已经成熟的研究方法的再探讨，以达到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加成熟和新鲜参考的目的。现在看来，已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想法。

1.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后实证主义的研究允许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研究的补充和深入，为研究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的社会资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可否认的是，主观因素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动员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因素无法通过定量研究全面把握。因此，本研究着力探讨了这种结合的具体应用，不仅体现在研究方法上也体现在报告撰写上。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以定量研究为主，具体是采取结构式问卷法。定性研究的方法是通过个案访谈收集资料。本书的结构式问卷主要分为四部分，具体为个体基本情况、个人社会交往情况、社区生活和社区整体状况评价。个人社会交往情况部分涉及被调查者个人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况，主要通过咨询网、情感网、信任网、帮工网和借贷网5种社会网来分析。社区整体状况部分涉及村庄中观层面上社会资本的存量，从社区参与、社区归属、信任、共享、互惠、合作6个维度来获得。

2. 整体网与个体网相结合。在社会资本这一领域中，学者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研究或者是某一个村庄的整体社会资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呈现出不同的社会资本面貌，但对于两种社会资本研究方法的融合却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对于个体网和整体网的融合做了尝试。个体网络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等方面来探讨的，进而得出农村居民个体社会资本的现状，发现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模式等。在本书中整体网络分析则侧重于中心性的分析，体现在影响农村社会资本因素这一章中，探讨的是农村社区居民之间的黏合程度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影响。

3. 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或以往的经验、教训对事物内部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事物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在国内社会资本的研究领域中，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地区之间的社会资本比较研究都是比较少见的。而研究不同地区社会资本状况对于发现提升农村社会资本路径具有指导性作用，并能够提升路径使用的普遍

性和效益性。本书的比较研究法是一种横向比较研究，主要是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定量的比较研究，所涉及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比较、不同（有无）宗教信仰的比较、不同村庄类型之间的比较等。

### （三）应用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又一次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足可见党中央对于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重视。而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内在关联性，新农村建设的“20字”要求与建立在以社会参与网络为载体的公民间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维度上的农村社会资本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新农村建设有利于重建农村社会资本，而农村社会资本的提升与培育又可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进而协调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是，伴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原来丰富的社会资本开始变的不足甚至出现了匮乏状态。农村社会资本的这种匮乏状态已妨碍了农民利益表达、利益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降低了社会的整合能力，对政府治理与农村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为此，本研究尝试提出提升和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路径与对策：经济发展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增加的基础；政府善治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提升的突破口；文化教育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关键点；创新社会管理是提升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土壤。由此，对农村社会资本的研究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1. 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高质量推进。构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体现了新形势下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要求，也将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重构与提升农村居民社会资本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社会生活、提升农村居民的思想素质、促进农村社区的社会发展，进而从总体上有利于新农村的建设。

加强农村社会资本建设使得农户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也为个体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通过这层关系，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互助和信任，为获得信息、技术和节省交易成本等提供了便利，为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降低农村居民在交易过程中隐藏的风险提供了可能。同时，通过组织

内信息的共享与流动，可以抵御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市场失灵。所有这些都降低农村居民的生产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农村居民获取更多收入以提高自身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目标。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现况使居民合作意识逐渐减弱。但是，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意味着农村居民能够遵守规范，对社会发展有所共识。“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目标的实现正是以这种能够达成共识的规范为前提的。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转型时期，原有的规范和治安受到挑战，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能够推动和谐农村的建设。同时，对共同规范的遵守和对社区发展的认同则意味着对社区的归属感，会强化“共同体”意识，推动社会凝聚力的增强和集体行动的产生。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意味着社区成员之间有着较强合作、较强信任度，也就是说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普遍信任。“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然认同。由此可见，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提髙扩大了普遍信任的同时也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直接作用是减少上访的数量和提髙解决农村居民社会问题的质量。与此同时，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增强所产生的信任感也能够提升公众的参与力度，提髙村民对集体利益的兴趣和对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目标的实现。

2. 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带动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使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政策（制度）方面协调发展的过程。社会资本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网络基础之上的，农村社会资本的增加首先是不同社会关系网络的增多和增强，这对于打破城乡、工农业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实现跨地区、跨产业的联合和分配有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基础的发展自然会积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对于改变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增加农村居民休闲生活时间和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进而可以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实现城乡一体

化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始终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城镇化发展的思想在社会学上由来已久，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过有关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思路，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新型的农村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城镇是农村居民与外界交流、发展的基地，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必然会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农村社会资本的提升能够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合理利用，能够实现农村市场的发展和开发，能够实现城乡社会资本的统筹发展，因此对于拉动内需、建立新型城镇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 三、研究的不足之处

从本次研究的过程和成果来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对于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有了一个更加明晰的认识和呈现，但也有一些部分需要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中需要改进之处有以下几点：

#### （一）获取信息能力的局限性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现象，获取信息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具有局限性。农村社区的硬件设施较容易测量，但是要测量信任、参与、互助合作、民主法制、公共精神等涉及农民的主体性意识、信念和观念的方面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个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对问卷的数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调查时发现，年轻的村民与年老的村民对待问题的态度存在很大不同。在问及收入情况时，年轻的村民会夸大自己的收入，对待消费也比较大方；而年老的村民对收入情况比较保守，会把收入说得比较少。另外，在进行满意度调查时，年长的村民也偏向保守，即便是有些不满意的项目，他们也会违心地回答满意；而年轻的村民就比较直接，不满意就是不满意。但笔者发现，有些正在改善的地方村里的年轻人看不到，夸大每一点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太过于愤世嫉俗。一位年轻宋先生说：“我对自己的医疗保障情况太不满意了，一开始只交 10 块钱，后来交的钱数到了 20 块，又到了 40



块，一直到现在要自己交60块钱了，交的钱越来越多谁愿意啊？”但据笔者了解，现在农村的医疗保障还是不错的，村民可以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看病时会给报销一部分钱，虽然自己交的钱增加了一些，但是可以报销的病的种类增加了。由此可见，对于涉及村民观念、意志等主观方面的调查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 （二）对数据的收集和挖掘稍显不足

除了在调查村民主观信念、意志等方面存在信息获取能力的局限性，本研究对数据的挖掘和收集还稍显不足。在数据的收集上，西部地区调查范围涉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和陕西省三个省份，其中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了8个村庄，有3个回汉杂居村、2个回族村、2个汉族村；甘肃省调查了1个汉族村，陕西省调查了2个汉族村。东部地区的调查集中在山东省的20个村庄。研究中的西部数据的特点具有陕甘宁特色，而东部数据的特点具有山东的地方特色，还远远不能上升到整个农村社区的高度。

同时，信息获取能力的局限常常使我们只能了解问题的一些局部，而新农村建设却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我们很难将支离破碎的局部信息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画面。新农村建设中的硬件设施容易调查，但要用问卷、量表或者个案访谈的形式去了解信任、参与网络、互助合作、民主法制、公共精神等涉及农民主体性意识、信念、农民观念的改变等，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三）村庄整体网未深入探讨

本研究虽然兼顾了个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和村庄整体层面社会资本的测量，但对村庄整体网并未做深入的探讨，仅选择了东西部两个地区的村庄作为个案初步了解了村庄整体网的结构和特点。而要想全面了解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具体情况，对于村庄整体网的分析也必不可少，对农村社会资本整体网的深入探讨可以作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 （四）抽样的改进

本研究的调查虽然涉及四个省份，但都属于北方地区农村社区，其中在对东部社区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山东村民比较保守和中庸，“非常同意”和

“同意”选项都是代表一种同意的态度，“不同意”和“很不同意”选项都是代表一种不同意的态度，倾向于“非常”和“很”这样比较鲜明的态度的村民较少，选择“无所谓”选项的村民较多，由于对东部地区数据的收集仅限在山东省的20个村庄内，但是收集信息的村庄不同，也会对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我国南方农村社会资本的调查尚未涉及。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应该尝试对不同地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比较，才能较为全面地展现我们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使我们对农村社会资本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进而提出更具普遍性和典型性的提升措施，更好地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

#### 四、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结和反思对于研究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提出了研究的结论，更提示了未来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在对本文总结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本次研究，毕竟要求一个研究面面俱到是不现实的，同时也会显得毫无重点。以下是我们今后研究的设想：

1. 将小宗物资的借用从测量维度中删除的可行性讨论。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地区，都存在小宗物资能够基本自足或者能够置办齐全的现象，虽然借贷网中反映了小宗物资借用的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等网络数据，但在实际填写时农户更多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情感网的影响。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农村的经济已得到长足发展，像食物、小型农具等的借用已经很少在农村中发生，因此我们主张可以将其删除，或者找寻其他替代指标。当然这只是基于本研究分析而得出的初步想法，其可行性和效果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得到验证和完善。

2. 社会网络规模的重复性。本研究的社会资本是从咨询网、情感网、帮工网、信任网和借贷网五个维度进行测量的。在测量社会规模时，我们发现不同社会网的构成中有一部分个体是重复的。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社会网总规模和五种社会网之间的重复度及五种社会网之间网络层成员构成的重复度。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重复成员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类型、职业类型等人口学特征，从而发现哪些特征的群体更容易被农村居民重复提名。

3. 对当前农村居民社会网规模扩大原因的探讨。当前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农村社区也从过去的封闭走向现代，随之开放的还有农村居民的社会心态，他们也愿意走出去，与他人结识。当前我国社会又被经济理性笼罩，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家庭发展的“非农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于“道义农民”和“理性农民”的讨论来越来越多。在这种双重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发问，农村居民社会网规模的扩大到底是基于经济理性，通过“关系”来获得更多、更高层次的社会资本，还是基于社会心态的开放，情感的自然发展。关于其原因的探讨我们大体可以从“在什么情况下你更愿意结交新朋友，或者说你最近一次认识新朋友的场合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来进行初步探讨。

4. 测量个体社会资本时，增加公共社会资本获取能力的测量指标。如今对于个体社会资本的测量大都通过某个或者某几个社会网来进行，通过这些社会网来测量的社会资本其本质都是基于嵌入其中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私人社会资本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是从辩证法来看，有私人社会资本就必然会有公共社会资本，这种公共社会资本同样需要投资，而这种投资主要由政府来提供。回归到农村社会资本这一主题上，公共资本对于农村居民同样是重要的，诸如社会保障的投保。这对于预防因生病住院而返贫的农村居民具有积极的作用，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经济增长。这种公共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比通过私人关系获得的社会资本更具普遍意义，获取的途径要比私人社会资本更加简单，可能性也更大。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农村居民的参保率尚未达到百分之百，尤其是对于农村女性来说，参保率和参保的档次都比较低。因此，开展对公共社会资本的测量对于全面了解农村居民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是一个可行的测量方法。

5. 运用整体网分析方法的相关模型来深入探讨农村居民社会网络结构和社会资本。目前，社会网络分析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在不同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分析软件和分析模型的发展与运用上。本文虽然也涉及了对整体网的分析，但分析的层面尚不深入，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加强对分析软件和分析模型的学习和使用，力图呈现农村社会资本的深层结构。

6. 在本书中我们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进行研究时,仅分析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我们通过李克特量表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6个测量维度的33项测量指标进行了有效百分比分析,通过研究各个指标的有效百分比来发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在进行这一步研究时,我们认为持“非常同意”态度的村民和持“同意”态度的村民都是同意该测量指标的村民,持“不同意”态度的村民和持“很不同意”态度的村民都是不同意该测量指标的村民,通过这些村民的态度来研究社区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少。尽管这种研究方式有效地测量出了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只是一种比较初步的研究,在今后研究农村社区社会资本时我们希望能够开阔思路,采取更加深入的研究方式进行分析。

7. 在进行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研究与分析时,我们仅选取了四个省份为代表,其中山东省的样本代表了东部地区,陕西、甘肃、宁夏的样本代表了西部地区。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我们主要把目光集中在了我国的北方地区,并没有考虑到南方地区的特点。实际上南方和北方的村民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点,北方村民大多豪爽、粗犷,而南方村民大多灵活、细腻。同时,北方村民在外出打工时最为青睐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地区,因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能够吸引更多的外来流动人口。所以我们在今后进行社区社会资本研究时应该综合考虑到南北方地区村民的特点,从一个样本特征更加全面、典型的角度去研究农村的社会资本。

8.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回报。本研究分析了不同家庭年收入、不同政治身份的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不同存量,而对于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的回报尚未涉及。在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在哪些方面得到了回报以及回报程度,例如是否在买卖农产品方面使用了社会资本,是否在子女教育问题方面使用了社会资本,是否在子女工作方面使用了社会资本等。

9. 进一步检验本研究假设的普遍性。本研究选取的调查地点集中在北方城市,对于南方农村是否有相同的结论还需要在今后更多的调查和研究中进行检验和完善。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书目（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1] 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M]. 王奔洲,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2] 彼德·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 孙非, 张黎勤,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3] 边燕杰, 李煜. 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0.
- [4] 边燕杰主编. 关系社会学: 理论与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5] 边燕杰. 社会网络与求职[M]. 香港: 牛津出版社, 1999.
- [6] 边燕杰等.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7] 边燕杰主编. 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 [8] 布迪厄.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 包亚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9] 迪尔凯姆. 社会分工论[M]. 渠东,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10] 弗朗西斯·福山. 大分裂: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重建[M]. 刘榜离等,

- 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1]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M].彭志华,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1.
- [1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13] 格鲁特尔特.社会资本在发展的作用[M].黄载曦,杜卓君,黄治康,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 [14] 贺寨平.社会网络与生存状态——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15]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6]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17] 罗伯特·D.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王列,赖海榕,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18] 牛喜霞.农村土地交易中社会资本运作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 [19] 罗大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基于西安市的实证调查[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 [20] 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21] 林耀华,庄孔韶.金翼[M].林余成,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 [22] 林聚任.社会网络分析:理论、方法与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23] 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24]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25] 刘军.法村社会支持网络——一个整体研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26] 刘林平.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深圳“平江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27] 刘兆发.农村非正式结构的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 [28] 牛喜霞,张生元等.农村社会资本:基于经验的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12.
- [29] 帕萨·达斯古普特,伊斯梅尔·撒拉格尔丁.社会资本——一个多角度的观点[M].张慧东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30] 吴士余主编,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 [3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32]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展望[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 [33] 约翰·斯科特.社会网络分析法[M].刘军,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 [34]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35] 翟学伟.面子.人情.关系网[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 [36] 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M].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
- [37] 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38] 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39]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 [40] 张其仔,邓欣.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发展的社会限制与社会资本的生产[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 [41] 周红云.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治理改革[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 [42]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43] 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UNDP.人类可持续发展[A].中国21世纪议程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教材.1995.

## 二、中文期刊（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 [1] 巴里·韦尔曼. 网络分析的研究传统和基本概念[J].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1(9).
- [2] 巴里·韦尔曼. 网络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J].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科学,1991(6).
- [3] 毕霞,茆倩. 构建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J]. 江西社会科学,2003(4).
- [4] 卜长莉. “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J]. 社会学研究,2003(1).
- [5] 卜长莉,金中祥.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J]. 社会科学战线,2001(4).
- [6] 边燕杰. 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 国外社会学,1998(3).
- [7] 边燕杰,丘海雄. 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功效[J]. 中国社会科学,2000(2).
- [8] 边燕杰,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2001(2).
- [9] 陈浩文. 网络分析: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和理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03-02(2).
- [10] 陈健民,丘海雄. 社团、社会资本与政经发展[J]. 社会学研究,1999(4).
- [11] 陈俊杰,陈震. “差序格局”再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98(1).
- [12] 陈全功,程蹊.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新进展[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3(5).
- [13] 陈午晴. 中国人关系的内涵[J]. 社会学研究,1997(2).
- [14] 陈欣. 网络分析:对“关系”的分析到“关系”分析[J]. 南京社会科学,2001(3).
- [15] 陈锡文. 深化对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 小城镇建设,2005(11).



- [16] 陈传明,周小虎. 关于企业家社会资本的若干思考[J]. 南京社会科学, 2001(11).
- [17] 曹锦清,张乐天. 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特征:人情与关系网[J]. 探索与争鸣,1992(2).
- [18] 曹祥涛. 论我国社会资本的重建[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3(2).
- [19]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流向[J]. 社会学研究,2003(3).
- [20] 段继业. 论我国社会的隐形人际关系[J].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3).
- [21] 范德普尔. 个人支持网概述[J].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8(2).
- [22] 方竹兰. 中国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资本积累[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5).
- [23] 方壮志. 社会网研究的基本概念和方法[J]. 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5).
- [24] 弗兰·汤克斯. 信任、社会资本与经济[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5).
- [25] 符平. 社会资本和个体经营者的创业与发展[J]. 社会,2003(2).
- [26] 高玲玲、黄志斌. 社会资本的本质及来源[J]. 华东经济管理,2003(1).
- [27] 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力量[J]. 张文宏,译. 国外社会学,1998(2).
- [28] 桂勇,黄荣贵. 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8(3).
- [29] 桂勇. 关系网络在失业者求职中的作用[J]. 社会,2003(7).
- [30] 郭于华.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 社会学研究,1994(6).
- [31] 贾先文. 社会资本嵌入下公共服务供给中农民合作行为选择[J]. 求索,2010(7).
- [32] 贺寨平. 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 国外社会科学,2001(1).

- [33] 胡荣. 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J]. 社会学研究,2003(5).
- [34] 胡荣. 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2).
- [35] 季虹. 论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J]. 农业经济问题,2001(10).
- [36] 姜楠. 单位型社区社会资本研究——基于大连市 S 社区的调查[D]. 沈阳:东北大学,2009.
- [37] 金耀基. 关系和网络的社会学诠释[J]. 二十一世纪,1992(8).
- [38] 肯尼斯·纽顿. 社会资本与民主[J]. 杨松,编译.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
- [39] 孔晓娟,邹静琴. 农村社会资本现状、成因及对策[J]. 南方农村,2012(1).
- [40] 冷崇总. 试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J]. 上海农业经济,1999(4).
- [41] 赖晓飞,胡荣. 论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基于 CGSS2005 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思考[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6).
- [42] 李聪.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资本构建[J]. 泰山学院学报,2008,30(1).
- [43] 李惠斌.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2).
- [44] 李兰芬,李西杰. 社会信仰:社会资本的权威内核[J]. 人文杂志,2003(3).
- [45] 李伟民. 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2).
- [46] 李伟民. 论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系取向[J]. 社会科学战线,1998(2).
- [47] 李煜. 文化资本、文化多样性与社会网络资本[J]. 社会学研究,2001(4).
- [48] 李路路. 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动力[J]. 社会学研究,1995(6).
- [49] 李路路. 私营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J]. 中国社会科学,1997(2).

- [50] 李勇翔. 人际关系网透视[J].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0(5).
- [51] 李绍伟,池忠军. 村民自治的功能主义二分法及统合[J]. 甘肃社会科学,2011(5).
- [52] 林聚任,刘翠霞. 山东农村社会资本调查[J]. 开放时代,2005(4).
- [53] 林闽钢. 社会学视野中的组织间网络及其治理结构[J]. 社会学研究,2002(2).
- [54] 林南. 建构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 国外社会学研究,2002(2).
- [55] 林南. 社会网简介[J].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89(5).
- [56] 林南著,俞弘强. 社会网络与地位获得[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2).
- [57] 罗家德,张绅震. 社会资本与关系网络——信息化组织与科层组织之比较[R]. 网络与社会研讨会. 北京:清华大学,2002-05-31.
- [58] 刘林平. 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 [59] 刘平青. 信息租金、信息成本与家族企业制度安排[J]. 社会科学研究,2002(5).
- [60] 刘萃侠. 中国大陆近十年亲缘关系之交往研究概述[J]. 社会心理研究,1997(4).
- [61] 刘少杰. 以行动与结构互动为基础的社会资本研究——评林南社会资本理论的方法原则和理论视野[J]. 国外社会科学,2004(2).
- [62] 刘世定. 嵌入性与关系合同[J]. 社会学研究,1999(4).
- [63] 刘世奎. 论族居村落的人际关系及其变迁[J]. 江汉论坛,1996(1).
- [64] 刘友凡. 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J]. 中国农村经济,2001(10).
- [65] 陆德泉. 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交换形态[J]. 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1(5).
- [66] 牛喜霞编译. 资本的社会学转向[J]. 社会,2003(7).
- [67] 牛喜霞,谢树芳. 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 江西社会科学,2006(11).

- [68] 牛喜霞. 社会资本及其本土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6).
- [69] 牛喜霞. 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3(4).
- [70] 齐学红. 社会治理模式变迁与道德教育改革[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2(2).
- [71] 彭庆恩. 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J]. 社会学研究, 1996(4).
- [72] 潘允康, 阮丹青. 中国城市家庭网[J]. 浙江学刊, 1995(3).
- [73] 裴志军. 村域社会资本: 界定、维度及测量——基于浙江西部 37 个村落的实证研究[J]. 农村经济, 2010(6).
- [74] 钱宁, 田金娜.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自组织与社会工作的介入[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0).
- [75] 秦广强. 社会流动的影响与后果——基于 2003CGSS 的实证分析[J]. 湖南社会科学, 2011(5).
- [76] 阮丹青, 周路, 布劳等. 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1990(78).
- [77] 隋广军, 盖翊中. 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 学术研究, 2002(7).
- [78] 孙丽军, 石磊. 社会资本: 文献与进一步的研究[J]. 社会科学, 2003(1).
- [79] 孙立平. 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流动空间[J]. 探索, 1993(1).
- [80] 孙立平.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 社会学研究, 1996(5).
- [81] 孙庆民. 社会交换资源理论述评[J]. 社会学, 1995(1).
- [82] 田凯.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局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1(1).
- [83] 托马斯·福特·布朗. 社会资本理论综述[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0(2).
- [84] 王晓峰.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增收致富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基于东北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调查研究[J]. 人口学刊, 2008(5).

- [85] 汪和建. 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0(2).
- [86] 王积超. 社会资本及其测量的理论研究[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 [87] 王崑,翟学伟. 论周庄人的血缘观和地缘观——苏南农村现代化的一个前提[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4).
- [88] 王思斌. 中国人际关系初级化与社会变迁[J]. 管理世界,1996(2).
- [89] 王思斌. 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 [90] 王欣. “关系网”的经济分析[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6).
- [91] 韦恩·贝克. 社会资本制胜——如何挖掘个人与企业网络中的隐性资源[J]. 张国华,译.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1).
- [92] 谢萌,辛瑞萍. 社区主导型发展与农村社会资本的培育[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4).
- [93] 谢建社,牛喜霞. 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J]. 江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1).
- [94] 谢治菊,谭洪波. 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概念、测量与计算[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5).
- [95] 肖鸿. 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J]. 社会学研究,1999(3).
- [96] 徐琦. “社会网”理论述评[J]. 社会,2000(8).
- [97] 徐晓军. 论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3).
- [98] 徐延辉.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比较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2002(6).
- [99] 邢亚非. 乡村精英的崛起与政治认同的获得——国家政权与乡村关系新形态的探讨[J]. 改革与开放,2009(7).
- [100] 杨瑞龙,朱春燕. 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经济分析框架[J]. 学习与探索. 2002(1).
- [101] 杨善华,侯红蕊. 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

- “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 宁夏社会科学,1996.
- [102] 杨雪冬. 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3).
- [103] 杨中芳,彭泗清. 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J]. 社会学研究,1999(2).
- [104] 姚咏涵. 家庭承包制下土地功能的实证考察与农地经营制度创新[J]. 农业经济,2001(3).
- [105] 殷德生. 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一个理论综述[J]. 南京社会科学,2001(7).
- [106] 余英杰. 试论关系网[J]. 理论教育,1986(9).
- [107] 翟学伟. 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 社会学研究,2003(1).
- [108] 张凤珍. 关于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几点思考[J]. 经济界,2001(1).
- [109] 张广利,桂勇. 社会资本:渊源. 理论. 局限[J]. 河北学刊,2003(1).
- [110] 张海东,杨隽. 转型期的社会关系资本化倾向[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1).
- [111] 张军.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社会资本的代价与风险[J]. 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3(3).
- [112] 张红宇. 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变迁:阶段性、多样性与政策调整[J]. 农业经济问题,2002(3).
- [113] 张其仔. 社会网与基层经济生活——以晋江市滨镇跃进村案例研究[J]. 社会学研究,1999(3).
- [114] 张强. 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中国空族企业的用人模式[J]. 社会学研究,2003(1).
- [115] 张景芬. 社会资本与中国人的合作[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5).
- [116] 张笑寒. 构建我国农用地市场流转制度的思考[J]. 中国土地科学,2001(9).

- [117] 张宛丽. 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社会分层结[J]. 社会学研究,1996(1).
- [118] 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J]. 社会学研究,1999(2).
- [119] 张文宏. 从农村微观社会网的变化看宏观社会结构的变迁[J]. 天津社会科学,1999(2).
- [120] 张文宏. 中国农村的微观社会网与宏观社会结构[J]. 浙江学刊,1999(5).
- [121] 张文宏,阮丹青. 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 社会学研究,1999(3).
- [122] 张文宏.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2003(4).
- [123] 张文宏.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上)[J]. 江海学刊,2011.
- [124] 张文宏. 中国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 30 年(下)[J]. 江海学刊,2011.
- [125] 张文宏. 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J]. 社会,2008(3).
- [126]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J]. 社会学研究,2004(6).
- [127] 张文宏,杨辉英. 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3).
- [128] 赵延东. 测量西部城乡居民的社会资本[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6).
- [129] 赵延东. 求职者的社会网络与就业保留工资——以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为例[J]. 社会学研究. 2003(3).
- [130] 赵延东. 再就业中的社会资本:效用与局限[J]. 社会学研究,2002(4).
- [131] 赵延东. 再就业途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下岗职工的问题卷调查结果[J]. 社会学研究,2003(1).
- [132] 赵延东. 社会资本理论的新进展[J]. 国外社会科学,2003(3).

- [133] 郑杭生, 兔平清. 社会资本概念的意义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J]. 学术界, 2003(6).
- [134] 郑也夫. 社会信任论述[J]. 国外社会科学, 2003(3).
- [135] 周红云.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5).
- [136] 周建国. 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及其负面效应分析[J]. 唯实, 2002(3).
- [137] 周建国. 紧缩圈层结构论——一项中国人际关系的结构与功能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02(5).
- [138] 钟涨宝. 社会资本理论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解释功能[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
- [139] 钟涨宝.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J]. 社会, 2001(10).
- [140] 钟涨宝等. 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C]. 农村社会资本理论探讨. 南京; 中国社会学会, 2000.
- [141] 朱海龙. 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与社会舆论——以社会动员为视角[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4).
- [142] 朱秋霞. 网络家庭与乡村私人企业的发展[J]. 社会学研究, 1998(1).
- [143] 朱秋霞. 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在村庄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作用[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8.
- [144] 庄洁.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综述[J]. 发展论坛, 2003(1).

### 三、英文书目

- [1] Adhikari & Goldey. (2010). Social Capital and its Downside: The Impact on Sustainability of Induced 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 in Nepal World Development, Vol 38, No 2.
- [2] Alejandro Portes. (1995).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Portes(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



- sell Sage Foundation.
- [3]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s the Keynote Address at the XIX International Sunbelt Social Network Conference,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February 18—21, 1999.
- [4]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6] DeSilva M. (2006) System Review of the Methods Used in Studied of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M]//McKenzie K, Harpham T.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
- [7] Fischer, Claude.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8] Fukuyama, Francis. (1996).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Y: Free Press.
- [9] Granovetter, M. (1974). *Getting a Job*.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0]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 [11] Harpham, T. (2007). The measurement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Through Surveys, Kawachil, Subramanian Sv, Danielk.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New York: Springer.
- [12] Jackman, Robert W. & Ross, A. Miller.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s. *Th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1.
- [13] James C. Scot.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4] James, C. Scott.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5] Kawachi I, Kim D, Coutts A, Subramanian SV. (2004). Commentary on the three accounts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33(4).
- [16]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7] Lin. Nan. (1982).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edited by P. Marsden and N. Lin. Sage.
- [18] Lorry, G.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Press.
- [19] Marsden, P.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 S. R. Vol. 52.
- [20] Narayan. D. (1999). Bonds and Bridges Social Capital and Poverty,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67.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21] Paul Bullen, Jenny Onyx. (1997).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in Five Communities in NSW: Analysis. *CACOM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41)*, 1997.
- [22] Putnam, R. D. (1995a).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5—78.
- [23] Putnam, R. D. (1995b). Turning in, Tur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664—683.
- [24]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25] Putnam, R. D., R. Leonardi & R. Y.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6] Ronald Burt.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7] Schultz, T. W. (1967).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 (1. March).
- [28] Uzzi, Brinan. (1999) Embeddedness in the making of financial capital: how social relations and networks benefit firms seeking financing.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1999.
- [29] Van der Poel. (1993). Delineating Personal Support Network. *Social Networks* 15.
- [30] Woolcock, M. (1997).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7.
- [31] Yang, Meihui. 1989. Gift Economy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1).
- [32] Gao Yue, John Whalley, Yonglei Ren. 2014. Decomposing China's export growth into extensive margin, export quality and quantity effects[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4, (29): 19—26.



7. 51—60岁            8. 60岁以上

A3. 您的现在居住的房子属于哪一种类型：

1. 租房子住            2. 自家的土坯房            3. 自家的砖瓦结构平房  
4. 自建小楼            5. 政府统一建造的居民区  
6. 其他（请注明：\_\_\_\_\_）

A4. 您的户口状况是：

1. 农业户口            2. 非农户口（蓝印户口）  
3. 非农户口（城镇户口）

A5. 您的民族是：

1. 汉族            2. 蒙古族            3. 满族  
4. 回族            5. 藏族            6. 壮族  
7. 维吾尔族            8. 其他（请注明：\_\_\_\_\_）

A6. 您的宗教信仰是：

1. 佛教            2. 道教            3. 伊斯兰教  
4. 民间信仰            5. 天主教            6. 基督教  
7. 无宗教信仰            8. 其他（请注明\_\_\_\_\_）

A7.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是：

1. 共产党员（是哪年入党的 [ \_\_\_\_\_ ] 年）→跳问 A7b 题  
2. 民主党派→跳问 A7a 题  
3. 共青团员→跳问 A7a 题  
4. 群众 →跳问 A7a 题

A7a. 您目前是否担任某种党内职务？

1. 未担任任何职务    2. 村支部成员            3. 村支部书记  
4. 乡党委委员        5. 乡党委书记  
6. 其他（请注明：\_\_\_\_\_）

A7b. 请问，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吗？

1. 未递交过  
2. 递交过，第一次递交申请书是 [ \_\_\_\_\_ ] 年

A8. 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 (包括目前正在读的):

1.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2. 扫盲班
3. 小学
4. 初中
5. 高中
6. 中专、技校或职业学校
7. 大学专科
8. 大学本科
9. 研究生及以上

A8a. 您家庭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

1. 1—5 年
2. 6—10 年
3. 11—15 年
4. 16—20 年
5. 21—25 年

A9. 今年您家庭的总收入大约是:

1. 20000 元以下
2. 20000—30000 元
3. 30000—40000 元
4. 40000—50000 元
5. 50000—60000 元
6. 60000—70000 元
7. 70000—80000 元
8. 80000—90000 元
9. 90000—100000 元
10. 100000 元以上

A9a. 您家庭主要收入的来源及其所占的比例

A11a1. 农业生产纯收入 (总产量 × 市价 - 成本)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1—1. 其中: 粮食作物占的比重 (%)	%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2. 本地 (县内) 非农工作纯收入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3. 外地 (县外) 非农工作纯收入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4. 土地 (股份、出租) 收入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5. 其他收入 (并注明其中最主要的一项)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1a6. 总计 (访问员询问, 不要直接加总, 可以与上面总和不一致)	_____元	不适用 C. 不回答 X. 不知道 Y

A10. 您家庭年均近二年来用于文化消费的经费是:

1. 1000 元以下
2. 1001—3000 元
3. 3001—5000 元
4. 5001—7000 元
5. 7001—9000 元
6. 9001—10000 元
7. 10000 元以上

A11. 平时您的文化体育娱乐项目主要有哪些? (多选题)

- 1. 看电视
- 2. 看书看报
- 3. 看电影
- 4. 上网
- 5. 看戏(文艺演出)
- 6. 跳舞等健身活动
- 7. 串门聊天
- 8. 听音乐
- 9. 唱卡拉 OK (歌舞厅)
- 10. 其他\_\_\_\_\_ (请注明)

A11a. 您家拥有以下哪些文化设备? (多选题)

- 1. 电视
- 2. 收音机
- 3. DVD 或者 VCD
- 4. 电脑
- 5. 卫星接收设备
- 6. 乐器
- 7. 学习机
- 8. 其他\_\_\_\_\_ (请注明)

### B 部分： 个人社会交往情况

(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得到他人的帮助等。这些人，可能是自己的配偶、家人、亲戚、同事、老同学、邻居、朋友及其他人等。请您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姓或简称，如老张、小李、王姨、老伴等。)

B1a. 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碰到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找人商量或谈论：如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您做出决定；当您与配偶或子女发生严重矛盾，而又无法与其讨论解决；当您心情不好，想找人谈谈。此时，您会找谁商量或谈论？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_\_\_\_\_

B1a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 \_\_\_\_\_。

B1a2. 最先提到的 5 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认识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1																	
2																	
3																	

续表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 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4																	
5																	

B1b. 您和谁一起外出, 如赶集(会)、进城、逛商店、看戏、看电影、下饭馆、散步?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曾提到的, 请在姓名下面划线!) \_\_\_\_\_

B1b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 \_\_\_\_\_; 其中前面提到的有\_\_\_\_\_人。

B1b2. 最先提到的 5 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 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6																	
7																	
8																	
9																	
10																	

B2a. 当您家中有些活需要别人帮忙, 如搬大袋粮食或重物、或红白喜事、盖房子、打场等, 您会找谁来帮助您?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曾提到的, 请在姓名下面划线!) \_\_\_\_\_

B2a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 \_\_\_\_\_; 其中前面提到



当前农村社会资本的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

的有\_\_\_\_\_人。

B2a2. 最先提到的5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11																	
12																	
13																	
14																	
15																	

B2b. 当您有急事要外出一段时间（一周或更长时间），您会请谁帮助您来照料孩子、庄稼、牲畜并看管家呢？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曾提到的，请在姓名下面划线！）\_\_\_\_\_

B2b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_\_\_\_\_；其中前面提到的有\_\_\_\_\_人。

B2b2. 最先提到的5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16																	
17																	
18																	
19																	
20																	

B3a. 当您需要借日杂小物（如自行车、筛子、饭桌等）、食物（油盐酱醋、大米白面等）、农耕用品（如小四轮、拖拉机、耕牛）时，您会找谁借？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曾提到的,请在姓名下面划线!) \_\_\_\_\_

B3a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 \_\_\_\_\_; 其中前面提到的有\_\_\_\_\_人。

B3a2. 最先提到的 5 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21																	
22																	
23																	
24																	
25																	

B4a. 当您急需一大笔钱(看病、教育、结婚、盖房等),您会向谁借呢?

请调查员依次写下这些人的姓名:(其中有些人在回答前面的问题时曾提到的,请在姓名下面划线!) \_\_\_\_\_

B4a1. 请调查员算一下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 \_\_\_\_\_; 其中前面提到的有\_\_\_\_\_人。

B4a2. 最先提到的 5 个人的情况是:

编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受教育年限	职业	收入/年	单位所有制性质	是您的什么关系	与您认识多久	过去一年中,哪个节日您与他/她联系的最多	见面的次数/年	打电话的次数/年	你们之间的相熟程度如何	家庭住址距您家的距离
26																	
27																	
28																	
29																	
30																	

B5. 从 B1 题开始，到此为止，每一个问题中最先提到约 5 人，一共提到 30 人，请在其中选取约 5 人，说明他们关系是否密切（是，画钩）；是否认识（是，画圈）

序号及姓名					

B6. 在 B5 提到的 5 人中，您与谁至少每个月交往一次，如互相串串门、一起聊聊天、喝茶、饮酒、打牌、下棋、或打麻将等等？

请调查员记录这些人第一次出现的编号：\_\_\_\_\_；请调查员记录本问题一共提到多少人？\_\_\_\_\_。

B7. 近两年来，由于搬迁、去世或其他原因，您是否失去了一些能给您提供帮助、支持的人？如是，请说明有关情况。

序号及姓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是您的什么关系？										
失去的支持类型										

### C 部分：社区生活

C1. 您和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互相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

1. 非常不熟悉                      2. 不太熟悉                      3. 一般  
4. 比较熟悉                          5. 非常熟悉

C2. 在日常生活中，您与您的邻居，街坊/同村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行为吗？

1. 没有                                  2. 偶尔有                          3. 有时有  
4. 较多                                  5. 很多



续表

	很满意 1	满意 2	一般 3	不满意 4	很不满意 5
村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					
对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管理					
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确定方式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确定方式					
您的医疗保障情况					
您的养老保险情况					

## D 部分：社区整体状况评价

维度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1	2	3	4	5
社区参与	我积极参加村干部选举					
	我经常参与村里的秧歌队或其他协会的活动					
	我愿意为村级文化建设缴纳费用					
	我会免费为村级事务出工出力					
	我会主动关心村级事务					
	我会无偿为村级事务献计献策					
	我愿意免费担任村里的卫生监督员					
	我愿意参与“义务为村里的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活动					
	我愿意参加义务献血活动					
	我愿意参与资助村里比我更穷的人					
	我与邻居或村民之间经常互访（互相走动）					
	我常常与亲戚/朋友一起聚餐					
我和邻里之间经常在一起打牌（或玩麻将）						
社区归属感	我们村的发展对我很重要					
	我喜欢我所在的农村社区					
	我关心我们村的村级事务					
	我们村的大部分村民都愿意参与村级事务					
	为了村容村貌，我不会乱丢垃圾					
我们村会越来越好						

续表

维度	测量指标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1	2	3	4	5
合作	我与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来					
	我与本村或其他村的村委会有生意或项目合作					
	我与乡政府或县政府有经济上的合作					
	我与企业（如房地产公司/工厂等）有租赁协议					
	我与社会中介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有合作					
共享	有好吃的食物，我会分给邻居与村民					
	我家买了农耕用具（小四轮），我会免费让邻居使用					
	知道打折或优惠的信息，我会告诉我认识的人					
互惠	农忙时，我常常与其他村民互换活路					
	红白喜事时，我常常与其他村民相互帮助					
	我的邻居给了我好处，我也会给他好处					
	村民需要帮忙，我会不计报酬地帮助他					
信任	我相信我家人说的话					
	我相信我的亲戚（三代以内的近亲）					
	出外时，我可以把家门的钥匙交给邻居保管					
	我看信或写信遇到问题时，会请村里识字的人帮忙					
	我相信村领导					
	我相信政府					
	我相信国内媒体上的新闻					
	我相信警察、法官/法院					
	我相信医生					
	我相信市场上的商人/买卖人不会欺骗消费者					
	陌生人向我求助，我会帮助他					
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基本可信的						

衷心感谢您的参与！敬祝生活愉快！

## 附录 2：村主任问卷

(注：除了注明复选题的可以多选，其他均为单选题)

### A 部分：基本情况

A1. 本村有多少个村民小组：\_\_\_\_\_个；有多少个自然村组：\_\_\_\_\_个。

A2. 本村总户数：\_\_\_\_\_户；总人口数：\_\_\_\_\_人。其中劳动力有\_\_\_\_\_人，非农业人口有\_\_\_\_\_口人；文盲\_\_\_\_\_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_\_\_\_\_人。

A4. 本村离县城有\_\_\_\_\_公里，离乡镇政府驻地有\_\_\_\_\_公里，离最近的集市有\_\_\_\_\_公里。

A5. 村里有几所医院或诊所？\_\_\_\_\_所；有多少名医护人员？\_\_\_\_\_人。

A6. 村里有几所学校？\_\_\_\_\_所；有多少名老师？\_\_\_\_\_人；其中有\_\_\_\_\_名正式在编老师，有\_\_\_\_\_名代课老师。

A7. 本村有多少户通电？\_\_\_\_\_户。多少户有自来水？\_\_\_\_\_户。多少户有电话（包括手机）？\_\_\_\_\_户。

A8. 您村拥有的电话为\_\_\_\_\_部；电脑\_\_\_\_\_台，是否上网？\_\_\_\_\_；拖拉机\_\_\_\_\_台。

A9. 本村现有几个村办集体企业？\_\_\_\_\_个；有几个私营企业？\_\_\_\_\_个。

A10. 本村党员总数：\_\_\_\_\_人；本村专职干部\_\_\_\_\_人，队组干部\_\_\_\_\_人。

A11. 本村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占全村总人口数的比例分别是：第一大姓

氏：\_\_\_\_\_ %；第二大姓氏：\_\_\_\_\_ %；第三大姓氏：\_\_\_\_\_ %

A12. 本村行政面积：\_\_\_\_\_（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_\_\_\_\_ %；丘陵占：\_\_\_\_\_ %；山地占：\_\_\_\_\_ %。

A13. 本村耕地面积：\_\_\_\_\_ 亩。其中水田：\_\_\_\_\_ 亩；旱地（土）：\_\_\_\_\_ 亩。

A14. 本村非耕地面积：\_\_\_\_\_ 亩；水面面积：\_\_\_\_\_ 亩。

### B 部分：村财务情况

2011 年全年收入	万元	
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专项转移支付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村农业收入（承包收入 + 直接经营收入）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村办企业上交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村出租土地、房屋及其他财产收入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一事一议”筹资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一事一议”筹劳折款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卖出土地款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卖出企业收入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卖出其他资产收入（包括树林、房屋等）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贷款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捐赠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其他（请注明：_____）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总收入（访问员询问，可以与上面加总的数不一致）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2011 年全年支出	千元	
村专职干部工资、补贴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队组干部工资、补贴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教师工资和补贴（村负担）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日常办公开支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村公共建设开支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续表

2011 年全年支出	千元	
其中：修路架桥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农田水利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医疗、饮水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通讯、电力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办公设施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其他（请注明：_____）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村统一经营支出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管理费支出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招待及应酬费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其他（请注明：_____）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总支出（访问员询问，可以与上面加总的的数据不一致）		不回答 X；不知道 Y；不适用 C

访问员/督导注意：查看总收入和总支出，如果差异太大（在一倍以上），则需核实一下。

### C 部分： 新农村建设的情况

#### Ca. 农业生产发展状况

##### Ca1. 您村的产业结构：

1. 种养殖业形成产值占 50% 以上
2. 种养殖、加工与服务等共同形成产值占 50% 以上
3. 其他（请注明：\_\_\_\_\_）

##### Ca2. 您村的生产手段主要靠（ ）；排列优先顺序为：（ ）

1. 手工劳动
2. 机械化作业
3. 高新技术

##### Ca3. 您村的生产经营方式主要靠（ ）；排列优先顺序为：（ ）

1. 依靠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
2. 农业养殖生产大户
3. 小农分散经营

##### Ca4. 您村里有以下哪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或协会？（复选题）

1. 生产型专业合作组织
2. 文艺型协会或组织

- |             |                |
|-------------|----------------|
| 3. 技术型协会或组织 | 4. 基金或信贷方面的组织  |
| 5. 宗教信仰团体   | 6. 养老助残等社会公益组织 |
| 7. 其他组织     | 8. 都没有         |

## Cb. 生活状况

Cb1. 您村的粮食自给状况是：( )；您村的粮食自给率为 \_\_\_\_\_ %。

1. 不能自给
2. 基本自给
3. 完全自给并大量剩余（剩余产品如何处理？\_\_\_\_\_）

Cb2. 2011年您村平均家庭总收入为\_\_\_\_\_元，人均纯收入\_\_\_\_\_元，其中来自非农业的年收入为\_\_\_\_\_元，您村进一步增收的主要困难是：\_\_\_\_\_。

Cb3. 您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最多选三项，并说明每种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 |               |                  |
|---------------|------------------|
| 1. 农业         | 2. 养殖业           |
| 3. 家庭工业       | 4. 家庭副业及外出务工     |
| 5. 工资性收入      | 6. 经商办厂等经营性收入    |
| 7. 股票房产等投资性收入 | 8. 出租房产收入        |
| 9. 土地流转收入     | 10. 集体分红         |
| 11. 政府生活补贴收入  | 12. 其他（请说明_____） |

Cb4. 您村的人均住房面积为\_\_\_\_\_平方米。平均每家的房间数量为\_\_\_\_\_间。

Cb5. 您村加入农村合作医疗的有\_\_\_\_\_口人。您村加入农村养老保险的有\_\_\_\_\_口人。

## Cc. 村容情况

Cc1. 本村饮水主要靠：

- |                |             |
|----------------|-------------|
| 1. 水窖积攒的雨水     | 2. 天然井水，肩挑  |
| 3. 自家打的浅地表水井的水 | 4. 自己安装的自来水 |

5. 国家自来水引用工程  
6. 其他（请注明：\_\_\_\_\_）

Cc2. 您村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产生量是\_\_\_\_\_千克/天；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是否经过处理？

1. 是  
2. 否

Cc3. 你认为目前农村自然环境中最主要的污染源是什么？

1. 生活垃圾  
2. 农业生产垃圾  
3. 工业生产垃圾  
4. 建筑垃圾  
5. 粪便  
6. 污水  
7. 废气  
8. 其他（请注明：\_\_\_\_\_）

Cc4. 您村的生活燃料主要是：

1. 木材/秸秆  
2. 煤炭  
3. 沼气  
4. 液化气  
5. 电  
6. 其他（请注明：\_\_\_\_\_）

Cc5. 与您村最近的硬化路面相连的主要路段是：

1. 土路  
2. 沥青路  
3. 水泥路  
4. 沙子路

Cc6. 您所在村居民的生活卫生习惯总体如何？

1. 非常好  
2. 较好  
3. 一般  
4. 较差  
5. 非常差

Cc7. 2007 年以来，您所在村的生活环境发生的变化状况如何？

1. 越来越好  
2. 有所改善  
3. 维持原状  
4. 有所恶化  
5. 严重恶化

Cd. 乡风文明

Cd1. 您所在村中接受正规教育的最高学历是：（\_\_\_\_\_），占全村人口的\_\_\_\_\_%。

1.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2. 扫盲班

3. 小学
4. 初中
5. 高中
6. 中专、技校或职业学校
7. 大学专科
8. 大学本科
9. 研究生及以上

Cd2. 您村家庭子女的年人均教育支出金额为\_\_\_\_\_元。

Cd3. 您村年人均文化生活支出金额为\_\_\_\_\_元。您村人身健康支出年人均金额为\_\_\_\_\_元。

Cd4. 您所在的村庄有哪些文化设施？（复选题）

1. 文化活动室或图书室
2. 电影放映室或电影院
3. 戏台或戏楼
4. 体育场地或体育器材
5. 阅报栏
6. 个体文化室或个体网吧
7. 寺庙
8. 教堂/清真寺
9. 其他（请说明：\_\_\_\_\_）

Cd4-1 如果您村有图书室，共有图书\_\_\_\_\_册，平均人均拥有\_\_\_\_\_册。

Cd5. 您村里平时有些什么文化体育活动：（复选题）

1. 放电影
2. 观看戏台演出
3. 扭秧歌、地方曲艺表演等群众自娱活动
4. 借阅图书
5. 打牌下棋
6. 体育比赛
7. 其他文艺活动（请注明：\_\_\_\_\_）
8. 都没有

Cd6. 您村村民近5年以来是否参加过各类技术培训？ 参加技术培训的情况是：

1. 从未参加
2. 1周左右
3. 半月左右
4. 1月以上



## 3. 有以宗祠/祠堂为活动中心的家族组织

Cd13a. 如果您所在的村庄有亲族网络或家族组织，它（们）的主要领导/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

1. 非村干部人士（包括前任村干部）
2. 以非村干部人士为主
3. 现任村干部
4. 以现任村干部为主
5. 两者各半

Cd13b. 如果您所在的村庄有家族组织，它（们）有没有下列氏族成员共有/享的物品/资源呢？

	有	没有	不知道
Cd13b1. 族谱	1	2	3
Cd13b2. 公共用地	1	2	3
Cd13b3 坟场	1	2	3
Cd13b4. 薪柴林	1	2	3
Cd13b5. 宗祠以外的物业	1	2	3
Cd13b6. 基金	1	2	3

Cd13c. 如果您所在的村庄有亲族网络或家族组织，它（们）在下列方面所起的作用是

	没有作用	较小作用	有些作用	较大作用	很大作用	不知道
Cd13c1. 组织/赞助公益活动（如赈灾、扶贫、修路、教育等）	1	2	3	4	5	6
Cd13c2. 组织/赞助文化/娱乐/节庆活动	1	2	3	4	5	6
Cd13c3. 调解村民之间纠纷	1	2	3	4	5	6
Cd13c4. 管理氏族成员的共享资源	1	2	3	4	5	6
Cd13c5. 为村民提供信息	1	2	3	4	5	6
Cd13c6. 协助村民寻找就业或商机	1	2	3	4	5	6
Cd13c7. 协调本村与外村的关系	1	2	3	4	5	6
Cd13c8. 协调村民与政府的关系	1	2	3	4	5	6
Cd13c9. 协助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	1	2	3	4	5	6
Cd13c10. 协助政府的工作（如税收、治安、计划生育等）	1	2	3	4	5	6



3. 不满意

4. 不清楚

## D 部分：村支书或村主任的情况

D1. 您的职务是什么？

1. 村支书

2. 村主任

D2. 您的文化程度是：

1. 没有受过任何教育

2. 扫盲班

3. 小学

4. 初中

5. 高中

6. 中专、技校或职业学校

7. 大学专科

8. 大学本科

9. 研究生及以上

D3. 您任现职有几年了？\_\_\_\_\_年

D4. 除了务农，您是否还有其他的工作经历呢？（包括当村干部）

工作 顺序	工作时间		工作性质 1. 非农务工人员 2. 个体经营者 3. 私营企业主 4. 集体企业管理人员 5. 村镇干部 6. 其他（请注明）	工作地点 1. 本乡 2. 本县 3. 本省 4. 外省
	开始年份	结束年份		
1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2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3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4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D5a. 2011年您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的全年工资一共有多少元？记录：

\_\_\_\_\_元 不回答 X

D5b. 您的工资水平是由谁规定的？

1. 镇及以上政府

2. 村两委

3. 其他（请注明：\_\_\_\_\_）

D6a. 2011年您担任村支书或村主任的补助一共有多少元？记录：\_\_\_\_\_

元 不回答 X



D6b. 您的补助水平是由谁规定的？

1. 镇及以上政府
2. 村两委
3. 其他（请注明：\_\_\_\_\_）

D7. 在 2011 年内，您在以下日常事务上花费的时间占多大的比例？（注意各项加总为 100%）

	C7	C8		
		第一项	第二项	第三项
从事农业生产	_____ %	1	1	1
从事家庭非农活动	_____ %	2	2	2
计划生育	_____ %	4	4	4
管理集体企业	_____ %	5	5	5
社区管理（如家庭纠纷、红白喜事）	_____ %	6	6	6
应酬上级各部门	_____ %	7	7	7
组织农业生产、农田基建	_____ %	8	8	8
组织社区建设（水电医疗养老卫生道路桥梁等）	_____ %	9	9	9
其他日常事务	_____ %	0	0	0
加总	100%			

D8. 在刚才提到的十项工作中，您认为最难做的前三项依次为：

衷心感谢您的参与！敬祝生活愉快！